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曾志回忆实录

下

⊙曾　志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曾志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12

ISBN 7-218-02997-3

Ⅰ.①一…②曾…
Ⅱ.曾…
Ⅲ.曾志-生平事迹
Ⅳ.K827.7

著　　者	曾　志
责任编辑	何祖敏　倪腊松
特约编辑	杨筱怀
封面设计	方楚涓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32工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　　张	19.5
插　　页	10页
字　　数	470千字
版　　次	1999年12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2997-3/K·668
定　　价	36.00元(上、下册)



1932年在厦门从事地下工作时的曾志。



1961年毛泽东与曾志、陶铸夫妇在广州珠岛合影。



毛泽东

60年代曾志在毛泽东的书房。

60年代初曾志在白云机场迎接周恩来总理。



1960年冬，陶铸、曾志、陶斯亮与朱德、康克清在一起。



1959年曾志、陶铸与叶剑英、陈郁、区梦觉、林李明、邹家华、叶楚媚在一起。



1965年朱德、董必武、徐向前、聂荣臻、贺龙、陶铸、林李明、刘兴元、何连芝、薛明、张瑞华、黄杰、曾志在广州。



1997年曾志、陶斯亮与王鹤寿及夫人王颖在一起。



1995年江泽民与曾志等老同志在一起。



1997年胡锦涛与曾志、陶斯亮在北戴河。



1998年6月24日，曾志与曾庆红、由喜贵在北京医院。



1992年曾志与王任重在一起。



1958年曾志、陶铸与越南胡志明主席合影。



1995年曾志与胡耀邦夫人李昭在一起。



1954年陶铸、曾志、陶斯亮在广州家中。



1959年陶铸、曾志、陶斯亮在庐山。



曾志与陶斯亮一家。

曾志与陶铸在湖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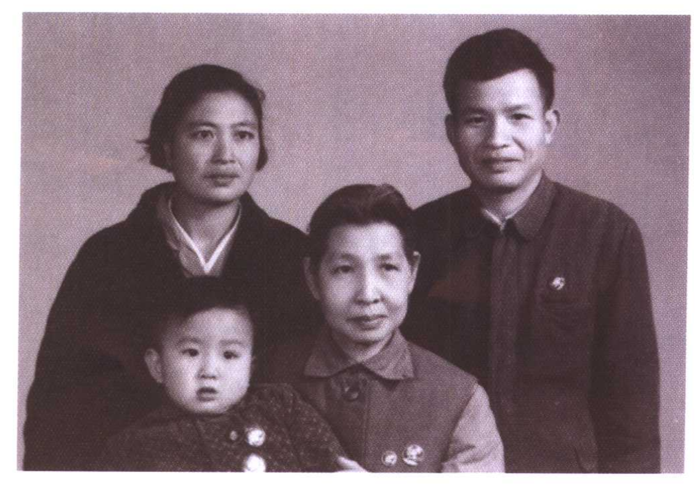
1947年曾志在东北。



60年代初曾志与外宾在一起。



1989年11月30日
曾志与陶斯亮在八宝山一室门口。陶铸逝世20周年。



1969年11月
曾志出中南海赴翁源前与曾春华全家在一起。



1990年4月，曾志二上井冈山看望石来发一家。



1998年4月4日曾志87岁生日。陶斯亮等兄妹三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母亲合影。



1998年3月16日，湖南暴动70周年、夏明震墓落成，陶斯亮代重病的母亲凭吊夏明震烈士。



1998年7月，井冈山，陶斯亮与大哥石来发夫妇、二哥曾春华夫妇抛洒母亲骨灰时在石来发家门口合影。



1992年9月曾志在家门前种花。



这是曾志外孙小亮为姥姥拍的最后一张相片。虽然病魔缠身，却依然笑容灿烂。

人的一生，都在路上

（代序）

柯　岩

人的一生，都在路上。在这漫漫的人生路上，无论是辉煌的，抑或是黯淡的，你都将遇到千千万万的人：有的长期交往，有的擦肩而过；有的令你赞叹，有的令你惶惑；有的令你鄙夷，有的令你无可奈何。当然，其中也有许多或此事让你钦佩，或彼举令你心折的人；但是，能让你刻骨铭心、终生仰慕、每一念及则令你肃然起敬如涤心肺者，滚滚红尘中，也就屈指可数了。

于我，曾志同志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其实，我和曾志同志相识很晚，交往不密，是她人格的力量深深地打动了我，终生教育着我。当着人，我像别人一样地叫她曾大姐；背着人，或只当着她家人的时候，我叫她曾妈妈。她曾多次反对说：就叫大姐吧！她的女儿亮亮（陶斯亮）也老憨笑说：我叫你小柯阿姨，你叫她曾妈妈，这不错了辈了吗？于是全体大笑。笑归笑，可不知怎么，多少年，还是这么叫下来了。

记得初见曾志同志是在一九六二年夏天。广州会议刚开过不久，正是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时候，许多文友聚会在北戴河。郭小川同志一天忽然对我和敬之说：陶铸同志也在北戴河，咱们看他去呀！我忙问：曾志同志也在吗？郭小川

说：你认识她?我说：哪儿呀，我只是想见她。郭小川点着头笑说：可陶铸同志会客，她一般是不出来的。我说：你说我们就是想见她嘛!陶铸同志谁还没见过呀!郭小川说：你为什么非见她不可呢?我说：她是传奇式的女红军嘛!郭小川磨不过我，用手挠着头说：嚯，还知道得不少呢!试试看吧……也不知郭小川是怎么试的，反正是联系成了。不但联系成了，而且说陶铸同志请我们吃晚饭。大家都很高兴，只有我这个傻瓜还不住地问：曾志同志出来吗?啊?曾志同志出来吗?

到了陶铸同志处，一看，只有陶铸和亮亮。我非常失望，又不甘心，就不断地和郭小川嘀咕，郭小川只好去走亮亮的后门。亮亮那会儿好像刚上军医大，一个大学生，又爱好文学，对我们十分热情，不一会儿，就把曾志同志请出来了。

怎么说呢?从那时到现在，长长的三十七年过去了，又是这样翻天覆地的三十七年!多少痛苦，多少快乐!多少眼泪，多少刻骨铭心的记忆!可写到这儿，三十七年前的那个黄昏，仍那样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就好像刚刚发生在昨天、在今天一样。

当时，亮亮喜笑颜开地出来说：妈妈来了。她是那样满不在乎地一说，可我竟一下愣住了。因为虽早有准备，知道曾志同志很漂亮，也听说过陶铸同志在厦门第一次见到她时，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总以为那是她年轻时候，在那血与火的年代，正是残酷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她又是出名的勇将，是陶铸同志把她想像成“母大虫”的强烈反差的缘故。却原来，她真是这样的美!我一直在美女如云的文艺界工作，眼睛早就历练得很“毒”，自是和当年的陶铸不一样；而她，也青春早逝，已年过半百，记得那天，她身着一件极其普通的月白色衬衫，浅灰色长裤，可气度却那样不凡。坐在北戴河陈年旧绿的纱窗下，和我们轻言细语地话着家常，是那样纤柔秀丽，又那样优雅脱俗，直能令你目不转睛。既很难想像出她当年赤脚持枪奔走在福建的崇山

峻岭叱咤风云的勃勃英姿，也很难看出现在是一个身居高位的广州这样一个繁华大市日理万机的工业书记。

那会儿我年轻，就那样很不礼貌地盯着她看，只间或瞟一眼风风火火的陶铸同志，席间说了些什么，竟完全不记得。回去后，可就抓住小川不放了，让他反反复复地叙述有关曾志的一切，他所说的，我至今记忆清晰。他说她是如何地英勇顽强，从年轻时就一直活跃在红军中，可谓身经百战；说她是如何地机智慧敏，在地下工作时怎样多次死里逃生，真是命如悬丝；说她是怎样自尊自强，因为陶铸同志一直身居领导岗位，整个战争年代，她几乎都和他分开各自工作；说她是怎样地情深义重，宁肯受处分也要把危险告诉被错误怀疑的同志；说她个人生活十分曲折不幸，但对革命却无限忠诚，无论是重病在身，还是被错误处分，都不计个人得失地默默为党工作，为革命丢失了几个亲生的儿子……他说得十分动情，我听得如醉如痴。之后，我又向多少革命前辈询问过有关她的情况啊！之后，我又曾和曾志同志有过多少接触啊！但是直到今天，直到此刻，直到我在含着眼泪一页页读着她这本回忆录时，我才知道：她哪里是什么丢失了儿子?!她是为了革命，亲手把他们都送了人，其中一个，甚至是为了给党筹措经费，心甘情愿地卖了一百块大洋……

我不禁掩卷痛哭了。我们这些后来者常常自认为很革命，可是，对于革命前辈，我们究竟了解多少?对于他们的艰辛困苦，他们的怀抱胸襟，我们更是体会不深！曾志同志很谦虚，她说她写这本书，只因为她是一个历史见证人。可是当我们读到那位伤残而不能重返前线的老红军背着小亮亮，历时一年，千山万水、顶风冒雪、忍饥挨饿甚至乞讨……终于把她送还父母的怀抱；当我们读到“文化大革命”旋风陡起，一向极其自尊的曾志对挨斗回来的陶铸说“……我……以后……再不和你争论了”；当我们读到陶铸那首《赠曾志》：“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

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曾志把它深深地缝进衣角；直到陶铸病体支离被押解出京，明知是死别，却滴泪不掉，只含笑握手。陶铸头也不回，曾志目随万里……这是多么深重的同志情，多少崇高的革命义，何等澄澈的壮士情怀，何等刚烈的铮铮铁骨!看着他们，想着千千万万和他们一样的先行者，我们还能无动于衷地安享由于他们的奉献而得来的一切吗?还能高高在上地挑剔指责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吗?是的，他们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可是，即使由于时代的进步，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在某些方面比他们有了多少进步，但在我们的后人看来，我们不也会有我们的局限性吗?是的，他们是革命者。可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也是父亲和母亲。不妨试想一下，假如我们也处在他们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我们肯像他们一样，只是为了后来人，而心甘情愿地、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一切吗?

我奉劝人们读读这本书，我还想请求哪位高明的编导把它编成戏，拍成电影，因为它不但能让后来人了解那段历史，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还会扩大我们的人生视野，让我们知道世界上确曾有过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无私无畏，完全忘我，为了真理，为了正义，可以披肝沥胆、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的人。这些人决不是像某些人所描绘的“头脑简单”的“傻瓜”，而恰恰是一些大智大勇的人，一些像我们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着极其鲜明个性的人，不同处只在于：即使我们真心实意地终身努力，恐怕也很难企及这些人。

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在面对曾志同志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她和屠格涅夫《门槛》里那个少女叠印起来，无论她在对我说什么，我的耳际也都会叠响着文中那著名的充满诗意和哲理的问答：

深暗的浓雾里吹着雪风，从建筑深处透出来一股冷气，同时还有一个缓慢的，重浊的声音：

“呵，你想跨进门槛来做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在等着你吗？”

“我知道。”女郎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

“我知道。”

“好。你准备着牺牲吗？”

“是的。”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灭亡，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悯。我也不要声名。”

“进来吧。”

女郎跨进了门槛。

“傻瓜！”有人在后面这样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个回答。

后来我也上了年纪，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每当和曾妈妈面对时，我眼前呈现的画面和耳中响起的声音就要比那更为鲜明和浓烈。因为我懂得了：其实跨进这个门槛并不是很难，难的是在跨进这个门槛之后。多少人在跨进了这个门槛之后又退了出去；又有多少人在门槛里改变了初衷……

而曾志同志，我们的曾大姐，曾妈妈！却不但跨进了门槛，而且矢志不移。无论是慷慨悲歌，还是衣单被薄；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生离死别，她都面不改色。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手握权杖，无论生降荣辱，还是黄金如雨，她永远是那么谦虚谨慎，

艰苦朴素，严格自律，从容淡定。从一个纤纤少女直到白发苍苍，她永远是那么的正！记得有一次我去看她，她正为了家人买了几样时令菜在批评他们，亮亮先还不服，见我进门，高兴地跳起来说："小柯阿姨来了，小柯阿姨来了！"可曾妈妈根本不容她转移话题，说："小柯阿姨来了，你也跑不了。不要以为这是小事，百里大堤往往毁于蚁穴……"她举了好几个腐化变质的实例，直说得满座肃然。又一次，她一个当空中小姐的亲戚随手带回了飞机上用剩下的咖啡和小毛巾，她居然为此专门给民航写了信，让他们注意对年轻人的教育……在她入党七十周年之际，许多敬慕她的老同志自发地为她举办了一个纪念会，她却在会上反复地讲述自己革命几十年中的教训和错误；她临终时，叫亮亮帮她清理存款和现金，亮亮找出八十几个没用完的薪金袋，一共只有几万元。可她还反复叮嘱亮亮说："袋子一定不要丢掉……因为它们能证明：这都是我的工资，是我的劳动所得，这钱……是干净的……每一笔都是清白的，是我的辛苦钱，上缴给中组部老干局……留给外地来京……看病的……困难的老同志……用……"

她过世后，亮亮在一只旧牛皮纸信袋上，看见妈妈写有这样一行字："我生命熄灭时的交代。"打开信封，遗嘱写道：

> **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京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告打扰；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另一部分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决不要搞什么仪式，静悄悄的，三个月后再发讣告，只发消息，不要写生平……**

亮亮为了完成妈妈的遗愿，让妈妈死后真正成为一名彻底的丧事改革者，就真正让她这样走了。曾妈妈从从容容地、坦坦荡

荡地走了，像清风明月一样静静地走了。于是，她也就像清风一样永远吹佛着我们，像明月一样永远照耀着我们，岁岁年年，直到永远……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能像屠格涅夫一样说她是“一个圣人”吗?不，我不能。我只能说：她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但愿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在人生的路上都能像她一样既追求崇高，又甘于平凡；只执著于自己的信仰，而淡泊于功名利禄。这样，在我们临终的时候，也许我们也就能像她一样说出“我的一切所得都是干净的，是清白的，清清白白的”了。

写在前面

我叫曾志，今年（一九九八年）八十七岁。我算不上是领导、名人，也不是奇人，更不是伟人，是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也许有人问，那你为什么要写回忆录，浪费读者的时间和精力呢？这是因为我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历史的见证人。

我参加党、参加革命七十多年，这期间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了，我并不贪生怕死，然而我却幸存下来，死亡之神多次与我擦肩而过。

我之所以幸存下来，不是什么“福大”、“命大”，而是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毛泽东思想的教导，靠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靠刚强的斗争意志和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以及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坚信三座大山一定能推翻，坚信中国革命一定能胜利，坚信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大同一定能成功。正是靠着这些信念，我才得以从各种常人难以想像的困境中顽强地走了过来，从无数险恶的逆境中幸运地活了下来。

我的一生，几乎经历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风风雨雨。我在苏区、游击区、白区、国统区、解放区等各种复杂的环境下工作过，从事过武装游击斗争、地下斗争、统战工作、抗日工作等

等。我有过成功与胜利,然而也有过挫折和失误。我曾多次受过处分,而其中也有过冤枉和委屈……

但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一直抱着积极热情、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每一项工作和斗争。我始终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最为重要,而把家庭、子女、感情看得较轻、较淡。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

当前,我们的祖国在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指引下,正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宏伟大业,并昂首阔步迈向新的世纪。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更应该继承党的优良传统,莫忘历史经验与教训。因此我有责任和义务,抓紧时间把我从呱呱坠地开始的这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尽自己的记忆如实地记述下来,付梓刊行,留给后人。藉以缅怀先烈,鞭策自己,激励来者。

因此,如果广大读者能够从我的这些平凡的往事中得到一点教益、启示和借鉴的话,我也就没有遗憾了。

一九九八年六月八日于北京医院

目　录(下册)

第九章　两条战线

第十章 宝塔山下

第十一章　转战东北

第十二章　工业书记

第十三章 陶铸落难

第十五章　北京供养

第十六章　耀邦麾下

第九章　两条战线

日机轰炸，我赶紧躲到桌子底下，房梁掉下来让药箱支住，才免一死；三里街住户跑光，我召集几个进步青年，给过往的士兵烧水做饭，感动了很多人，我们成了荆门“明星”

与陶铸在十里铺挥泪相别后，我与郑速燕于当天下午赶到了荆门县城。当时鄂西北地区由国民党第五战区的三十三集团军驻防。

郑速燕对外的身份是荆门合作指导小组的组长，其实，郑速燕是中共党员。这个小组共有七个合作指导员，都是从汤池训练班出来的。指导小组设在一个已停课的小学校里，小学校的旁边是医院，学校的大门过道和一间教室里，堆着齐屋顶的医药箱，这是隔壁医院寄放的。学校的另一边则是监狱。

到荆门的第二天，我们就遇上了日军飞机的轰炸。

中午，我们正围着桌子吃饭，就听到了飞机声。开始没在意，因为日机常来侦察骚扰，后来炸弹在周围爆炸了，大家才紧张起来。可是不等我们夺路逃跑，又一颗炸弹已经落在了小学校的屋顶上，爆炸声和房屋的倒塌声震耳欲聋，我们赶紧躲到桌子底下。敌机轮番轰炸了好久，谁也不敢动一动，直到听不到飞机声音了大家才从桌子底下爬出来。一看，学校的教室倒了好几间，我们藏身的那间也塌了一半。幸好靠墙堆满了药箱子，房梁

掉下来正好被这些箱子顶着才没有压塌桌子，否则我们都可能被倒塌的房子压死。

我们拔腿往北跑，不料敌机又飞了回来，大家只好就近跑进一户人家的菜园子，卧倒在矮矮的瓜棚底下。敌机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轮番轰炸，一串串落下来的炸弹看得一清二楚，眼看就要掉到我们头上了，“轰”一声却在附近爆炸了。那些炸弹不算大，估计不上十斤，但数量很多，每批投弹都有十几枚，所以那一天荆门县城倒塌的房屋和死伤的百姓不计其数。

我们在瓜棚底下大约躲了两个小时，一直到看不见飞机了，才出来。

天将黑时，我和同志们走遍了城里的各条街巷，到处是断垣残壁，到处燃着熊熊的大火，到处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流经城区的刘家河已成了浑浊的血河！

在荆门——襄樊公路上，那一阵日夜都有从武汉方向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经过。有的成群结队，有的三三两两；有的枪上挂着鸡鸭，一步一晃；有的手上抓把地里拔来的葱蒜，边走边嚼。个个无精打采，步履蹒跚，疲惫不堪。

我同合作指导小组几个人连夜商量如何开展工作。他们都是青年学生，抗日的热情很高，只是缺乏军事知识，缺乏发动群众和统战工作的经验。我当时也只二十七岁，但在这群人中就算是老资格了。尽管我不是合作小组的指导员，也不是党组织分配来的，然而因为我当过训练班党支部书记，还是教员，他们又知道我曾是红军战士，打过游击，参加过苏维埃的土地斗争，所以都非常欢迎我的到来。

我说：“现在武汉失守，国民党军队大溃退，不断路过荆门，这正是我们做军队统战工作的好时机。要利用目前的兵荒马乱，与他们多接触，建立联系。”我提出，做国民党军队统战工作的目的，一是向军队宣传抗日救国，鼓舞他们抗击日寇的士

气；二是用军队作掩护，建立群众组织，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和武装，准备创建游击根据地。他们对我的意见十分赞同。

说干就干，我们首先开展了劳军活动。我们选择荆门城外靠公路的一条小街，叫三里街，三里街上的住户都跑光了，家家都关着门。我们打开了一家饭馆，搬出锅碗瓢盆、桌椅板凳，从几家逃跑的大户人家抬出大米、柴禾，又找了几个本地进步青年，就在公路旁埋下大锅烧开水、煮稀饭。

水开了，饭熟了，我们一碗碗舀好摆在桌上，对过往的士兵们喊："各位老总辛苦了！日本鬼子想要灭我中华，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你们抵抗得好！我们是荆门合作指导小组的爱国青年，特意烧了开水煮了稀饭慰问老总们。请大家停下来歇歇脚，喝碗开水吧！如果饿了，就请喝碗稀饭。身上有钱，随便给一点就行，没钱也不要紧！这是我们爱国青年对抗日将士的心意！"

于是，停下来喝开水、吃稀饭的官兵络绎不绝，有的还坐下来歇息聊天。

我们从早到晚不停地烧开水做饭，感动了许多士兵，他们说：

"行军几百里，地方官见不到，连老百姓也难得碰上，从来没看到对我们当兵的这样好的。"

"不是骂你们，真的！荆门除了狗就只剩下你们了！你们不怕敌机轰炸，不怕脏不怕累，又不要钱，这样的爱国举动，在中国怕是绝无仅有的！"

很快，这些部队成了我们的活广告，他们走到哪儿就替我们宣传到哪儿，说荆门有几个爱国青年，其中还有女士，不怕飞机炸也不辞劳苦，在全县百姓和官员跑光的情况下，为官兵们送水送饭……不到几天，这些话就在方圆百里的国民党军队里传开了，我们一下子成了荆门的"明星"。

大部队过完，我们决定开个“军民合作饭店”，王昆仑专门来视察，把我介绍给三十三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陶新畲；部队有五千袋大米急需运输，我们又趁机组织起了“军民合作运输队”

荆门是宜昌与襄樊之间的第一大县，也是两地交通的必经之地，所以过往的车辆、行人较多。这时国民党的大部队基本过完，劳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为长久之计，我们决定把公路边烧水煮稀饭的事停了，集中力量开一家饭店。三里街上正好有一家饭馆闲着，拾掇拾掇便挺像样，去乡下买来些鸡鸭鱼肉，还找回了原来的厨师，然后我用毛笔写了个招牌“军民合作饭店”，往外一挂，这就开张了，而我就是这里的老板。

不出所料，饭店的生意非常兴隆，不但过往汽车上的客人纷纷下来吃饭，就连附近的国民党驻军也有常来下馆子的，这是因为偌大个荆门，饭店却仅此一家。合作饭店除了厨师与一名勤杂工是雇的，其余七八人都只尽义务不拿工钱（此时荆门合作指导小组的薪水也已停发）。都是青年人，都是为了抗日救国走到一起来的，所以大家的关系很融洽。

饭店跑堂十分关键。我们就是通过跑堂接触客人，了解他们的职业和思想动态，了解战场情况，同时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持久战思想，并尽量同他们交朋友的。几个担任跑堂的青年都聪明伶俐，善于应酬，干得很出色。

接着，我们又利用隔壁人家办了“军民合作旅店”。还在饭店对面开了一家“军民供销商店”。供销店的老板过去既做过生意，又参加过苏维埃工作，是从老苏区杨家集找来的。再后来又办了一家“妇女制鞋合作社”，制鞋社的主任是荆门城里的一个进步女青年。这样，我们的企业就越办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我们的工作情况后来连远在襄樊的鄂西北区党委书记王翰也知道了，为了加强这里的工作，经区党委决定，任命我为荆当远中心区委（后改为中心县委）书记(“荆当远”即荆门、当阳、远安等县），以后又派了吴云鹏、马仲凡、王全国、王守如、刘真、张清华等参加荆当远党的地下工作，荆门、当阳各地的县委已相继建立。

至此，从一九三三年以来已被破坏五年之久的各级党组织又终于全面重建起来了，各地党员人数也有很大增加。

军民合作饭店开张不几天，来了几个前往襄樊的客人，说要见见饭店管事的，于是我便会见了他们。

原来，他们是国民政府第三厅的，是郭沫若厅长的部下，其中一位就是王昆仑先生，他是第三厅的视察员，穿皮夹克、黑皮鞋、西装裤，戴副眼镜，举手投足一看就知道是个有大学问的人。王先生对我说：“你们不怕敌机轮番轰炸扫射，在公路上烧水做饭慰劳过往军人，现在方圆四五百里的军队都在传播着你们的佳话。你们的行为，特别是女士们的表现给了抗日将士很大鼓舞。有些士兵掉了队，又饿又冷，几天没吃过一顿饭，而在你们这里吃饱了肚子，得到了温暖。军队感激你们，敬佩你们！”

王昆仑先生又说：最近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将军）就在荆门附近驻防，我想把你们介绍给三十三集团军政治部。你们是抗日爱国青年，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军队帮助，你们也可以帮助军队——军民合作抗日嘛！说着他取出自己的名片，在背面写道：“陶新畬副主任，兹介绍曾霞女士前来拜见，请予接待。”（曾霞是我当时的化名）他说：“我现在就去陶新畬那里，我会当面把你们的情况告诉他的。你拿这张名片去找他，他保管会见你的。”

王昆仑这个介绍，正是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慰劳过路官兵，开办军民合作饭店、军民合作旅店，就是为了做国民党军队的统

战工作，就是要与上至长官下至士兵的整个军队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以便发动群众抗日救亡和开辟党的地下工作。

来饭店和旅店吃饭、住宿的人越来越多，既有一般旅客，也有军队的官兵，既有兵站人员、军车司机，也有去日军占领区的便衣侦探。对所有客人我们都热情接待，而对便衣侦探和兵站人员我们则更加热情，有意给一点优待，或饭菜丰盛点，或价钱便宜点，所以跑堂的同志与他们都成了朋友。兵站是军队在后方交通线上设置的物资供应、伤病员转运和过往部队接待的军事机构，它在各地还有许多据点，跟兵站的人搞熟了，对我们开展工作是很有利的。当时正是国共合作初期，政治上比较清明，所以他们对我们并无戒备，海阔天空，说话毫无顾忌，只要引导得法，什么情况都敢掏给你。所以我们对国民党军队的驻地、兵力，日军进攻的动向，两军对峙的情况等了解较多也较早，这就使我们的工作避免了盲目性。

接到王昆仑名片后不久，我就与郑速燕去荆门城外的三十三集团军驻地找陶新畲。果然一递名片，陶新畲副主任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说："我们一来到荆门就听到了你们慰劳军队的事情，全军官兵也都在议论这件不寻常的事，正想去看你们呢！今天你们来了就是我们的上宾，快请坐！"

我们说："前些日子，我们只顾埋头劳军，没有离开荆门城，不知道城外有这么多驻军，要不然，早就来拜访了！"又说："部队初来乍到，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尽管说，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陶新畲叹口气："唉！大轰炸之后，荆门城的百姓进的少，出的多，政府关门，商店关门，县长也跑了，连民夫也找不到，军队有许多事没法解决。眼下就有五千多麻袋大米搁在沙洋的船上，上不了岸，更运不来荆门。这是军队的口粮。军队一天不吃饭就不能打仗，看你们能不能帮忙？运费我们出，贵一点也可以的。"

我们说："试试看吧！"

陶新畲高兴极了，马上把管后勤的副官长找来，介绍给我们。副官长说："从沙洋到荆门，运一袋大米给一块银元，另发两斤大米作口粮，行吗？"

我说："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吧！"

我们回来商量后，认为：军队无粮是大事，理当尽力，而且这也是取得军队信任和开展群众工作的好机会。可是，上哪儿去找那么多民夫呢？

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荆门南区。南区是红军活动过的地方，群众基础好，红军被打散后，在国民党军队以及联保和保安队的"追剿"下，原苏维埃政权的干部和积极分子纷纷躲避在外，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有些同志已经回来了，郑速燕等已经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并恢复了其中一些党员的组织生活。

南区的杨家集我也去过，还住过几天。那次去就我一个人。我身着旗袍，外罩绿色大衣，原是城里人装束，为走路方便，我把大衣脱下卷起背在背上，又把旗袍的前后片提起掖在腰间，便成了一副上褂下裤的乡里人打扮了。从荆门到杨家集六十多里的公路，沿途有不少国民党士兵的尸首，或趴或仰，或身首分离，却不见有人来收尸掩埋。那时，国民党撤退下来的部队还有少数掉队的，稀稀拉拉在这一带经过，有走跛了的，有生病的，有伤员，大多军容不整、纪律很差。还见到一些散兵到农民家里抢来鸡鸭，挂在枪尖上，一路嘻笑着往北走。这情景使我有些担心，我没带武器，怕这些散兵游勇胡作非为，直到在南区找到李纯斋，一颗心才落了地。

李纯斋是共产党员，红二方面军来时，他是苏维埃委员，斗争很坚决，也是逃亡在外刚回来的。他在当地很有威信，领着一帮年轻人活动得有声有色，当地的地主保甲都不敢碰他，他又很重视武器，想方设法搞了不少枪支。

在南区我们还商量过建立党组织，成立秘密贫农团，派人打入联保、保安队去掌握武装以及在国民党政权里安插我们同志的事，我还建议把邻村那十几条枪买下来。李纯斋说："他们弄枪主要为了对付来村里抢劫的国民党士兵，所以只要短枪，不要长枪，一枝长枪给他们三几块钱就能要来。"我交代枪要藏好，日本鬼子一到就把我们的武装拉起来。

由于我们跟南区已经有了这些来往，南区党的力量较强，因此决定把三十三集团军运粮的事交给南区去办。

我同郑速燕、吴显忠等简单商量了一下，便连夜派人到南区联系。第二天他们回来了，说："运粮的人可以找到。沙洋到荆门来回三天，赶紧一点两天也能到。用鸡公车运，一车装三麻袋，用牲口也可驮两麻袋，农民核计了一下，认为还是划算的。就是怕军队不兑现，还怕把粮运到荆门被军队拉夫。"

我立即把这一情况转告给三十三集团军的军需长官，同时建议：组织一个军民合作运输队，发给盖有军队大印的军民合作运输队旗帜，再发给通行证书，写明沿途不得阻拦和拉夫。军需长官问："那运输队由谁来管呢？"我说："队长由军队任命，管理人员由我们合作指导小组派，因为军队一派人，农民就不敢来了。"军需长官一一同意了，因为他们非常着急，只求大米能尽早运到荆门。

运粮开始了，我们组织了三个分队，每个分队都发给队旗、委任状、通行证和介绍信。第一批有五六十人参加，由我们合作指导员和南区的党员带队押运，大家起早贪黑，昼夜兼程，结果两天就运到了。农民们拿到了白花花的现大洋和一小袋大米，个个欢天喜地。于是，第二、第三批参加的人就更多了，轻车熟路，速度也更快了。结果仅用了十几天，五千多麻袋大米就全部运到了军队手里。

军队对我们很感激，说：我们找不到县政府，而且即使找到

县政府怕也派不出民夫，还是你们这些青年本领大。

这件事又很快传开了，农民们都把我们当亲人。因为凡是参加了运粮的，每人都拿到了十几块银元，这对农民来讲是笔很大的收入。在运粮这件事的推动下，南区的工作进展得很快，党和群众组织更加壮大了。

粮食运完了，我们也取得了三十三集团军特别是后勤人员的信任。我们建议：现在找民夫的确较难，所以运输队不要解散，以备军队不时之需，而且运输队还可以进山去运些山货来供应军队，于军于民都有好处。他们同意了，运输队保留了下来，旗帜和证明等也没有收回。

后来我们便利用这些旗帜和证件成立了一个三十多人的专业运输队。当时三十三集团军正在宜城、南漳一线驻扎，而我们也正要开辟宜城、南漳、钟祥一带山区工作。运输队就着意进入这些山区帮助代运山货，沟通了山里山外的贸易。通过运山货，运输队直接与穷苦山民接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告诉他们日本侵占东三省和北平、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后奸淫烧杀的情况，号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保家救国，拿起家伙跟鬼子干。山民们对运输队员都很信任，群众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运输队成了抗日宣传队和发动群众的工作队。很快，在这些原来的空白点上，建立起了农民的秘密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又秘密串连起各自的亲戚、朋友，迅速扩大了我们的活动范围和政治影响。

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张克侠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冯玉祥是他的连襟；了解到他的政治面貌后，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为防止国民党反目成仇，我们组织了公开与地下的两套班子

就在这个时候，鄂西北区党委书记王翰派人通知我：三十三

集团军的张克侠是抗日进步人士，要我主动找他联系。

经过这一阵工作，三十三集团军的情况我们已了解不少。这个集团军下辖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集团军总司令是张自忠，政治部主任韦永成，副主任陶新畲和谢某某，参谋长就是张克侠。据说陶新畲是脱党分子，谢某某是蒋介石委派的。而张克侠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属，是冯玉祥夫人的妹夫，也就是冯玉祥的连襟。三十三集团军有个顾问，记得姓徐，是个托派；还有一个副官长姓王，山东人，大高个儿，行武出身。七十七军不在荆当远一带驻防，军长是冯治国；五十九军军长由张自忠兼任，副军长李文田则是地地道道的旧军人。

张自忠是有名的爱国将领，当时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少到荆门。据说他很爱读书，他买的抗战书籍足有半麻袋，其中就有我写的《游击战争中的政治工作》一书。当他得知荆门路边几个爱国青年劳军的事情之后，曾在一个雨天打着伞来拜访我们，可惜那天我们正好都不在，让他空跑一趟，失去了一次与这位抗战英雄相识的机会。

运粮的任务完成之后，三十三集团军由副军长李文田出面，请我吃饭，作陪的有参谋长张克侠、政治部副主任陶新畲、谢某某等。李文田让我坐上席，嘘寒问暖，夹菜敬酒，大献殷勤。知道我是湖南人，便调笑道："湘女最多情啊！"他问我曾在哪里深造，我骗他是福州学院毕业。席间说到战争形势时，我也说了我的看法，从敌我对峙的态势说到日军可能选择的进攻路线，可谓侃侃而谈，头头是道，令他们大为惊讶。我之所以敢这样讲，一是因为他们是友军，我有必要作可能的提醒，二是因为我所说的没有超出一个有头脑的爱国青年的知识范畴。李文田说："曾小姐文韬武略，真是女中豪杰，佩服佩服。但你对地形怎么这样熟悉呢？"我说："是从地图上看来的。"李文田忙问："是军用地图吗？"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敏感问题，便说："就是街

上卖的学生地图呀！”接着，我又根据我党公告于世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精神，说了我的抗日主张，李文田指天誓日地说：“抗日不分党派，谁要是打日本，我给他下跪磕头！”又突然问我：“曾小姐，你这样能干，是共产党吧？”我说：“我相信马列主义。共产党嘛，我还不够格呢！”

在餐桌上，我认识了张克侠参谋长，我主动与他招呼，并说改日要去拜访他，向他请教抗日的问题。他笑着连声答应：好、好、好！

张克侠将军高瘦而挺拔，白净脸，单眼皮，穿一身毛料军装，佩戴着中将军衔。他的神态沉稳，举止儒雅，待人热情而谦和，与同桌那帮高声说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行伍相比，显得很斯文，他一直带着浅浅的微笑静静坐在那儿，几乎没有说话。

其实我对张克侠的大名早有所闻，知道他是国民党将领中为数不多的廉洁正派的人，在三十三集团军中口碑极好，威望很高，是位传奇式的军人，人称“佩剑将军”。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在一篇文章中称其为“出类拔萃的人物”。

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与张将军在餐桌上认识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他就到我们饭店来了。

因为我对他已经有所了解，所以说起话来就比较放得开，他似乎也没有多少顾忌。我们海阔天空地谈抗战形势，谈抗日的战略方针，谈持久战，也谈到了蒋介石的抗日决心等等。后来我问他：“听说参谋长是冯玉祥先生的连襟？”他便告诉我：大革命时期他在苏联学习，时与冯先生的女儿同学，后又认识冯先生的妻妹并结为夫妻。他告诉我，前些年他参加过抗日同盟会的喜峰口、古北口战斗。“那么，抗日同盟会有一个叫萧明的，你认识吗？”“认识、认识！你也认识他吗？”他显得很感兴趣。

我说：“认识，我同他夫人还是朋友呢！”

他十分振奋："我同萧明也很熟呀！"

关于萧明的话题到此戛然而止，彼此的政治面貌却已心照不宣了。因为萧明是共产党员，又是我党领导的抗日同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无论是我是他，如果没有党的关系怎么会如此深知萧明呢？

此后他对我便几乎没有什么避讳，无话不谈。他经常向我通报战场消息以及政治部的人监视我们的情况，也谈一些他的家事。例如我后来知道他有一个兄弟在伯力被苏联人抓了起来，已很久不通音讯了。考虑到我们看报有困难，他便经常把他刚看过的报纸借给我们。

由于荆门的军民合作饭店、合作旅店受到了普遍欢迎，为了扩大影响，因此，我们又在三十三集团军驻扎的其他一些城镇办起了军民合作饭店、书店、供销社等，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进行地下工作的落脚点。

在荆门开办这些商店，全靠自力更生。比如办第一家合作饭店就没有一分钱投资，是在荆门遭轰炸全城官员和百姓都跑光时，先从大户人家弄来大米柴火煮稀饭慰劳国军，再藉此向军队官兵募集了一些铜板办起来的。荆门的其他军民合作商店则是靠饭店的盈利开办的。然而，要到外地去开辟新的军民合作商店，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行的。

经过商量，我们决定向三十三集团军的军官们发起募捐。先写了一个募捐缘起，又做了一本募捐簿，我们请参谋长张克侠帮忙，张克侠一口答应下来。我们发起募捐且单向国军团以上军官募捐的另一意图是，通过募捐向荆门一带的反动势力示威，以显示我们的各项合作事业都有军队作靠山，迫使他们不敢对我们轻举妄动；同时对三十三集团军的军官们来说，还有一层"请君入瓮"的意思。

我们总共募集到三百多元钱，张克侠一百五十元，李文田等

各捐三十元、五十元不等。那时三百多元钱是很能够办些事的。

如何正确处理国共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党中央指出：抗战时期，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但又不能否认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促进民族斗争，对蒋介石集团则必须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决不甘心长期同共产党合作。所以荆当远中心区委（县委）一成立，我们就有意把工作分成公开与秘密两摊，即：两条线、两个班子、两套人马。公开班子即合作饭店、旅店、供销商店、书店、运输队等；秘密班子就是中心县委。除个别人之外，中心县委的其他同志都不能与公开班子进行联系。

我们的中心县委设在农村，是流动的，没有什么机关。中心县委的同志平时分散各地，定期定点召开会议，会后又散开隐蔽在各处，从事不同的职业。为了确保安全，我们没有搞党员名册，也没有向鄂西北区党委报送党员名册。

有备果然无患，中心县委就因为这一招，后来躲过了一次灾难。

有一次，襄樊遭空袭，鄂西北区党委一个同志携带着装有全区党员名册的绝密文件箱躲飞机，结果一不留神箱子被五战区（三十三集团军属五战区）的特工偷走了。这只箱子虽然过几天便交还了，但是其中的党员名册却已全部被第五战区李宗仁手下的人抄录了。然而，这份名单上惟独没有荆当远的内容，甚至我的名字也不在名册上。

这个情况是张克侠参谋长后来告诉我的。

正因如此，所以当后来国民党与我们反目成仇时，虽然合作饭店等均被查封，但人员却一个也没有损失。

一九三九年二月，蒋介石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加剧了对共产

党的“摩擦”。

张克侠将军接到这份命令时没有马上传达，而是先亲自把命令的电文拿给我看，压了两天才发下去，从而为我们作出应变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当时，荆当远等地的各类军民合作店，以及作为老板的我，已经声名鹊起。张克侠将军告诉我：外面已有谣传，你们办的这些店，都是共产党的联络点，前不久国民党的便衣曾秘密搜查过你们住处，不过除几张《新华日报》外没有发现别的，所以一时对你们还下不了手。张克侠将军提醒说：

“政治部的人已经收买了荆门中学几个接近你们的师生，要格外小心才是！”

叫他一说，我猛地惊醒：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动农村斗争而忽略了城市的青年工作，这是一个失误！这些青年师生本来爱国热情挺高，我们曾通过他们在学生中进行抗日宣传，可是对他们的具体帮助却不够，更没有及时组织他们建立起抗日救国团体，以至于被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人员拉拢过去，参加了三青团，并在学校中建立起了三青团和童子军的组织。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不久，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和五十九军移防宜城、南漳一带，此时我们的工作也已经由荆当远扩展到南（漳）、宜（城）、钟（祥）各县。

我因为要不时离开荆门到南漳一带去了解地下党的工作情况，所以有可能被军方看出破绽。想想与其被撞见不如自己找上门去来得主动，于是我一到南漳便去见他们。我先去见了政治部副主任谢某某，我说我是来南漳合作饭店检查账目和看望同事的，听说主任、副主任在此，特来看望，接着我又恭维了他一番。他听了很高兴，很快就带我去见了主任韦永成。

韦永成是李宗仁的亲信，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他说：“我

们广西待客的规矩是一般客人来叫‘请坐’，贵客来了叫‘请上坐’，一般客人来了叫‘泡茶’，贵宾来了叫‘泡好茶’。你是贵客，所以——请你上座，泡好茶！”说得大家哈哈大笑。韦永成似乎意犹未尽，还一定要留我吃饭。政治部的人平时派人监视我们，今天却要请我吃饭，这分明是鸿门宴，但又推辞不掉，百般无奈只好答应了。

席间，谢某某他们拚命敬酒，有时甚至是硬灌。我知道他们是有目的的，是想把我弄醉后从我嘴里套出些什么来。我暗暗告诫自己：这是一场肉搏战，一定要清醒！绝对不能醉！由于精神上高度抵制，虽然也被这伙人灌了五六杯酒，脑子却很清醒。而那谢副主任反倒让我灌得醉倒了。

我一个人统管荆当远中心县委秘密与公开两摊工作，公开工作是“军民合作饭店”，接近国民党军队上层人物；秘密工作是建立党组织，建立秘密武装，掌握地方政权

虽然国民党已经加快了与共产党“摩擦”的步伐，但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暴露真实身份，三十三集团军中的反共分子暂时还没有对我们下手，所以中心县委的各项工作仍然进展较快。中心县委成立仅个把月，党员就发展到五百余人，共建立了一个县委、十个区委、十多个特别支部。

党的秘密工作，除了已开辟荆门、当阳、远安三县外，又发展到南漳、宜城和钟祥诸县。比如我们在南漳附近就建立了多个工作点，中心县委派了三个负责同志在那一带领导工作。我们在六个县的广大农村中积极串连老苏区的党员干部，并把贫雇农组织起来，还成立了一些秘密武装，工作搞得很活跃，把群众爱国抗日的热情鼓得很高很高。

这里的地理条件十分优越，地广、山险而川富。沿着山脉，东接鄂中大洪山游击区，西靠广袤的神农架大森林并与武当山南麓的保康、房县相望，北又与鄂北相贯通，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且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活动，确是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

一九三九年二月以后，根据区党委的指示，中心县委决定：一、整顿党的组织，开办训练班分期分批轮训新党员。二、通过各种途径，掌握武装，作好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准备。三、利用合法形式，建立群众组织，争取开明士绅，掌握地方政权。在整党工作中，中心县委推广了当阳县委的经验，在轮训中对新党员着重进行了秘密工作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规定党员之间，未经组织允许，不准发生横向联系。对觉悟低、工作消极、产生动摇的人，有计划地实行隔离，并根据不同情况作出适当处理。外来党员一律寻找公开职业作掩护，在一个地方搞“红”了的党员要设法调离。通过整党，荆当远地区绝大部分党员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党的组织更加纯洁、巩固，为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党的公开工作仍以开办各类冠以“军民合作”之名的商店为主，用以接近军队，接触上层军官并在军队与民众中宣传抗日救国和国共合作，其工作范围也由荆门一地向南漳等地发展。

为安全起见，荆当远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公开与秘密两摊工作只能由我一个人统管，任务之重是显而易见的。

秘密工作这一块点多面广，不但包括荆门、当阳、远安三县，还涉及钟祥县河西两个区和宜城、南漳的一些乡村，这些地方都须我经常去巡察指导；而作为公开工作的军民合作商店是接近国民党军队和上层人物，随时了解战局和国民党动向的主要场所，我同样须经常去应付，再说几天不在荆门露面，也易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因此为保证党的秘密工作不被国民党特务发

现，我只好采取勤走、短住的办法，到一地呆两三天，又返回荆门呆两三天，像车轮一样不停地转：时而到宜城，时而到南漳，今天去东区、北区、襄樊，明天又去钟祥、当阳、宜昌。不过我说“像车轮一样转”也只是一种牵强的比喻，实际上除了去襄樊偶尔能搭上大汽车有“车轮子”转之外，其他地方都得靠两条腿，一天走百把里路是常事。一旦与下面约了时间，不论下雨、下雪、白天、黑夜，我都说走就走，从不误事。

在这段不停奔波的日子里，至今还留有许多生动的记忆，如有次从当阳回荆门，下大雨，公路上一片黄浆，一脚踩下去，泥浆没过脚面，鞋子根本穿不住，只好脱下来赤脚走。我多年不赤脚走路了，踩在公路上脚底硌得钻心疼，虽然到家后两只脚板痛得火烧火燎，但也总算不穿鞋走过一回远路了。

还有一次仍是从当阳回荆门，天上细雨纷飞，我照样赤脚走，走到一个圩镇已是正午时分，肚子饿得咕咕叫，想起这天是我生日，该庆祝庆祝，便穿上鞋进了一家馆子，叫了一碟青菜，吃了两大碗干饭；又见鸡蛋便宜，一毛钱可以买四个，便要了八个荷包蛋，一口气就吃光了。老板娘收碗筷时，笑我说：“你这个女学生可真能吃！”我笑笑，心想：你还没见我吃二十六个荷包蛋那阵势呢！

吃完饭继续赶路，在离荆门五六里的公路上不巧遇上了三十三集团军中的一个认识的人，他见我一身泥泞，便说：“这种天气还出门呀，真是辛苦啰！”我说：“你们打仗更要风里来雨里去，我们也要锻炼锻炼嘛！”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不料有一天王副官长来说：“有人见你下雨天在路上走得一身泥，你可真是热情、勇敢噢！”这事让我立即警觉起来，看来我是太大意了。

此后我再去别处，总是天蒙蒙亮就走，天黑了才回来，尽量不被军队的人看到我在外面跑动。

同时，在路上走，免不了碰到日机轰炸。有次我和一位同志在距襄樊二十来里的公路上又遇上了敌机轰炸。当时天快黑了，突然飞机从头上掠过，炸弹像冰雹一样往下砸，我们赶紧就地卧倒，炸弹掀起的泥土把我全身盖住了，也不知伤没伤，飞机过后爬起来，摸摸身上，竟然哪儿都好好的。那个同志也被土埋了，结果也平安无事。

荆门大轰炸后，城里城外三天两头遭炸，这种绝处逢生的情况我还遇到多次。有次我隐蔽在城墙脚下，一颗炸弹正好落在头顶的城墙上，把城墙炸出了一个缺口，面前的几亩棉花地被霰弹“呼”一声平茬茬地割倒了。后来军队在城墙附近挖了壕沟，遇上空袭我们就跳壕沟。有次一个老妇人就被炸死在距我一米远的地方，有次一个小号兵就血肉模糊地死在城墙顶，而他的肠子则挂在不远处的树梢上……

这期间我跑襄樊向鄂西北区党委汇报的次数也较多，不到三个月就跑了三四趟。荆门到襄樊约三百华里，难得搭上汽车，多数是步行。

在襄樊除了王翰，我还认识了在第五战区李宗仁的抗日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曹荻秋、张执一等人。原来筹划创办汤池训练班的李范一、杨显东两位先生那时也在襄樊。

说到王翰倒又记起一件事情。那次我从荆门步行到襄樊，正是雪后的天气，后半程时，雪融了，雪水遍地，我的棉鞋全部湿透了，到了王翰书记家，正赶上他家吃晚饭，饭后我一刻也没休息就向他汇报工作，谈到十二点多，还没有谈完。他老婆躺在被窝里却三番五次说我们影响了她睡觉，最后竟骂起王翰来，说：“你们再讲不完，我就起来把你们赶出去！”王翰迫于无奈，只得草草结束了谈话。我不知道王翰怎么想，反正我是气极了，心想：今天我冰天雪地走了一百多里，裤脚和棉鞋都湿透了，没有烤没有换，就坐在冰冷的屋子里汇报工作，你盖着被子暖烘烘

的，还嫌吵了你睡觉，这也太娇贵，太没有同志情义了！这样的人还能抗战？还能革命？果然不久，她就弃王翰而去，跑到重庆上学了。

国民党特务怀疑“军民合作饭店”是共产党办的，但又没有证据，就派“童子军”捣乱；传言日本鬼子进攻襄樊，国民党部队望风而逃，烧毁大桥；一个兵站站长给我一张名片，准予搭车，陶新畲突然变脸

南漳军民合作饭店是三十三集团军调防过来后，通过一些下级军官的关系开起来，并由荆门来的几个得力同志负责经营的。但三十三集团军政治部一直派人监视着饭店，经常唆使一些童子军来饭店捣乱，还放出风声说：这饭店是共产党办的，饭店里的人都是危险分子，企图威胁群众使他们不敢上饭店吃饭。

我来到南漳饭店对同志们说：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应付三青团、童子军和特务的捣乱，还要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更严重的情况，要事先想好一些对付与应急的措施，一切都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能冒险。

第二天天没亮，我便偷偷出了南漳县城，来到距城四五里外的一个村子，与中心县委的吴云鹏、马仲凡等同志碰头，交换了情况，讨论并布置了下一段工作。之后，我写了一封短信请一位同志送去给也在南漳驻扎的张克侠参谋长，问他可否与我见一次面，地点是我定的一个村子。张克侠当即回了信：“某日某时一定到某村。”

我和李金生按约在那个村子等候。果然，在约定的时间张克侠参谋长带着两匹马来了。我们请他到一个群众家里休息，我说：“有劳参谋长大驾，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的抗战形势和发展趋势，例如，要是日军来犯，贵部将作何打算？有无在这一带坚

持游击战的可能？”

张克侠参谋长告诉我们：日军若来进攻，我部有抵抗的决心，但不会在此长期进行游击战，因为部队的行动还要由蒋介石统一指挥。

我又问：目前国共关系如何？

他说：自从限制共产党活动办法下来以后，政治部那些人活跃多了，但又查不出什么，显得有些无奈。于是说你们没啥大能耐，也没有民众力量，也就是靠饭店、合作社混混而已。尽管政治部那帮人想查封你们，但李文田说你们不是共产党。说曾霞常跑襄樊，襄樊是鄂西北共产党区委管的，但在查获的鄂西北的共产党员名单中根本没有曾霞的名字，也没有荆门这些青年的名字。他说，共产党做事都很秘密，而曾霞她们却是大张旗鼓，横冲直撞，他们不过是些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而已。

张参谋长告诉我：政治部谢副主任本来想对你们加点压力，考虑到李文田护着你，怕引起李副军长不满，影响自己仕途，所以目前还不会对你们怎么样。但不能排除他们会变换手法来限制你们，也不能排除形势变化时会向你们下毒手。

张克侠跟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又骑马回部队了。

张参谋长走后，我又与中心县委的同志分析了这些情况。看样子，国民党政工部门还没有发现我们在农村中的那条秘密工作线，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这也证明我们将党的工作严格分作公开和秘密两条战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切不要麻痹大意，秘密工作还要加强。今后合作商店既要力争保存下去，又要准备一个在实在无法立足时稳妥撤退的办法；对活动较多，特务重点注意的同志，必要时应先行撤离或调到距军队较远的农村去。

大约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底，在南漳有一拨三青团、童子军，穿着黄卡叽的童子军制服，三天两头到合作饭店胡闹，不是说菜咸了淡了，就是说饭少了多了，打盘子摔碗跟跑堂的吵。最后一

次是十几个童子军拥进饭店，高喊着要吃面条，锅里正煮着，他们却用筷子敲着桌子、碗碟，嚷嚷着："快点快点！"跑堂的说："就好，就好，请各位稍等一会。"那帮人喊道："妈的，老子不吃了！"便"呼"地一声把桌子掀翻了，接着又把饭店的碗碟全打碎了。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以为童子军就像少先队，是少年儿童组织，其实不然。童子军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其成员中许多是十八九岁的三青团员，常以维持社会秩序为名，充当国民党镇压群众的打手，一些童子军与地痞无异，同样吃喝嫖赌，无恶不作。

面对这样无耻的挑衅，我们饭店的副经理兼会计周楠毫无惧色地走上街头，扯开嗓子喊：

"街坊四邻的乡亲们！请你们来评评理呀！童子军无缘无故把我们饭店的东西都砸啦！我们受尽了日本鬼子的欺侮，今天童子军也来欺侮我们！我们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开饭店谋口饭吃，到底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童子军凭什么砸我们的饭碗！往后叫我们怎么谋生？还让不让我们老百姓活命呀？"

女经理一喊，四邻的百姓便闻声而至，把饭店大门围得水泄不通，大家纷纷谴责童子军丧尽天良，无异于日本鬼子帮凶。吓得童子军像过街老鼠，只得在众人的唾骂声中灰溜溜地跑了。

女经理还不解气，又大声说："街坊们，这些童子军胡作非为惯了，今天砸了我们饭店，明天不定砸谁的呢！你们看看这叫什么世道！"

街坊四邻也愤愤不平帮着骂，这一天饭店门前人多极了，而且群情激昂，像是开了一场民众声讨大会，国民党特务导演的这场戏最后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从此三青团、童子军再也不敢在南漳街头耀武扬威地招摇过市了。

然而，南漳饭店没有了餐具，生意就没法做了，只好关门，店里的同志也只好转移到别处去了。

这期间，荆门的军民合作饭店也同样受到了特务的骚扰。

有天晚上十点过了，荆门的合作饭店已经打烊关门，忽然中学里一个姓黄的青年教员慌慌张张跑进来，又往身后张望了几下，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我们问他：干吗这么慌张？他压低声音说："我进来时发现，门外有人在监视这幢房子，可能有什么行动，你们赶紧想办法，快把要紧的东西藏起来！"

然而，此人的底细我们已经知道，他早就被政治部的特务拉过去了。

于是，我们装作十分气愤的样子七嘴八舌地说："难道抗日爱国也犯法，开饭店也犯法吗？""他们要监视由他们监视！就是要搜查要抓人也听便，不管他！"

这么一来，倒把那个姓黄的弄得手足无措了，只好随便搭讪了几句就借故走了。

我们很清楚，这是特务布设的圈套和陷阱，想采取突然袭击的恐吓办法，来试探我们，如果我们表现惊慌，立即藏文件（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文件），就证明我们是共产党，屋外的敌人就会冲进来搜查抓人。

可是今天他们又落空了，那一晚我们连大门口也没有去瞧一眼，闩上门安心睡觉——果然一夜无事。

那一段时间，我们与三十三集团军的关系是相当微妙的：张克侠将军在暗中支持我们，我猜想他八成是我们的同志；胡传魁式的旧军人李文田则认定我们不是共产党，照旧嘻嘻哈哈与我们来往；政治部的人对我们怀疑已久，只是碍着李副军长面子，表面上跟我们还过得去，但老是在背地里使绊子。好在我们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倒没让他们捞到什么。

自三十三集团军移防南漳、宜城一线后，荆门的驻军就很少了，只有兵站与后勤人员还在那儿来往。大约是五月的一天，我同王守如趁去襄樊汇报工作之机，用毛驴驮了两大麻袋妇女合作

社做的布鞋去推销。到了襄樊没看见王翰，便又赶着毛驴到另一个村子找，却意外地碰到了李范一、杨显东、张执一等人。这时天快黑了，张执一说："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今晚离开襄樊北撤，你们就跟着一起撤吧！"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呀？日本鬼子离这儿只有四十华里了，明天拂晓就要从南边向襄樊进攻了。"

"可是我什么也没听说呀！我们刚从南边的荆门来，走了好几百里，还驮着两袋布鞋呢！"

张执一说："快把布鞋扔了，与我们一起撤离吧，这里的军队和地方机关今晚也一律要撤出襄樊城——我们也是中午才得到消息的。"

我断然回答："我不跟你们走！我的岗位在南边的荆当远和钟宜漳。越是这种时候，我越要赶回去，今晚就赶回去！"

"可是你们回荆门的去路正是日本人进攻的来路，宜城一线可能已被日本人占领了，你们往南去不等于送死吗！"

我想：危险是有的，但日寇来了，不正是我们拉起队伍打游击的好时机吗！进行了那么多秘密工作，作了那么久的准备，不就是为了拿起武器跟日本鬼子较量较量吗！不要说鬼子离此还有四十华里，就是鬼子进了襄樊城，我们也要冲出城赶回荆门去。

卖鞋子是来不及了。我们辞别了张执一等人，喂好牲口，吃了晚饭，大约九点来钟，便又赶着毛驴驮上鞋子，迎着日军踏上了回荆门的路。

刚到襄河边，却见国民党军队已把襄樊大桥泼上汽油点着了，烧得火光冲天。这可糟了，我们怎么过河呢？沿着襄河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在一个偏僻的河沿找到了船夫和一只小船。我们恳求他，并答应多给钱，这才把我们渡过了河。待进到襄阳城已是夜里一点多了，城里一片漆黑，冷冷清清，国军的大部队早已

闻讯跑光了，只有三三两两的士兵还在往北走。出了城又南行两三里就再无一个人影了。

那天夜里，皓月当空，万籁俱寂，我们一边瞪大双眼支起耳朵注意着四周的动静，一边加快了步子赶路。我小声对牵着毛驴的王守如说："尽量快点走，只要走出二十里地就可以避开鬼子的拂晓进攻了。"

为了防止撞上敌人尖兵，我说："我在前面走，遇上敌人，就往后扔石头，听到动静你赶快往山上跑。"

"那你呢？"王守如问。

"那还用说，我也往山上跑呀！"

这条公路一边靠山一边临河，所以有情况往山上一跑敌人就不好找了。

我们一路走得飞快，走出二十多里地了，却连日本鬼子的影子也没碰到。会不会宜城已被敌人占领了呢？我便同王守如商量：由他赶着毛驴到宜城与南漳之间我们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去，如宜城已被日军占领，就按原来的计划把队伍带上山去打游击。我则继续往南走，赶回荆门、当阳一带，也把队伍武装起来拉上山去。我们又约定：今后的联络办法与接头地点都按过去的布置，一律不变。

于是我便一个人拚命往宜城方向走。快到宜城的一个镇子了，仍是没有碰上一个人。这时天已亮了，附近的老百姓也没有异样。这个镇子是通往荆门的必经之路，为慎重起见，我爬上附近的高地对镇子作了一番观察，发现确实一如往常，甚至还远远看见几个穿灰衣服的国民党士兵在公路上走动，紧张了一夜的心这才松弛下来——可以肯定：宜城没有失守。

此时肚子也饿了，便走进镇子吃饭，边吃边笑：堂堂的国军第五战区，军队数以万计，却连日寇的动向还没摸准就下令撤退，还把大桥烧了，真是可恨又可笑！

后来知道，那天确有一小股日军曾进入到襄樊以南四十华里处，但只是突袭了一下就撤了，并没有进攻襄樊的部署。

这种草木皆兵、望风而逃的“仗”，我们在所谓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上已经屡见不鲜，见怪不怪了，我实在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这支军队太缺乏勇气呢，还是因为掌握军队的权贵们过于稀松！

回到荆门，我又去各处农村转了一圈，因为荆门东区的冷水铺一带有我们的地下党在活动，所以我需要经常去看看。途中听说鄂中区党委代理书记杨学诚正在钟祥县城，我就赶去看他。我和杨学诚是在鄂中应城的汤池训练班上认识的。见到杨学诚，我向他汇报了荆当远、钟祥河西和南漳、宜城的工作，并告诉他：我们准备把冷水铺以西一直延伸到南漳、保康一带的广大地区作为游击区和后方根据地，与鄂中游击区相呼应、相连接。他对此很重视，说两地虽有汉水之隔，但只要群众基础搞得好，鄂中与鄂西北是一定可以连起来的，那时游击范围将更大，革命的武装会更强。

转了一圈回到荆门已是六月了，我准备再去襄樊向鄂西北区党委汇报工作。但那时国民党搞“摩擦”更起劲了，我们的行动已不像以前那样自由。但我认识一位过去常来合作饭店吃饭的兵站站长，我们曾给过他不少优待，所以他也常在搭乘军车方面帮助我们。就是这个站长给了我一张名片，并在背面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兵站汽车司机：持我此名片者，准予搭车。”

那一天我在三里街军民合作饭店后面的公路上等候去襄樊的军车，但一连几辆不是人多就是货满。又来一辆大卡车，人不多又恰好去襄樊，而且车子正好已停了下来，我赶紧上去，递过那张“准予搭车”的名片，司机看后挥挥手要我上车。

我正往车上爬，一抬头，发现陶新畲和他的太太也在车上。他前一阵到重庆受训，大概是刚回来。陶新畲正要下车去小解，

我满面笑容迎上去："陶主任回来啦！"但陶新畬却一反常态板着面孔，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又用冰冷的目光盯着我看了几眼，才问："你要上哪儿去？"我说搭车去襄樊。他再不吭声。他太太还算客气地招呼我，我便上了车。陶新畬小解完半天不上来，坐在野地里好像等什么，最后派人把我叫了下去，阴阴地问："你到襄樊去干什么？"我说："我去李范一先生那儿。我们的鞋业生产社与李先生襄樊的实业有来往，想请李先生帮我们在襄樊也办一家鞋业合作社。"

陶新畬突然横眉竖眼起来："你不要总混来混去，到处乱跑，给我放规矩点！今天你不能搭我们的车！"

我也一下子火起来："我去襄樊联系生产贸易合作，是堂堂正正的事，怎么成了乱混乱跑？"

他站起来挥了挥手："你不能搭我们车走！"

我忍着性子说："那好，我就回去吧！陶主任见到李军长、张参谋长、王副官长，请代为致意！"

回到饭店，我立即把情况告诉了荆门的几个同志。大家分析，陶新畬态度的变化是有来头的，我们的处境可能很快恶化。这里的饭店，由于调出不少人去各地开办新的商店，人员已由原来的三四十减少到现在七八个了，生意已很萧条，连供销社与妇女合作社也早已作好了停业关门的准备。我要求大家：作好应付突发事变的准备，但又切不可惊慌失措。

商量之后，决定由我马上去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找张克侠参谋长，探听陶新畬的虚实，以便及早作出安排，然后再去襄樊找区党委汇报；同时由原汤池训练班学生李金生赶去南漳，把这里的情况通知中心县委的其他同志。

为了尽早掌握陶新畬的动向，我一通宵走了一百二十里地；张克侠说：我看那些饭店、商店收场算了，免

得被他们查封造成损失；王翰让我离开荆当远，我提出去延安

我出发已是下午四点多了，而陶新畬的汽车大约是两点离开荆门的。虽然我两条腿跑不过汽车，但我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司令部，尽早掌握陶新畬的动向。

我迈开大步拚命赶，几乎一路都在小跑，走着走着天就黑了。还是夜里走路好，不会遇上军队的人。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驻在宜城附近的武安堰镇，荆门到这个镇大约有一百二十里路，不过都是公路，并不难走，我走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清早就赶到了。

也许这一行路记录所反映的我的耐力和速度会让今天的许多青年人吃惊，其实这样的长途行军我早习以为常了，加上那天情况紧急，身上也就力气倍增了。

武安堰镇是南漳、保康、房县等地农民挑木耳、香菇等山货下山时的落脚地，这里公路可以通车，水路可以走船，农民的山货一般就在这里卖给街上的货栈，然后再下船销往各地。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的地址是张参谋长调防时告诉我的。

武安堰镇比较繁华热闹，街长店多，尤其是饭铺多。我选了一个女老板的小饭铺，在那里吃了早饭。饭后我对老板娘说：我有点不舒服，想借你的床躺一躺。老板娘很面善，一口答应了，我就在她的床上一觉睡到下午两点多。起来又吃了些东西，问好路，就径直往张参谋长的驻地走去了。

这个村相当大，靠着一条河，河里可通小船，村头还有两三家未开门的店铺。这时天还未黑，我不敢贸然去司令部找人，就在河边观望着，发现河边有一片很好的草地，便又在草地上坐了会儿。天渐渐黑下来了，我走到草地附近的河边，河边泊着一条小船，我早就观察好了，这小船的船家是位四十多岁的妇女，带

着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八九岁光景，家里的男人不在，大约是外出办事了。

我对女船家说：我是到这里找一个军官的，天晚了，不敢进去，我付钱给你，在你船上歇一夜好吗？她收下钱很高兴地说："只要不嫌船上脏，你就住下吧！"我在船边写了张条子告诉张克侠参谋长："我已在村旁草地前的一条小船边，请见字速来。"之后，我与船家的女孩一起走到司令部门口，把封好的纸条交给卫兵就回到了船边的草地上。

不到一个小时，天全黑了，张克侠将军打着手电来了，他很奇怪地问我："这么老远怎么跑来了？"我便把昨天见到陶新畬的情况讲给他听，我说："他前脚开车，我后脚就赶来了，走了一个通宵，白天在武安堰镇睡了一觉才来找你的。"他问我吃饭了吗？我说等会儿与船家一起吃，他不由分说，立即回去叫人做饭，一小时之后有个士兵提着装了四样菜一碗饭的盒子送来了。

我说："这次来找你，专为打听陶新畬准备怎样对我们下手。"

他说：他们昨天就回来了，我们都去迎接，因为同车来的还有总政治部检查组的两个组长和一个工作组。晚宴前，陶新畬告诉我，他在荆门看到你，没让你搭车，因为有两个组长在车上，他不好办。末了他说你们不做正经事，到处混混，打算把你们取缔了。

张克侠将军说：当时姓谢的副主任也在一旁附和了一通，说你们没什么力量，不外是靠军队撑门面，军队到哪里，你们也跟到哪里，南漳的饭店让三青团、童子军砸了才不得不关门，等等。

我问："李文田态度怎样？"张克侠将军说："李文田背上长了个毒疮，正在老河口住院呢！"

我又问：他们打算怎样对付我们？张克侠说：陶新畬准备把

你们的合作商店都封掉，逼你们散伙，姓谢的也说早就想查封你们了，正考虑找什么理由。

张克侠将军说："昨天来的两个检查组都是国民党特务组织里的反共专家。所谓检查，主要目的就是抓共产党。你们要谨慎小心才是。"他又说："我看那些饭店、商店收场算了，免得被他们查封造成损失。"

第二天一早，我又直奔襄樊找区党委。途中遇雷阵雨，淋了个落汤鸡，一会儿天放了晴，慢慢地又把身上的湿衣服晒干了。这一天又走了一百多里，到襄樊天已大黑。但得知党委书记王翰已到谷城县，这样只好在襄樊住下了。天一见亮我又匆匆上路，赶到谷城，向王翰书记汇报了这些情况。

王翰说：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党在荆当远的各种公开活动要一律停止，迅速转入农村从事秘密工作。并说我的目标已经太大，即使转入农村也极易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一旦被发现，还可能影响整个秘密工作，所以区党委已决定让我离开荆当远，我的工作另派别的同志接替。

我表示如确须调动工作，愿去延安学习。我又提出：其他商店可以停止活动，但应当留一家影响较大的荆门合作饭店让他们来查封，这样更利于在群众面前揭露国民党欺压民众的丑恶嘴脸。

王翰同意了，但他说："你不要回荆门了，从这里转道中原局去延安吧。"

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克侠将军的警告和建议是十分及时的。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才证实了对张克侠将军的猜测。原来张克侠早在一九二九年就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担负着特殊使命的秘字号党员，除了周恩来以及单线联系人之外，再没有任何人（包括他的妻儿亲属）知道他的中共党员身份。

在荆当远，张克侠将军一直暗中帮助保护着我们，并把我们

引为知己。

他在一九三九年的两则日记是这样写的：

三月十八日：……近日来对余之事业，颇为重要，合作饭店已由余集资开业，景象一新，今后，又将如何？孰难料定也。无论后果如何，此抗战之纤弱花蕾，不可为肆虐风雨所摧，慎之，爱之，有志事竟成也。

四月九日：连日来，敌机不断骚扰荆门一带。接曾霞信，述及空袭及有关战争等事，情真意切。彼与郑等为动员民众抗日，鼓舞军心，出生入死，不亚男儿，中国军人亦能如此，何患国仇不可报乎！

在张克侠的生命最后几年所写的自传中，也披露了些许他当年对我们的观察和对我们的支持和保护：

……在部队到达荆门前，就听说荆门附近出现了两个女同志，她们动员民众帮助部队运粮运草，促进了当地社会安定。人们都猜测说，她们是共产党，否则没有这么大的本领和魄力。我也认为她们一定是自己同志，于是决定主动与她们取得联系并给予帮助。到荆门后我即去会见她们，原来是曾志同志和郑速燕同志，她们以开饭馆、办合作社为名，从事党的工作。我了解了她们的工作情况之后，就尽一切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和掩护她们，尽一切可能创造条件，使她们能够坚持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张克侠先后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和林业部副部长。在林业部副部长任上曾经提出要在黄河两岸，特别是甘

肃省境内大力植树造林，并发出了“二十年让黄河变清”的呐喊，但久久得不到响应和首肯，因而感到十分苦恼，身体也随之每况愈下。

张克侠带着壮志未酬的深深遗憾逝世于八十年代。

现在，可以告慰这位老林业部长的是，继“三北”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和长江防护林等世界级特大型造林绿化工程之后，黄河流域的防护林工程也已全面启动。针对黄河近年来不时断流，且断流时间越来越长的严峻形势，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我国一百五十一位“两院”院士又在《中国绿色时报》上联名呼吁“行动起来，拯救黄河”。我们有理由相信，认准了目标，持之以恒干下去，黄河水变清，奔流入海不复还的日子一定不会太遥远！张克侠的遗愿一定可以实现！

为了麻痹国民党特务，我在李文田面前慷慨陈辞；害了眼疾后，日夜不能入睡；陶铸突然来到我身边煮饭做菜熬药；民间神奇的医药治好了我的眼睛

区党委同意送我到延安学习，我高兴得恨不得立即长上翅膀飞向延安。但又一想：如果我不吱声就走，国民党特务一定很快就会警觉，这对于荆当远各公开活动点同志们的撤退是极其有害的。我必须在退却之前露露脸，还要煞有介事地告诉他们一声：我要走了！我想这样可以麻痹那些国民党特务。

于是我决定去鄂豫边界的老河口医院看望李文田副军长。

当我出现在李文田面前时，他感到十分意外。我说：“听说军长住院，特来探望！”他赶忙让坐，客气地说：“领你的盛情，谢谢你！我快好了，快好了！”客套几句后，我突然说：“军长，我要离开这里了！”“为什么呀？”他问。

我便把陶新畲在荆门对我的蛮横无理告诉他，我激动地说：

“我们流亡青年凭着一腔爱国热忱，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为军队为民众做些抗日事情，这难道不对吗？怎么倒说我们是混来混去？陶新畲副主任去重庆受训前还口口声声感谢我们帮他运了军粮，解了军队燃眉之急。军长也知道，当时日本飞机怎么轰炸扫射，当时县政府又在哪里?!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下乡找来民夫运军粮，为过往军队烧水做饭，恢复了市场，繁荣了经济，使荆门由一座死城变成了活城，这难道没有功劳反倒有罪吗？那么，这到底叫什么罪！我们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学问的青年学生，你陶主任说翻脸就翻脸，我们实在受不了，中国之大，哪里不能抗日救国，为什么非要在这里忍气吞声受他的侮辱！”

这些都是憋在心里多时的话，所以说得滔滔不绝，痛快淋漓。

李文田问：“那你准备到哪里去？饭店又怎么办呢？”

我说：“先回湖南老家看看再说；饭店只能听其自然了。”

李文田顺水推舟地说：“离开也好，政治部那帮人总怀疑你们是共产党。”

我气愤地说：“共产党也是主张抗战打日本鬼子的。国共不是合作了吗？怎么上面讲合作，下面却要反共呢？我不是共产党，不怕他们搞我，但这口怨气实在吞不下！”

李文田劝解道：“你们还年轻，对于社会上的事还不全懂，唉，世事险恶啊！”

我说：“就是有人不准我们抗日救亡呗！”说完，我请他多加保重，便告辞了。

我去找李文田并在他面前装出一副又怨又恨的样子，是为表明我是被气走的，走得光明正大，这也是一次退却之前的进攻，以便让李文田把我离开的消息传播出去，麻痹国民党特务，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向农村转移。

因为这些天我跑路太多，过分劳累，加上天气又热，日晒雨

淋，所以突然害起眼病来，眼珠痛得厉害，日夜不能入眠。回到襄樊住了几天医院，天天只滴眼药水，病情便越发重了。正不知如何是好时，陶铸来了。

他也是来住院的。他去随县的鄂中专员公署参加抗敌工作委员会的会议（他是委员会的顾问），散会后反共专员石毓灵企图扣押他向国民党邀功，并已经软禁了一天。因附近有我们的部队，姓石的思前想后最终没敢动手，只好改为礼送出境，所以陶铸便来到了襄樊。组织上就安排他住进了教会医院。

我的眼睛医院治不好，陶铸一时又回不了鄂中，为安全起见，经地方同志介绍我们又离开襄樊，到四五十里外的一个叫黄龙档的村子住下了。

这时我的眼睛已成灰白色，终日钻心地痛，三步以外就看不清人的五官，快要瞎了。有人介绍了一位中医，说是会治眼病，于是雇人用轿子从五十里外把他抬来，他看了我的眼睛，也不说我害的是什么眼疾，只叨叨着“很严重，很严重！”他从挂在身上的小铜罐里倒出些药粉，撒在捣碎的葱白上，敷在我两眼上方的额头上，又用“太阳膏药”贴在上面加以固定，同时开了剂中药让我服。不料只一天，我眼珠的疼痛就大为减轻。如是又过五天，眼睛竟然不痛了，视力也恢复了一些，只是模糊不清，一件东西能看出两三件来。然而医生是不能久留的，只好把他送走了，我们则住在村里慢慢养病。

我们与房东老太合住一间大屋，我们睡的竹床宽不到三尺，老太太睡自己的木床，通讯员则住在隔壁临时搭起的小铺上。

老太太清早下地，天黑才回来。通讯员则每天要走很远，去送信、买药、买菜。因此服侍我的事全由陶铸一人承担。他天天为我煮饭做菜熬药，照顾得十分仔细周到，有一次通讯员把换下来的衣服放在脸盆里泡了一天多，陶铸也帮他洗好晒干了。

陶铸在黄龙档陪我住了半个月，就又准备绕道返回鄂中了。

这时有位同志介绍说：宜昌有一个眼科门诊，据说不错，建议我去宜昌治疗。我寻思，若瞎了眼，也是一大不幸，不如趁当前没有工作担子，去治一治；而且宜昌也有住处：荆门合作饭店有位青年叫陈鸿儒，就是宜昌人，他也是汤池训练班的学生，现在已转入荆门南区农村工作。于是我决定前往宜昌。

我比陶铸先走一步。他送了我十几里路，一直送到襄樊至荆门的公路上，才返回黄龙档，然后便去了鄂中。

陈鸿儒的家境当属小康，母亲四十五六岁，很能干，又十分善良贤惠，对媳妇像对女儿一样亲热，父亲五十多岁，却是个骨瘦如柴的大烟鬼。家里开着大烟馆，他父亲烟瘾上来，又流鼻涕，又流眼泪，甚至不省人事。我就亲眼见过他烟瘾发作时倒在地上浑身抽搐的场面，让人不忍目睹，甚是可怜，但一旦过完烟瘾，精神比谁都好。

我就住在陈鸿儒家，每天到眼科门诊作治疗。

治疗的方法很奇特。一个小砚池，一块拇指大的药石，一根玻璃棒：用药石蘸水在砚池中磨，再用玻璃棒蘸上磨出的药浆往眼睛里涂，每天三四次。说来也怪，这么治却很有效，几天时间眼球的颜色就基本恢复了正常，视力也逐渐好转了，我再一次亲身体会到了祖国民间医学的神奇。

只是治疗后感到眼中出现了许多小黑点和云彩，这种现象维持了三年才逐渐消失。

荆门合作饭店已被取缔，我大摇大摆拜见兵站站长；在去枣阳平林店的路上，我故意耍弄特务；然而，到了平林店，却真被特务扣了起来

在宜昌治疗二十多天后我又来到了荆门。

这时荆门的情况已经大变：军民合作饭店已关门，门上贴着

县政府的封条，街上很冷清。我正踌躇间，忽听有人在街对面轻轻叫我，回头一看是荆门饭店一位瘸腿勤杂工的妻子，她既年轻又长得秀丽，正坐在一家小铺门口偷偷向我招手。

她告诉我：前一阵子县政府来人通知，不准饭店再开业，饭店人员须在三日内离开。果然，三天后县政府就有人来检查，并贴上了封条。我们没有地方去，仍旧住在这里，他们却也没说什么。

我问："你们生活怎么办？"

她说：她与丈夫都是荆门南区人，因为丈夫有残疾，不能种田，所以不打算回去了，打算就在街上摆个小摊子度日。

听了这位饭店勤杂工妻子的介绍，我知道此刻我的处境已很危险，现在荆门已没有三十三集团军的部队驻扎，只留下一个兵站，而国民党的三青团、童子军又猖獗起来了，我须想个办法才是。

于是我便去见兵站站长。兵站站长属营级，部队一走，一个营级军官在县里就算高官，就可以呼风唤雨了。这个站长与我素有来往，那张"准予搭车"的名片就是他给我的。

他见到我时有些吃惊，听说我是从宜昌治眼病刚回来的，倒也算客气。

我说："怎么饭店被县政府贴了封条？饭店的人都到哪儿去了？请问站长知道什么消息？"

他回答："这些我都不知道。只是听到街上有人议论，有说你们是共产党的，有说国难时期政府不该这样对待老百姓的，也有说你们做了不少好事，疏通了城乡贸易往来，要不然荆门如今没这么兴旺的……"

我说："正是。荆门被轰炸，县政府的先生们躲的躲，溜的溜，现在却耀武扬威，取缔我们的饭店，这叫什么事儿！我们开军民合作饭店，宣传抗日救国难道错了吗？前线国军不都在抗日

战场上浴血奋战吗？你们兵站不也在为前线打鬼子而日夜操劳吗！县政府封了我们的门，封不了我们的心，这里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我又说：“今天我是特来拜见你的，感谢你对我们军民合作事业的热情支持。同时也来辞行，我现在就去襄樊，然后回湖南去。”说完我就告辞出来，朝通往襄樊的大路上走了。

我去见兵站站长的目的，一是要给三青团、童子军造成一种印象：我与兵站仍有良好关系，使他们不敢立即向我下手（有两三个人是三青团的，见我在兵站站长那儿，探头瞧了一下就走了）；二是让三青团知道我是离开荆门到湖南去，避免他们在荆门一带追究我的下落，给其他同志造成威胁；三是表明我不怕恐吓，光明磊落，还是个横冲直撞的热血青年，使三青团的人仍然摸不准我的真实身份。

我去宜昌前，鄂西北区党委已经重新配备了荆当远中心县委的领导班子，刘真、张清华、吴云鹏、马某某等同志的工作仍如从前，未作变动。

我离开荆门，并未去襄樊，而是去了枣阳地区的平林店。这是我与陶铸在黄龙档分手时约定的等他信件的地点。

平林店是一个小镇子，有天主教堂，二十二集团军的特工队通讯站就设在教堂里。这个特工队是由我们地下党的郑绍文负责的。

二十二集团军来自四川，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属杂牌军，所以一直受歧视，待遇较差，司令官孙震也与蒋介石有矛盾。

我党在二十二集团军较广泛地开展了统战工作，还派了一些同志打入了一些要害部门，郑绍文就是其中之一。他所领导的通讯站实际是我党的交通联络站，除做饭的厨师外从站长到工作人员不是党内同志就是革命青年。通讯站的大印、招牌直到信封、信纸则都是二十二集团军直接发的。

去平林店，记得走了一段水路，可能是在宜城下的船。途中有一段小插曲，还挺有趣儿。

那是一条只能容纳两三人的小船，我在船头坐着，看着两岸风光。不久后面来了一只同样的小船，船头上坐着两个国民党士兵模样的人，两船同时走，且渐走渐近，也不知怎么回事，当时突然冒出一个逗他们耍耍的念头。于是我故意拿出一个小本子，东张张西望望，然后低下头写些古诗（本子上原来就有几页记着些购物的账目，也是为了骗特务事先就写上的）。这以后，那只船就一直若即若离地跟在我们后面，我只当没看见，照样抬头四顾，低头写诗。最后，他们终于靠过来了，还上了我们的船。我当时穿的是黄色的类似童子军的上装，胸前佩着棉业改良所的牌子。他们客气地问我：写的是什么？我抬起头来好像刚刚发现他们，笑着说："哦，抄一些旧诗玩！"说着顺手把本子递给他们："请多指教！"一个士兵接过本子翻了一下，立即满面堆笑地说："小姐能写诗，真有学问！"他看了眼我胸前的牌子，再不敢盘问，只说："见你在船上张望，还以为你在画地图呢！误会，误会，真对不起！"说着就回自己船上去了。

我到达平林店的天主教堂已是下午了，这里是事先约定的接头地点，平林店通讯站也早知我要去，只是互不认识罢了。作过一番自我介绍之后，我就在教堂里住下了。同在教堂住的还有中共随（县）枣（阳）地委组织部部长唐韬默和他妻子冯珍。

不料，第二天早上大约八点多钟，进来几个穿便衣的，要站长和唐韬默随他们去枣阳城的军部，说这个通讯站很值得怀疑，又要把我和冯珍带去见什么黄高参。

站长（已不记其名）分辩道："我们有军部委任的印章和证件，你们怀疑什么！"说着把公章和证件都取了出来，两个便衣看后说："还是去军部吧，你们自己当面去讲清楚！"于是他们便随便衣去了枣阳。

我与冯珍被带到距平林店两三里外一个村子的黄高参那里，并被告知：须在这里住下，等去枣阳的人回来才能走。

这是一座大宅院，主房住着黄高参，厢房住长工佃户，大门口设警卫，隔壁有驻军。黄高参是四川人，表面上很客气，同我们谈天说地，拉东扯西，但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想套我们的底。

他说他夫人是高中学生，北伐战争时的共青团员，现在四川教书。他吹嘘说，他曾看过许多马列主义的书，他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但认为，共产主义不合中国的国情。又抱怨说，高参没啥搞头，不过是块空牌子等等。

我想我们还是少说为佳，所以只是静静地听他讲。

高参又问我们：是不是大学生，籍贯哪里？我说："冯女士是北平的大学生，流亡来的，我籍贯湖南，因祖父在福州经营盐务，所以家也迁往福州，我是福州学院的学生。"

其实这一半是蒙他的瞎话。我在福州工作多年，福州话讲得相当好，而且福州学院的情形也基本了解，所以即使他有所盘问也不至出现漏洞。不过冯珍倒真是"中国大学"出来的，但冯珍听我介绍她是大学生却吓了一跳，脸刷地白了，忙说："我不是大学生！"听了她的辩白，我笑起来了，高参也笑了。

回到房里，冯珍怪我，说不该讲她是大学生。我告诉她，在这种势利人面前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份提高些。

中午与晚上两餐高参都同我们一起吃饭，晚上我们就睡在厢房里一户佃农的床上。第二天，这位佃农悄悄告诉我们：地委叫我们不要着急，已派人去枣阳打探情况了。原来，这位佃户恰好是我们的地下党员，真是无巧不成书。

又过了一天，唐韬默与通讯站长安然回到了平林店，我与冯珍便也离开了黄高参的家。唐韬默说了他们的经历：

他们被带到军部后一直在门卫的房子里等候，直到晚上十点也没人理睬，也不给饭吃。十一点多了，一位像是副官模样的人

满脸堆笑进来，拱手说道："对不起，对不起，把你们请来纯属误会，下面的人不了解情况，害你们跑了这么多冤枉路！"立即叫人端茶备饭，领往旅馆住宿，并说："明天就请二位听便回去。"下面的人原来都板着面孔，一下子又低眉顺眼，唯唯诺诺起来。第二天他们便自由了。

事后，见到随枣地委书记顾大椿时，我问他："怎么抓人时严重得不得了，放人又那么随便呢？"

顾大椿说："由于这里不是蒋介石嫡系部队防区，军队中又有我们地下党组织，因此我们一些同志来此工作便不大注意秘密工作的原则。组织部部长唐韬默夫妇常到通讯站住，就有这个毛病。前几天他写了一封信给鄂中区党委杨学诚，没有寄出就同自己的笔记一起放进挂包里，挂包就随意挂在了通讯站的住房里。不料通讯站来往的人很多，结果挂包被特务偷翻了，从而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还牵连了通讯站的地下党，这样就把人抓了。"

"那怎么又放了呢？"我仍然一知半解。"二十二集团军司令部及下面的部队都有我党地下工作者，估计这个情况被他们知道了，便利用司令官孙震与国民党中央的隔阂和矛盾，从中斡旋，把人搭救出来了。因为通讯站的委任状、印章都是军部发的，把通讯站长抓起来再嚷嚷出去，就更会授人以柄，蒋介石就更有理由挤兑他们了，还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掩盖起来不了了之的好。不过这是我们地委的分析，具体情况还要再了解才知道。"

这事发生之后，顾大椿即将我转移到二十里外高家村的一个小学校里。小学已放暑假，空无一人。不多天收到了陶铸来信，要我就地等他一起去延安。于是我便等他，却一直不见他来，心里自然很着急。一直等了半个多月，才又收到他的信，说暂时走不开了，要我自己先去延安。

平林店被扣押事件的来龙去脉，直到三十四年之后我才从当事人那儿听到详情。

那是一九七三年，曾在二十二集团军司令部任过职的地下党员胡春甫从四川（或宁夏）来京住在中组部招待所（当时他任省委统战部部长），听说我也在招待所，便来看我。谈话中我问及平林店被扣的事，他说了以下情况：

平林店便衣侦探打到司令部的电话是他接的，他没有立即向上报，而是要便衣先把人送来司令部，随后又立即与地下党的同志商量对策。大家认为，要充分利用国民党军队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抓住通讯站是二十二集团军直属机构，公章与一切证件都由军部发放这一要害问题做足文章，全力营救被扣同志。这样我们便在军部上下散布这些话，并立即起了作用，加之当时虽然国共间有“摩擦”，但对于公然抓捕共产党，二十二集团军还有许多顾虑。所以，唐韬默等人被扣并送来司令部的事，军部一直不敢张扬。接着我们又把便衣找来，告诉他们：“通讯站的公章和证件都是司令部正式颁发的，把通讯站的人当共产党抓，不是给自己脸上抹屎吗？国共合作怎么搞，下面不清楚，你们不要造次！”这样就把人放了。

胡春甫还告诉我：“你们在平林店被扣的事，‘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和专案组都多次找过我，其实，他们已经把全国的知情人都找遍了。”

我认为胡春甫的叙述与当时的情况能够一一印证，并无出入。

为了抵达设在河南确山县的中原局，我装扮成“棉业改良所”的技术指导员，走进国民党的联保公所，教训了一顿办事员，让国民党的一路人马把我这个女共产党送到了中原局

我去延安是要经过中原局转介绍信的。那时中原局在河南省确山县的竹沟镇一带，我须先到位于湖北随县与河南桐柏县交界处的一个地方（据说是黄火青的家乡，好像叫鹿头镇），只有到了那里才有交通员带我去竹沟镇。

我所住的高家村的小学校距那个交通站有一天的路程，那时国民党与共产党搞“摩擦”的劲头正越来越大，沿途国民党特务与军队追查得很紧，我这一路就要经过多处军队驻地，如遇盘查怎么办呢？

只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行前，我把自己作了一番改头换面的打扮：我特意穿上了一套童子军式的黄制服，头戴制帽，腰扎皮带，胸前还醒目地佩着一枚“棉业改良所”的证章。这枚证章以及我随身带的“棉业改良所”的证件是上次去襄樊遇到杨显东先生时向他讨的。我知道凭着这两样东西，在鄂北农村的植棉区便可以随意通行。我把自己的身份设定为棉业改良所的技术指导员，此行的任务是巡视随县一带的棉花种植情况。我在汤池训练班经常听杨先生谈棉花栽培，已有的棉花知识糊弄那些地痞和士兵已绰绰有余。

于是我大摇大摆地向国民党的联保公所走去，人还未到门口，就大声大气地对站岗的保丁说：

“你们主任在吗？”我一边问一边径直走了进去。

岗哨见我派头十足，哪里还敢阻拦，“啪”地一声立正：“报告！主任不在！里面还有办事的人！”同时立刻向里面大声通报：“有客找主任——！”

办事的闻声迎出来，见我是个女的，起先有些轻慢，但见我目空一切居高临下的神态便又立即恭敬起来。

“嗯——我是省建设厅棉业改良所的技术指导，来这一带视察棉花种植情况，路过贵处，请你们派牲口送我一程！”

抗战中，国统区建立了一种各联保所共同支援来往官员和军人的民间交通网制度，凡国民党官员与军人，下乡到各地都可以要求联保公所派牲口或民夫护送，但一般一程不超过二十里，到另一地则换另一联保公所护送，这样一程接一程，一直送到目的地。

见我如此说，办事的不敢怠慢，忙说："那好，马上派，马上派，请先进里屋坐！"

我便坐下来，故意拉长了声音同陪我的人东拉西扯。我问他：你们这里哪块地的土质适合种棉花？这里一共种了多少亩棉花？什么品种？长势如何？病虫情况怎样？老百姓对种棉有什么反应？不料一问三不知，一句也答不上来，他显得很惶恐，满脸愧色，恨不得地上有个缝能马上钻进去。

于是我对他讲，要注意棉花品种，棉业改良所最重视品种改良，从美国引进的丝质棉纤维又长又白，所以纺纱织布质量高、价钱好……他似懂非懂地一个劲点头。我又用教导的口吻说：

"农民种棉花意义很大，老百姓和军队穿衣都少不了棉花——是不是啊？"

他连声答应：是，是！

"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的工作都多，任务都重，但种棉这件事万万不可忽视，这也是你们联保公所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嘛！"

"是，是！"他又一个劲"捣蒜"。

"那就拜托诸位啦！"我见马已牵来，茶也喝够，就十分宽容大度地结束了"训示"。那帮办事的便一齐装出已把我的话句句听进去记住了的神情，信誓旦旦地说："请长官放心，我们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他们陪着笑脸扶我上了马，一个保丁牵着缰绳走在马前面，我漫不经心地向背后的人挥了挥手，便骑着马晃晃悠悠地走了。

这一关过去了，后面有岗哨的村子就更容易了，因为到了下一个联保公所，不用我费口舌，牵马的保丁就会自己去要马、要人，联保公所也会立即派马、派人。于是，这一匹匹联保公所的马与一个个牵马的保丁就成了我一路过卡闯关的通行证。我骑在由保丁牵着的马上，途中所有的岗哨、所有的军人都没有盘问一句。就这样，国民党的联保公所一路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把一个女“共党”安全护送到了鹿头镇。

在鹿头镇隔了一夜，交通员便带着我经由桐柏山的一条小路向河南确山县进发，好像又步行了两天才来到中共中原局的所在地——竹沟。

竹沟是一个小镇，却筑有城墙，估计有四百来户人家，商店少而小，城边还有条干沙河。我住在一个农民家里，最麻烦的是没有厕所。后来才知道，猪栏就是厕所，人粪就是猪食，这又是怪事一桩。

中共中原局书记是刘少奇，但当时他不在。在家的主要负责人是朱礼治，他好像负责组织工作。我与他是一九三二年认识的，当时他是以团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厦门检查工作的。在这里我还见到了张执一、郑民石、潘琪等，大家都是熟人，见了面自然都十分高兴。

我在竹沟住了一个多星期，一九三九年十月在办好中原局的关系介绍后又由交通员送我去延安。

我在荆当远的工作，除了去宜昌治眼病的时间外，掐指算来约有十个月。这十个月既是国共合作时期，又是国民党跟我们搞“摩擦”的时期，既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又要进行公开的抗日活动与统战工作，既完成了荆当远地区重建党组织的任务，又进行了坚持敌后游击战的广泛思想发动和细致的具体准备。从我个人的经历而言，这一时期的工作是完全崭新的和极富挑战性的，在这秘密和公开的两条战线上，我的工作虽不能说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确

是尽了力的,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是很有成效的。

首先,三十三集团军虽然有一些坚定的反共分子,但由于我党强有力的统战攻势,这支部队对蒋介石的反共“摩擦”命令始终抱敷衍应付态度,并时常向我方通报敌情,后来还与我军联合打过日军。他们在战场上的缴获较少,我军就把自己俘虏的日军官兵和缴得的马匹、枪支、指挥刀送一点给他们,让其向上级报功(每名日俘可与其交换子弹一万发),他们也不时从人员、物质、武器、弹药等方面支援我们。从总体上说,三十三集团军是我党在抗战时期的真正的友军。

其次,日军不久便占领了这片土地,但由于我们已事先作了充分工作,因此荆当远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都没有受到破坏,还拉出了一支武装队伍,壮大了新四军的力量,大批从荆当远走出来的干部以后成了各地的党政领导,成了新四军五师的各级指挥员。

虽然在荆当远的工作时间只有不长的十个月,但是这十个月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却是刻骨铭心,没齿难忘的。

第十章　宝塔山下

去延安的路上，彭德怀认出了我，请我到小馆子里吃葱爆羊肉；谈到爱妻，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喜上眉梢

一九三九年十月中旬，交通员送我由竹沟去西安，同行的还有中原局秘书长郭济斧的夫人。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盘查，我们避开大路，尽量走山间小道，而且昼行夜宿，全程步行，到底经过了哪些县城与村镇，现在记不清了，只知道曾到过河南的叶县与洛阳。

从竹沟到洛阳，沿途都有小饭铺、小吃摊，小饭铺也是小客栈，过往行人既可吃饭也可住宿。我们一路的吃住都在这些地方。我对河南小摊小铺价格之低印象很深。一大碗面条，一碟咸菜，加住宿一夜，只要两毛钱。糊辣汤在这一带很有名，无论到哪里都有卖的，一汤碗糊辣汤加四个油炸馓子只要五分钱。一毛钱买一碟熟驴肉（约三两重），两毛钱买三四斤煮熟的花生。这些价格比起湖北襄樊来要便宜许多，但也说明这里的消费水平低，群众生活较苦。

十一月初，我们抵达西安，被安排在党的招待所住下。这里各地来的同志很多，但没有我认识的。

我们因等交通汽车，便在西安住了一个多星期。

十一月底，招待所通知有汽车去延安，要我们马上动身，并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灰色的棉军服。军装太大，穿在身上空落落



一九四七年在东北。

的，特别是裤子，长出五六寸，穿上后显得很滑稽。汽车是敞篷大卡车，车上除我们两个女的，其余都是男同志。大家都站着，汽车一开，左摇右晃，前俯后仰，每一块肌肉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在一条泥浆路上，汽车陷住了，同志们都下了车，喊着号子推着车走了几十分钟。到达宿营地时，大家照顾女同志，把我们单独安排在一个窑洞式的屋子里。

我很快发现，对面屋子住了一位首长，他穿件灰蓝色皮大衣，戴着皮帽，不知是谁。长期秘密工作，养成了多观察少打听的习惯，所以我也没去问人家。

不料进屋不久，那位首长来了，他问我："你是不是曾志呀？"

我很惊讶："是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们在井冈山见过，以后在瑞金也见过呀，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彭德怀！"

"哎哟！怎么一点也认不出来！相隔十年了，你记性可真好！"能在这里碰到尊敬的彭老总，真是喜出望外，我当时蹦了起来。彭老总说：

"今天在路上见你同战士们一起推车时那拼命三郎的样子，就估计你不是一般的女学生。后来我慢慢想，才想起可能是你——果然不出所料！"

第二天路过一个镇子时，停车吃饭，彭老总邀我们两个女同志到一个小馆子里吃葱爆羊肉，这是我第一次感到羊肉好吃。晚上好像在耀县宿营，邓发跟我们住一栋房，也要去延安。邓发我早闻其名，却一直没见过，这次经彭老总介绍才认识。邓发的穿着很一般，但显得很精神。

又一天，下了大雪，路不好走，只好歇下来，邓发要去打猎，我就跟去了。斑鸠、野鸽子成群结队地在雪地里寻食，黑白

分明，一目了然，邓发枪法又准，有时一枪能打三四只，所以一个多小时就打了一大串。晚上大家便聚在一起美美吃了一顿百鸟宴。

晚饭后，彭老总邀我去他房间聊聊。他问我怎么现在才去延安。我告诉他一九三六年在上海时就想去延安了，但当时交通不便，后来待我提出来，组织上又没同意，之后又到湖北两年，因为在荆当远工作有些暴露，这才让我去延安的。我问彭老总，我们部队下井冈山之后，敌人是怎么打上去的？彭总说：敌人是从小井山下循着砍柴采药人的行走路线攀藤砍树上来的——我去黄洋界哨口巡察，走到小井医院附近，就发现了敌情，这时敌人已占领小井山头，绕到黄洋界后面了。

接着又谈到已在延安与毛主席结婚的蓝苹（江青）在上海演艺界时的一些传闻。还谈到他的前妻与陶铸母亲在船上相遇后的一段经历。他前妻在革命困难时登报与他脱离关系，所以彭老总拒绝与其恢复关系的事，就是这天晚上他自己告诉我的。

“那么现在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她是个女学生，很纯洁很温柔的。”说到爱妻，横刀立马的大将军立刻喜上眉梢，变得春风得意起来。

在赴延安的途中遇到彭老总，而且有机会与他推心置腹，秉烛畅谈，对我来说，实乃一生之幸矣！

一到延安，我就给毛主席写信，两天后，毛主席写来亲笔回信；见到毛主席时，他首先问起蔡协民；主席让我在马列学院读三年书；吃饭时，江青走了过来，主席见她吐了，赶快扶着她的头，端水让她漱口，又拿毛巾给她擦嘴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我终于来到了心仪已久的圣地延安。

望着巍巍的宝塔山，望着一排排错落有致的窑洞，我的激动之情，难以言喻。中央组织部出面接谈的是科员刘立青。因为我离开竹沟前，中原局已电告中央组织部并说明我要求进马列学院学习，所以刘立青便问我：你想去马列学院吗？我说，是的。他交代我写一份自传，同时介绍我到中组部招待所住下。

招待所在杨家岭附近的一排窑洞里，已有十几位同志在那里了。

窑洞就是黄土坡上挖出的一个个山洞，每洞长十来米，宽约四米，土质坚实、干燥，冬暖夏凉。窑洞内一半是土炕，炕下有通烟沟，冬天炕下烧火，炕上及整个窑洞都暖融融的，每炕至少可睡四个人。窑洞口则一分为二，上窗下门，近门处光线还是很充足的，可以读书写字做针线。

一安顿好，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伏在炕上给毛主席写信。大意是：自一九三二年漳州一别，我常常想时时盼，希望再见到您，一九三六年我就想来延安，想回到您身边了。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已来到这里，期待着您的接见！

这封信我是请刘立青代转的。

把信转走之后只过两天，毛主席很快就回了信，是他亲笔写的：曾志同志，接到你的来信，实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带你来，见面再长谈。

第二天早饭后，中组部刘立青派一位警卫战士带我去杨家岭毛主席的住地，警卫让我进叶子龙的窑洞等候，他便去通报了。

不一会儿，毛主席过来了，他高兴地紧握住我的手：“你来了，很好，很好！”说完便把我迎到了他的窑洞。

主席的窑洞比较大，前半截是石砌的，摆着小书桌，几张木椅凳，另有一个书架，有许多书，还有一张吃饭用的矮方桌。

主席说：这几年上海那边有人来延安，我都注意打听你。潘汉年来时我也向他问起你和蔡协民，但他同样没有你们的消息。

今天见到你，好高兴噢！这几年你们在哪里？蔡协民呢？你们还在一起吗？

主席的关怀，使我内心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了出来。这八年来在白区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啊？四次无端蒙冤，一度丢失党的关系，而重新寻找党组织的过程又是那么的坎坷漫长；蔡协民的牺牲是那样的悲壮惨烈，而与陶铸的悲欢离合，又是那么的大起大落，真是百感交集，一言难尽的八年啊！面对兄长般的领袖，我将几年来的郁闷委屈一股脑地倒了出来。最后我又告诉主席：这次来延安准备进马列学院学习，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条件系统学习过。

主席颇解人意地静静听我讲完，然后点点头说：很好，你有了实际工作经验，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之后，就可以把经验好好总结起来，自己才可能有真正的提高——实践、理论、经验总结，再上升到理论。所以这种学习是很重要的。

如此看来，我应当要求多学一些时日，于是我说："主席，我打算在马列学院学一年。"

不料毛主席说：学理论一年不够，最好学它三年，至少要学两年。学马列要精通它，要学会运用，要多读些经典著作，而且要用心精读。主席说：我这书架上有不少马列主义理论书，你随时可以来拿。

吃晚饭时，主席说：以后，你星期日就来我这里吃饭。我不假思索地马上说："那好啊，来吃一顿好的！"主席一听，愣了愣，立刻笑了："哦，吃好的，吃好的。"我这么说当时就后悔了，主席与全体将士同甘苦，共患难，军装上打着补丁，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我这么说太不合适了。其实我也不是真想吃香喝辣，只是一到主席面前就不由地变成了大小孩，不由地变得调皮了。

饭菜端上来了，大米、小米加土豆的三合饭，一碗白菜，一碗豆芽（豆芽带着许多壳子，很老了），只有那碗烧土豆里有几片薄薄的肉。据我后来的观察，主席的伙食，比王明他们差多了。王明的伙食是鸡鸭肉不断，色香味俱全的。

这些年读到一些回忆文章，说主席对党内同志一般并不迎送，这事我不敢妄加评判；但至少对我，主席是时有迎送的。延安时期是这样（那时我们常见主席），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我去中南海看望他，辞别时，他也会一直送到勤政殿外，看着我登车而去。我以为，主席那时很平易近人，我们也只把他当做一位可尊敬的领导和可亲近的师长，是与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人。至于后来毛主席慢慢被人高高捧到了天上，当做偶像一样供奉朝拜起来，由“人”变成了“神”，“一言堂”代替了党内民主，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自然是令人扼腕叹息的！

吃饭时，主席才将江青唤过来。关于主席与江青结婚的事，我在上海时就听说了。我当时十分疑惑，像主席这样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怎么会与上海滩这位声名狼藉的明星结合呢?她与贺子珍是两路人，而子珍才真正是我们自己的人啊！不理解，怎么又能理解！所以谈话时我不愿听到江青的名字，更不好去问贺子珍的情况。

江青走了过来。我在上海时看过她的戏剧广告，几乎有房子一面墙那么巨大。广告上的江青还是蛮漂亮的，但这会儿，我却实在看不出她有什么漂亮，也许是烛光太暗淡的缘故。她高高的个子，穿着臃肿的灰棉服，样子不显年轻，却在胸前吊着两根姑娘式的长辫子，只是她的一双眼睛还算明媚动人。不知为什么，她整个人显得软绵绵，懒洋洋的，不大多说话，对我谈不上热情，也谈不上不热情，也就是客客气气的吧！

我们三人一起吃饭，延安没什么好东西吃，我至今记得那盘

豆芽菜，不去皮白水煮煮就那么端上来了。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我才明白她为何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原来怀孕了。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我不好再留，就说："天晚了，我该回去了。"主席说："以后每个礼拜天你就上我这里来，在我这儿吃饭。我有很多书，愿看哪本就拿去，看完后再来换。"我傻不叽叽地说："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主席收住了微笑，显得有点尴尬，我自知失言，后悔莫及。也真是的，主席这里只有粗茶淡饭，哪里谈得上什么会餐啊!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席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他睡的是木板搭的床，枕的是荞麦壳枕头。主席在穿着上也很不讲究，只在见外宾时才换上皮鞋，一般穿布鞋旧衣。有一次我去看望他，都六月份了，主席还穿条破旧的有几个洞洞的毛裤，我问："这么热还穿毛裤，是不是腿有毛病?""腿没毛病，只因块头大，买不到现成的线裤。""那江青不会给你订做吗?""我生活上的事她从不关心。""那我在广州针织厂帮你订做两套好吗?""好呀，那就麻烦你了，我有稿费，我自己出钱。"于是我给主席订做了两套线衣线裤。在家里，主席总爱穿毛巾睡衣，那件睡衣不知穿了多少年，磨得又旧又薄了，还打了补丁。

江青在生活上很忽视主席，但主席对江青却是关怀备至。江青患子宫原位癌，在苏联做了放射治疗，主席念她有病，处处照顾她让着她。在广州，主席总是将自己的一号楼让给江青住，而自己到较小较差的三号楼去住，将自己身边最喜爱的四个警卫人员派去照顾江青。他还特意交代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他说："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所以江青虽然只是个秘书职务，但无论到哪里，看文件都必须按政治局委员待遇。有一年，主席要我替江青买块表，他说："江青跟我这么多年没有一块好表，她向我要块

表，你在外面给她买一个，我出钱。”后来我托人到香港买了块金壶劳力士坤表，给了江青。

初进延安马列学院，一捧起书本不是打瞌睡就是精神不集中；延安的生活比上海的地下斗争生活好得多，饭管饱，菜不断顿；一九四〇年五月，陶铸到延安，不久我就怀孕了

上马列学院前我去中央医院作了一次妇科手术，切除了一个鸡蛋大的瘤子，同时也切除了痔疮。手术后两处伤口都痛，腰也痛。痛得我直咬牙，苦不堪言。出院前，医生又花了一个多小时，把我已经严重化脓的断牙牙根拔了出来。这就算是把这几年因动荡不定而老出毛病的身体初步地“全面检修”了一下。这种“全面检修”既需要医院的条件，又需要时间和金钱，更需要宁静的心绪，过去是完全做不到的，这一切只有回到自己的“家”——延安，才有可能一一具备。

我十六岁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到如今再一次迈进校门，其间相隔了十多年，我已经不习惯坐下来读书了，主要是脑子静不下来，也动不起来。一捧起书本，没看两页不是想睡觉就是心猿意马、思想开小差。马列著作本来就不好懂，教员又大多照本宣科，解释不多，启发也少，不外是马克思怎么讲，列宁怎么讲，而没有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也不教给大家学习的方法。所以开始时感到很枯燥、很累。尽管如此，我却很努力。书读了一遍，获得些印象；两遍学到些皮毛；反复读，反复揣摩，反复思考，作摘录，写笔记，慢慢就有了心得体会，有了收获补益。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学比行军打仗还艰难，常会冒出有劲使不上的喟叹，认为自己脑子不行了。有时也会冒出自己反正不搞理论研究，当一个实际工作者未尝不可的思想。这实际上是对

毛主席向我强调的学习理论的重要性还没有真正理解。

三个月后，这一情况才有改变。这时，读书也读出些兴趣了，静得下心坐得住，自然也不打瞌睡了。

马列学院院址在中央医院与蓝家坪之间，绝大多数同学与学院工作人员都住在山上的窑洞里。开始我也住山上的窑洞，因为没人做伴，没有生火，睡冷炕，所以冻得够呛。只有小组讨论时才五六个人热热闹闹聚在一个窑洞里，窑洞也因此才变得暖和起来。记得我与薛焰在同一小组。后来我搬到山下住平房，我们小房间共有四人：朱琏、郭明秋、王季青和我。平房里有一大间是上大课的，说是课堂，却只有一个小讲台，一块小黑板，没有桌子椅子，一律要自己带坐的。在膝盖上作笔记。于是，有的一截木头，有的一方木板，有的一块砖头，有的则席地而坐，讲究些的带个小凳子。这就是我们有时兼作礼堂的教室。

过去我在别处总听人说延安生活很苦。到了马列学院，实际体验之后，倒觉得延安的生活比我们在上海时要好得多。在上海天天与我们作伴的是酸菜和开水泡饭，就这么还经常吃不饱。延安虽吃小米，且壳子多，口感不好，拉嗓子眼儿，但管饱。这很重要。道理明摆着：吃饱肚子比什么都好；菜也不错，不是白菜，就是土豆，没有断过顿，量又多。当然，井冈山时期也比不过延安，那时南瓜都不易吃上呢！

其实延安的群众很少种菜，也不太会种菜。可是大路菜，例如萝卜、白菜、土豆、红枣都还容易买到，就是猪肉、鸡蛋之类也并不缺，还便宜。一斤猪肉就两角钱。延安人有个习惯，不吃“猪下水”，因此猪的肝、心、肺、肠、肚就尤其价贱。

开始那一阵，每逢星期日我总是到彭儒、陈正人那里吃猪肉囊子（即肚皮肉），我们用装饼干的洋铁盒或搪瓷盆当砂锅，每次都煮三四斤，大家吃个饱。后来陶铸来了，家里便常炖猪肉红枣，请同志们一起来打牙祭，有时还去集上吃一顿“三不沾”。

所谓“三不沾”就是把鸡蛋、油、糖混煮，用油多而不沾锅，又甜又香又滑溜，很好吃。那时大家都需要油，需要脂肪，所以“三不沾”特别受欢迎；但现在的人尤其是城市里的人恐怕是不敢问津的了。

再后来，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延安军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我们开出荒地，种瓜、种豆、种菜、种粮食，自己养猪，自己磨豆腐，集体伙食就更好了。尤其从一九四二年起我在延安党校一部，几乎餐餐有肉，馒头、包子、水饺也常吃，小米经过再加工也基本不见壳子了。我们还纺线、织毛衣、缝衣裤，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陕甘宁边区也更加巩固了。

记得大生产运动中就已经引进了一些“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机制：纺线、缝衣、打毛线都给点手工钱；地里劳动，完成上级任务后，剩下的产品可以留给自己或送人，也允许上市出售，所以劳力好的和手巧的，手里的钱就多一些。

总之，在延安，不但有安全感，而且精神生活乃至物质生活都是很富足的。作为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我对延安的体验可能是与众不同的。

陶铸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初也由鄂中经重庆来到延安，我们筑起了自己的小窝。不久我便怀孕了，反应很厉害，吃什么吐什么，连蛔虫、胆汁都吐了出来。医生确诊是怀孕后，陶铸很高兴，整天乐呵呵的。由于反应太厉害，什么东西也不能吃，连喝水都吐，只好卧床休息，马列学院的学业便不得不搁下来了。

怀孕七个月的我从马背上摔下来，只跌成个脑震荡；“宪政辩论会”上，反方戏说共产党的宣传是黄婆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王明出口伤人骂我是“笨猪”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决定调我担任中央妇委秘书长，据说这是蔡畅大姐提议的。

中央妇委书记是王明，副书记是蔡畅大姐。我在妇委只工作了四个月，后来因生孩子便离开了。四个月里我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各地来延安的妇女工作干部和女干部汇报；与西北局妇委和妇联保持联系，参加她们的会议，起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以及整理各地妇女工作的报告。

在此期间有几件事印象较深。

第一件事：马上跌下，脑震荡。

西北局妇联离中央妇委有二十多里，我因肚子大了，行路不便，往往是骑马来去的。有一次从西北局妇联参加她们的会议回来，骑马到马列学院附近已是晚饭后了，一些战士在割过谷子的地里打篮球，正好一个球飞来砸在马头上，马惊得两只前脚朝天把身子竖了起来，一下就把我摔到地上了。那时我已怀孕七个多月，我想这下完了，胎儿肯定保不住了。不料这孩子命大，竟一点事儿没有。倒是我自己跌下，头撞在石头般坚硬的冰地上造成了脑震荡，晕晕乎乎躺了二十多天才下炕。

第二件事：王明的宪政大辩论。

王明的“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切服从国民党。他认为国共两党今后应当搞议会制，共产党的参政权应当通过议会辩论、议会选举来争取。为此，他在女大校址（王明是女大校长）搞了一次宪政辩论。

在临时搭起的一个台子上，辩论双方分坐两边。以马列学院的范元甄为组长的四人被指定代表国民党一方，宣传国民党如何爱国爱民。以我为组长的另外四人被指定代表共产党一方，宣传共产党怎样爱国为民。辩论会开始，由双方组长主讲，组员可以插话和补充。范元甄能说会道，她把国民党吹得天花乱坠，简直捧上了天；我则处处用事实驳斥，说明为什么共产党比国民党

好。范元甄突然说："你们是卖瓜的夸瓜甜，你们的宣传是黄婆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呢！"台下立刻哄堂大笑起来，好像听到了什么语妙天下的崇论宏议一般。

这种戏剧性的议会斗争演习，这种不加引导、放任自流的所谓辩论，热闹固然热闹，实则弊多利少，这反映了王明错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参加这场"演习"只是服从组织决定，不得已而为之的，我想范元甄也是这样。然而，女大与马列学院等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一共有一千多人参加了这场辩论会，其负面影响不可谓不大。

第三件事：王明出口伤人。

我过去没有专门做过妇女工作，更没有在中央领导机关做过妇女工作，所以刚到中央妇委时不知从何入手，自然也没多少主见，只是王明他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事，有一天王明站在窑洞院子里，见我也在（我与他是邻居，共一个院子），便无来由地骂了句："笨猪！"又骂了句："讨厌！"接着自言自语道："有的人比猪还蠢，真讨厌！"说完，就气冲冲地进了窑洞。很明显，这是骂我。因为他的窑洞没有旁人，而院子里也只有我。他平时看见我总是不理不睬，这会儿又这样出言不逊，真把我搞懵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呢？只好按下火，隐忍不发。考虑到大概王明不满意我的工作，而且自己也快临产了，我便提出了调动要求，也不再去妇委上班了。之后，秘书长一职便由卢镜如担任。

进了产房，护士没接住，孩子掉进床下面的铁盆里；产后大出血，两千 CC 血从床上流到地下；陶铸很少来看我，使我很失落；我讲了一些讽刺的话，他把茶壶都砸了，两个人打得鼻青脸肿；主席谈起贺子珍，谈

起毛毛，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伤感

一天夜里，睡到半夜，忽然感到枕头上有些湿糊糊的，点灯一看，全是血。原来是嘴唇破裂了，鲜血直往外冒。陶铸赶紧用湿毛巾把出血的地方按住，一会儿不出血了，但一不小心稍稍碰一下，鲜血又滋出来，只好到医院缝了四针。我算算预产期就要到了，就干脆住进了医院。

那天早晨五点，我感到腹痛，开始出血，八点多医生让我上了产床，可是直到十二点仍没有动静，医生就吃饭去了，产房里只有一个护士值班。快到一点了，腹内突然生出一股力量，逼得我不自觉地往下使劲，忍也忍不住，几下子小孩就蹦了出来，护士慌忙用手接没接住，“咚”一声，小孩掉进了产床下面的铁盆里，这就是今天的陶斯亮。

孩子生下来了，但医生去吃饭还没有回来，我在产床上躺了一个小时，才被人抬进病房。

病房也在窑洞里，这个窑洞还住了一个女同志，刚分娩两天。我被抬进病房后就再没有人来管我了，而我却开始大出血。想请医生来，又不好意思让刚分娩的病友去，这个时候我真希望医生能碰巧来一下，哪怕进来一个护士也好呀，可始终等不到。直到我感觉快虚脱了，才告诉对面床上的同志，她立刻起来，看我脸色苍白，马上去叫来了医生，此时我已失去知觉了。

事后知道，医生一来就接连打了两支止血针，又把床脚垫得很高，使头朝下、脚朝上，两个护士轮流用冷毛巾贴敷肚子，折腾了一天一夜，才止住血，恢复了平躺。医生告诉我，我至少失血两千 CC，血已经透过油布、棉垫、草褥子一直流到地上了。医生说止血针是外面买来的，仅有这么两针，都用上了。我估计：如果没有这两针，那天我大约就一命呜呼了。

从我住院到出院，陶铸很少来看我。忙，是主要原因，但来

看看的时间还是有的。

以前总以为我与他是天造地设最美满的一对。但住在医院，眼见其他人的丈夫每星期都来几次，每次来回都要步行几十里，我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陶铸为什么不来呢？就连我大出血，医院通知了他，他也只来了不到一小时便走了。

多次盼望多次落空后，我便很失望了。什么最美满的一对，那只是我的一种美梦。我戳穿了自己的美梦，心情反倒平静些了。

孩子出生后十六天我便出院回家住了，其实回家也是我自己照顾自己。我们住的是山上的窑洞，带着婴儿很不方便。厕所距窑洞一里远，也在山上，坡陡路窄，不小心就会滚下山去。厕所里又很不安全，粪坑丈把深，上面只有两块木板，一脚踩空，后果不堪设想。山上没水，要到山下挑，还好有一位公务员帮忙。其他公务员抽去烧炭了，他一人帮好几个干部家挑水也十分辛苦，我不忍再叫他帮我做别的。所以月子里煮的、洗的，甚至下山打饭都是我自己干。

小孩的事很多，换尿布、洗尿布、喂奶、喂水，麻烦得很，我终日都在忙，一天不能睡几个小时。陶铸对这些都不关心，白天上班，晚上回来也不太帮忙。最让我生气的是星期天，他整天在李富春、陈云那里不回来，有时要到半夜才到家，其实也没什么正经八百的事，就是玩，摆龙门阵。我难过极了，感情降到了冰点以下。百般无奈，我便自问：难道你就不可以自己料理孩子吗？

无所期待，也就无所失望。从此我对他反而客气起来，但有时言语中免不了会带些“骨头”。

孩子两个多月时，可能我讲了些讽刺他的话，他发了火，把茶壶都砸了，于是打了一大架，两个人都打得鼻青脸肿，弄得左邻右舍都来劝解。后来有的同志说笑：“曾志，你真厉害，那一

架打得那么凶，你一滴眼泪没有，像是满不在乎！”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当时我心如刀绞。

过了很久，我终于真正冷静下来了，也终于一点一点明白了：过去，陶铸之所以乐于同我朝夕相守，是因为他只能同我朝夕相守。因为那时搞地下工作，人际关系极其单一，还得谨言慎行，所以两人都有相依为命不可或缺的感觉。而延安是革命根据地，周围都是自己同志，有些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陶铸又是火一样炽热最讲情谊的人，来到这里，他好像久旱逢甘霖，又恰似鱼龙入大海。他才刚刚无所顾忌地打了几个滚儿，还没有尽兴呢，我又何必与他锱铢必较呢！

从此，我改变了态度，一切顺其自然，对他不再苛求，也不再祈望过多过高了，这样倒也心情愉快相安无事。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五六十年前的感情波折，则认识又进了一步。

与那个时代中国大部分男人一样，延安的许多男同志也担心被人耻笑为“怕老婆”和“围着老婆转”。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大男子思想亦即男权或称夫权思想的残余。这种旧思想横亘在中国几千年封建文明史的每一章节、每一页的字里行间，致使“男权”思想对许多人来说不是有或无的问题，而仅仅是多与少、重与轻的问题，即便是坚定革命如陶铸者，有时也难免其俗。这个问题似乎近些年有好转，但也远没有彻底解决，否则，相声与小品中就不会有“怕老婆是一种美德”的调侃了，可见中国的男权（即夫权）意识有多么根深蒂固，反封建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那时我们与主席分住上下窑洞，靠得很近，我常抱女儿去他那儿聊天，谈点家常和以往的事情。

主席有时也谈起家乡吃的东西，如湖南的臭豆腐、腊鱼腊肉……说起辣椒来更是津津乐道。他说：辣椒好啊，吃辣椒有很多好处，开胃通便，延安没辣椒吃，老吃那些土豆白菜，真是没

有什么味道!他还要给我二十元，让我给家通信时，让我母亲做些腊肉腊鱼捎来。当然这只是一说而已，不过是他思乡情怀的偶然流露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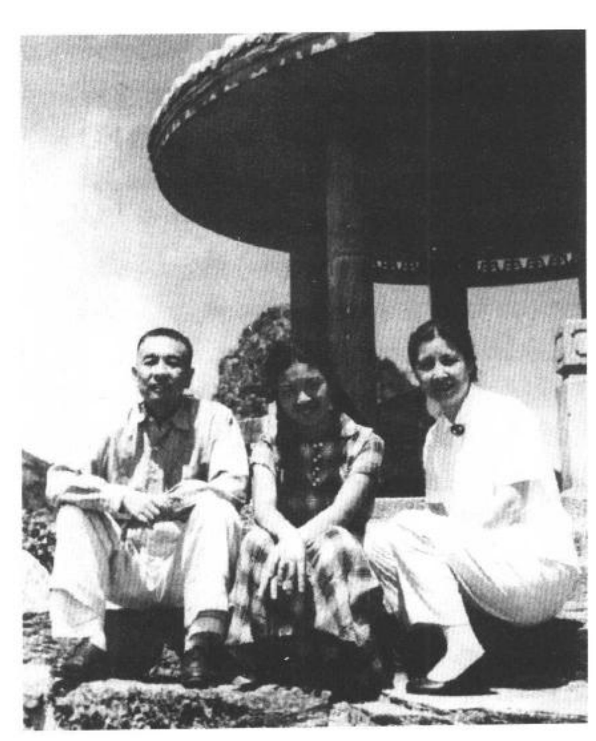
有时他也谈到陶铸，说陶铸很能干，那篇论精兵简政的文章，写得好，别人写不出来。

我老惦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主席竟主动地说起了她。主席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那为什么要离开呢?""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十一处弹片。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还保存在我的铁箱子里。"沉默稍许，主席又说："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长征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我最怀念的还是在中央苏区生的毛毛，部队出发时，孩子站在路边送行，那时毛毛才四岁，没想到这一别就再也见不到了。"主席谈起贺子珍，谈起毛毛，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伤感，这伤感，过去我从未在主席身上发现过，看到的都是欢天喜地的大丈夫气概。他还告诉我，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从领导岗位上被撤下来后，名义上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他，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主席说："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

多读书!”我相信主席讲的都是心里话。在毛与贺的分离上，人们总是指责毛，连我也认为主席未免太负心。那天听了他的一席肺腑之言，才感觉到他也有难言的苦衷。

后来，一九五九年，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我因肾盂炎急性发作，正在家中休养，所以就跟陶铸一块上了山。当时谁都没有料想到，这个会后来会开成那个样子。

在山上，突闻冯伯驹同志患急性心肌梗塞，正在南昌抢救，陶铸立即下山乘飞机去南昌探望，我则随机去看了下贺子珍。



一九五七年与陶铸、亮亮在庐山。

一九四六年子珍从苏联回到东北时，我曾去看望过她。她南下准备进北京时，在山海关被阻，强行让她改路去上海。一九五四年我去上海却没有见过她。一晃十年过去，她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子珍是江西人，江西的领导同志对她很好，所以她时常来南昌住一阵子。她的住所是一栋带一个小庭院的小洋房，比较陈旧了。见有来客，子珍迎到房门口，她一眼就认出了我：“你是曾

志同志?”接着既客气又热情地将我让到客厅，我端详着子珍，不到五十岁的人，却像个老妇了，花白的短发，瘦弱的身体，上身穿件洗退了色的短绸褂子，下面是条黑色的半短裤，赤足拖双布鞋，手中拿一柄蒲扇。那年南昌酷热，宾馆是用大盆的冰块来降温，而她只能用凉水泼地以度三伏，所以客厅湿漉漉的，两脚像泡在水里。我不由得深深感叹，她和江青太不同了。江青时髦娇贵处处显示第一夫人的派头，而子珍却像市井贫妇一般地生活着，但她质朴、真诚、善良，而且还保留有几分的清秀。

见我来看她，她十分高兴，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个没完，都是她自己的零星家事，她说话有条有理，脑子也很清醒，每当提起毛泽东，她都毕恭毕敬地尊称为“毛主席”，不像流传的那样，说她有精神病。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留影。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子珍。回到山上我就去见毛泽东，我告诉她我去看望了子珍。“怎么样，她还好吧?”毛泽东关切地问，“我看她精神很正常，说话表情神态跟正常人一

样，记性也很好，过去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毛泽东沉思片刻，然后极真挚地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的夫妻嘛！你跟汪东兴同志讲一下，乘江青还没上山之前，将贺子珍接来，晚上两点，当××值班时再来。”我将毛泽东所嘱之事告诉了汪东兴。陶铸说：“这件事若是让江青知道了，那还了得呀！”所以后来怎样进行的我就再没有介入了。近来才知晓，是朱旦华和水静同志陪子珍上山会毛泽东的。事后我问主席，久别重逢的感觉如何？毛泽东叹息着摇摇头说：“大失所望！看来她的精神还是不正常，我吃安眠药，她一把抢过去，说是有人放了毒，唉！”这次之后，主席就再也没有见过贺子珍了。一九六五年，我去上海治病，看过子珍多次，她也来过我住地几次，讲了很多往事和心里话，记得最深刻的，是她坦言主席不该这样去对待彭德怀，可见子珍思考是健全的，有独立见解，政治水平不低，从这点看她不像有精神病。“四人帮”倒台后，子珍来北京住了一段，我去机场接她；她回上海时我又去送了她。不管怎样，我与子珍是风雨同舟的战友，我同情她，更尊敬她！

“抢救运动”阴风陡起，河南省委成了“红旗党”，我也成了小组审查重点；作了五六天的详细报告，一个星期的面对面责问，我还是不信口开河，因此被认为是“顽固不化”；有人骂我是吃屎的，历史比狗屎还臭

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要求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然而在审干中却一度出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记得那是在整风后期，大家正联系实际，联系自己，学习党的文件，忽然从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那里传来了一股“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阴风。

一九四二年初，新组建的党校开学，我调党校一部学习。记不清是在党校一部附近还是南门外附近的一块平地上，有天晚上，搭起了台子，架着好几盏汽灯，我们都去听了“失足青年”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报告。有位青年叫张克勤，二十岁左右，在台上大讲他怎样被国民党利用，加入了特务组织，又怎样带着任务来到延安混入革命队伍，讲得有鼻子有眼。还有一位女青年叫徐曼丽，大约还不到二十岁，她说她也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也是打进革命队伍来搞破坏的，她边讲边哭，并大喊大叫说要挖掉国民党特务的眼睛，要剥他们的皮，抽他们的筋，喝他们的血。看到台上的报告人声泪俱下、痛不欲生的样子，我们也都情绪激昂，信以为真。

以后，这样的会隔几天就要举行一次。

之后我们以党小组为单位，每个学员都要报告个人的经历，再由小组全体学员背着报告人，进行分析研究，寻找疑点，然后在小组会上向报告人提出质疑。如此反复多次才有可能得出结论。这样，经历简单的也要半个月才能过关，经历复杂些的，至少要一个月，认定有问题的，半年一年也结束不了。

在白区、敌占区和国统区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同志顺理成章地成了这次审干的重点。

有一次党校一部又举行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动员大会，校长彭真、教务主任黄火青都参加了，会议好像是由一部主任古大存主持的。谁作动员报告忘记了，主要是动员失足的人自首坦白。讲到党内成分不纯时，特别提到：河南从省委到基层都有红旗党问题，所有党员都是红皮白心的假党员！会场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闷、紧张起来了。

危拱之，大革命时期的留苏学生，长征女干部，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她听了报告，感到党组织对她的共产党员身份都怀疑了，十分绝望，就在动员会后的一个夜里，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

子自杀，幸好窑洞外有人站岗，听到异响后发现了，才抬到医院抢救了过来，但已七窍流血，满面污秽，枕头床单也红了一大片。危拱之从此有些自暴自弃，精神也有些失常，乱骂领导，乱谈恋爱，并嚷嚷着要脱党。她常跑到男宿舍去和她的男朋友睡在一起，弄得同窑洞的男同志很尴尬。对批评她也满不在乎，说什么：我命不要了，党籍不要了，还怕什么？我愿怎样就怎样！

她的问题一直过了两年才得到甄别，认定她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刘少奇亲自找她谈话，当面向她赔礼道歉。后来，危拱之调东北工作，不知怎么真的疯了。新中国成立后她在武汉住院，我去看过几次，她不说话，只把笔记本给我看。厚厚一本，写得乱七八糟，完全不知所云。她没有儿女，没有丈夫，得不到亲情的关爱。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而调去的一个女工作人员也不大尽心，危拱之上厕所跌断了大腿，她既不护理也不报告，听之任之，真是凄惨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危拱之就糊里糊涂、无声无息地死去了。一个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女领导干部，落得个如此凄惨的结局，真正匪夷所思。

由于动员大会把河南省委定为“红旗党”，河南的党员便都成了假党员。因此，我们小组审干工作首先就从河南学员开始。

小组里有位姓苗的青年，是河南地委一级的干部，才二十三四岁，大家叫他小苗。小苗报告了自己经历后，大家马上对他采取攻心战术，鼓励他尽量多交代，然后就夜以继日地轮番向他进攻，不让他睡觉，逼他坦白，只要他“坦白”一些，就给他煮面条，加以鼓励。这种“恩威并施”的车轮战术整得小苗晕头转向了，他开始胡说，却又不能自圆其说，一追问便矛盾百出。这样搞了一个多月，直到他承认在河南某地曾加入了国民党 CC 特务组织，才认为差不多了，对他的审查方告一段落。

小苗成为“解放战士”后，又参加了对他人的审查，他变得分外积极，加倍发狠地整别人，希望立功赎罪。

没过多久，轮到我在小组里报告自己经历了。我的经历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工农红军、苏维埃、游击队和根据地等公开环境里工作过，另一方面又在白区和国统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于是小组自然将我列为审查重点。我明白：我做地下工作时间长，环境极为复杂，经常要与社会各界人士来往，也难免要与国民党的人甚至特务打交道，所以，对我这段历史作严格审查是完全必要的，我不应该抱抵触情绪。我告诫自己：第一，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不管如何逼供，都要讲真话，即使把我打死，也不能说半句不实之词。第二，态度要冷静，绝对不可与同志们对立；对别人的偏激与过火行为要谅解，要有受委屈与皮肉受苦的思想准备。第三，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是非曲直终会水落石出。

我从祖父母、父母亲与我小时候的家庭情况回忆起，一直说到来延安前在荆当远的工作，我一段一段交代，尽量具体、仔细，大概花了五六天才报告完。最初小组同志只是听，偶尔询问一两句，待我交代完了就让我休息了几天，他们则对我的报告进行研究、分析，提出疑点和问题。

一星期后，转入小组内的面对面责问，人问我答，许多事情都要反复询问，我也必须反复回答。我总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大家的提问，有则说有，无则说无，绝不信口开河。这样大约又是一个星期，他们没有从我身上“突破”什么，于是认定我属于顽固不化分子。小组便集中火力对我实行逼供，仍无进展，又扩大为全支部都来逼供，还是车轮战，白天黑夜不让休息，每天都要搞到下半夜两三点，有时则要通宵。所提问题都是事先作过分工的，只要我的回答不合他们的意，就有人用手敲我脑袋，或把我像皮球那样推来推去，甚至揪头发踢腿。比较有“创意”的办法是把板凳翻过来，逼我坐在一条凳脚上。他们认定我是因怕死从闽东苏区逃跑出来的，认定我在鄂西北国民党第五战区做地下工

作是特务活动，硬说三十三集团军兵站站长给我的名片是特务介绍信，连我在襄樊平林店被国民党便衣扣押又旋即释放的事也不相信，认为此事有重大嫌疑。有人甚至想通过整我，弄出材料，再去整陶铸（陶铸时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后又调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管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

虽然我也被车轮战搞得疲惫不堪，晕头转向，但脑子再糊涂，有一条却是认准了的：绝对不说瞎话，无论别人怎样软硬兼施，武攻文诱，始终坚持记得就是记得，不记得就是不记得，没讲过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对我的这一态度，有的同志很恼火，他们对着我大喊大叫，骂我是吃屎的，历史比狗屎还臭，骂我不要脸，脸皮比城墙还厚。说别人受审查还掉泪，你却一滴眼泪没有。说我们这样气愤，你却还在笑，分明是死心塌地要跟大家作对！

其实，我有时笑一笑是因为实在忍不住。有的同志长期在军队里工作，过于缺乏社会常识，比如硬说火车只能跑平原，不能盘山行驶，比如硬不承认世上还有什么名片，一定要我承认名片就是特务证，等等。解释、辩白不通，只有一笑了之。

我当时身体并不好，有突然晕倒的毛病。我最怕晕倒过去被别人说成要死狗，到那个时候，他们再把我拖来拖去，我就非死不可了。所以我在被逼供时总是尽量控制情绪，一休息下来，又尽量想一些愉快的事，并抓紧时间睡觉，以便养精蓄锐，准备应付下一轮围斗。因为这，我终于坚持下来了，竟没有在会场上晕倒过一次。

全支部对我的车轮战没有取得他们希望的东西，又请了其他支部的精兵强将来助战，结果仍是一无所获。对我的车轮战整整进行了两个星期，他们认为我是死顽固，只好把我先放在一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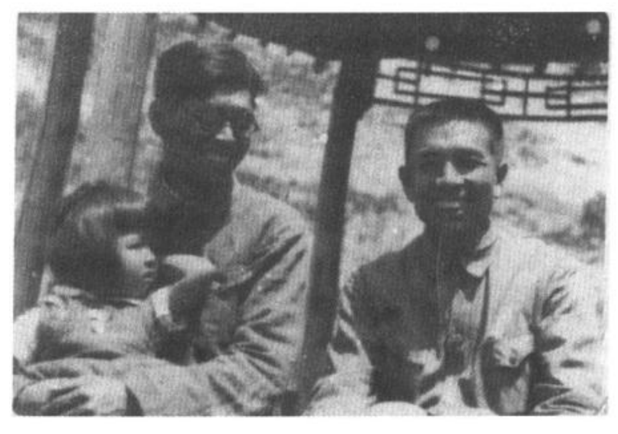
我与叶群同住一室，她在我的脸盆里撒尿，弄得屋里屋外臭烘烘；审干“逼供信”，出现了一些自杀现象；我最想念我的女儿亮亮，审查期间不能回家，男保姆外出时就把亮亮拴在床腿上，拉屎拉尿全由她

这以后我倒轻松了，没有了车轮战，甚至没有人再来过问我，我便在一旁看着人家批斗和被批斗。

在党校一部，我与叶群两人同住一间平房。那时她与林彪结婚不久，但林彪已去了四川。她在另一支部接受审查，小组同志向她提问时，她又哭又闹，回到房间也总是哭哭啼啼。生活上她也弄得乱七八糟，吃饭的搪瓷缸子和筷子、汤匙，从来未见洗过，吃过饭就撂在那儿，下一顿再拿来装饭菜。学校的厕所很远，她说有病，不愿去，就在房间往洗脸盆里大小便。晚上或清晨有时也用菜碗接尿，然后顺手从门缝往外泼，弄得屋里屋外臭气烘烘。可气的是，有一次趁我不在，她竟在我的脸盆里拉了尿，我问起，她倒承认得很干脆：“是我尿的。”林彪寄给她的新白布，她撕碎打了草鞋，甚至还用新毛线打草鞋。她的行动显得很反常，很怪诞，我十分看不惯。林彪为什么会找这样一个人呢？

五十年代，叶群常去广州，并在市教育局挂名工作了一段时间，与我接触较多，之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又多次见面。久而久之才感到此人并不简单。初识她的人，都以为她为人直爽、生活朴素、学习也很刻苦。例如她自学俄语时，请了个白俄保姆，天天用俄语对话，房间挂着俄语单词条子，口袋装着学习卡片，坐车、休息甚至上厕所都要念几句，给人一种孜孜不倦的印象。其实叶群这人善耍手腕，爱讲假话，很有心计，后来就连林彪也被她弄得服服帖帖,对她言听计从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地位上升，叶群的野心更大了。



一九四五年离开延安前，亮亮干爸爸王鹤寿抱着亮亮与陶铸在一起。

记得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时，我因是全国人大常委，发了上天安门城楼的票。她说，她是在人民大会堂楼顶上观看广场游行和群众晚会的。我问：你为什么不上天安门呢？她说："还没到时候！"这句话，她是脱口而出的，但恰恰暴露了她的野心。

延安的审干一度"逼供信"相当严重，以致出现了投井自杀、跳岩自杀、悬梁自杀事件，偏离了党中央审查干部的初衷。这些情况后来毛主席知道了，及时做了纠正，经中央决定，提出了审干"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的原则，这才慢慢扭转了局面。因我属于被审查对象，所以"九条方针"的文件从未学习过，至今不知其详。但我知道，我能活着度过这一关，靠的就是这"九条方针"。因为，按过去中央苏区"肃反"的做法，我早就脑袋搬家了。有了中央的方针，党校一部的"逼供信"一度有所收敛。对叶群的审查不久也告一段落了，她得到了比我更多的自由，星期天可以回家了。

我与叶群的家都在王家坪。她回家，我总让她去看看我的女儿。

我最想念的就是女儿亮亮了。

亮亮的大名叫陶斯亮，她爸爸起的。"斯亮"大概就是"这

儿最光明”的意思，是纪念宝塔山下延安这块革命圣地的。

整风开始，亮亮一岁多。我被审查前，每星期都回家，审查一开始便不许回家了，而此时陶铸又化装去晋西北进行敌后武工队的工作调查了，需要第二年才能回来。家里的男保姆是个战士，三十多岁，对孩子算是有些感情，但管教方法不对。比如他去担水、打饭，就用绑带把亮亮的脚拴在床脚上，哭也由她，闹也由她，拉尿拉屎都由她。我怕女孩子穿开裆裤不卫生，就让她穿实裆裤，孩子小，大小便有时会拉在身上，男保姆就用小板子打她的手心。裤子一脏就打，所以孩子很怕他。

有一天，叶群从王家坪回来告诉我：亮亮病了，发了烧。我只好请求支部让我回去看一下，支部居然同意了。我回到家见女儿烧得迷迷糊糊，就急忙带她去看病，喂她吃药。第二天中午，我正陪女儿在床上休息，叶群进来了，说是支部要她来看看我、陪陪我的。以往我回家从没有什么人来陪我，显然是让她来监视我的，不外是怕我自杀，怕我找人串通。女儿退烧后我就回党校了。

此后，经支部批准，女儿每星期都可以来我身边过周末，周六下午由男保姆送来，周一接回去。女儿来，是我这一周的大事，每周六天一到傍晚，我总是早早坐在半山坡上焦急地等待女儿。我不眨眼地远远望着王家坪的渡口，眼看着保姆背着亮亮上了岸，然后让孩子下来走一段，又背一段。一到党校跟前，我便飞奔下山，亮亮也老远便叫“妈妈”，我们母女俩那个高兴劲，那种幸福的感觉，真是笔墨难以描述。

“临时支部”实为监狱，重点审查对象七十多人互相审查、批斗；“坦白分子”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心狠手辣；个别老红军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整起人来毫不留情；一顶“特务嫌疑”的帽子把我挂了起来；陈

毅认为我在高压下没讲假话，态度诚恳；我被勉强选为党的七大候补代表

春节过后，大约是三月份，我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又被编入了党校临时支部，从而离开了原住处，迁往新住地继续接受审查。新住地在党校一部后山，新开了一条巷道般的山洞，直通党校一部。此处三面是山，打了一排窑洞，缺口处筑着一道高约三四米、厚约一米的坚固土墙，墙上插着许多破瓷片、碎玻璃，墙外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战士。这里名为临时支部，实为监狱。新搬来的党校一部学员有七十多人，都是所谓有重大问题的。七十多人中有二十多位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党的七大代表，因党的七大延期召开就进了党校接受审查。临时支部的书记最初是耿飚，他上前线后继任书记是聂鸿均。

七十多名学员分作七八个小组。审查方式是：小组学员互相审查，即“有问题的”审“有问题的”。每个人又重新报告一遍个人经历，然后在小组里互相提问、批斗。我属于死顽固，大约他们估计不容易突破，所以在一年多里始终没有轮到我。

虽然中央有了“九条方针”，但是这里的“逼供信”仍相当严重，与以前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分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还有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于分析，只一味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

有一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叫易季光，被审查时，有人用皮带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袄都抽破了，遍体血迹斑斑，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块。有一次用绳子只吊着他两手两脚各一个指头，高高悬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不忍睹。

还有一位被斗的女同志被打昏过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

却说她装死狗,反而用脚死命踢她。

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洇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

上吊自杀的好像叫周风平，他是来自白区的省委书记。

连续几个昼夜的车轮战，这是每个被审查者都必需要遭受的。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如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可是，偏偏我这个“顽固分子”在临时支部里没有再被批斗逼供，也没有参加审查别人，一年多里我都是作记录，那一豆昏黄的小灯，使我的视力下降了许多。不开批斗会时，我就翻来覆去地“啃”马列学院读过的理论书。我排除了一切烦恼与痛苦，尽一切努力，使自己不至活得太沉重。我一再告诫自己：要活下去，要健康地活下去！因为我明白：再大的冤屈，总有澄清洗雪的一天，但如果经不住批斗，身体垮了甚至死了，那么冤屈就可能永远成冤屈了。因此，我时时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励自己，敦促自己多吃、多睡，努力排除干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之，我的心绪一直是较为平静的。

例如：我与危拱之同住一个窑洞时，她同一名比她年轻的干部恋爱，半夜三更两人还在窑洞里说说笑笑，搂搂抱抱，甚至在床上滚来滚去，我都能视若无睹，照样看书睡觉。后来我与宋维静同住一个窑洞。由于她曾被长期单独关押，受刺激较大，已几乎失语，与我同处一室后开始是断断续续说一些，后来变成整天含糊不清地叨叨，还经常神魂颠倒地在窑洞里走来走去，我也照样泰然处之，看书学习和睡眠都不受影响。

由于这样，在这一年多里，我的身体反而比以前还要好些。

一九四四年初，大概是因为中央下达了甄别决定的缘故，临时支部的批斗有所缓和，又过了一段，批斗审查就基本结束了，党支部的工作转向甄别。此时支部书记聂鸿均已调走，由我们小组的范某某继任。

范某某原来也是重点审查对象。他刚入党那会儿，敌人想抓他没抓到，便抓走了他的姑父，并告诉姑父家的人，只有范某某前来自首才能放人。范某某经不住姑母等人的苦苦哀求，后来果真去自首了。他一自首就被关进了看守所。这时一位老同志的表弟偷偷告诉他，自首并不会减轻刑罚，只有翻供，坚决不承认才是出路，这样他便推翻了自己的口供，于是又被解往福州监牢关押。一九三二年，国民党派系斗争激烈，蔡廷锴、蒋光鼐在福州反蒋，发动“闽变”，释放了政治犯，范某某才获得自由，回到闽东。

在临时支部的小组会上范某某解释说，当时他入党才几个月，还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幼稚想法，甚至幻想自首了便可以回家当教员，这都是不懂党的纪律的缘故。

大概当时范某某已过甄别这一关了，所以要他当了支部书记。

在这次审干中，“逃跑问题”又是审查我的重点。这个问题，正是范某某一九三八年首先向中共中央长江局提出的，现在范某某又担任临时支部的书记，我当然就更不容易过甄别关了。

范某某继任书记不久，校部通知，要各支部总结审干经验。范某某传达这个通知后，便讲了许多成绩，并宣布整个延安审干都没有“逼供信”现象。临时支部各小组对校部的通知和范某某的讲话讨论得很热烈，此时“肃反”的恐怖气氛有所缓和，越来越多的同志敢讲话了。讨论中，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不赞成审干中没有“逼供信”的说法，我们说，其他地方有没有“逼供信”我们不知道，但临时支部却是典型的“逼供信”。范某某说：

“你们这样讲就是反对中央总结审干经验，就是反对中央精神。”面对这样吓人的帽子，大家没有被唬倒，我说：辩证法是讲“一般与个别”、“普通与特殊”的。全延安的审干是不是都有“逼供信”我们不清楚，即使大部分没有“逼供信”，那也只是“一般”和“普通”，而不是全部，至少我们临时支部就是例外，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个别”和“特殊”。临时支部审干中的“逼供信”，大家分明都是亲眼见着，亲身经历着的，又都是刚刚发生的，怎么可以死不认账呢？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做法，根本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范某某坚决不同意临时支部存在“逼供信”的说法。我们气极了，我就和另外两个同志跑去找彭真校长汇报，但走到半路硬是被支部派去的人给拽回来了。

后来才知道，所谓的总结审干经验，和“抢救运动”一样都是康生他们搞的。

不久，支部把审查我的结论交给我看，结论把我的经历写了一大篇，结果认定：离开闽东苏区是逃跑行为，与任铁锋的关系、荆当远工作以及平林店被扣等，都有特务嫌疑，最后结论是把我的问题挂起来。

我早就料到我不会有好结论，但戴一顶特务嫌疑的帽子却是始料未及的。于是我便根据这份结论的内容，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一项一项地进行辩解反驳。我还去找了党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释，但他不表态。我又去找教务主任，他说：是啊，这些问题是跳到黄河也说不清了。我请他为我说几句公道话，他很客气，可也不肯表态。

碰了这些钉子，我便不再找人了，挂起来就挂起来吧！延安通讯与交通都不方便，全国又分根据地、国统区和敌后区，到处都在打仗，目前要弄清这些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次蒙冤，我很镇静，也很坦然，因为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也相信自己，

相信我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我不断勉励自己：革命是自觉的事，决不能因这个审干结论而消极、悲观，我还要像在荆当远工作期间那样，用事实来证明我的无辜和清白。我是革命战争中的一个幸存者，我只有更加积极努力，自觉为党工作，才能不愧对那些先我而去的同志，才能不愧对自己的历史。

一年多的审查批斗中，我没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没流过一滴泪。我惟一的武器就是“实事求是，知之说知之，不知说不知”，这也是我能做的对党的最大忠诚。我尽量吃好睡好，如果哪个晚上停止批斗，我就静静地读书，一年多下来，我不仅没瘦，反而胖了。这期间我给毛主席写了封长信，尽管没收到回音，但我相信主席最后会主持公道的。果然，主席亲自纠正了这种无辜迫害党的忠诚干部的做法，朱老总、陈(毅)老总、钱瑛大姐等了解和熟悉我的老同志，也纷纷站出来为我说话。甄别后，我还被补选为七大候补代表。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为毛主席祝寿，在王家坪组织了一场舞会。我去了，主席见到我，显出很高兴的样子，邀我跟他跳舞，我乘机问：“收到我的信没有?”“收到了，很理解你的心情。”这样我还能说什么呢?领袖的信任，足以消融我一切的幽怨和委屈。

包括审干在内的延安整风，是我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克服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伟大政治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教育运动，这次整风对实现党内思想、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次整风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与过去“左”倾路线占上风时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方针是根本不同的。通过这次整风，党内达到了空前团结，革命队伍的战斗力得到了空前加强。

整风后期出现的“抢救运动”，以及“抢救运动”中存在的

严重的“逼供信”和假坦白现象，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给整风运动特别是给审干工作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我们永远记取。但这一错误在延安整风中，毕竟是局部和支流的问题，不能因此而否认整风运动的巨大成就。

好像是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已经延期多年的党的七大终于进入正式筹备阶段了，中央成立了几个大区代表团，开始审查代表资格。整风审干中有遗留问题的代表都由各代表团负责甄别。

我虽不是代表，但我是华中的干部，所以华中代表团的领导对我的历史和原审查结论也进行了考察和甄别。

华中代表团团长是陈毅，钱瑛也是领导成员。他们考察了我在审干中的表现，认为我态度诚恳，实事求是，在高压下没有讲过一句假话，而在临时支部七十多位受审查的同志中没有讲过假话的只有四人，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是难能可贵的，代表团领导因此推荐我为党的七大候补代表。这样，党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结论便成了我在延安审干中的最后结论。结论大意是：从我入党到离开闽东之前，以及离开闽东之后，工作一贯是积极的，表现是好的；但因病离开闽东是一种政治动摇的错误。

华中代表团正式选举代表时，陈毅为我作了介绍，肯定了我的长处，但也指出因病离开闽东苏区是一个错误。大多数代表投了我的赞成票，我被选为党的七大候补代表。但毕竟有一个“错误”尾巴，所以赞成票刚刚超过三分之二，可以说差一点落选。

为了甩掉压在我身上的“逃离闽东”的包袱，我打报告给毛主席，要求去敌后工作；临别前最放心不下的是仅四岁的亮亮；我们让长征战士杨顺卿把亮亮当做女儿养大成人，抱着赴死的决心踏上沙场

党的七大开幕前，中央决定大会后要派一批干部并调一支军队到两湖、两广，深入日军占领区去加强武装斗争，并在敌后更大区域内开展党的群众工作。陶铸要求到敌后去，中央同意了。由于敌后斗争异常艰苦凶险，中央决定此次深入敌后一律不调女同志，也不准带家属。

但我想去敌占区。我长期以来被迫背着"逃离闽东"的沉重思想包袱，由于战争环境里一时难以进行调查核实，因此要证明自己不是贪生怕死之徒，只有主动到最危险的敌后战场去。我要用事实来洗刷别人泼到我身上的污水，用鲜血，甚至生命来证明我政治的坚定和对党的忠诚。

于是在另一次舞会上，我找到了主席，我说我要随陶铸去，死也要死在前线，我要用自己的鲜血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与清白！主席有些为难，说中央已做出决定，任何女同志都不许去，何以单让你去呢?我倔强地争辩："不可能一律不去，个别情况个别对待，我做过那么长时间的地下工作，怎么就不能去敌后呢！你们不要看不起女同志！"主席拗不过我，最后宽厚一笑："好好！我支持你去！回头我同少奇同志讲讲。"最后中央也同意了。

就这样，中央特批我一个女同志随陶铸南下，到沦陷区去打游击。但走到半路，日本投降，中央指示我们日夜兼程赶赴东北。在白山黑水艰苦卓绝地战斗了四年，直到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我才又见到主席。

就要告别延安了，就要结束我在延安五年八个月的难忘岁月了，我心中还真依依难舍。离开延安，最放心不下的，是我们的女儿亮亮。她刚四岁，天真活泼，人见人爱，尤其是陶铸的心肝宝贝。然而为了抗战胜利,为了民族解放,多少人已经抛头颅洒热血捐躯疆场，我们离开女儿又算得什么？何况还有党组织和同志们的照顾，我又何必牵肠挂肚！

此时，组织上已派杨顺卿来照顾亮亮。出发前一个月我就告

诉女儿：爸爸妈妈要出远门，到很远的地方去，白天晚上都不能回来，你就跟杨叔叔在一起。你要爱杨叔叔，不要想爸爸妈妈，不要哭。这样的话我几乎天天对孩子讲，使她知道爸爸妈妈不会回来了，让她幼小的心灵有个准备。同时我们请求照看她的杨顺卿，把亮亮当做自己的女儿养大成人。杨顺卿是经过长征考验的二级残废战士，非常和蔼善良，十分疼爱亮亮，亮亮交给他，我们是很放心的。

这时，我忽然得了阑尾炎，送进医院经检查后是亚急性，因此当晚未动手术。那天晚上我想，不如趁这次开刀把绝育手术也做了，免得以后在敌后工作再添拖累。我向李富春提了这个要求，李富春说这事要征求陶铸意见才行。于是便给陶铸打了电话，陶铸说没有意见，由我自己决定。这样，第二天就一下子做了两个手术。

手术很成功，但术后我受了风寒，咳嗽不止，把腹内的缝线崩断了一处。当时并不知道，术后十天就出了院。再十天左右就参加了党的七大预备会，每天往返要走十多里，党的七大之后更经历了连续几个月的长途行军，所以伤口一直没有完全愈合，经常发炎，腹部时肿时消，非常痛苦。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地点在杨家岭大礼堂，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候补代表共七百多人。毛主席在会上致开幕辞（即《两个中国之命运》），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科学地总结了三次革命特别是八年抗战的经验，提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团结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纲领与策略。在政治报告的最后，毛主席满怀激情地号召：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大家精神无比振奋。在整风审干中挨过整的同志，心中的一切哀怨和不满也都一股脑儿抛到九霄云外了，特别是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向被错整的同志们脱帽、鞠躬、赔礼道歉，大家更是感动得热泪涟涟，呜咽不能语。大会期间又有许多同志报名到前线去，到敌后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党的七大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以后革命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七大是六月十一日闭幕的，六月十二日，我们来不及参加牺牲同志的追悼会，就随警一旅的大部队出发了，杨顺卿抱着亮亮和朱仲丽（王稼祥夫人）等同志一起来送行。当我骑上马时，看到亮亮很惊慌，却又不敢啼哭，而我则早已泪如雨下了。因为我是抱着赴死的决心踏上那喋血沙场的，这一别，五年十年难再见，而且很可能就是我与女儿的永诀了……



一九四五年在延安。

第十一章　转战东北

告别延安，原准备进军两湖两广；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中央致电陶铸，赶往沈阳接受新任务；苏联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却要把主权交给国民党；东北群众也面临选择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问题；彭真说，苏联士兵爱喝酒，我们可以投其所好，换回军用物资

告别了延安，我随警一旅的队伍向敌占区——两湖两广前进。

警一旅即延安边区的警备一旅。此次行动，王震三五九旅的一个团也配属给了警一旅（三五九旅的主力已进入河南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加强后的警一旅的旅长是文年生（新中国成立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政委由陕甘宁边区地方法院院长雷经天担任。雷经天是广西人，也是广西原红七军的领导人之一。副政委是莫文骅和陶铸，莫文骅分管军队，陶铸分管敌后地方工作。

由于部队进军目标是两湖两广一带，并要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湘粤桂边根据地，因此中央也预先配备了一个地方区党委的领导班子：湘粤桂边区党委书记是雷经天，副书记是陶铸，随部队去湘粤桂区做地方工作十来个同志中，雍文涛、刘子载、我等准备参加区党委，薛光军、陈再道、贺炯等准备从事其他地方工作。部队要求：行军中陶铸在司令部，我们一行十几人便在政治部帮助做群众工作。

部队离开延安，经过清涧、绥德后，在吴堡境内横渡黄河。这个地方虽崖高谷深，水流却还平缓，几条小船，只要两三小时就把五千人马渡过去了。

过了黄河，进入山西的山区。从此地到太岳根据地，要经过宽约二十里敌占大平原。这里距日军的巢穴太原城很近，所以碉堡林立，戒备森严。但地方机构却多是两面政权，名义上是敌人的乡、村、保、甲，实际上是我们的人民政权，而且几乎村村通地道。许多地方，碉堡上站岗的是日伪军，碉堡下的村庄里却住着武工队、八路军。

部队预定急行军一百八十里，天亮前在太原附近过封锁线，然后渡过汾河进入太岳山区根据地。我们傍晚六点下山，尽管是急行军，但因有几千人的大部队，加上马匹辎重的拖累，所以过汾河时天已大亮了。一夜辛苦，司令员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布好警戒做好战斗准备，吃完早饭立即开拔。

部队一停下，当地群众便欢天喜地拥了过来。过去大部队经过这里都是晚上，敌占区群众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八路军，兴奋得不得了。各村都拿出了粮食、蔬菜等，男女老少抢着为部队做事，烧火、做饭、喂马，或站岗放哨、侦察敌情。军民情同手足，感人至深。

吃过饭，正要出发，敌人从太原乘火车追来了，我们立即向太岳根据地急行军。沿途碉堡里的敌人不断向我们开枪，太原的敌人还向我们开了炮，子弹在身边“嗖嗖”飞过，炮弹也不时在附近爆炸。更可恨的是在某个村子驻扎的伪军，竟摆开一副阵势企图狙击我们。

文年生司令员身先士卒，带着身边的战士像饿虎扑食一样呼啸而上，一下就把敌人打傻了，这时大部队也到了，向伪军包抄过去，吓得伪军立即抱头鼠窜。这次遭遇敌人追袭，我们伤亡数人，其中有一位是团职干部，还丢了几匹牲口、几箱银元。有一

位老红军和几位战士掉队后被群众掩护，藏在地道里，几天后，群众又护送他们赶上了队伍。有这样好的人民群众，我们的军队能不赴汤蹈火多打胜仗吗?!

在太岳根据地，部队进行了休整，进入河南境内已经是七月了。不料连日大雨，河水暴涨，黄河过不了，其他几条河，涉水也过不了。这一个月里，我们和部队只好在河南焦作、渑池、孟县、孟津一带来回运动。

八月中旬，突然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我们和全体将士一样，都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中央来了命令，要警一旅停止南下，就地勒令日伪军投降，收复据点，收缴枪械。部队立即按中央命令，开始了行动。

渑池附近铁门镇驻守的日军不肯向我缴械投降，部队坚决采取军事行动，强攻铁门镇，但因敌人工事坚固，且地势险要，所以接连两天没有打下，进入了胶着状态。

就在这时，中央致电陶铸，命他率领随队南下做地方工作的十几位同志立即北上，日夜兼程赶往沈阳接受新任务。

看了电报，我们一刻也没有停留，由四匹牲口驮着行李就出发了。我们白天步行，晚上躺在牛车上，请老乡一站接一站往前送，经河南孟县、博爱、辉县、涉县、武安，到达了邢台。这些地方都刚被我军解放几天。从邢台再往北，一路也都是解放区。我们先后经过河北的巨鹿、南宫、冀县、献县和霸县。在霸县休息了两三天，便又继续向北走。走到北京南口机场附近，却碰到了一批由美国人驾驶的小飞机在沿公路作超低空飞行，飞机只比树梢高一些，机舱里美国兵的嘴脸看得一清二楚。我们牵着马，停下来瞪着飞机，美国人见我们停了下来，都狂笑起来，“呼”“呼呼”地紧贴着我们头顶掠过去。这显然是一种挑衅行为。

美国兵为什么要向我们寻衅呢？因为美国人同蒋介石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因为日本投降时，蒋介石还在峨眉山上乘凉、观战，而

在广大的日军占领区坚持了八年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广大民兵却迅速收复了大片国土，人民的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对此蒋介石和美国人又岂能善罢甘休？

毛主席在分析抗战胜利后我们与蒋介石的斗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抗日胜利的果实了。

所以，抗战胜利后，立刻出现了反动派抢夺胜利果实和人民保卫胜利果实的尖锐斗争形势。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抉择。

我们奉调东北，就是参加这场保卫胜利果实的伟大斗争的。

走到香河县境，正碰上香河发大水，一望无际的高粱被淹没了大半截，公路更看不见了，只见白茫茫汪洋一片。但我们还得抓紧时间走。水淹过了马肚子，我们在水里慢慢蹚了十几里，才踏上了未被水淹的公路。又经过玉田、丰润，终于到了山海关。

山海关街道不宽，但相当繁荣。我在街上买了汗衫和衬裤，这是我一九三八年以来第一次买衣衫，屈指算来也有八年了。

离开山海关来到绥中，看到铁路上正行驶着一辆汽油巡道车。一问是锦州铁路局一位姓马的副局长到绥中办事的，我们便搭上了这辆巡道车直奔锦州。由于车小，马匹只好留下，由饲养员带着走。

在锦州，见到了李运昌，他是驻锦州部队的司令员。他的部队最早占领锦州一带，缴获了许多军械装备，所以部队穿着较齐整，显得很威风。在锦州还遇到了林枫等，他们是刚从晋西北来的。休息了两天，我们就与林枫等同志同乘一列火车赶往沈阳了。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左右，我们抵达沈阳，住在汇丰银行大楼里。住在大楼里的还有全国各地调来东北的同志，如张平化、吴亮平、朱光、李天佑、邓华等，桌上、地上都睡了人，我

也睡在一张长会议桌上。因为人多，一些设备又不懂使用方法，所以银行所有的抽水马桶都塞满了粪便，自来水龙头终日滴着水，电风扇开了不会关，只好昼夜吹着风。

在这里我们住了三四天，其间听了一次彭真的报告。报告讲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一方面要尽力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另一方面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报告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对他的报告印象最深的是讲当时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刚刚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和其他协定，这些协定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但又规定这些主权要交给国民党政府。彭真说：东北是战略要地，我们决不轻易放弃，人民的果实，要靠坚决的斗争来保卫。

我党我军正是在这种态势下，像楔子一样“挤”进东北的。

当时局势是：苏联一百万大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后控制着整个东北；我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和先期出关的八路军、新四军力量正迅速发展壮大，党的工作也正在全面铺开；国民党正规军虽远在千里，但在美国的支持下，正通过陆、海、空三路加紧向东北集结军队，同时以高官厚禄大量网罗伪满人员，收编伪满警察，组成了国民党地下军与我对抗。

住在汇丰银行的同志们很快就分配了工作，有的去黑龙江，有的去吉林，有的留在辽宁。陶铸任辽宁省委书记，我任沈阳市委委员兼铁西区委书记。

铁西区在沈阳西部距市中心二十多里。铁西区周围国民党的地下军很多，他们四处打黑枪，专门暗杀从关里来的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人很好认，都穿着灰布军装，所以不少同志就这样遇害了。

为了行动方便，我在一个伪满大臣的家里找到一件黑棉旗袍

及一些棉衣裤，穿在身上竟畅行无阻，哪怕是深更半夜，来往铁西，也无人注意。

群众工作，这是我们进入铁西后抓的第一件大事。

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面临着群众选择谁的问题，即：选择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在有些群众眼里，国民党是“正统”，对我党我军则持怀疑与观望态度，所以宣传发动群众的任务相当紧迫也相当繁重。

铁西区是工业区，大小工厂一百多个，绝大部分是新建的厂区。工人宿舍区距厂区很远，一律是平房，阴暗潮湿，拥挤不堪，街道狭窄而肮脏。与整齐划一的厂区相比，这里简直是地狱。

当时铁西区的工厂大多停了工，不少大机器和主要设备已被苏军拆下运回国内了，有些工厂则遭到了破坏和偷盗。厂区只有少数工人在看管，大部分工人都在宿舍区待着。区委立即把全体干部和工人党员动员起来，深入到几个大厂的宿舍区去，在几万名工人和家属中调查访问，与群众一起回忆日伪统治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镇压，发动群众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

区党委的另一件工作是抓“枪杆子”，以组织起一支工人武装，对付国民党的地下军。武装工人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武器。

铁西区是日本军队的仓库区，每个仓库占地都很大。仓库里面有环形汽车道，有的还有火车道，四周围着高压电网，戒备十分森严。我们知道仓库里的武器枪械和一些重要物资大多已被苏军运回国内了，但还剩些一般军用物品，如军用衣裤、棉布、棉纱、毛皮靴帽等，甚至还有大捆大捆的儿童服装。然而仓库都由苏军士兵守卫着，如何把这些物资弄出来呢？

彭真曾在一次会议上讲过：我们要设法从苏联战士守卫的仓库里搞出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品来，大家可以多想点办法。苏联士兵爱喝酒，我们可以投其所好送他们烟酒，以换回我们需要的军

用物资。

恰好分配到铁西区的有一位从延安俄文学校毕业的女同志，叫高茜，她的俄语说得十分流利，我就同高茜一起去找守仓库的苏军士兵，与他们交谈，请他们支援。

虽然苏联政府与蒋介石政府订有条约，但毕竟苏联军人是长期受苏共教育的，听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有的士兵就翘着大拇指，对我们十分亲切。有的把我们领进仓库，有的则开着汽车送我们一个一个仓库看，我们需要什么，大多能得到满足，只可惜仓库里的枪支太少了。

我们用这批从仓库搞出来的枪支弹药，加上发动群众自己找来的武器，很快就组织起了一支工人武装训练队。

在工人武装训练队成立的同时，区党委也着手铺开摊子，建立各种组织。

铁西区范围大，有十几万人，我们成立了区政府和区工会，区党委下面又设了两个分区委。街道与居委会组织暂时未作改变。伪警察大队因为由苏联红军控制，所以也原封未动；我们虽然派了三位同志去公安局任局长、副局长，但实际指挥不了伪警察大队。

工作才开头，摊子刚铺开，国民党的大部队就通过山海关直逼沈阳来了。苏联红军只准备把沈阳交给国民党，而不准我们的部队再驻扎这里。我军只好匆匆换上警察帽，伪装成警察部队；同时决定武装保卫沈阳，准备打巷战。为此，省、市、区都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党政军统一指挥。市委决定，铁西区行动委员会由我任书记，驻扎铁西区的我保安团长邢成和区长孙毅任副书记。

几天后，市委通知我去开会。会上我们被告知：苏军限令我党、政、军人员（包括伪装成警察的部队的）二十四小时内全部撤出沈阳，否则要武力解决。市委决定第二天撤出，要求各区也同

时撤出。撤出后的市委机关将迁往沈阳以北五十里的财落堡村。

从市里回来，我马上召集区委会议，研究撤退问题。大家认为，要安排的事情很多，例如布置秘密组织和隐蔽党员，例如抢运重要物资等等，二十四小时是远远不够的。铁西区这样大，一天一夜把人找齐也来不及。我们觉得，苏军限二十四小时撤出沈阳指的应是市区，而铁西区是郊区，于是决定找个苏军指挥官谈一谈。

我们在公安局楼上找到了驻铁西区苏军的一个营级军官，由高茜翻译，提出二十四小时来不及撤出，至少要三天才够，并指出：铁西区是郊区，与沈阳市区不应一样对待。那位军官架子很大，板着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面孔，生硬地说：不行。我们又再三跟他摆出具体困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才没有极力反对，但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

我们返回区委继续开会，按三天时间布置撤退。会后，区政府立即撤到区委，区委的隔壁是公安局（即伪警察局），伪警察住楼下，苏军的一个班在楼上。我们以为这样也好，有苏军战士住在隔壁，区委、区政府会安全些。

国民党警察骗苏联红军打我们；苏联红军劝我们早日撤离铁西区；两个伪警察把我挟持，苏军士兵冲向伪警察拳打脚踢，把我拉上楼

哪知二十四小时刚过，晚上八点左右，在区委楼上担任警卫的工人训练队的岗哨就持枪来报告，说从公安局出来许多伪警察，正向区委大院靠拢。我们赶紧到走廊砖墙下观察，发现五六十名伪警察，手持武器，沿区委院墙已形成了半包围圈。这时，又见四五个伪警察走到区委敲门，前院的同志毫无思想准备，便前去开门，正要制止，门已打开了，伪警察当头一枪，我们的同志就

应声倒下了。区委站岗的训练队员见状立即开枪还击，伪警察见有抵抗，也不敢进院里来。

我们迅速下楼，把大门重新关上，伪警察则在墙外散开，虎视眈眈地盯着院内的一举一动。我们决心与来犯的伪警察决一死战，幸好准备巷战时区委楼上保存着两大箱手榴弹，大家把箱子抬到楼梯口，只要敌人一向我进攻，就用手榴弹对付他们。但这些伪警察很怕死，蹲在墙脚下就是不敢动，既不前进，也不后退，而我们在二楼射出的子弹也打不着他们。

突然，从公安局三楼的平台上向我们射来雨点样密集的冲锋枪子弹，一听就知道那是苏制冲锋枪，幸好我们都在走廊上蹲着。我对高茜说："糟了，莫不是苏军被伪警察缴了械，伪警察再拿着苏军的枪来打我们？"枪声响过，停了几分钟，有苏军士兵在平台上说话的声音，我们喜出望外，立即要高茜向苏军喊话。高茜便用俄语大声喊："红军同志！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铁西区委，现在伪警察包围了大楼正袭击我们，为什么你们也开枪打我们呢？请你们把伪警察赶跑，快来救援我们吧！"隔壁平台上的苏军士兵立即回话："妈的，上了警察的当，他们骗说一股土匪占领了你们的楼房，要我们帮他们打土匪哩！"又说："你们不要动，守住大门，我们立即打电话调部队来！"

半小时后，果然开来了两卡车苏联红军，他们一下车就把包围我们的伪警察集合起来带回警察局了。随即进来几个红军战士，把区委、区政府的几个负责同志接到隔壁警察局大楼的红军住处，其余的人仍留在区委楼里，苏军加强了警戒。

我们一到三楼，发现公安局局长杜西书等也在，我问："到底怎么回事？"杜西书说："晚饭后，几个伪警察到我房间，对我很不礼貌，要把我房间里的手提机枪拿走，我不准，当时就看出他们可能有什么行动，红军怕出事，就把我叫到三楼，并叫我们不要出去。"

红军战士说：有两位派来公安局工作的同志，晚上一进大门就被几个伪警察挟持走了。

又有几个红军士兵告诉我：包围区委的伪警察是国民党的地下军，有国民党发的委任状。

然而，袭击区委事件后，苏军只是把包围我们的伪警察带回警察局，却未作任何处置，所以之后又接连发生了一连串伪警察袭击我们的事件。

第二天早晨约七点钟，伪警察对警卫的红军战士说：广场上来了几十名老百姓，要找穿黑旗袍的妇女，战士把这话转告了我，我未作任何思考就随战士下了楼。

来到广场，却一个人也没有，就在这时，突然冲出两个持枪的伪警察，一左一右夹着我两边胳膊，我一面在口袋里掏手枪，一面大声喊叫，伪警察把我往大门里拖，守卫在楼梯口的红军见状便冲向两个伪警察，拳打脚踢，拉起我就上了楼。伪警察的如意算盘是：把我骗出去，然后押到他们楼下办公室里，把我杀死。后来知道，那两位派去担任公安局副局长的同志就是被伪警察挟持后弄到办公室杀死，再扔到旁边防空壕里的。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一位赶大车的车老板通过红军告诉我们：在前面不远处，有我们一男一女两位同志被害，女的死了，男的还活着。我这时有了警惕，请求苏军一位尉级军官与我同往。这位军官同意了，但他十分大意，竟然没有带手枪，只在裤袋里装了一个手电筒。

我们随车老板走，出警察局大门，沿途都有荷枪实弹站岗的伪警察，只是看见有苏联军官陪同，所以对我才不敢造次，但个个都饥鹰饿虎般盯着我，弄得那军官也紧张了起来，赶紧把手插进了放手电的口袋，装出手里握着手枪的样子。走了一里多路，在一个胡同口发现了躺在地上的两个同志，女同志已经咽气了，叫武云勉，男的是工会的萧同志。萧同志是区工会负责人之一，沈

阳坦克厂的工人，地下党员。见了我们，他勉强坐了起来说："昨晚听到区委有枪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早上想来看看，走到半路碰到武云勉，她说借了群众的脸盆，要撤离了，她是去还脸盆的。正说着，来了几个便衣，挟持着我们来到这里，二话没说就朝我们开了枪。

我们请车老板帮忙，把两个同志抬上大车回到了警察局操场，并赶紧把萧同志的伤口作了包扎。

伪警察是下了决心要消灭我们的，看来这里呆不下去了。苏联红军也劝我们区委、区政府尽早撤离，并主动提出派一个班的士兵，护送我们离开铁西地界。区委经过简单研究决定，为了避免无谓牺牲，立即撤出铁西区。我们请求苏军帮助雇了三四辆大马车，把一些必要的东西装上车。我们到三楼红军住处取行李，却发现一个装满伪钞大票的皮箱不见了，这是我们辛辛苦苦拍卖棉纱换来的，足有十几万元。这肯定是某个苏军士兵所为，我们又气又急，但士兵们没有一个肯承认，真是哑吧吃黄连，有苦难言。好在另一个麻袋里还有两三万元，因为上面压了些书籍和衣物才没有被士兵发现，否则我们就连雇马车的钱也没有了。这些苏军士兵纪律不好，我们睡在苏军房间里，士兵们就调戏高茜，被高茜大骂了一通。士兵也恼羞成怒，扬言要把我们统统炸死。这里的确不是久留之地。

红军一个班护送着我们走了十几里，估计伪警察不敢追了才返回。因为有伤员，我们便沿着去财落堡的大路慢慢走着。天很冷，大家的衣服都很单薄，受伤的萧同志躺在马车上也只盖了两条薄军毯。我时时下车走在他车旁询问他的感觉，他都有回答，问他哪里难受，他说没有。天将黑时，才到财落堡。我揭开萧同志头上的毛毯，却发现他已经没气了，心脏停止了跳动且周身冰凉。我难过极了。

到了财落堡，市委书记孔原等都在，武云勉的爱人也在。见

到妻子的遗体他痛哭流涕，悲愤不已。第二天，掩埋了两位同志，我把铁西区的情况向孔原等作了汇报。铁西事件，我们共牺牲了五位同志。

离开沈阳，陶铸说："老大哥"也管不着了，我们搞我们的；关里来的干部衣着单薄，陶铸把自己的毛衣毛裤都送了人；车老板告诉我：这一带打闷棍抢劫的土匪很多

听完我的汇报，孔原说："你去找省委，代表市委将我们撤出沈阳的情况汇报一下。"我估计他是想让我回到陶铸身边去。我问：

"省委在哪里？"

"你先到马三家子看看。"孔原说。

我和通讯员雇了一辆马车到了马三家子，但省委机关不在那儿，只见到了薛光军，他是省委联络站的。薛辉告诉我："你们往巨流河方向走，一路找吧！"到了巨流河，见有我们的部队守卫在桥头，卫兵告诉我西边高台子村里有部队还有首长。到了高台子村，邓华司令员、陶铸都在，还有李富春。大家见了面，都高兴得不得了。

陶铸说："离开沈阳，到了农村广阔的天地，这就好了。'老大哥'也管不着了，我们搞我们的！"

我问他："在沈阳清理多余物品时你把马搭子留下了，说是将来打游击用得着，这次带来了吗？"

他说："当然带出来了！我出沈阳坐的是汽车，一到马三家子，司机就跑了，可能跑回沈阳了。在农村还是骑马可靠呀，自由自在，哪儿都可以去。"

所谓"马搭子"，就是厚布缝制，搭在马背上用以装被子、



曾志和战友们在东北。

衣物和办公用品的大口袋子。现在看来，陶铸不肯丢弃马搭子，说明他对我们进沈阳后可能出现的尖锐斗争和复杂局面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但我想，包括陶铸和我在内的许多同志也许当时根本预料不到：从这时候开始，只短短四年，几百万国民党军队就土崩瓦解，蒋家王朝就寿终正寝了，他的马搭子也完成历史使命了。

作为革命战争的历史见证和革命者战斗风格的见证，这副马搭子我们家后来一直作为纪念品珍藏着。因为它不值钱又不起眼，所以“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也没有被红卫兵抄走。一九八四年吉林省白城博物馆来征集文物时，我认为这马搭子具有一定意义，就交给他们收藏了。

我向省委汇报后，在高台子住了几天，其间听了李富春的一个形势报告。

巨流河的高台子，是省委所在地，也是我党干部从关内到东北各省的必经之地。关里来的干部络绎不绝，这些同志往往衣着

单薄，经济也较困难。钱还好办，而御寒衣服即便现做也来不及，于是陶铸就把自己身上穿的大衣，甚至毛衣毛裤都脱下给了他们。他的警卫员向我诉苦：“好不容易给他弄件大衣，没几天就送了人，又得再去想办法，真是费劲！”对同志，陶铸永远是冬天里暖融融的一盆火，永远可以倾其所有。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在高台子，我见到了刚从晋西来的林枫的爱人郭明秋，她入关的准备比较周到，光洗衣皂就带了好几块，让人羡慕不已。

我在高台子呆了一星期左右就返回财落堡了。途中车老板说，这一带打闷棍抢劫的土匪很多，要加倍小心。我说：不怕！

车老板是个热心人，跟我一路拉着闲话。那时形势虽然紧张，但老百姓毕竟结束了日伪统治下的非人日子，自由多了。所以几乎任何时候都可以雇到农民的胶轱辘马车。

到了财落堡，市委机关却已转移了，留下来的工作组告诉我，孔原等人现在法库县附近的赵贝堡。于是我又赶往赵贝堡。

在赵贝堡不但找到了市委，还认识了驻扎在这里的辽西第一军分区的田维扬司令员、黄永辉副政委和冯志祥副主任等。

市委撤出沈阳原是准备回去的，但省委陶铸、邓华等分析，短期内沈阳是打不回去的。因此省委决定，以沈阳市委为基础再设一地委，辖新民、铁岭、昌图、法库、康平、沈阳以北郊区以及东科前旗、东科后旗等地。孔原任沈阳市委书记兼一地委书记，田维扬任军分区司令员，张化东为专员公署专员，褚凤岐为宣传部部长，我为组织部部长。

我到赵贝堡时孔原已兼任一地委书记了，宣传部部长褚凤岐，却是第一次见面。

我向孔原汇报了去省委的情况。从孔原见到我时惊讶的表情看，我回来是他始料未及的，大概他原以为我会留在陶铸那里的。

我们都住在群众家里，孔原、张化东住一个院，我与褚凤岐住一个院。吃饭是在孔原住的院里，配了个炊事员。其他同志则在群众家里吃。记得元旦那天吃了顿饺子。我原来不爱吃饺子，但因好些时候没吃到肉了，所以这顿饭倒也吃得有滋有味。

同我们一起吃饺子的房东感慨地说，好吃不过饺子呀！但伪“满洲国”那时，不要说过新年了，就是过大年也照样吃不上饺子——连荞麦面饺子也吃不上。老百姓年年上缴“粿税粮”，但日本鬼子还时常来屯子里“打金米”、“骂白面”，哪怕是一粒大米一把白面都要抢走，那日子真是苦透了。

从沈阳撤出的市、区干部，大部分分配在市郊各地，如财落堡、平罗堡、蒲河等，我们铁西区一些干部，如区长孙毅和高茜等则去了苏家屯。市委提出的工作任务首先是宣传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宣传人民军队为人民，控诉日本军国主义和汉奸特务的暴行，并用事实来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勾结汉奸特务、倒行逆施的罪行。其次通过广泛的访贫问苦和宣传发动，迅速培养一批积极分子，成立起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参议会。然后是建立人民民主政府，组织自己的武装。此外，还有开展反奸清霸斗争，解散由国民党、汉奸、地主组织起来的维持会等。

元旦后一星期左右，孔原、张化东说要去铁岭检查工作，便离开了赵贝堡，同时还带去了两个班的战士。六七天后回来一个班，告诉我们：孔原、张化东带着一个班往抚顺方向去了。孔原没有说何时回来，也没有写信来布置工作，我们感到很突然，有一种群龙无首的感觉。

三月份省委才通知：东北局已把孔原、张化东留下，将另行分配工作。

我们只好将一地委和军分区迁至省委和省军区的所在地法库，住在两个地主的大院里，这时专署好像没有机构。因为地委书记和专员都不在，我们只有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开展工作。遇

有事情，就由田维扬、褚凤岐和我碰头，商量着办，有时也请黄永辉来参加。

撤出沈阳之后，沈阳郊区的地主武装勾结日伪残余势力接受国民党的秘密委任，公开或暗地里跟我们对抗。因此这一时期地委和军分区的主要工作就是扫除沈阳外围的土匪和地主武装，镇压汉奸恶霸和国民党的“地下军”，使占领沈阳的国民党军队失去耳目和左臂右膀，也为我党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打好基础。

秀水河子战役一举歼敌五个营，使国民党是“正统”的观念在东北群众中开始动摇；从马背上跳下摔昏过去的我，鼻子里流出乳白色的东西，我一惊：这不是脑浆吧?法库县几次易手

秀水河子是法库县一个有五百余户人家的小镇，一九四六年二月中旬，我军在蒋介石军队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利用其轻敌冒进，在秀水河子集中优势兵力，精心组织了一场歼灭战，一举歼敌五个营，共一千六百余人，这是我军在东北战场的第一次亮相，大长了我军的威风，我党在东北地区的威望也因此大大提高。

当我军战士带着缴获的战利品，坐着美式汽车浩浩荡荡经过法库县城时，街道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群众纷纷议论：不要看国民党军队武器装备全是美国造，一律穿着翻毛大衣，神气十足，可是这些“猴子兵”不会打仗；共产党的军队虽然穿着不好，武器也一般，但打仗勇敢，而且秋毫无犯。这次胜利使国民党是“正统”的观念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动摇。不少人纷纷转向支持我们。贫雇农和青年知识分子更加愿意接近我们的干部和军队，报名帮助部队抬担架、送伤员和运输军用物资的多

了，要求参加八路军的多了。

秀水河子战斗是林彪在法库指挥的。战斗打响的那个晚上，枪炮声像鞭炮那样密集，曳光弹如满天流星。他说：我军出关时把好武器留在解放区了，原准备到锦州换新枪，但锦州换枪的计划没有实现，倒弄得有些战士只有手榴弹而没有了步枪，加上因长途行军的缘故部队都很疲劳，这一仗完全靠指战员的机智和勇敢，硬是用手榴弹、炸药包、爆破筒和拼刺刀打下来的。林彪还说：我这辈子打了许多仗，这是炮火最密集，战斗最激烈的一仗。

我们到法库，已是天寒地冻的时候了，许多同志从沈阳出来，衣物很单薄，所以一到法库，就组织人赶制棉军装。我原来穿的是棉旗袍，虽不觉冷但很别扭，于是我也要了一套棉军装换上了。但因棉衣制作粗糙质量差，我又经常骑马，所以不几天，膝盖上的棉花都掉下裤脚只剩两层布了。我因此很快得了关节炎，膝盖肿痛不堪，行动相当困难，尤其到晚上，痛得难以入眠。后来老百姓教我：穿上老羊皮裤，膝盖再包一块厚皮子就可以治好。我如法炮制，经过两个冬天，果然彻底好了。

此时辽宁省委已改称辽西省委，书记仍是陶铸。省委和陶铸根据形势发展，要求各地以区为中心，在地、县工作团的指导下由点到面开展工作，以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当时，我们主要抓的是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发动群众清匪反霸。群众最痛恨的就是敌伪时期直接残害老百姓，干了无数坏事的汉奸、恶霸、土匪、特务和伪警察，我们就用人民政府的名义狠狠镇压了一批，从而把群众发动起来、争取过来了。二是清算敌伪的资财，把敌伪的浮财和粮食分到穷苦的贫雇农手上，让群众得到实际利益，这不但有利于发动群众，也有利于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三是在群众发动起来后，认真物色贫雇农积极分子，放手让积极分子去领导群众运动，以培养群众自己的领袖。

四是建立贫雇农为主的人民自卫队和区中队，同时迅速发展县大队和军分区的武装力量，以便武装保卫群众的斗争果实。五是没收汉奸恶霸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合理分配开拓地（即伪满时期日伪军抢占的公有地）。六是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取缔或改造国民党秘密委任、由地主恶霸操纵的村、区维持会，建立和健全农会、贫农团和村、屯基层政权。七是组织好群众的生产。

那次我打算去铁岭。我是骑马去的，顺着铁法公路走，大约有六七十里地。我是一个人骑马走的。这匹马我是第一次骑，有同志教我："你骑马走二三十里后，要下来牵着走一段，再上马时把马肚带稍稍扣紧点，这样马会走得更快。"我照着做，骑了三十来里就下马步行，然后紧了紧马肚带。但当我的左脚刚踏进蹬子，右腿还未跨过马背时，那马突然飞奔起来，我急忙从马上跳下，结果摔在路边的硬地上，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才醒来，发现那马也乖乖站在我身旁。我勉强撑起身，感到鼻孔里流出了什么，用手一抹，满手乳白色的东西。我一惊：这不是脑浆吧?!

马路上没有一个人影，我只好自己慢慢起来，费了好大劲才爬上马背返回法库。这匹马一定是很好的坐骑，十分忠诚，也很通人意，我扣紧肚带它就飞跑，我跌下马，它又回来守在身边，我受了伤，它又驮着我自己慢慢走回来。如果当时马跑走了，我跌在地上，冻成冰人了可能还没人知道呢。

回到地委机关，医生说是脑震荡。我昏昏沉沉躺在炕上，一个多星期脑子才清醒。

当时我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迟滞敌人推进速度、掩护后方根据地建设为目的，不打消耗战，所以在法库县几经易手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大的损失。

我地委和各县党政干部在坚持农村工作的过程中，遭到了地

主恶霸反动武装的疯狂反扑，不少干部被明枪暗箭所杀害，其中有区长张强、前旗大队长刘营昌、康平县委副书记贺炯、法库县委组织部部长刘卓仁、昌图县县长许芝等。

敌人的猖狂更激起了我们的斗争勇气。根据中央和省委精神，我们在康平县大张旗鼓发动贫雇农和中农分配开拓地，向地主、富农开展清算斗争，并加紧创建敌后游击根据地。

中央“五四”指示下达后，我们在各县有条件的村屯开展了减租减息、诉苦、清算、分粮、分浮财的斗争。康平等敌人尚未占领的县城，是我们的后方，在这些地方的农村里继减租减息之后，又领导了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雇农的斗争。方法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合理分配，地主富农也各得一份，中农不动。步骤是：诉苦、清算、划阶级、丈量土地、定界插牌。这一切均由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领着群众自己干，我们对他们只负责土地分配的培训，从旁指导和支持，并不包办代替。

一九四六年三月中旬辽西省委从法库撤到郑家屯，后又撤至洮南县，并于六月改为辽吉省委，下设五个地委，陶铸仍为省委书记。

不久，我就康平县减租减息、分开拓地、组织群众生产和党的建设等工作到洮南向省委作了汇报。从康平到洮南要经过科尔沁左翼中旗、瞻榆、开通等地，沿途都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四五十里不见一户人家，而野鸡、野兔却遍地都是，还有成群的黄羊。蒙古族村庄里则奔跑着马牛羊，狗多鸡也多，物价很便宜，我们在中旗的一个村庄住下时，给房东一块现洋，她竟给了五只鸡，由于交通阻塞，这里也没有什么商品交换，完全是小牧农经济，而且大牲畜都是牧主的，因此农牧民的生活是很艰难的。

我在瞻榆附近的群众家里，吃了生虫子的井水泡的涝水饭，结果得了痢疾，小腹剧痛，还屙脓血。

到洮南找到省委，我抱病作了汇报。主持汇报会的是郭锋，

他对我的汇报比较满意,认为康平的一系列工作是集中试点、梅花形铺开、波浪式发展的，方法基本正确。

对东北地区的局势，郭锋指出：国共两党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签订东北停战协议之后出现的停火是暂时的，国民党军队终归会进攻我们，东北的斗争将是长期而艰苦的，也必然是错综复杂的，要求我们利用停火时间，大力发动群众，健全农会和贫农团组织，扩大人民武装，加紧剿匪清霸和分配土地，确立起作长期艰苦斗争的决心。

国民党军队突然进犯康平，一千多共产党人被围；四个月后，被围的一千多人步行八千里地，历尽艰难险阻，终于来到齐齐哈尔；陶铸说：这是一次可歌可泣的“小长征”

在坚持东北对蒋斗争的头一年，我们遵照毛主席“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在康平、前旗全境和法库、铁岭、昌图广大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在军事上开展游击战，壮大了军分区和县区武装，肃清了地主恶霸的反动武装，歼灭了多股政治土匪，在政治上取缔了国民党的维持会，培养了大批贫雇农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建立起了农会以及区、乡、村、屯政权和党、团组织。由于我党我军给广大群众谋取了许多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人民政府更加信赖、更加拥护了。

但是，我们在工作中也有重大失误。

毛主席早已指出：建立根据地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做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取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

建立巩固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巩固的根据地。

一地委和军分区的活动范围正是毛主席指出的“这种地区”。而真正巩固的根据地,应当建立在“距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我们处在敌我犬牙交错的复杂环境中,大部分活动都在接敌地带。虽然我们明白这里是游击区,知道战争必然是长期的、残酷的,但我们却没有预先布置一个可靠的后方;虽然我们明白国共停战是暂时的,敌人一旦准备完毕就会对我大举进攻,但我们却没有下力气抓好敌情的侦察和情报工作,没有制订出对付敌人突然进攻的预案,也没有制订一个与前沿各县党政军在各种情况下保持联系的办法。

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统统在康平,而康平与已被敌人占领的法库之间,仅仅隔着一马平川的一百里地!

正是我们的麻痹大意,招致了康平的失守和部队的损失。

一九四六年八月下旬,正当我们埋头打小仗壮大武装,埋头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党建政的时候,沈阳和法库的国民党军队突然从几个方向进犯康平。等得到消息,敌人距我们只有三十里了,地委等机关只好匆忙西撤,进入大郑铁路以西地区,而敌人一直尾随在后,紧追不舍。十月,根据省委陶铸的指示,我们进入内蒙古奈曼旗大沁他拉地区的根据地,这才摆脱了敌人。

但是,活动在法库以南、铁岭和昌图农村的党政干部、军分区部队和县区武装,在敌人来犯时,我们却来不及通知,后来派去联络的同志也杳无音讯,致使那里的一千多同志和我们失去了联系,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情况非常危急。

造成匆忙撤出康平且与前沿同志失去联系这一严重后果,作为地委成员,我是有责任的。当时我只顾自己分内工作,其他问

题，特别是整个局势的变化、机关和部队的安全我都未加注意，更未予过问。敌人逼近康平了，我才从乡下赶回，随队撤退。恰好此时地委傅雨田书记调走，代理书记刘瑞森刚到，他仍按常规工作，为了熟悉情况一头扎到下面去了，以致敌人逼近时，他还在昌图，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褚凤岐也是撤到了前旗时我才碰见的。

这是个沉痛的教训，事后省委和陶铸严厉批评了我们，我是诚恳接受批评的。

国民党正规军大举进攻康平的消息，军分区司令员田维扬也是那天下午才知道的，他立即通知了我们，我是傍晚从乡下赶回，连东西也来不及收拾，立即集合地委机关同志，跟着田司令员和一支分区部队撤出康平的。

撤出康平后，我们的目标是通辽、开鲁一带，走到东科后旗时已是沙漠区了。那里的沙很白很细，俗称“大白沙”，那两天风又大，一阵狂风过去高丘便成了低丘，再一阵狂风，低丘又成高丘了。因此沙漠里没有永久的路，行走十分困难，而且极易迷失方向。行进到下半夜三四点，竟走到敌人的村子边上了，算一算实际才走了三十多里。好在那里沙漠虽然东西方向宽达两百多里，但南北较窄，所以走到天亮，我们终于脱离了沙漠区。

在通往通辽、开鲁的西撤途中，遭遇了国民党军队和反动蒙古族骑兵的多次围追堵截，掩护我们的部队牺牲了不少同志。通辽、开鲁是辽吉五地委的所在地，摆脱敌人后我们就在通辽、开鲁附近活动，等待省委指示。

辽吉军区司令员邓华当时正在通辽，他来驻地看望大家，并批评了田维扬和我们对来犯之敌未作必要狙击即撤出康平，致使敌人步步进逼，置我于十分被动境地。邓华又说，曾志是参加革命较早的女同志，在当前环境下不宜再随部队行动，要调其回省委工作。刘瑞森书记当即表示同意调出。但我坚决不同意。正因

为现在局势险恶，才更需要每一个共产党员坚守岗位。见我不肯走，他们也只好由我。

就在这时，西满分局召开了高级群众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委派一两位负责同志参加，地委派我去。于是我便到了齐齐哈尔，住在一个旧日本兵营里。

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领导群众运动。

在我党的工作范围内既有大后方，也有前沿接敌区，又有我们铁岭、昌图一带敌占区，在发动群众的方法上差别较大。

大后方一些地方发动群众是派出工作队到农村去，工作队员手把手地带积极分子。例如斗地主，要先示范表演，有人当地主，有人当贫雇农，如何开场，如何批斗，如何结束，一段一段排练，一句一句由工作队员教授。我们认为这不是放手发动群众。但主持会议的领导却表扬他们工作细致、深入，批评我们工作马虎。

我们这些身处敌占区和接敌区的同志都不同意这种批评。他们在大后方有的是时间，怎样排练都无碍大局。而我们处在前沿地区，斗争尖锐，情况复杂，敌我态势瞬息万变，形式和程序是次要的，让贫雇农得到实际利益，把群众发动起来斗倒地主恶霸才是第一位的，不可能也不应当像后方那样慢慢地描图绣花。我们的做法是放手让积极分子带领贫雇农自己干，地、县派出的工作人员只负责土地分配的培训，从旁给予支持，并不包办代替。

然而在会议上，一些领导和后方同志都认定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好像我们犯了什么大错误，对我们不理不睬，另眼相看，连生活待遇都不同，吃的住的都不一样。人家昂首挺胸、喜气洋洋，我们却抬不起头来，一个地委组织部部长都气哭了。我把这些情况写了封信给李富春，因为他是西满分局的书记。后来李富春专门来看望了我们，大家的情绪才趋好转。

群众工作会议刚结束，我找到了也参加这次会议的西满军区

卫生部部长吴自理，请他帮我检查一下延安开刀后的伤口愈合情况，因为我时时感到伤口痛，且腹部经常会鼓出一个包来，工作、生活甚为不便，行军起来尤其痛苦：骑在马上，马鞍一磨，肿块就大起来，有时半边肚子都肿得鼓鼓地，且会几个月不消。

他检查后说："你的刀口化脓了，现在已经形成了脓肿，很厉害！"于是我跟他来到野战医院，并立即上了手术台。吴自理为我打了点麻药，又亲自为我开刀。伤口一切开，脓血像喷泉一样，足有一尺高、一大杯的量。吴部长说："好险唷，只差几层纸那么厚就穿透腹膜了！如果穿透，得了腹膜炎，在这样的战争环境里，生命就难保了！"

正是这个脓包，伴着我骑马、行军、打仗，历尽了艰险，转战六七省,算起来已有一年半了。

排脓后我的肚子上出现了一个鸡蛋大的窟窿，吴部长往里面塞了好大一块药布。我在野战医院住了三天，医院就开拔了，只好再转到西满的一个地方医院继续治疗。这个医院很大，可是我看它不像医院倒像个难民营。没有煤，没有暖气，各病房都是自己找柴火做饭取暖，弄得到处烟熏火燎，手术室里也脏乱不堪。我们地区的小田怀了孩子，我陪她进手术室作流产手术，医生在泡有来苏水的盆里洗了手，而那盆水早已是一盆黑兮兮的污水了，就这么马马虎虎地把孩子刮掉了。依我看，这样的工作态度，好端端的人也会治出毛病来。

我在那里住了十几天，伤口老不见好，李富春便叫我住到西满分局机关里去了。又过了几天，富春要我与他同去哈尔滨，接他的夫人蔡畅，蔡大姐参加了在法国召开的国际妇女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之后刚回国。按理，参加这样重要国际会议的同志回国，应该有一些妇女和儿童到车站欢迎，可是来接站的除了我们就只有东北局另一位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同志了。

蔡大姐身体不好，要在哈尔滨治疗一段，大姐留我住下一起

治病，于是富春便自己回了齐齐哈尔。

我那时除了腹部伤口未愈，身体也不好，体重不到八十斤，铁路医院的医生检查后说我还有神经衰弱。医生是位俄籍女博士，十月革命时还是农民，革命后上了学，成了出色的医生。日本投降后哈尔滨铁路是中苏共管，所以铁路医院里的医生多为苏联人。

那时林彪、高岗也都是请这位老资格的女医生看病的。林彪是东北局书记，高岗是副书记。有一次高岗请蔡大姐吃饭，我也顺带请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吃熊掌，是火锅熊掌，白灰灰的，活像人的大脚板，既不好看也不好吃，此后再也没有吃过。大概就在那时高岗的警卫员睡在床上被人杀了，一直没有破案，至今也未听到这个案子的下落。

正在这时，忽然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们从康平撤出后一直没有联系上的一千多人马在缺吃少穿、缺医少药、弹药得不到补充、孤立无援的艰苦环境下，不怕牺牲，英勇作战，不断东进，途经康法、铁岭、西丰、通化、临江、图们、牡丹江、哈尔滨，其间还渡过辽河、牡丹江、松花江，翻越了长白山，铁流滚滚八千里，终于来到了西满分局所在地齐齐哈尔！

当这支衣衫褴褛、精疲力尽的队伍到达时，省委书记陶铸亲自前来迎接，盛赞他们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独自周旋于敌后，历尽艰难险阻，保存了可贵的革命力量。陶铸说：

“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是一次可歌可泣的‘小长征’！”

陶铸与大家亲切握手，热情欢迎同志们的到来。

离开上级组织四个月九死一生的战士们，握住陶铸的手禁不住热泪盈眶，大家群情振奋，决心打回去，恢复原地区的工作，为死难的同志报仇。省委隆重召开了前线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会

后，这支英勇的队伍就踏上了西进的征程。

我的伤口虽未好，但也立即停止了治疗，与同志们一起上路了。

经过近两个月的行军和战斗，终于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到达奈曼旗的所在地大沁他拉。

地委书记吕明仁为抢救落水的警卫员而牺牲；由于在农村的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工作，共产党在农民中一呼百应；我们答应破路后所挖取的枕木、钢轨归个人所有，老百姓一夜能破坏三十里铁路

一九四七年四月上旬，地委通知我去奈曼开会。到了奈曼，却未见地委书记吕明仁，同志们说他下乡去了，明天准能回来。可是第二天，吕明仁并未回来。第三天中午了他还没回来，大家心里就有些忐忑不安了。到了下午，得到噩耗：吕明仁骑马过辽河时，为抢救落水的警卫员，不幸淹死了，遗体已抬到开鲁城停放。

这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每一个人都有点不知所措，他是辽宁庄河县大王家岛上一个贫苦渔民的儿子，从小与海为伴，练就了一副好水性，怎么会淹死呢?

他的爱人丁修更是哭得死去活来，他们刚吵过架，吕明仁是吵完架与她分手下乡的，丁修一边哭一边不停地诉说着自己的后悔。平时我们都知道丁修性格倔犟，脾气比较大，而吕明仁则涵养特好，尽管丁修经常跟他发火，他却总是笑眯眯地，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迁就着她。现在人死了，想到的就都是他的好处了，她怎能不肝肠寸断呢!

我们连夜乘马车赶去开鲁。

吕明仁不幸遇难的情况大体是这样：

四月份正是开春季节，辽河正在化冻，大量的冰块横冲直撞，顺流而下，按理说这时节是不能骑马过河的，只有乘船才比较安全。吕明仁从开鲁城赶到河边时，恰好摆渡的船工回家吃早饭了。因为急着赶回地委开会，见河滩上有马蹄印，以为骑马可以过河，就下了河。他不知道由于河水长年冲刷，河床已形成了不少深沟，特别在这样的高水位季节里，无论人、马，涉水过河都是十分危险的，而且吕明仁背上长了个大痈，刚经过手术，行动尚不方便。

他们一共三人三马，同时下了河。警卫员康殿才骑马走在前面，是最先连人带马落进河沟的，吕明仁见状立即从马背上“扑通”一声跃入水中，游向警卫员，同时连声向后面的通讯员喊：“老康坏了！要淹死了。”吕明仁虽然在水里游了起来，但他穿得太多，毛靴、皮裤、皮大衣，哪里游得动，背部又有伤口，加上周围的冰块不断撞击着他，所以游了一丈多远，就精疲力竭了，他只回头对通讯员喊了句：“我不行了！”就顺着冰块急速漂走了。

此时通讯员也掉进水里，但他紧紧抓着马鬃趴在马背上，因为马会游泳，所以没有沉下去。见吕明仁漂走了，通讯员立即鸣枪报警，附近的居民和船工很快赶来了，一起追了两里多路，才把吕明仁捞上来，但为时已晚。而警卫员连人带马却一直未找到，估计不是被河泥掩埋，就是被冲得太远了。

吕明仁灵柩停在开鲁城外的一座寺庙里，遗容已经整理，闭着双眼，好似睡着了，很安详。我一时竟不相信他真的死了，伸出手轻轻摸了摸他的脸，冰凉冰凉，鼻孔里还可见堵着一些细沙子。据开鲁的同志介绍，他的肚子里没有水，所以他实际上不是被淹死而是被大量泥沙堵住了口鼻憋死的。

我们在开鲁城开了一个小型追悼会。后来他的灵柩又运到了白城子，省委又为他开了一次较隆重的追悼会，陶铸亲笔写了

“抚棺痛哭难抒沉憾，誓争胜利以慰英灵”的挽联，并致了悼词。

吕明仁不幸遇难，我们大家都很悲痛。他是一位很有能力、很受爱戴的领导，他的遇难，是辽吉一地委的重大损失。我至今仍深深地怀念他。

在党中央“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方针的指引下，经过近两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我党在东北地区逐渐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一九四七年五月，我军发起了夏季攻势。

我们分地委在夏季攻势中的任务就是支援战斗。支援战斗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破坏敌人的铁路和通讯线路，使敌人成为寸步难行的瘸子和闭目塞听的瞎子、聋子。为此，地委机关由奈曼的大沁他拉，前移到阜新县以北的务欢池镇。

我们主要负责黑山、新立屯、阜新、彰武一线的破路任务。

由于我们在农村广泛进行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建党建政工作，广大农民亲身体会到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真正保护人民，为群众谋利益的，因此当我们发动群众参加破路时，群众的热情十分高涨，确实是一呼百应，加上我们答应破路后所挖取的枕木、钢轨归群众所有，参加的老百姓就更多了。破路都选在晚上，人多势众，一夜能破坏三十多里铁路。群众潮水般涌来，潮水般退去，肩扛车拉地把枕木和钢轨弄到二三十里以外。枕木连夜砍碎，不留痕迹，钢轨则深埋地下，使敌人无处寻找。

铁路一破坏，敌人就僵死了，只好派人来修。而修复一次则要花个把月，然而刚修通，不过几天就又被我们破坏了。如此反复了多次，直到一九四八年冬沈阳解放时，这段铁路还不能完全贯通。

夏季攻势中，地委的支战工作除了破路外，还帮助部队运输辎重和抢救运送伤员，不过任务都不太重。因为我们的主力只有

七纵和军分区两支队伍在新立屯、阜新、彰武作战，其余都去东满和南满打大仗了。



一九四七年在东北。

东北夏季攻势，历时五十天，歼敌八万多，收复城镇四十二个，迫使敌人转入了以沈阳为中心在一条狭长地带上的重点防御，广大的解放区则基本连成了一片。

夏季攻势一结束，我们立即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土改运动。

土改的第一项工作是训练骨干。其步骤是一诉苦，二学习，三骨干自己划阶级。重点放在划阶级上面，采取自己划、互相讨论帮助的办法，通过对真人真事的分析，学会划分阶级。

我们在训练骨干时力戒“先生讲，学生听”那一套，主要精力放在从参加训练的骨干分子中挑选典型上。

土改是一个由点领导面，由点到面逐步推开的过程，我们称其为“梅花形”工作方法。可以说，我们有多少个工作队，就培育出了多少朵这样以点带面的“梅花”，而这些绽放的“梅花”又在一波接一波地迅速向外发展着，把整个夏末秋初的路西地区装点得春潮涌动。

这种梅花形波浪式向前推进的方法，避免了“运动群众”，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千百万劳苦农民在党的指引下，为了建设崭新的生活，开始了自己解放自己的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

当然，在那些并不稳固的游击区，敌人时来时往，群众有后

顾之忧，也不勉强进行土改。

土改斗争的重点是发动贫雇农清查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财产。由于地主、富农特别是那些恶霸分子在运动中对群众有威胁利诱活动，因此有些知情的贫雇农，不敢大胆控诉、揭发，特别对自己的佃东和雇主，更是顾虑重重。从感情上说，他们是愿意参加斗争的，但又害怕地主、富农和恶霸的报复，其思想斗争无疑是十分激烈的。这个时候工作队和土改骨干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这些动摇的农民进行必要的教育和引导，做他们的靠山。

有一个雇农老实厚道，在地主家打了十几年长工，受尽了剥削压迫，三十多岁了还讨不起老婆，大家一致认为他苦大仇深。然而，当地主逃跑时，他却为地主藏匿财产，之后又与另两个长工一起为地主看家护院。土改发动阶段，听了许多人的诉苦和揭发，他被深深触动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思想斗争很激烈。轮到他诉苦时，他涕泪满面，痛哭不已，但说出来的又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众所周知的东西，对地主的财产去向却总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无论别人如何劝说、鼓励，就是不敢说。由于思想压力太大，后来竟然精神错乱了，大哭、大叫、大唱、大笑，手舞足蹈，力大无穷，几个人也按不住他。幸好土改工作队中有位公安局局长会针灸，而且还是祖传中医，他拿出根很粗的银针，让别人把患者按倒在炕上，对准那人大腿弯子一下扎进三寸多深，随后又在那人屁股上重重踢了两脚，患者一惊，一骨碌爬了起来，瞪眼看看扎针的公安局局长，一会儿便倒在炕上睡着了，醒来，精神就正常了。大家仍精心照顾他，嘘寒问暖，令他万分感动，十几年来他头一次体会到了人世间的温暖。他像换了一个人，把他所知道的地主家的底细全部揭发了出来，把他替地主分散埋藏财产的地点一一说了出来，并领着大家去挖，真正成了运动的骨干。

土改运动从诉苦、算剥削账开始，查封粮食、挖底产，没收

浮财，一直到划分阶级、分配土地，我们都紧紧依靠贫雇农，同时争取中农积极参加，一起民主讨论，民主评定。对于一些偏“左”或偏右违反政策的做法，也尽量通过启发教育加以引导，让群众通过学习政策自己纠正，在斗争中长见识、增才干。

一九四七年冬季，许多战士冻坏了手脚，为了保证战斗力不受损失，部队下令把老百姓家的羊统统杀掉，剥下羊皮包脚；冬季攻势刚开始，大雪盈尺，十几万部队无法活动，十万农民顾不上自家门前雪，浩浩荡荡开上了公路

夏季攻势后不久，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四日至十一月五日我军又发起了全东北战略反攻中的秋季攻势。其间十月十日，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庄严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我人民解放军的九个野战纵队以及各地方武装，先在北宁路以西，接着在沈阳以西、以北、以南地区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这些地区大多属辽吉一地委工作范围。在野战军以及杀回路东的分区支队、各县武工队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我们已在康平、法库等地站住脚，沈阳的敌人有些龟缩，不但游击区扩大了，而且建立了较稳固的游击根据地。据此，辽吉省委决定，恢复路东地区为一地委、一专署，路西地区为五地委、五专署。我被留在五地委任副书记，书记是刘莱夫。刘莱夫管全面，主要在奈曼、库伦后方，我则负责前沿地区，即游击区和接敌区的工作。

在秋季攻势中，我军攻占了黑山的新立屯和阜新、彰武等县城。我立即与地委一些同志将驻地前移到新立屯，以便更好地完成支战任务。

新立屯是铁路枢纽，又是军事要地，我大批军用物资和兵员都要在此中转，而此时被我们破坏的铁路尚未修复。为此，我们又连夜下去发动群众抢修铁路。广大群众眼见我千军万马过往不息，受到了极大鼓舞，一声号令，立即聚集起一支浩浩荡荡的民工大军，抢修铁路，搬运物资，送粮草，抬担架，救护伤病员。真可谓人多势众，众志成城，各项支战任务都完成得十分圆满。

但我野战军南下阜新、新立屯不到十天就又转移到他处作战了,傅作义军队在沈阳之敌配合下,乘机向我进逼。我们又组织群众，三下五除二把铁路扒了，从而迟滞了傅作义部队的北进。

广大群众全力以赴帮助我们一会儿修路，一会儿破路，足见世道人心!

在秋季攻势中，成千上万的农民，召之即来，修路、破路，支援解放军，均由各村屯自筹粮款，政府既不发钱，也不发粮，有些农民则是自己带着干粮来的，但无不情绪高昂，争相完成任务。我亲眼看到许多支前民工，衣着单薄，怀里除了几块又干又硬的高粱面窝头，什么也没有，挨冻受饿是常有的事。

老百姓这样忘我地支援前线，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帮助解放军赢得这场战争，才能赢得他们的新生活，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

秋季攻势结束，只休整了一个月，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军在东北战场又发起了更加强大的冬季攻势。

这次攻势以长春、沈阳、锦州等大城市周围的敌人为主要攻击目标，我五地委位置在沈阳与锦州之间，所以正是主战场之一。经常在我地区往来运动的有七纵、八纵、九纵和十纵。七纵主要由辽吉武装组成，八纵、九纵从热河来，记不清十纵来自何处。他们都是在十一月前进入五号地区的。

那一年冬天特别冷。热河来的部队战士虽穿上了冬季服装，但棉衣棉裤都较薄，而来得早的部队，则还没有换冬服，许多战

士已经冻坏了手脚。冻坏了手不能打枪拼刺刀，冻坏了脚连路都走不动，还有战斗力吗？临时制装来不及，又要立刻打大仗，在这非常时刻，部队采取了非常措施：把老百姓家里的羊，不管是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的，都抓来杀了，剥下羊皮，拿烧酒鞣熟后，用以包脚。

这是一次大的违犯群众纪律行为，但这样做是应急的惟一办法，是打赢这场战争的需要。事后，地、县委紧急动员，各级干部深入到村屯作解释。讲明野战军这样做实属无奈，如果不采取这种紧急措施，不用一天，战士们的双脚都要冻坏，战士不能走路，就不能打胜仗了。我们请求广大群众予以谅解，同时由地方政府酌情予以赔偿：贫雇农照价全赔，中农赔少些，地主、富农再少些，结果大部分老百姓都表示了谅解或支持，没有造成大的不良影响。

此次攻势与以前有所不同，秋季攻势时，我主力部队一扫而过，局面迅速打开，所以战勤任务不重；而这一次敌人集中了其东北兵力的一半以上于沈阳外围固守，战役不可能太快结束，我军主力经常会有一部或几部留驻五号地区，后勤保障工作十分庞杂，支战任务极为繁重。

冬季攻势刚开始，就遇上了下雪天气，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纷纷扬扬，几天几夜不停，公路上积起了几尺厚的雪，影响了十几万大部队的活动。

我们一声动员，盼望早日获得解放的十万农民有如云合雾聚，呼啦啦涌向了几百里长的公路线，为部队铲冰、扫雪，清理道路。其实，所有农家的门户都叫大雪给封住了，不少穷人的茅草屋被雪压塌了，但他们顾不得自家的冷暖，推开大门迎着打得头面生痛的雪粒子浩浩荡荡开上了公路！远离公路的群众，因走得匆忙，许多人连干粮也来不及张罗，饿着肚子也照样从早晨扫雪到傍晚，天黑了，还要勒紧裤带再走几十里才能到家。

十几万解放大军在十万扫雪大军的夹道欢呼声中迅速通过了五地区。

如果说，后来淮海战役胜利是几十万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我要说：一九四八年东北战场冬季攻势的胜利道路，则是全东北几十万农民用扫雪的大笤帚扫出来的。

我永远忘不了在五地区那百里公路上十万人扫雪的激动人心的壮阔场面。

群众在帮部队运输军用物资和救护转送伤员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不少民工还为之献出了生命。

有一次我去某部队，迎面远远看到一队民工抬着十几副担架从前线下来。红红的太阳高挂天上，大地是一望无边的、混沌的雪白，那队民工身着深色衣服，走在茫茫雪原里显得十分醒目。忽然天空传来了飞机的嗡嗡声，民工们立即四散开来，我也赶紧趴在地上。敌机很快发现了我们，“哒哒哒”响着机枪俯冲下来，此时我看到停在我身边的两个民工突然勇敢地扑倒在担架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伤员。敌机在我们头上来回扫射了两遍，一串串子弹就落在担架旁边，溅起了阵阵雪雨，可是，无论敌机怎样扫射，他俩一直纹丝不动。敌机终于飞走了，所幸这次空袭我们竟无一伤亡。担架队又匆匆上路了,我也起身赶往前线部队，当时竟没有问一下抬那副担架的民工来自哪个村屯，叫什么名字。后来想到应当表扬一下两位老乡，却已擦肩而过走得很远了。

其实，这样感人的拥军支前的故事在五地区可谓比比皆是，不可胜言。

多么富有牺牲精神的父老乡亲啊！在茫茫雪原的衬托下，他们是如此的渺小，但他们的精神却极其伟大。粗枝大叶的历史不会记载下每个人的姓名，但，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共同拥有的一个名字：东北民工！

正因为有了群众的大力支持，我们的党和军队才能迅速在东北站住脚跟，才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在冬季攻势中，为了切实搞好物资转运，五地委负责前方工作的几位同志，也由务欢池搬到了距新立屯三里左右的一栋独立屋里，这里距停放、转运军用物资的火车站只有半里地。敌机经常来袭击这个转运站，同志们依然日以继夜地坚守岗位，把大批军用品，特别是部队的冬服及时地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前线。

有一次敌机又来扫射车站，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飞到地委机关周围。第二天，地委组织部部长两岁的小男孩竟然在院子里捡到了近一百个机枪弹头！

这年冬天最冷时达到零下三十七度，据说这个温度是那几十年的最低温度，是个大小便一落地就结冰的日子。在路上走一阵，帽子、手套、眉毛和男同志的胡子，便会结上冰凌。特别是马，马尾马鬃结满了冰，一跑起来，丁冬作响。

在雪地上行走常会找不到路。因为大雪早已把路盖住了。有一次我骑马在山坡的小路上走，一阵大风吹来，也不知是风把马吹倒了，还是风把马眼吹迷了，反正我和马一起跌下了一丈开外的坡下，埋进了深深的雪坑里。通讯员见状解下绑腿带扔给我，我把它绑在腰上，他上面拉，我手脚并用在下面爬，这才爬上来。之后，通讯员下到坡底，把绑带扎在马脖子上，我们在上面拉，他在下面推，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马也弄上来。如果当时是一个人走，没准就冻死在那雪坑里了。

那次部队打新立屯，敌人据山固守，拼命抵抗，仗打得很苦。我军是下半夜向山头发起攻击的，经过三个多小时激烈战斗，才把敌人全部歼灭。这次战斗，我军负伤七八百，绝大部分是冻伤！这些伤员都暂住在地区医院。医生说，枪伤易治，冻伤难愈，完全坏死的，还要截肢。这批伤员中，因冻伤须截肢的就有两三百人！

鼠疫、霍乱流行在辽吉地区，人们如临世界末日；“扫堂子”之风刮起，游手好闲的“勇敢分子”成群结队到邻村“吃大户”，原先热心土改的贫雇农转而同情地主

一九四七年秋季，我五地区和辽吉一些地区，鼠疫大流行。虽然是腺鼠疫，但发病后几天内也会死人，据说肺鼠疫更厉害，只消几小时人便会丧命。这次鼠疫流行，单单通辽县就死亡了几千人。巨大的恐怖像压城的黑云一样迅速笼罩了全辽吉、全东北，一时人心惶惶，如临世界末日。到后来，这种恐惧竟发展到人死了谁也不敢抬、不敢埋的地步，任由尸体腐烂，这就更加剧了鼠疫的扩散。

奈曼有一个小村子，得病的人很多，附近的人就把村子团团围住，不准他们出村，还在村子周围挖了一道人爬不上来的深沟，谁想过沟就开枪打谁，最后又向村子的屋顶上扔了许多着火的柴草，硬是把这个村子连房带人烧光了。

我们有位县委干部发现自己淋巴肿大，以为得了鼠疫，为了不传染别人，他把自己关了起来，静静地等死，因为他明白当地的医生根本没法对付鼠疫。过了好几天，发现并未恶化，知道不是鼠疫，这才从屋里走出来，重新开始工作。

在鼠疫流行区，我们随时都有被传染的危险。老百姓对付鼠疫有个土办法：拿生鸦片土用水化开，用小竹签当针筒，蘸上鸦片水往肌肉里扎，据说此法也救了一些人。但只能往身上扎，而不能服用，因为生鸦片吃了要死人的。我在通辽到中旗路上的一个饭铺里见过的一个老板娘，就是用这个办法治好的。她让我看她脖子和腋下的淋巴腺，一个个被竹签扎得像蜂窝一样，但生鸦片水扎进去，黄水慢慢流出来，黄水流干，病也好了。

后来，从苏联来了一个医疗队，带来了疫苗，我们都打了疫

苗，死亡的威胁才减轻了。经过医疗队的治疗和预防，病人死亡率大大降低，疫情也很快被控制住了。

除了鼠疫，这年夏天还出现过霍乱。霍乱死亡率也很高，但由于有药品防治，所以没有发生大的流行。

鼠疫是通过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染的，在农村里，跳蚤是随处可见的寻常之物，简直无孔不入，防不胜防。而老鼠在东北又出奇的多。有一天早晨，太阳刚出来，我在通辽附近的田野上走，视野所及，有成千上万只如松鼠般拖个大尾巴的黄灰色老鼠，一律脸朝东方，两只前脚时而举起，时而放下，像是在朝拜太阳。如此众多的数量，如此统一的举动，真是一大奇观。后来我发现，太阳将落山时，它们也要再这样演练一次，其中的缘故，却百思不得其解。

通辽一带有个很坏的风俗：人死后，棺材只埋三分之二，而留一部分在地面上。这样，坟地就成了家狗和野狗的聚集地，它们扒开棺材拖出死尸，撕咬争抢，也没人去管。所以在通辽附近的山坡上到处可闻群狗的狂吠声，到处可见横七竖八的尸骨，这不免让过路人感到心惊胆颤、毛骨悚然。

我们的冬季攻势就是在这种特别困难、特别危险的环境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胜利的。这次攻势，歼敌十五万多人，国民党军队已被我团团围困在沈阳及其外围不多的几个据点里，陆上交通和后勤补给基本切断，此役从根本上奠定了我军在东北的胜局。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为期整整三个月的冬季攻势宣告结束。

我在延安党校一部的同学，七纵的李锋团长却在攻打彰武的战斗中牺牲了。

全国土地会议后，从北面刮来一股狂风，叫“扫堂子”，也就是挖地主的底产，对地主实行精光政策，然后扫地出门。由于

本村的贫雇农在本村“扫堂子”多有不便，因此还传过来一条经验：村屯之间交换着“扫”，即甲村到乙村“扫”，乙村到甲村“扫”。这股风吹到五地区后，一些正在土改的地方也一阵风似地扫开“堂子”了：大队人马，坐上雪橇，赶着大车，到邻村的地主甚至富农家，挖地三尺，风卷残云，见什么拿什么，杀猪宰羊几十人上百人大吃大喝。地主、富农扫光了，只要有点钱的也“扫”，挖不出底产或底产较少的，就把人抓走，日夜审问，往死里打。记得有个晚上一下就打死了九个人，县委书记都制止不住。

这种“扫堂子”的做法，极大地消耗和浪费了有限的社会财富，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实际上老实的贫雇农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吃得满嘴流油、抢金夺银的大多是那些游手好闲的“勇敢分子”。而且，剥夺了地主、富农的起码生存条件并把人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也是脱离群众的。长此以往，原来热心于土改的贫雇农就有可能转向消极、观望，甚至转向可怜和同情地主，真所谓过犹不及。所以“扫堂子”是十分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

幸好这股风在我们地区只刮了七八天，就被东北局和省委制止了,因此,对五地区影响及危害都不算很大。

杨顺卿拉着毛驴，驮着亮亮，辗转千里，从延安到河北，从河北到辽宁，渡海到朝鲜平壤，最后才到东北，把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送到我的手上

一九四七年秋天，陶铸来五地委检查工作，顺便告诉我：女儿已到省委所在地白城子了，他还带来一张亮亮与杨顺卿的合影。

这真是天大的喜讯，是原来想都不敢想的喜讯啊！

这样的战争环境，杨叔叔竟然能带着亮亮从这样远的延安来到吉林白城子，这简直是奇迹。

在延安时，我们就知道老杨对亮亮比我们还亲，他养了只鸡，生下蛋来，自己舍不得吃，一个个都填进了亮亮的小肚子里。他纺线得来的工钱自己一个不花，全部为亮亮买了解馋的零食。

有这样一位好叔叔，这既是亮亮的福气，也是我和陶铸的福气！



一九四七年初到达白城子的老杨和亮亮。

陶铸告诉我：老杨和亮亮在路上走了一年多，经过了好几个解放区，后来是经过朝鲜平壤才转到东北的。一路上，他们碰到过敌人多次轰炸，遇到了不知多少危险，也历尽千难万险。

我多么想立即见到我的亮亮和可敬的杨顺卿啊！

初冬，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这个会本来应当是刘莱夫参加的，他却要我去，说是五地委在冬季攻势中任务繁重，他脱不开身。我明白，其实他是让我公私兼顾，去省委看看女儿的。我在心里默默感谢他的这番美意。

离开延安奔赴湘粤桂去开辟敌后战场时，我是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心的。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女儿或者至少要五年十年才能团聚的。没想到，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我的心里每天都充满了

喜悦。

我在省委报了到，就去陶铸那儿看亮亮。

听到我的喊声，她立即跑了出来，但见了我又马上躲到爸爸的房门后面去了。伸手拉她，她不肯，我去抱她，她竟害怕得哭了。杨顺卿来了，告诉她：这是妈妈呀，你不是天天想妈妈吗？见了妈妈怎么不让抱呢？

唉，这就是我六岁的女儿，在战火中生长，不认识妈妈的宝贝女儿！

但是过了不到一刻钟，她就和我很要好，很亲热了。

省委组织部部长曾固告诉我，亮亮听说我要来，几天前就在他面前不断念叨：妈妈来了，我该怎样同妈妈见面呢？我要对妈妈讲些什么呢？像个小大人似的，煞是可爱。

曾固又转身取笑亮亮："怎么真的见到妈妈，倒把准备好的话都忘啦？还哭——亮亮，羞不羞呀？"

一屋子人都笑了起来。

老杨怎么会带着亮亮从延安来东北的呢？

原来，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战火随时可能烧到延安。中央决定，延安的非战斗单位一律撤离，转移别处。

他们是七八月间从延安起程的。王家坪托儿所的丑子刚所长告诉老杨，领导决定他和作战部副参谋长朱军的男保姆一起，带两个孩子去东北找父母亲（据说这是在东北工作的一位同志的美意，可事后我们一直没有打听到这位好心的同志是谁）。组织上给了一头毛驴子，替他们炒了两米袋面粉。毛驴子驮着两个柳条筐，一边坐着亮亮，一边坐着朱军的女儿妞妞便出发了。刚走出三十里地，在距延安机场四五里的地方，就遇到了国民党飞机的空袭。幸好这里到处都是青纱帐，他们立即钻进了一片玉米地。敌机轰炸、扫射了好几圈才飞走，等到天将黑了，他们才从玉米地

里出来。

亮亮告诉我说："那时我们吓得直哭，杨叔叔说：'哭了，飞机听到，就会来丢炸弹的。'我们就都不敢哭了。"

走了几个月，他们先后穿越了陕西、山西、河北和现在的北京，来到承德，可是正遇上承德大撤退，到处乱哄哄的，没地方找组织和党政军领导。他们只好急忙去搭开往赤峰的汽车，准备再由赤峰转往东北。汽车非常拥挤,他们费尽气力,才把亮亮和妞妞抱上车。可是她们太小了，被大人们挤在腿脚和臂膀间，连气都喘不过来。亮亮又太老实，小脸憋得通红，也不敢反抗一下哭叫一声。老杨一看这样不行,车一开动,亮亮一定会被挤倒、踩坏的，一咬牙抱着亮亮又下了车。

老杨重新牵起了毛驴，这次他们没有再往前赶，而是一下子倒走了一千多里，回到了晋察冀解放区的阜平，寻找党组织和延安出来的老首长。他们先见到了曾涌泉，又见到了胡耀邦。在组织和首长的关怀下,他们又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一站一站往东北赶。先是南下邯郸，继而东行山东烟台，然后渡海至辽宁大连，改乘海轮取道朝鲜平壤，再转回安东（今丹东），辗转多处才到达了白城子找到辽吉省委。

好一个杨顺卿！历经艰辛磨难，千里迢迢把女儿送到我们的身边。

客人们离开后，老杨和亮亮你一言我一语地向我说起了一年多来他们的经历。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这时亮亮才六岁多,可是沿途的事她却记得一清二楚，而且叙述得绘声绘色，颇能传情达意，就像讲故事。

他们把一路上的经过叙述得很详细，许多我已忘记，现在只记得下面几件事了。

第一件事：

亮亮说，在一个什么村子里，杨叔叔他们上街买东西，我和

小妞妞在屋外玩，突然飞机来了，还听到“啪啪”枪响。叔叔阿姨们都往村子后面的山上跑，我同妞妞也跟着跑。我们跑到山脚下，寻到一棵小树就趴下躲了起来，不让飞机看见。隔了好久，叔叔阿姨都走了，我同妞妞也蹦蹦跳跳一路玩着走了回去。

老杨说：啊呀，那天飞机轰炸，我们正在镇子上，孩子不在身边，可把我们吓坏了！哪里还管飞机扫射轰炸，我们一溜烟跑回村里，却到处找不到两个小丫头，急得团团转。过了很久看到她们欢欢喜喜回来了，大家都好高兴。两个孩子经受了几次轰炸，已经知道怎样躲飞机了。

亮亮说，妞妞见了飞机还不躲，是我告诉她：赶快躲起来，不然飞机看见了，会炸死你。妞妞就跟着我躲起来了。

我问亮亮：“看到飞机害怕吗？哭了没有？”“没哭，飞机丢炸弹见多了，不怕！”亮亮回答。

第二件事：

老杨说，有一阵子，敌机经常来轰炸、扫射，我们白天不敢走，天黑了才上路。老百姓是用牛车送我们的，孩子睡在车上，大人则跟着牛车走。这时朱军的女儿妞妞和她的男保姆已经不与我们同行了。有一天牛车里还躺着两个大人，走了一段路之后，我听到亮亮在车里时不时发出哼哼叽叽、似哭非哭的声音，初时没在意，以为她在做梦，后来发觉不对劲，立即跑上前去问：亮亮怎么啦？她带着哭声说：“叔叔的脚，压在我身上，好痛！”我往车里一瞧，顿时气坏了，一个大汉的两条腿都压在亮亮的身子上。我冲着大汉大叫：“喂，大个子！你一百六七十斤的膘，却把两条腿压在小孩身上，有良心吗！你没病没伤，躺在牛车上睡大觉还嫌不舒服，还要这么丁点大的娃儿为你垫脚吗？”那家伙一声不吭，把脚从亮亮身上拿开，翻转身又睡了。

老杨说：亮亮就是太软弱，大汉的腿那么重，她就是不敢大声叫。平日里妞妞欺负她，打了她，都不敢哭，即使打得很痛，甚至

打出了血，也要走到没人的地方才敢哭。四五岁年纪就这样，活像个小媳妇儿。

第三件事：

老杨说，有一次我们清晨到了一个县城。找到一家旅馆，把亮亮一个人锁在房间里面之后，我去找当地组织接洽。因为找不到人，所以去了大半天。过午很久了，才急匆匆赶回旅店，心想锁了这么久，又饿了这么久，还不定亮亮会闹成啥样呢。打开房门一看，亮亮却还是老老实实地坐在床上，跟我早晨离开时一模一样。见到我紧张的面孔，亮亮一下子跳起来扑到我身上，紧紧搂住我的脖子，又像哭又像笑，真是可怜噢！

我问亮亮："一个人呆在屋子里，怕不怕？"她说："怕。杨叔叔老不回来，我肚子很饿，饿得好难受。听到门外脚步声，总以为是杨叔叔，可总不是。老等不回来，我就害怕了，又不敢大声哭，怕外面有坏人听见。后来我想，杨叔叔肯定会回来的，我就不怕了，就自己玩儿。"

第四件事：

老杨说，有一次坐火车，到一个小站后我下车去买吃的，还没买好车就开了。这下可把亮亮吓坏了，她看到车开了我跟着车跑却没有上来，就趴在窗口上嚎啕大哭起来了。

听到这里我也大吃一惊，忙问：那后来是怎样赶上车的？

老杨说：我是从后面的车厢跳上车的。经过了许多节车厢回到原来座位时，看到亮亮还趴在窗口放声大哭。我叫了声：亮亮！她回头见是我，眼泪又像串珠一般直滚下来，紧紧抱住我，叔叔叔叔直叫，叫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酸。亮亮说，叔叔你是怎么上来的呀，我还以为你上不来了呢！我告诉她我是从后面车厢上来的，她又破涕为笑了："叔叔，你真棒！"

第五件事：

老杨说，由烟台到大连坐的是木帆船，船小浪大，我和亮亮

都晕船了，不断呕吐，什么东西也不想吃。亮亮很乖，躺在船舱里，闭着眼不吃不喝，一声不吭，像是生了大病，一连两天都这样，我看着有些怕，担心亮亮熬不过这一关。到了大连，休息了好几天，她才恢复过来。

老杨又说，由大连去平壤，乘的是大海轮，比小帆船平稳多了。但大海轮不能靠岸，泊在海上，我们要坐小划子到大船下面，然后攀着大船放下来的软梯才能上去。亮亮不能上，我也不让她自己上。我是用绑带把亮亮绑在身上背着，臂弯里拐着大行李包上软梯的。软梯是用粗绳子结的，软软乎乎，脚和手都使不上劲儿，上一步，梯子就要晃荡几下，两只脚好像随时会落空一般。软梯上人又多，一个个都在催促上面的快爬。还不敢往下看，因为下面是翻滚的海水，一看心里就更悬。爬那段绳梯可把我紧张坏了，就怕脚踏空、手抓不牢掉下海去。我死了没关系，可我还背着亮亮呢！用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爬上了大海轮，放下亮亮，一看自己已经全身湿透了——那可是个大冷天哩！

我问女儿："上大海轮时你怕不怕掉下海去？"

女儿回答："不怕，我紧紧抱着杨叔叔脖子呢！"

老杨告诉我，一年多里，亮亮得过几次病，还发了高烧，老杨急得要命，想尽办法求医找药，为孩子治病。有一次亮亮烧得迷迷糊糊，几天里没有吃东西，不睁眼也不说话，附近又没有医院，这可怎么办？用手摸亮亮皮肤，烫得很，看亮亮的脸，通红通红，而且呼吸急促。老杨急得哭了，手按着亮亮的额头，心里说："亮亮啊亮亮，你病成这样，叔叔怕是不能把你送到你爸、妈跟前了，叔叔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的父母啊！"还算好，老杨在村里求爷爷告奶奶，央这家给个偏方，央那家拿点草药，吃了半个月，孩子总算慢慢好起来了。大病之后，亮亮很虚弱，他们便在那里住了三个月，等身体完全复原后，又再上路。

听了这些事情，我百感交集。一个在万里长征中打瘸了腿，

打掉了一半牙齿的二级残废军人，一个年近四十的红军老战士，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兵荒马乱的战争环境中，逢山过山，遇水渡水，辗转四五个解放区，还借道朝鲜平壤，忍饥挨饿，筚路蓝缕，历尽艰难，终于把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送到了我们手里。老杨是亮亮的恩人啊！

但是，谈起这一年多的日子，他只谈亮亮怎么乖，只说一路上党组织和老首长怎么为他们写介绍信，怎么安排他们行程，怎么关心、帮助、照顾他们。而一年多里，他是怎么克服伤残的困难，行程几千里，怎么饿肚子，怎么战胜疲劳，自己生病怎么挨过来，他却一点儿没说，连一句也不提。

没有老杨，哪里还有亮亮的今天！真是千言万语，我也说不尽对他的感激啊！

尤其重要的是，老杨赋予了亮亮温柔的性格、善良的心肠，赋予了她事事想着别人，做事总要做好的秉性。杨叔叔没有文化也讲不了许多大道理，但他用无私的爱和自己的行动教会了亮亮这一切。

杨顺卿是贵州遵义人，红军到遵义，他就参加了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负伤成了残疾，到陕北后在八路军总司令部做饲养员。之后又上前线给一位首长带孩子，首长回延安时，他也背着孩子到了延安。后来组织上又安排他带亮亮。

到东北后，亮亮在哈尔滨上幼儿园，老杨便要求在幼儿园工作；几年之后亮亮先后在天津和武汉上小学，他又相继要求到天津和武汉那两所小学工作，目的都是为了照顾亮亮，让我们安心把工作做好。

再后来，亮亮大了，不需要特别照顾了，正好曾固调任贵州省委书记，就把老杨要走了。之后老杨一直在贵州的省委招待所当科长，由于身体不好，又没有文化，因此始终没有提拔，但他干招待所工作是很称职的，上上下下都十分敬重他。

打倒“四人帮”之后，他不顾年老体弱，专程从贵州坐火车来北京看望亮亮和我这个大难不死、幸存下来的老战友，不料在车上患了阑尾炎，只好一路强忍着。到了北京我们马上把他送进医院，并在当晚就动了手术。由于在火车上耽误了，因此差一点造成腹膜穿孔，病情挺重，出院后又在我家养了三个月。



一九六四年亮亮和老杨在广州合影。

以前都是老杨照顾亮亮，这一次像是命运有情有意的安排，在老杨晚年时让亮亮也尽心尽意照顾了他一次。我们亮亮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无论老杨住院还是在家休养，她都天天侍奉在侧，端水喂药，问寒问暖，买这买那，给杨叔叔做了许多好吃的，一停下来又陪杨叔叔说话，一老一少仍像四十年前那么亲热。亮亮的一对小儿女也嘴甜得很，整天围着老杨逗乐，“爷爷、爷爷”叫得老人直抹喜泪。老杨病好之后，我们全家陪着他又游览了北京城的一些风景名胜。

我觉得，这次亮亮对杨叔叔的感情有点儿像女儿对父亲。亮亮一直为陶铸病重和临终时未能在旁守护而抱恨自责，这次她把对父亲的负疚之心化作了一颗炽热的爱心，加倍地奉献给了在战火中保护她，如同父亲那样从小抚养教育她，亲她疼她的杨叔叔。

一九八四年，湖南祁阳县为陶铸铜像举行落成典礼，我和亮亮应邀前往参加了纪念活动。会后亮亮转道去贵阳看望老杨，在叔叔家住了几天。亮亮回来说：“杨叔叔家的好东西都让我吃光啦！”

杨顺卿现已去世了，我们永远怀念他！怀念他的恩情，怀念他的人品，怀念他崇高的精神！

看完电影坐马车回家途中，陶铸让日本女护士上车；我突然生气：那么多同志在路上走，为什么单让她上车？陶铸回到家大发脾气，捶胸顿足；我知道伤了陶铸的自尊，但没有向他认错

一九四七年秋天，陶铸来五地委检查工作。

陶铸有肺病，时好时犯，一直未得根治，而仍然日以继夜工作；我因为要坚持前沿新区的斗争，也不能照顾他。所以，他到东北不久肺病便又复发了，还吐了血。这次我发觉他已骨瘦如柴，前胸贴后背了。过去尽管瘦，但还精神抖擞；这次却不行，开会时讲话都没力气，说几句要咳一阵，咳完就累得直喘气了。不几日，便又吐起血来，一口接一口，止也止不住。我很紧张，但他却很坦然，还来安慰我，也没吃药只在炕上躺了两天。两天里，他还不断找人来谈话，了解本地区的工作和困难，为地委出主意。血一止住，他又坐上军车，赶往更前沿的部队去了。

在那个寒冷的深秋，望着在崎岖的道路上摇摇晃晃渐渐远去的军车，我对重病中的陶铸充满了敬意。这个人呀，就是从来不怕困难艰险，而且越是困难艰险的环境，他越是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就像那越压越蹦的弹簧一样。我认为陶铸身上的这种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他人格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可贵，也是值得我永远学习的。

一九四八年夏季，我又去省委开会。当时听说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省委已迁到郑家屯了，但找到郑家屯时，才知省委又迁往白城子了，并听说陶铸有病，正在洮南治疗。反正距开会还有七八天，我就又搭上火车去了洮南。

陶铸躺在一间民房的炕上，全身主要关节，包括双肩、双肘、手腕、十指、膝盖、脚踝都肿得透明了，许多盏电灯泡罩在关节上烘烤着，浮肿处的体液从关节里不断渗出来，一滴一滴往下淌。他的脚与手都不能弯曲，连上厕所都蹲不下去；腰也伸不直，行走与站立都很困难；全身酸痛，昼夜难以成眠。看到这情景,我吓了一跳,这是什么病,人会变成这样？医生说,这叫急性关节炎。

前不久他去哈尔滨参加东北局会议时，发现呼吸有些不顺畅，一检查是鼻子里长了许多息肉，堵住了鼻腔通道。在好些同志的劝说下，他在哈尔滨做了鼻息肉切除手术。据朱仲丽说，割息肉时，陶铸曾虚脱过去，上了全身麻醉。术后只两天，他就坚持出了院坐火车匆匆赶回郑家屯，没两天又赶往白城子了。当时亮亮送爸爸上火车，本来讲好不跟爸爸走的，但上了车却赖着不肯下，陶铸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让她一起走了。但亮亮什么也没带，夜里天气冷，陶铸便把自己的大衣脱下盖在亮亮身上，自己因此受了风寒，引起了急性关节炎。

我只好在洮南住了下来，帮助陶铸治疗。他每天除了打针，就是用十几个灯泡组成的电热罩烘烤关节，还有就是用硫磺热水作全身浸泡并加以按摩。其他的我做不来，就帮他泡硫磺浴。办法是：在一个水泥砌的澡池里放上水，加进硫磺，拿一根电棒插到水池里加热。待水热了,我就帮陶铸脱下衣服,扶他躺在水池，他一面泡，我一面按摩他各个关节，每次要按摩一小时。活儿挺累人，每次他泡完我也累得直喘粗气了。但这办法还真有效，五天之后他的关节就好多了。

我们都要赶去省委开会，我扶着陶铸一拐一拐走了四五里，后来搭上一辆巡道车就去了白城子。

省委扩大会的主要议题好像是整风总结，有些县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有几个县委同志批评省委在指导全省群众工作和



一九四七年与陶铸在东北白城子。

土改运动中政策过"左",批评陶铸民主作风差、主观片面、性情急躁、与大家商量少、倾听他人意见不够、有家长作风等等，还举了一些例子。

我认为对陶铸工作作风上的批评以及所举的例子，基本上都是事实。但我同时认为，省委包括陶铸在发动群众和执行土改政策方面是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东北局指示的。一些地方"左"的错误是存在的，例如"扫堂子"，但这股风是从外省吹来，而后是各地自发学起来的，省委一经发现立即就加以制止了。所以，这些地方过"左"与过火行为的账不能算到省委和陶铸头上。

后来，陶铸在会上承担了责任，作了检讨。

会议刚开完，我就同陶铸吵了一架。

那天省委放电影，我考虑到陶铸这几天心情不太好，就和亮亮极力动员他去看电影。这时候他的关节炎未好，走路不方便，医生护士还在为他治疗,而电影场离住地又远,所以我们就特地雇了一辆马车去。电影散场后，我们是坐马车回来的。途中遇到了这些天护理陶铸的日本女护士，陶铸便让马车停下，请那位护士也上车。我突然生气了，我说："那么多同志在路上走，为什么

单单叫她上车！日本鬼子那样对待中国人，为什么我们偏要优待日本人呢！”我又对那护士说：“你不要上车了，自己走回去吧！”

陶铸当时一声未吭，回到家他却像火山似地突然喷发了，他大声指责我蛮横无理，不近人情，他说：“她是我的护士，为什么不准她上车？她是日本人但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日本俘虏我们也要优待的！”

我也大声反驳他：“优待就是让同志走路，让俘虏坐车吗！”

这下子陶铸更火了，他捶胸顿足，撕碎了自己身上的衣服，高声喊叫着，吓得亮亮跑到房门外面嘤嘤地哭了。陶铸听到了亮亮的哭声，把亮亮抱进来，坐在床上也流了泪。我心里清楚，他这是一次心中痛楚积蓄很久后的总爆发。因为从延安出来后，我正式向组织上打了离婚报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义。陶铸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因日本投降，时局突然发生变化，也就顾不上再扯这些个人的事了。到东北我们是散多聚少，感情上一直未能真正修复，这给陶铸心上留下暗伤。

我突然后悔了。

这个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多少年来，无论遭受多大打击、多大委屈，从没有掉过一滴泪。今天却当着我们母女的面哭了。唉，我对他太狠了，他一定是伤透心了。

我在大庭广众下让他这个省委书记下不了台，影响了他的威信；而且，这种难堪的场面又发生在一个女护士面前，这就更伤害了他男子汉的自尊；特别是因为那女护士恰恰曾是个日本俘虏，从而使这种伤害加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的确太不冷静了，我为什么要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发泄到一个小护士身上呢？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但我当时没有去安慰陶铸，也没有向他认错。

我至今为我那时的狭隘感到羞愧。

离开白城子返回五地委已经是八月底了，与我同行的还有地委民运部部长赵龙和他的妻子奈曼旗委组织部部长李柱等同志。快到通辽时，我们坐上了一列运木材和军用物资的火车。

车行很慢，我们在没有窗户黑咕隆咚的闷罐车里席地而坐或干脆躺着熬了一夜。半夜里我被尿憋醒了，可车厢里没有厕所，又躺了许多人，上哪儿去小解呢？谋划了好久，终于想出了办法：我摸到铁门边，脱下帽子盛了尿，让尿在布帽里慢慢顺着铁门的缝隙流出去。此事现在想起来还觉好笑，但那时却实实在在解决了一大难题。

第二天，敌机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开始以为是侦察机，没在意，后来扔下了炸弹，还向列车扫射，司机才紧急刹车。火车停在一个小山坡上，边上有个小水塘。同志们打开了车门，拼命往下跳，有的人一下车就跳进了水塘，好像水塘里的水和烂泥也能当掩体一样，民运部部长夫妇就是跟着别人跳进水塘里的。我没有下车。从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我经历过几十次这样的轰炸扫射，习以为常了，而且敌机已开始攻击我们，这时跳下去可能更危险。我紧紧贴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这种位置抗弹性较好，子弹打不穿，弹片一般也打不穿。

一个多小时后，敌机走了，火车拉响了汽笛让人们上车，赵龙和李柱两人浑身都是泥，狼狈至极，赵龙的手表也弄丢了。看了看车厢，发现中了三四颗机枪子弹，但我却安然无恙，大家都说我福气大。

回到地委，就开始动员民兵、民工准备支援辽沈战役。此时地委机关又搬到了黑山县新立屯附近的村子里。

辽沈战役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到十一月二日之间，我军和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地区规模空前的最后决战，我五地区则是这次决战的主战场之一，东北野战军七八个纵队几十万大军在五地

区来回运动穿插，我们的战勤工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繁重。地区党政机关以及全区男女老少都被动员起来为前线服务。任务除搬运军需物资,救护转运伤病员和修桥补路之外,还有送信带路、打探敌情、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以及碾米磨麦、烧水做饭、搜擒残敌、押送俘虏等。

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共产党的部队也成建制地实现了机械化、配备了重武器，惊讶与欣喜的心情溢于言表，加上人民解放军军容整齐，纪律严明，与老百姓有说有笑，亲如一家，所以群众的支前积极性更加高涨。村屯干部一敲锣，一吆喝，根本不用多费口舌,一支又一支民工队伍就源源不断地开赴前线了。

由于人民解放军在五地区范围内调动频繁，行动神速，有时候部队走了还来不及通知地方,因此,我们的支战工作就愈显紧张和忙乱了。九月中旬，我军对锦州的攻击已经开始，除原来的第七、八、九、十纵队仍常在我五地区穿插外，第三、四纵队也突然来到彰武、阜新、黑山一带，但几天后又一晃不见了。

在这样瞬息万变的环境下，军、地工作一时的脱节是很难避免的。有时部队走了,我们不知道;有时敌人夜里来了,我们还以为是解放军，一点未加防范，所以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杀戮，损失很大。特别是当我军攻克锦州全歼九万余守敌之后，敌人的反扑更是空前疯狂。廖耀湘兵团十万之众从沈阳倾巢而出，企图夺回锦州，扬言要与我决一死战，并丧心病狂地在沿途实行“三光”政策（即粮食烧光、干部和积极分子杀光、牲口抢光）。此时地里的高粱已经熟透,有些收了,有些还来不及收割,他们一见到就点上火烧光。有些老乡的牛马他们牵不走，就把牲口的蹄筋砍断或干脆杀死。这期间被敌人杀害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达两百余人，是五地区三年来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我们与敌人的“三光”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第三、四纵队突然转移消失后，我们刚刚

调运来的几十万斤军粮的运输与贮藏，就是个火烧眉毛的大问题，沈阳的敌人随时会到，这批粮食若被他们发现就会立即化为灰烬。于是我们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连夜组织起方圆二十里几十个村子的几千群众来火车站搬粮，说好这批粮交由各户分散保存，解放军一回来，再由各户送还。后来这几十万斤粮食在我军解放沈阳之后，又由群众如数送了回来，从而避免了一场巨大损失。东北群众的革命觉悟和支持我党打赢这场战争的决心，刻骨铭心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军攻克锦州后，又迅速回师，在黑山、大虎山一带布置了一个"大口袋"，一举把廖耀湘兵团装了进去，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全歼该兵团十万人，连廖耀湘本人也被我军活捉了。值得骄傲的是抓住廖耀湘的是我们的民兵。

当时廖耀湘与其高级将领李涛、白凤武、郑庭芨等已经化装成老百姓逃跑，我们部队认不出来，可是却逃不过当地群众的眼睛，很快就被我北镇的民兵一个一个都活捉了。

锦州的解放，迫使长春之敌一部起义，其余全部投降。

我军乘胜追击，十一月二日解放了沈阳和营口，又歼敌十四万九千人。至此，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全军覆没，东北全境获得了解放。

辽沈大决战，共歼敌四十七万人，大大加速了全国胜利的到来。我为自己目睹了这次伟大的战役和亲身参加了支战工作而深感荣幸。

沈阳解放第三天，我被分配担任市委职工部部长；担任军管会主任的陈云在工人代表会上讲话，使工友们个个笑逐颜开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即沈阳解放第三天，接辽宁省委

电报，调我以及其他一些地、县干部，前往沈阳，参加城市恢复工作。

从上次被迫撤出沈阳到这次以最后胜利者的姿态昂首阔步再次迈进这座城市，前后仅仅三年！

我被分配担任市委职工部部长，参加市委常委，并担任市工会筹备会主任和市妇联筹备会主任。兼职虽多，但实际工作主要是发动和组织企业，迅速恢复生产。

过去，我虽然也曾在厦门、福州、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工作过，但那是地下活动；虽然在上海也做过工人工作，但那同样也是秘密的。一九四五年十月第一次进沈阳，担任工业重镇铁西区党委书记，为时仅有两个月，许多精力还要分散去和苏军周旋，去跟伪警察和国民党的地下军作斗争，所以同样也没有积累下工业生产方面的经验。

现在，沈阳解放了，整个城市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工人阶级成了这里的主人翁。发动起群众来自然是不成问题的，但如何使停工和半停工的工厂恢复生产，如何改变“缺吃少穿”的困顿局面，使群众能安然度过这个已经到来的冬天，却是一件劳心费神的事，对我来讲又是一件从未接触过的全新工作。

当时沈阳已成立了军管会，发布了许多命令和政策。全市范围内接收公共机关、接管工厂企业、清查物资财产、登记审查旧职人员等工作正在全面展开，任务重且时间紧，需投入大量干部力量，现有的人手已明显不足，所以不可能再为我这一摊子配备许多人。

我面临的困难确实不少，好在陈云担任了沈阳市军管会主任，他是工人出身，又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具有丰富的城市工作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我想：反正遇事可以多请示陈云，没什么好怕的。这样我便大胆干开了。

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好职工的生活，这是发动群众

的前提。

国民党占领沈阳三年，广大工人、城市居民的生活贫困到了极点。我们看到工人们买不到像样的粮食，吃的是豆饼渣和麦麸子；已是初冬季节了，却没有足够的燃料可以烧饭取暖。一个“饥”、一个“寒”，成了套在人们头上的两个紧箍咒，全城人心浮动，惶惶不知所终。我们决心迅速解决粮食和燃料问题，最好还能给工人兄弟们解决一些生活费。

陈云对我们的意见很重视，立即让军管会从各地紧急调运了大批粮食和煤炭，供应沈阳的工人、职工和城市居民，沈阳解放的第五天，军管会又给每个工人发了十万元旧币。由于旧币不值钱，之后又改为按工人和职工的原有等级标准，发放大米，每人八十斤至四百斤不等。吃的、烧的有了保证，工人和职工的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参加新沈阳恢复工作的积极性陡然高涨了。

接下来，我们便着手接管工厂企业。在解放沈阳之前，我党就通过地下工作渠道和别的渠道向全市工厂企业的职工进行了反复的政策宣传，号召工人阶级和职工积极保护工厂，严格监督老板和经理，不准他们转移和破坏机器设备，不准他们抽走工厂资金，不准他们开除、辞退工人。事实证明，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工作是十分必要也是极其有效的。沈阳解放后，经我们检查，各工厂的机器设备基本是完好的，虽然许多工厂停工或半停工了，但工人和职员仍能坚守工厂，不像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被苏军搬走了许多机器设备和重要物资。

所以，这一次军代表一进驻工厂，就有工人代表主动前来配合工作。我们在厂里召开了职工大会，宣讲我党政策，宣传工人阶级翻身做主的道理，宣布工厂纪律；同时责成厂长与经理会同工人与我们共同核查、清点机器设备、仓库原材料、资金财产以及企业员工。

在广大工人的支持和拥护下，接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接管

工作完成后,工厂陆续恢复了生产。

但不久一些工人在全市工人代表会议上对粮食和燃料提出了新的问题:调来的煤灰分太高,做饭取暖上不来火。这个意见在分组讨论时又被提及,同时还提到配给职工的高粱米和玉米面有的发了霉,有的壳子太多,尤其是有了霉味的高粱米不好处理。我把这些意见向军管会陈云作了汇报,陈云很重视。他指示我再召集一次全市公营工厂的工人代表会议,他要去会上讲话。

我们把这次会议安排在一月五日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五六十人。陈云这一天的讲话现已收在《陈云文选(1926~1949年)》,并成了该书的压卷之作。

会议先是由工人代表汇报情况,提出问题,然后由陈云讲话,中午以陈云的名义在附近饭馆请代表们吃了顿饭。这顿饭虽不过是四菜一汤,但代表们吃得很开心。这不仅是因为大家生活很苦,吃一顿鱼肉不容易,更是因为陈云的讲话使他们受到了极大鼓舞和教育,工友们豁然开朗,所以个个笑逐颜开了。

下午讨论时,代表们争先恐后,纷纷发言。他们说:听了陈主任讲话,心里亮堂了。为了更快地消灭国民党军队,为了彻底摧毁蒋家王朝,一切物资应当首先满足前线,好粮好煤应当优先供应前方的解放军。

工人们说,在这之前我们不了解全东北、全中国的情况,听了陈主任的讲话,现在明白了,没有意见了!过去国民党军队占领沈阳,工人们连豆饼渣都难吃上,煤更没有;现在粮食和煤质量虽差些,但总能吃饱,也冻不着了。只有全力支援前线,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才能长久地过上好日子。

代表们纷纷表示:现在这点困难不算什么,把裤腰带紧一紧就过去了,咱工人阶级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回厂后要向全体工人和家属讲清这些道理,带动大家加紧生产,多提合理化建议,多创造生产新纪录,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

听到代表们这些发自肺腑的话，我很感动。多好的工人啊！有这么好的工人做靠山，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呢！我也由衷敬佩陈云，他的这个讲话，对我的教育既是多方面的，又是永久深远的。

陈云这个报告所显示出来的深邃思想、全局观念，对情况的细微体察和准确把握以及高超的群众工作艺术，让我叹为观止，佩服之至。这个报告就像一座蕴藏丰富的矿山，人们可以从中不断开采出许许多多珍宝来。特别是他对工人代表的坦诚态度，他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交底交心做思想工作的方法更值得我学习终生。我认为，正因为陈云是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党的群众领袖，所以才能与人民群众如此息息相通，心心相印。

第十二章　工业书记

北京西郊阅兵式没多久，我随四野南下到了武汉；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邓子恢安排我为重工业部部长，我自愿任副职；作为一个女人，我头一个爬进了萍乡煤矿的井下，有些不穿衣裤的工人只好趴在地上不动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一天，我带着女儿斯亮及老杨离沈抵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妇代会。

我们住在东四四条陶铸住处，那原是国民党一位将军的公馆，三套院的四合院，我一家住中套北屋两间，刘白羽、陈荒煤、林一山，好像还有华山也都住在这座房子里。

二月底某天，正刮大风，风沙扑面，陶铸随总司令到西郊飞机场，忙着布置欢迎毛主席等入北平检阅的准备工作，检查香山住处等。回家时，他的身上脸上沾满了灰土，我第一次领教了北平风沙的厉害，难怪妇女们脖子上都围着一条纱巾，原来就是避风沙蒙头蒙脸用的。

三月十五日，我赶早来到了西郊机场，只见晋京部队全副武装，整齐地排列着。各种武器和车辆也整齐地排列着，沿机场围了一个大圈。北平各机关的干部群众早已列队迎候，翘首以待一睹首长的风采。我不是集体去的，活动比较自由，便爬上了一辆吉普车顶上，以便在毛主席检阅时看得更清楚。

不久，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有几辆吉普车从远处缓缓驶

来，人群突然变得鸦雀无声，人人屏息而望，神情凝重。瞬间过后，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呼喊起来：

“毛主席来了！”

人人脸上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神情。吉普车渐渐驶近，我仔细一看，朱总司令乘坐在前头的车上，毛主席站在第二辆车头上，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招手。

“毛主席万岁！”喊声四起，人群沸腾，不时掌声雷动。此情此景，令我怦然心动，回想前尘往事，我深深地被感染了。二十多年的浴血奋斗，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我周围的亲人、战友们一个个地倒了下去，而我却活了下来，无论死去了的还是活下来的，不都是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么！我的双眼湿润了，我随人群拼命地喊叫：毛主席！我多么希望主席能够看到我啊！但车缓缓开过去，车上的巨人终究还是没有看到我。

离开沈阳前，组织已决定让我随第四野战军南下，五月二十日前后，我即随同四野司令部抵达武汉。随后，武汉军管会宣告成立，谭政任四野政治部主任，陶铸为副主任，后谭政升任四野副政委，陶铸接任政治部主任。军管会还成立了物资接管部，部长由四野参谋长赵尔陆兼任，我被任命为副部长。

接管工作包罗万象，不仅包括吃的、住的，也包括工厂、企业的接管。我主要抓工厂方面的接管。但这项工作操作起来，不管我还是别人并不陌生。

早在沈阳，陶铸曾任军管会副主任，我也曾在那里搞过工会筹备会工作，主要是接管工厂，恢复工业企业生产，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因此武汉包括物资的接管工作都是依此进行，并不费劲，也顺利地完成了接管工作。

过不久，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下设若干部委，那时中南局的常务工作主要由邓子恢负责。有一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便信，安排我为重工业部部长。

我一看急了起来，马上复信邓子恢，说明自己没有做过工业管理工作，也没有科学技术知识，文化水平也低，不能胜任重工业部部长一职。转而推荐刚刚到武汉已在大连军工系统工作过的朱毅任部长，我自愿任副职，做朱毅的助手。后朱毅调任他职，重工业、轻工业合并成工业部，由刘杰当部长。

我从没有做过工业工作，而对这全新的一课，我掂出了肩上担子的分量。但我相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话，只要肯下功夫，肯学习，一定会把局面扭转过来的。

因此，最初我并没有深入到工矿企业蹲点，搞民主改革，而是先到一些大的厂矿做面上的调查，了解厂矿企业一般情况，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才能对症下药搞好企业。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我去过不少工矿企业调查。生产、生活条件最苦的当属煤矿工人，看了令人心酸，留下异常强烈的感受。

萍乡煤矿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煤矿，但那里除了一对竖井是机械化，出煤用提升机，载人用电梯外，其余都是斜井，坡度极陡，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七十多度，长度则至少百十来米，有的地方甚至长达半里多。阶梯也不正规，每级台梯竟以横放着的一根竹筒代替，两边扶手是用竹筒连接起来的，井下电线都缠在扶手上面。工人们挑着百十来斤煤，爬上七十来米高的陡坡，只能横着脚艰难、吃力地往上走，扶手摇摇晃晃，稍不小心，从高处掉下去，就会人滚煤翻，不粉身碎骨，也得腰折腿断，比临深渊更可怕，每走一次等于闯一次“鬼门关”。我每下到这种矿井一次，双脚肿得像面包。

这些矿井的安全条件实在太差了，矿工们的生产安全毫无保障，死人事故习以为常。一般来说，那些矿井的普遍特点是井下暖和，井口风大，工人挑煤上井时满头大汗，一到井口大风迎面扑来，很容易着凉。

他们的宿舍大都是自己找些废木料、杉树皮搭起来的，工作一天回来，精疲力竭，倒床就睡，到时间又上班，哪有精力去关心住处的卫生。时间一久，住处显得又黑暗又潮湿又脏臭，发病率自然很高。他们拿自己的青春、自己的健康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所得到的甚少，甚至还不够糊口。

最残酷的是一种狗爬式矿井，煤坑比桌面高不了一点点，矿工只能爬着进去。躺在地上挖煤时，哪怕是寒冬腊月，全身都脱得精光，就着瓦斯灯，用镐头一镐一镐地挖煤。挖下来的煤，因为用肩挑不来，只能装在用柳树条编织成的一种像儿童睡觉时用的摇篮似的筐子里，工人们再将粗壮的绳子，一头系在筐上，一头挂在脖子上，两手用力撑着地，两脚奋力蹬，硬是拖着往前走，将煤运出坑道。到了下班回来，全身黑不溜秋。

新中国成立初期，延续过去的状况，矿工们的这种生产环境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有一次我不知就里，提出要到矿井里检查工作，矿领导犹豫了。原来当时煤矿里很迷信，据说不许女人下井，否则会招灾惹祸。

我不知道这风俗，也不管这一套，执意要下井，女人破天荒地第一次爬进了煤井里。

“快穿上裤衩，有人来参观了！”

带路的同志大老远就大声喊叫着，弄得我莫名其妙的。后来才发现工人们都不穿衣裤，有些工人发现有人来参观来不及穿裤子，只好趴在地上不敢动，但仍有人脖子上挂着煤筐往外拖煤。这些工人猛然间见到我是女人，惊慌不已，弄得我既难为情又难受，心情异常沉重。这种采煤的凄惨状况我至今犹历历在目。

粉碎“四人帮”后，我又去过一些煤矿，这些矿区不论是生产还是生活条件，与我当初见到的煤矿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采煤全面机械化，用综合采煤机，不用支架也不会冒顶，不会塌方，安全很有保障。工人下班回来，有较舒适的浴室，甚至

还有太阳浴，以弥补在井下缺少的阳光。不论是家属楼还是集体宿舍，都是高楼大厦，光线充足。集体宿舍还设有专门帮助搞卫生的服务员，到处干净整洁。有些矿区集体宿舍的被褥、蚊帐、脸盆、水壶等等都是公家配备，有的连被褥也是公家定期给换洗，就像住在旅馆里，生活非常舒适。工资、奖金、福利、劳动保护等，不知比旧社会的矿工高出多少倍。

旧社会的煤矿工人牛马不如，新社会工人阶级是主人翁，真正体现了主人翁的优越地位，真是两种制度两种命运啊！

“三反”、“五反”打老虎，采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方式；我不满意那种做法，但又不能站出来公开反对，只能尽量控制事态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参加了开国大典，我站在观礼台上，听到了毛主席那惊天动地的声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被胜利的喜悦激荡得兴奋无比，我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幸福，哪里能想到，以后还会有那样多的风风雨雨啊！



五十年代初在武昌东湖，时任中南工业部部长。

从灾难深重的旧社会脱胎而出的新中国难以一时涤清旧时代留下来的流毒，它们仍然阴魂不散，在新时代的阳光下不时显现，一些偏离正常轨道的

事情常常在我们喘息未定时发生。

一九五一年，一场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在神州大地上展开，中南局也不例外，我负责工业部各机关单位。

工业部机关成立“三反”委员会时，全体职工干部进行民主投票选举，也许因为我在工业部时间最长，不管是从物资接管部到重工业部，还是后来合并为一体的工业部，我都在位。相反的是部长刘杰调任不到一年，其他几位副部长在职时间也没有我长；或许因为同志们对我信任的缘故。计票结果，我票数最多，但中南局已有明确规定，“三反”委员会的领导应该是部长，投票只是一种测试，不能以投票多少而定。

工业部系统“三反”工作，同其他部门大同小异，搞极左的那一套，采取延安整风“抢救运动”那种方式，比如开群众大会、点名批判、搞逼供信、吊打关押、威胁利诱、车轮战术等，无所不用其极，天天开群众大会，夜夜开小会，被斗的人晕头转向，精神受刺激，身体被拖垮。而参加批斗的同志也疲惫不堪，颇有怨言，搞得人心惶惶的。

我参加了几场“打老虎”大会，都是大轰大鸣，不重调查，不实事求是。我们宿舍在工业部大楼，有时半夜三更听到楼下的办公室内“打老虎”，犹如鬼哭狼嚎，我实在听不下去，跑下楼严厉制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对这种状况隐隐产生了一丝不安，历史有时往往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许多悲剧往往都是在极其荒谬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使我想起延安的“抢救运动”，我是过来人，被“抢救”过，我深深体会到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决不可能实事求是，许多被批斗的人是冤枉的，没有亲身经历的人，绝对体验不到那种切肤之痛。我内心深处很不满意这种做法。由于各种原因，我又不能公开站出来反对，也无力扭转整个局势，这并不等

于我在消极观望，而是尽自己的能力，凭自己的分析，明辨是非，尽量保护一些同志，尽量控制事态。

如有人供出某副部长，偷卖黄色炸药，贪污了两箱子黄金。对这种没有证据的指控，我就不相信，试想想在实行供给制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怎么有这种可能呢？一些从旧社会过来搞地质勘探工作的专家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很深的感情，工作起来兢兢业业，每天翻山越岭忘我工作，他们怎么会有贪污和投机倒把行为呢？却也以一些莫须有的名义批斗关押他们，实在令人心寒呀！

对那些我认为没有“三反”问题而被错整的同志，我总是力所能及地予以保护。因为我是“三反”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并且是大家选出来的，知道我的人较多，看管的同志不会难为我，比较容易接近被批斗关押的同志。没有谁要求我这样做，我只是受一种良心和责任感驱使，去同他们谈话。

数不清多少次，我都语重心长地与他们交心。我不想空谈，也不想骗他们，我只是把自己作为一名有几十年革命历史的共产党人内心的真实感受告诉他们。不管是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还是在不平静的建设年代，对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只要心中存在相信党的坚强信念，不管面临怎样的困难与艰险都可以解决的。

我还把自己在延安整风的经过简单诉说出来，给他们以安慰，坚定他们的信心。对那些不吃饭的同志，我在劝慰的同时，还给他们送稀饭面条。我相信自己的话给了他们慰藉与希冀。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比较好，凡我做过工作的干部，经查证没有问题，出来后都照样努力为党工作。

可是，仍然有点出乎意料的是，我被调往广州工作，做鉴定时，我们的党组织负责同志却说：

“我来工业部工作时间短，‘三反’领导工作，我是依靠你的，但你在运动中，有些态度不够明朗，不够一致，使我为

难！”（大意如此，具体的话记不清了。）

也许是他没有经过“抢救运动”，没有我那种切身体会，没有深刻的教训，不可能有我的心情。

我没有过多去解释他对我的所谓批评。道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对待事物的态度自然存在差异。不能求全责备，我相信自己是在为党工作，是对得起党的。

我毕竟出自公心，帮助许多同志渡过难关，相比之下，我压根儿没有把个人受的一点委屈放在心中。

陶铸调广东省委后，我想尽尽人妻之责，调到广州任电业局党委书记、局长；我拼命学习，努力成为内行，与工人们甚是融洽



一九五四年与陶铸、亮亮在广州家中。

陶铸奉调广东省委工作已两年多时间了，虽然还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但工作地区基本固定下来。十年来，我与他离多聚少，即使是相聚，也是匆匆一见，一直无法呆在一起过日子，作为妻子，我内心一直有一份内疚感。我觉得我应该去广州，工作岗位离他近一点，尽尽人妻之责。

一九五二年，中南局领导支持我的想法，并任命我为中南局工业部副部

长，兼任广州电业局局长和党委书记。

此时我深深感到，作为管工业的干部，如果自己既没有技术，又没有经营管理经验，对工厂生产工艺缺乏了解，是搞不好工作的。我决心从头学起，决心呆在最基层。

这一想法使我改变了调广州的初衷，把局党委设在了西村电厂内部，先后将母亲、侄儿、侄女以及外甥都接来，在电厂的老工人宿舍区一间房子里安了家。小屋过于拥挤，我夜宿办公室，吃饭时回家。

夏天的晚上，屋里闷热异常，邻里们常将小桌子搬到小天井来，小桌子几乎连成一片，大家一起边吃饭边说说笑笑，不太宽敞的天井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彼此都很亲切，气氛十分融洽。我母亲对人热情诚挚，与邻里相处得很好。

这里的人心是相通的，没有等级之分，没有界限，有的是同志之间深厚的情谊。

我和电厂厂长对业务都外行，上任伊始，工作千头万绪，要抓的事情实在太多。好在全国刚解放，工人阶级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从内心热爱新社会。再者经过民主改革，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也提高了，这些都是我们搞好工作的有利条件。

当时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工人们由于在旧社会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受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因此不管在生产还是生活上对文化都有强烈的渴求。四野部队南下广州后，因势利导，要求所有工人都要学习文化知识，并派出大批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形式帮助广州干部、工人学习文化知识，由此在广州掀起了一场学习文化热，从机关干部到一般工人都在努力地学习文化知识。我们电厂的工会则组织全厂工人，按不同文化程度，分班级学习语文及数理化知识。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工人们果然学习劲头十足，如饥似渴地学，连饭也顾不上吃，有的甚至把孩子锁在家里，下了班就往夜校跑。

还有我们这些新进厂的外行干部以身作则，也都在业余时间加入了学习的行列，由本厂工程技术人员分门别类上课，定期考试，张榜公布成绩，让全厂职工都能看得到。大家怕考试不及格，会造成坏影响，便都拼命学习。我每次考试成绩都在八十分以上，体现了作为一个电业局局长应有的素质，给全厂上下学文化、学技术添薪加火，全厂形成了一个学技术、学文化的浓厚氛围。

正因为如此，这期间我们培养了一大批工作骨干、技术青工。两年时间抽调了一整套电厂的班组长和车间干部去新建的郑州发电厂，调出两个工程师分别到沈阳发电厂以及新建的武汉青山发电厂任正副总工程师，还调出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到青山发电厂工作，为国家电业建设输送了许多工程技术人才。

实践出真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个观点，是千真万确的。我总是不放弃每一次实践和学习的机会，为了增长知识，工厂每次搞大维修，我总要亲自参加，从电机的拆卸、擦油、检修到安装，我都要亲手操作。

检修锅炉是最辛苦的活，锅炉又脏又热，为了抢时间，炉火停了四十多个小时，温度仍达摄氏六七十度，工人就得披上打湿的衣帽，进炉膛里检修。很厚的鞋底踩在炉条上冒着烟，吱吱作响，衣帽上冒着蒸汽，人在炉膛里呆不上十分钟，就得赶快出来透透气。锅炉的节炭器，维修起来更困难。节炭器里的许多铁条像篾子一样密密地排列着，时间久了，炉里的烟灰就会把铁条堵住，维修时，只能从一个一尺多宽的窗口爬进去，温度与炉内一样，烟气弥漫，暗不见人。只能用铁钎和棕绳像拉锯一样在一米多深的铁篾子里拉来拉去，把灰尘刮干净。

每次检修锅炉或节炭器，我都同工人们一起钻进去。我虽然不能参加重劳动，但我同他们一起进火红的炉膛，工人们很感动，很鼓舞士气。

一旦供电线路发生故障，不论白天黑夜，也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线路工人都得去马路探测故障，并在故障点挖开马路，把碗粗的电线拆开修好。有时为了缩短时间，连续作业三十六个小时不休息。我同工人们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甚是融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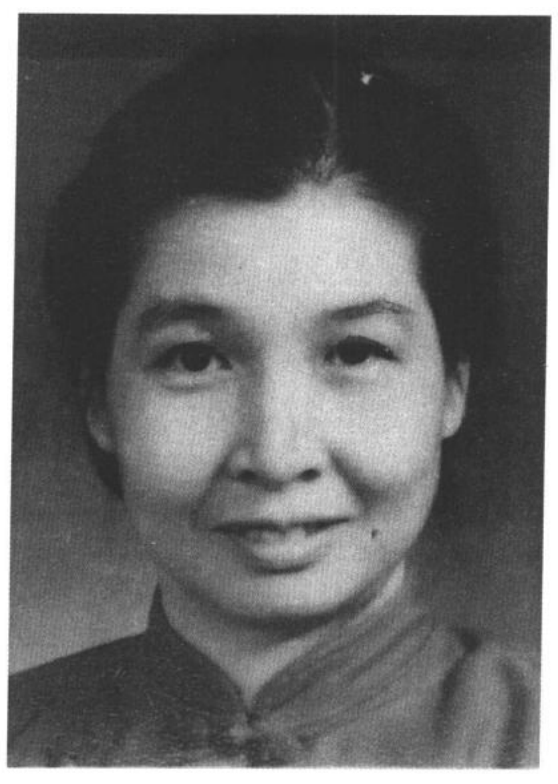
回顾两年来在西村电厂乃至广州电业局的工作体会，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我信任全厂、全局的科技人员、干部、职工，使他们明确自己的职责和任务，时常了解时事政治和做社会主义主人翁的具体革命道理；其次，放手让大家动手动脑，使全厂干群自觉自愿并富有创造性地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我认为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踏踏实实地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思想政治工作扎根于群众之中，思想政治工作寓于生产、技术、经济工作之中的基本方法，这便是我在西村电厂取得成绩的成功之处。

一九五四年十月，组织上的一纸调令，我就任广州市委工业书记，带着温馨的回忆，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西村电厂。

广州公园里躺在石凳上的中青年男子，引起了陈云的注意，他提出建几个工厂，解决了两万人的就业问题；作为市委管工业书记的我，几乎是广州工业的晴雨表；毛主席要我找人把老字号招牌和一些著名的街道拍下来，我只轻描淡写地告诉了陶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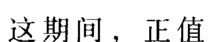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我从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回来，就开始上班，马上着手了解广州市工业情况，研究和准备部署一九五五年及该年第一季度的工作。

由于受沿海城市不发展新兴工业的影响，广州市失业人员、闲散人员逐渐增多。一九五五年前后，陈云到了广州，看到公园里一些中青年男子无精打采地躺在石凳上，大街上东张西望、游



一九五四年参加中共八大期间。

手好闲的人也很多，这种现象引起了长期做工人工作的陈云的重视，他认为广州市不建几个轻纺工厂，失业人数还会增多，提出了在广州建一个高级细纱纺织厂，主要供出口，再扩大广州市原来又陈旧又小的惟一的纱织厂，建一个无线电元件厂、一个生产新闻纸的造纸厂。这几个厂很快建成，解决了两万人的就业问题。



这期间，正值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期，可是与此不同步的是，广东因为解放较迟，土改进展比较缓慢，城市工作与工业企业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的开展也比其他大城市略微放慢了一步，直到一九五四年广州工交企业民主和生产改革才基本结束，而这一工作在有的公私合营、私营的企业中才开始，有的还尚未进行。

针对这种情况，广州市委决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奋起直追。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精神及华南分局、省委的有关指示精神，在一九五四年的中共广州市第四次代表会议上决定全市的建设方针是：把广州市逐步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在次

年召开的中共广州市第五次代表会议上更进一步地明确要把广州市建设成为一个以轻工业为主的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城市。

我作为广州市委管工业的书记，不仅参与这些方针、政策的决策，而且也是一个直接的领导者、执行者，这些工作抓得好坏，成效如何，都与我密切相关，也是有关广州工业方面各项工作的晴雨表。

在一定程度上，我肩上担负着振兴广州市工业的重担，能否把广州如期建设成为一个以轻工业为主的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城市，其责并不轻。当然到市委工作以后，我的工作量增加了不少，我不可能再像在西村电厂时那样，整天泡在基层。我及时调整了工作方法，采取各个击破、个案解决的办法，对那些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便提交市委，与其他领导同志一同探讨，研究解决，诚恳待人，不骄不躁。

五十年代中期，中央曾明确指示沿海地区地处前沿，要准备打仗，不宜于新建、扩建许多工业，这给我们广州市委的领导出了个难题，也给我们提出把广州建设成为工业生产城市的目标当头一棒。显然，广州仅靠新建和大力扩建国营、地方国营工业来建设工业生产城市的路子已走不通了。我们只好另走他途。

广州市原有私营工业企业将近四千户，还有轻、化、纺（如修理修配业、小五金、橡胶、食品等等），形形色色的工业不少，小而全。为了充分发挥现有工业生产能力和潜力，市委决定，必须以社会主义改造为重点，并集中主要力量对资本主义工业、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市私营工业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基本上做到了有条不紊。总的来说，这项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带、联、并、转、淘以及人事安排、设备调配、清仓核资等等工作，绝大多数都做得相当慎重，群众发动得也较好，绝大多数工业行业和企业在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同时，也掀起了生

产高潮。

在“双高潮”中，除党的组织作用外，其他各级干部和工人积极分子也发挥很大的组织作用和骨干带头作用，真正贯彻执行了中央、省市委指示，做到了改造、生产双高潮。

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至今仍令我内疚不已。毛主席来广州时，曾很郑重地对我说：

“曾志，你回去告诉省、市委要赶快把一些老字号招牌和一些比较出名的街道，找人拍摄下来，不然那些历史见证物就永远消失没有了！”

我当时对毛主席这句话理解不深，思想上重视不够，只把这句话轻描淡写地告诉了陶铸和王德。因此，省、市委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好像并没有去完成这个任务。

结果，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一完成，许多有历史意义的东西也随之消失，造成了莫大的损失。

广州的公私合营，引起了印度驻华使馆的注意，周总理让龚澎带我去印度使馆做客；“大跃进”，我的头脑也发热，广州掀起了比大炼钢铁更热闹的制造机器设备的“土简群”运动

广州乃至全国的私营企业实行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曾引起国际上不少工商界与政界人士的注意。

中印边境战争那时还未开始，中印双方尚有来往。广州市私营企业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刚结束，印度驻中国大使小尼赫鲁（不是尼赫鲁的儿子）从印度返北京，逗留广州。大使夫人也是个政治家，她委婉地向广东省政府负责人提出要了解广州公私合营和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市委派我与小尼赫鲁夫人交谈。

大使夫人很有政治敏锐感，对情况询问得很详细，我把广州市私营工业企业如何按厂按户调查登记，如何清仓核资，如何实行赎买政策，如何额定利息，人事如何安排等等都如实相告。

广州市在实施公私合营时，把工资比合营前低的一律涨上去，比合营后高的一律不变，私营企业工资就高不就低，私营工业企业合营后，职务是副职的，工资一般都比厂长、科长正职都高。私营工业企业合营后，私营企业者人人都有职业，一般任副职，个别也有担任正职，妻儿原在私营企业的都安排了工作。合营时私营老板临时安排进厂的，也同样安排了工作。私营企业者认为公私合营了不会有什么损失，打消了原来的许多顾虑和害怕，真心敲锣打鼓、欢欢喜喜迎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

我把这些情况都不厌其烦地向她介绍。这位大使夫人听得很入神、津津有味，也很满意，她好像也打消了一些疑虑。后来大使夫人回北京对周总理说：

“我在广州听了某女士关于私营工业企业全行业如何进行公私合营的谈话。现在我理解了你们中国全行业公私合营，与私营工业企业老板没有什么大抵触，而且很快欢迎接受的原因了。”

她在周总理面前特地称赞广州市私营企业公私合营改革措施。

此后，这位小尼赫鲁大使夫人对我简直有点念念不忘。

一九五六年六月，中央党校开办为期一年的高级干部研究班，每个省及直辖市抽调一个领导，我有幸加入了其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我大受裨益，提高了辨别事物的能力。

没想到大使夫人得知我的行踪后，向周总理表示要请我吃饭。周总理通知外交部龚澎带我去印度大使馆。

我是第一次吃印度菜，见印度人请客非常简单，只有一大盘香料炒饭，两三盘菜，其他就是水果、饮料和酒。吃饭也不用筷



一九五八年担任广州市委分管工业书记期间。

子，用刀叉，用手抓饭。我很不习惯，也吃不惯她们做的又辣又香的菜。

我见大使夫人那天只吃苹果，其他什么都未动，很奇怪地问她怎么不吃饭菜。她说：

“今天星期五，我们印度规矩星期五禁烟火，不吃饭只吃水果。”

“这是宗教规矩还是为了身体健康？”我又问她，但她没有明确回答。

我心想，我是不是土包子，这样的话在外交场合怎么能查问呢？

进入一九五八年，广州市的工业发展与生产像一列突然受到撞击的列车一下子加速奔跑了起来，这是形势使然。

中央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和敢想敢干的精神，紧接着又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中央与地方工业、大小工业同时并举和后来的土洋并举的指导方针，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业都开始“大跃进”，甚至还有了模式。

这样既有来自最高领导阶层的指示，也有身边的经验和生

动、典型的具体例子，形势逼人，广州市的工业建设没有理由不跃进起来。

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一结束，我便与市里几位负责工业工作的同志到东北、上海、武汉等地学习参观。在东北参观了“蚂蚁啃骨头”式的用专用设备车床头和组合机床生产大设备，用土简设备生产出符合国际水平、能供出口的金钢砂和土法炼钢等。在武汉参观了一个动力设备厂，他们仅花七天时间就完成了建设出一个三吨转炉炼钢厂的绘图设计、施工、制造设备、建造厂房、安装机器等。还从报纸上看到武汉烟厂也开始炼铁，再加上在上海时中央冶金和机械工业部部长批评广东工业不跃进，钢铁指标全年仍然是四万吨，远远没有达到当前总路线的形势要求。

广州市的工业建设简直有点陷入四面楚歌了。我的头脑顿时大大地发热起来了，认为广州市工业落后，一定要不甘落后，迎头赶上。

回到广州后，我们发现广州市工业“大跃进”已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了，许多行业和工厂掀起了新产品献礼和一厂变几厂运动。第二天，我在市委召开的干部扩大会议上介绍了各地的干劲和跃进情况，特别强调了武汉动力设备厂的情况，进行点火加油。

由此广州市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跳出了过去认为沿海城市不适宜发展主要工业的框框，省、市委雄心勃勃地不但要把广州市建设成为一个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生产城市，而且要建设成为华南工业基地。

我们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改变现有的工业面貌，积极大力发展基础工业，因此省、市委决定着重发展钢铁冶炼工业，中、重型机器制造工业、机电工业和化学工业，以及与此相关的煤、电、炼焦、轧钢、耐火材料、水泥、砖瓦和交通运输等。全市上下都围绕这个目标转了起来，轰轰烈烈地掀

起了群众性大办工业，大炼钢铁的高潮。

一九五八年底至一九五九年春，广州市工业“大跃进”活动进入高潮时期，但各工厂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苦于自身机器设备陈旧落后、生产效率低，远远不能适应“大跃进”的要求。

因此，全市掀起了比大炼钢铁更加普遍、热闹，更声势浩大的制造机器设备“土简群”运动的新高潮。原计划要求两个月内，全市制造出一千至一千五百台工作母机，结果仅两个多月时间却制造出了五千多台大小工作母机，还改进了许多工具和工艺流程，制造出三万多台机器设备，就连轻工业、纺织工业、手工业、建筑工程及基本建设单位也都制造了许多工作母机与机器设备。

一九五九年春，广州市针对当时大办工业中存在的“五大关键”，在全市工厂企业里开展“六革一改”的技术革新运动。为弥补“六革一改”之不足，随即又提出开展“四面三高一结合”运动。这样，全市工交系统工业企业的工作母机与机器设备从无到有，从劣到优，效率低的明显提高了，质量差的也改进了，面貌都有了很大改观。

一九六〇年春，市委工业生产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和全国各地经验，提出了“机械化、半机械化、消灭笨重劳动，为节约百分之十的劳动力而奋斗”的口号。

由此广州市交通运输的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就成为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中心内容。

在此期间，恰逢毛主席到广州视察工作。有一天，我向主席汇报广州市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六革一改”和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的情况，以及广州市举办半机械化、小型自动化现场表演的热闹情景等。主席听了，也很高兴，他善意地笑着问：

“你们机械化、半机械化一步就能升天，达到自动化了吗？还是要有半自动化！”

我回来后，把毛主席的指示向市委作了汇报，马上着手正式

改进机械化、半机械化,半自动化、自动化的“四化”运动。现在回忆起来,真正的自动化,真正的生产自动线,当时我对此并没有真正和准确的认识。

为解决广州市的蔬菜副食困难,我向毛主席提出划两个县给广州市领导,毛主席认为有必要;在广州的工作,我有五个方面的问题和三点原因

大概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有一次,毛主席来广州视察,我赶往他下榻之处看望时说:

“广州职工及全市居民的蔬菜、猪肉、鸡蛋等副食品供应困难,市委领导希望省委划两个县归广州市直接管理,以解决蔬菜副食品的困难。”

“有这个必要,有这个必要!”主席听了,很亲切地连连点头。

过了一会儿,陶铸也来了,毛主席就对他说:

“曾志讲广州市委希望你们省委划两个县归他们直接管理作为蔬菜副食品基地,自己解决蔬菜和副食品供应困难,我看有这个必要,你们省里商量商量!”

不久,省委果真把靠近广州比较穷困的花县、增城两个县划给广州,后来又增划了几个县。广州市帮助那些直辖县发展工业生产,改善了直辖县穷困面貌。而那些县则帮助广州市解决蔬菜副食品和某些轻工原料生产问题,解决了广州市的“菜篮子”供应难题。

不仅如此,广州市委其实还一直十分关注发展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从全行业公私合营起,直至每次的增产节约运动、机构调整、行业规划以及大办工业、大炼钢铁、“四化”运动等期间,市委都不忘要求各单位不能随便并厂、转厂,不能淘



一九六一年毛泽东与陶铸、曾志夫妇在广州。

汰原来的轻、手工业产品,不能减少花色品种。

一九五九年四月，市委针对有些工厂停产和减少生产许多人民生活迫切需要的轻、手工业产品，造成了产品市场脱销的情况，马上通知有关部门抓紧安排生产。六月，市委根据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副食品和手工业生产会议精神以及省委指示，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大力抓紧恢复与发展手工业生产，突出抓了一下轻、手工业名牌产品的生产，成立“广州市轻、手工业名牌产品、新产品检查鉴定委员会”，加强了专业性生产技术研究试验工作，并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底举办了一个轻、手工业名牌产品、新产品展览会，以促使产品的恢复和质量的提高。

这些都可说明，广州市委是十分关心广大干部、职工生活的。

五六十年代，广州市的工业建设的确获得很大的发展，但在那时代种种动人心魄的光辉笼罩与驱动下，人们没有理由不狂热，不把自己所有的思想、言行纳入到那股滚滚的潮流中去，片面突出主观意识,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从中也产生了一些偏差和不少错误、缺点,包括我自己在内也不能幸免。兹罗列如下,以备查考——

主张钢铁高指标，要求以“多”求“快”实现高指标。我作为制定这一高指标的主要成员之一，不得不使差不多比较大的轻、重工业工厂都炼起钢来。为了追求高、快、多，我曾要求拖拉机厂在一星期内建成一个三吨的转炉炼钢厂，结果费了十几天时间，虽勉强建成，但数量、效率都不高，厂房设备全部返工。

为了能让钢铁生产一马当先，只得盲目积极贯彻大搞原材料，全民办工业，一切为钢铁让路，挤掉了许多生产、生活所迫切需要的工业，手忙脚乱地建小型水泥厂、耐火材料厂、砖瓦厂、酸碱厂，并大办煤炭、电力，大搞机器和电器工业等，后来又不得不反过来为上述这些原材料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去建

设相应的企业,形成了恶性循环。

而当钢铁指标任务完不成时，看到全国各地大力推广土法炼钢时，我亦是最积极主张土法炼钢者，为土法炼钢召开现场会，限定各单位土法炼钢任务，并提出完不成任务者，要受到党纪行政纪律处分。

在今天看来，这种做法是盲目的，不够实事求是的，因为炼出来的钢大都达不到质量标准，结果不但没有炼出钢，反而使上万吨现成、好的钢铁门窗等材料又还原成铁，甚至变成了废渣，还损失了不少煤炭、木炭。通过这些，也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与增产节约运动流于形式。*重视一般的号召多，要求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数量多、范围广，照搬人家技术经验多，从形式上看的多，特别是变化多。一个运动才开始，就要求第二个运动跟上来，今天要求“六革一改”，明天就要求“四面一高一结合”，接着又要求搞增产节约、“土简群”运动、“四化”运动，一个接一个，变化多端。但运动的实效并不大,即使取得一些效果,也不够巩固。

只凭一时的热情，希望一步能够登天，要求许多厂普遍实现自动化和生产自动线。结果有些厂虽然照办了，但质量不仅没有提高,生产没有搞好,个别的反而把机器搞坏了,把原来的生产秩序打乱了。

有些生产自动线，由于赶工图快，不顾质量，不考虑长期效果，搞起来只是为了应付上面的要求、完成上面的任务，往往大都是让人参观一番，表演几次使用几次，就拆掉废弃一旁。

惭愧的是在这些运动中，我曾对推广强化器、管导化不力或公开抵抗的几个工厂负责同志进行过严厉批评。如对重型厂谢阳光的批评,对广州水泥厂和锌片厂同志亦有过批评,这是不对的。这些同志在推行强化器中碰到困难，思想上产生了怀疑，我没有

详细了解,没有很好与他们共同研究商量,而是简单地采取批评、采用施加压力的办法来解决。

事实上这种不符合实际的批评，是不可能真正解决思想问题的，在当时被批评者表面服从，实际思想是不通或不满的。

推行多种经营，综合利用和多面手的做法不够实事求是。有些工厂为了发展综合利用,响应一厂变多厂的号召,在一个工厂里竟生产几种与本厂生产无关的产品。有的工厂竟把多种经营、多面手演变成专为完成生产任务和增产值的投机取巧的手段。如有的酱料食品厂产值任务低，为了让产值翻几番，便利用食油、酒精、白水等添加香料,谓之“食用香精”,以高出成本几倍的高价来增加产值。我不赞成这些投机取巧的行为，但由于深入调查和掌握具体材料不够，对其危害性具体了解不够，加上有些单位汇报好的方面多，反映问题方面少。因此，未能及时有效地加以制止、批评，反而有一次还在该区表扬其做法。

政治思想工作简单、表面化。缺乏做艰苦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放松了对党的组织领导和个别串联访问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的运动方式几乎代替了细致的经常性的工作方式。做政治思想工作，毫无例外都是采取全面动员，一般号召，点面及时铺开，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方式，往往都是虎头蛇尾，开始时总是轰轰烈烈,到后期就冷冷清清,拖拖拉拉,不善而终。

在“大跃进”中开展的劳动竞赛，推广隔日或五日一安排，五日一战役的方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工业生产是细致的工作，进行适当的安排和评比是需要的，但不能简单地用战斗、战役的形式，否则必定使生产得不到正常的准备和巩固提高，破坏生产正常秩序。况且在竞赛评比中,花样多、变化多,基层记录不健全,评比工作缺乏详细确凿的依据。有的为便于评比，仅强调产值，就会造成一些工厂和单位单纯追求产值，不择手段地投机取巧，不愿生产产值小的产品和零件，给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不少

困难。

不重视劳逸结合，不够爱惜工人、干部和群众的高度革命热情。在“大跃进”中，虽口头上经常强调要关心职工群众身体健康、关心安全，注意劳逸结合，尽量不要加班加点，不要搞突击。但实际上由于计划任务经常变更，生产安排、原材料供应不正常，要求紧急、多快，中心任务又多（如几大会战、几大战役等），加上竞赛中的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基层单位就不得不突击，不得不加班加点，星期天也不能休息，许多职工弄得精疲力尽，连衣服都没时间洗，孩子都没有机会见。另一方面对职工困难了解少，一些单身职工宿舍卫生条件差，臭虫蚊子很多，也很少去关心和过问。

在工厂副食品生产方面，原本要求一年以后达到一人二分地、十人一口猪，却既不能如数地安排土地耕种，也不能如实地解决劳动力问题，完全是一种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要求，搞小球藻、人造肉精、甘蔗渣等代食品，也是铺得广、要求高，“一阵风”，缺乏严肃慎重的负责态度。

综观那几年的工作，不管是全市还是我个人为什么会发生上面那许多偏差和错误呢？错误来源和性质是什么？后来我一再进行反思，认为主要有这么几点原因：

一怕落后，不甘落后，急于求成的思想成了指导工作的重要方法。不甘落后，怕落后，向先进看齐的思想，本来是正确的，我们错在不分析主观情况，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仅凭热情、干劲、主观愿望和需要，盲目地急于求成。还错在把这种思想当做调动群众、指导工作的重要方法。对我个人而言，那几年时间，脑子总是热多冷少，对上照搬的多，对下压力多，重急不重细，平日辛辛苦苦。虽然大原则错误没犯，具体领导上却表现得杂乱无章。艰苦朴素作风、深入基层的作风比从前差了，谦虚与考虑反面意见亦差了。自问主观上的确没有骄傲自满情绪，但在有些场合

说话时,缺乏以平等态度对待同志。

二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敢想敢说敢干精神的理解，有许多地方只凭主观愿望，缺乏从客观实际出发。本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要消灭几千年来历史传统的自卑感，打倒富贵思想，敢于站起来，相信自己的力量，坚持以自力更生的原则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但不能因此不从实际出发，不去研究问题、地理、条件，而仅凭热忱和愿望盲目地想什么，说什么，就去干什么。在贯彻执行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的方针中，往往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客观条件，分清主次，分别轻重缓急来作全盘的考虑。以为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方针，就是为着求多图快，全面铺开，齐头并进。

三在贯彻自力更生与从全局出发、全国一盘棋问题上，曾过多地强调了自力更生，过分强调了建立地方工业体系，没有充分认识到，片面强调自力更生会对国家工业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什么样的恶果。这显然是不符合自力更生，必须从全面出发，建立在全国一盘棋基础上的原则的。

四在贯彻执行高速度有计划、按比例的综合平衡的工作中，思想上有混乱，方向上有模糊。以为高速度就是一马当先，万马就要随之奔腾；以为计划平衡就是让万马齐奔。没有看到万马中，有强有弱，有老有小，是否能够一齐奔腾上去？一马当先过远是否有脱离整体危险？不理解高速度一定要经过综合平衡，高速度要有客观条件加主观努力，才能真正做到切实可靠。不重视从综合平衡中去实现高速度。

总之，当我以一种较为冷静的态度，反观在广州市委当工业书记期间的工作，不言而喻，自己在“总路线”、“大跃进”红炉冶炼之中，受到了很大的锻炼，不论在政治上、政策水平上，还是思想上都有了提高。如自力更生问题，过去总认为我国工业建设离不开苏联帮助，以为苏联的一定是好经验，不用脑子，不

研究具体情况，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经过“大跃进”，我在这方面才真正地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对依靠工人阶级，深入基层，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和创造性，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道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了认识，经验增多了，处理事情更稳些准些，信心也更加增强了。同时也深感原先的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低，计划性、组织性、系统性也差。

因此从那时起，我暗自要求自己，要防止摆老资格，不要自以为是，警惕官僚架子，不论在工作还是在思想上都不应有丝毫的自满，一定要时刻谦虚谨慎，兢兢业业，一定要有原则地主动地团结同志，认真做到虚心接受正确批评，努力学习，克勤克己，以身作则，经常进行自我检查，使自己在往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尽量为国家和人民多做贡献。

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席没有出面会议就结束了，主席对陶铸说：“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在主席寿宴上，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散席后，主席将我介绍给钱学森和陈永贵：“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一九六五年三届人大散会后，陶铸对我说：“主席推荐你当人大代表，还说什么‘善马任人骑，善人任人欺’。”

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我已经调到省委分工负责工交企业，也参加了。这一年，中央已明确决定，主席退居二线，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党内一线工作也由刘少奇主持。所以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刘少奇做的。

会议期间，少奇同志让陶铸去跟李雪峰同志讲一下，由李雪

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中的“桃园经验”。参加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去听了，江青则在屏风后走来走去地听着，看样子江青对此不满意。

这次会议，主席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青请我和陶铸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见到了主席。主席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我和陶铸，其实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就是指刘少奇，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主席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有的走了。”“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主席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观看《红灯记》时，江青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又是一个“有人”!但这又是指谁呢?我和陶铸都不敢去多想。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这次是由主席亲自讲话，他不紧不慢，却相当严肃地说：“社教只讲‘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分析。关键的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大概意思如此)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感到问题严重，跟不上主席的思想。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做是了。

这次会后，重新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

会议刚开完，恰逢主席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同志来吃饭，一共三桌。我和陶铸、李富春及胡耀邦是最早到的一批。不一会儿主席走了进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座，说：“东兴同志讲罗长子(罗瑞卿)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就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李讷呢，李讷下

去搞‘四清’了,她没有资格来。”

突然主席扭头对坐在身旁的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主席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的气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我们相信，这决不是批评李富春。幸好这时江青过来招呼大家入席，她将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和邢燕子安排在主席左右；罗瑞卿、陶铸和我也分在这一桌；而刘少奇、胡耀邦、李富春和各大区书记以及江青自己，则分坐另外两桌。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时间久远了，我已记不全主席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而一年多后，一九六六年，终于爆发了旨在打倒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

散席后，主席才向钱学森和陈永贵介绍我：“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九年期间，我曾在中央党校学习，有时也去看望毛主席。在谈到一线、二线问题时，主席说他要从一线退下来，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了，改由别的同志来担任，自己要集中精力研究一下理论问题。他还提出在大学里的教学和行政事务由校长治校，国家行政部门设党组，党组对行政部门领导起党的核心作用，做思想政治工作。他的这些想法，拿到中央党校高干研究班去让大家讨论，征求意见。有次主席问我讨论的情况，我说开始大家不通，不同意主席下来，但后来经过几次讨论，大家通了，认为理论工作也很重要，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世界革命的前途，都需要理论去指引，再说，退下来后可以减少一些外事活

动，这样有益于主席的健康。主席说："噢?你们都想通了。"

一九六五年三届全国人大，刘少奇接替主席担任了国家主席。那时刘少奇在人民群众和党内有很高的威望，以全票当选。

当时陶铸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也是人大代表，自然也参加了人大常委名单的审定会议。散会后他对我说："主席推荐了你当人大常委，还说什么'善马任人骑，善人受人欺'，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我说："我怎么知道!"其实我心里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早在一九五四年，筹备第一届人大时，广州市委书记何伟同志告诉我："市委推荐你担任人大代表。名单到了陶铸，他一笔勾掉了你的名字，换上另一位女同志。"我责问陶铸为何不让我当。陶铸解释道，中央认为方方同志不适合在华南局工作，就将他调去了北京，为了照顾一下方方同志的情绪，顾全大局，缓和一下矛盾，就让方方同志的爱人来担任人大代表。我听了非常生气，认为陶铸的理由完全说不通，他是为了个人关系，拿我来做交易。我斥道："你这是毫无原则，我是组织上推荐的，你为了你自己与方方同志的关系就否定了我的代表资格，我想不通!我有意见!"但陶铸根本就无意接受我的意见。我感到委屈苦恼。陶铸不讲原则，就因为我是他的老婆，"大义灭亲"砍掉了我人大代表的资格，我气得很，但又不能同别人去讲，怕别人会认为我在争名夺利。在这种无处申诉的情况下，我只好给主席写了封信，倾诉我的满腹委屈，而主席肯定是看了。否则我怎么会又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主席怎么还会想起让我当常委呢?而"善马善人"那句话，我想就是批评陶铸的。看到陶铸那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傻呵呵的样子，我又不由得好笑起来!

第十三章　陶铸落难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调陶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广州太冷清，我被准予去北京养病；新家设在中南海杨尚昆曾住过的房子；陶铸突然脱下军装改穿便服；“中央文革小组”把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派到陶铸那里“协助工作”；浙江高中生陆荣根，给陶铸贴了六十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中央通知陶铸去北京开会。回来后，我发现他神态有些异样，总好像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心情显得相当沉重。第二天午饭时，两人都默默地各吃各的饭，我等待着他将要说些什么。

果然，沉思了一会儿后，他终于开口了：

“曾志，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

“让你做什么？”我感到很意外，忙问。

“中宣部部长。”他回答。

“你不合适，宣传部部长要由理论、文化和文字水平都很高的同志来担任，你胜任不了。”我断然否决。

陶铸点点头，很认真地说：“是呀，我不太适合。”

“那你就向中央辞掉。”

“不行，我还要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辞是辞不掉的。为这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得很多，

不过中央既然已做决定，那就去吧！”

事已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你什么时候去？”

“交代一下，六月初就去，不过先要去湖南为韶山渠通水剪彩。”此后，我们再也没说什么，他整天忙忙碌碌，我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精神不好，也无心过问；再说，我们素来谈话简短，只说一些在生活上必须谈的话，谁都难得向对方谈及个人工作上的事情，尤其是他。



“文化大革命”前夕，与陶铸、亮亮在杭州。

六月一日，陶铸就一个人匆匆忙忙飞往北京了。

我没有跟去，一个人呆在广州冷冷清清的，但到了七月初的一天，由于身体过于虚弱，突然休克，脉搏每分钟三百来次，发烧三十八度达二十多天。刚退烧，陶铸来电话，要我去北京养病。我想，女儿陶斯亮正在上海军医大等待毕业分配，一个人呆在广州冷冷清清的，反正病后需要恢复，不如去他那里，两人相

互间也总有个依靠。于是九月十日那天，我的想法得到了省委的支持，准予去北京休养三个月。

下了飞机，出乎我的意料，陶铸居然亲自来机场迎接，这是我们结合三十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

以往北京的九月份，正是最明媚最舒适的季节，而此刻，一切美景全让红卫兵运动给打搅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拥在大街上，搞“四大”，破“四旧”，揪“走资派”，斗“反动学术权威”；不仅触及人的皮肉，还要荡涤人的“灵魂”。我看着车窗外这种动乱景象，一股不安袭上心头：这场运动，究竟要搞成个什么样子呢?

陶铸一直在注意地观看着窗外的情景，很少吭声，一直到驶抵目的地时，他才告诉我他已搬出钓鱼台（即“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住进中南海杨尚昆的房子。杨尚昆调广东工作，家已搬走。

陶铸情绪很好地说：“我现在在西楼食堂吃饭，一天两元钱标准，太贵了，你来了很好，我们可以自己开伙。”他这个人，只要有辣椒吃就高兴。

车开进中南海，拐进了一条两边是高耸红墙的巷子里，在一座中式的大门旁停下。我迈进了新家，颇有兴致地参观了一下房子。这所住宅，不算宽敞，但挺精巧。主房只有三间，中间大的一间被隔成两半，一半做客厅兼餐厅，另一半是书房，两侧各一间卧室。室内陈设简单，但很实用。因为我们没有把广州的家搬来，只随身带了几件行李，因此这个家缺少生活气息，倒像是宾馆。

房门前是一个小小的院子，栽着两棵海棠和几株桃花。再往前走几步，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游廊，因为迂曲回旋成了“卍”字，因此得名为“卍”字廊。荷花池很大，长满了荷花和睡莲。那些红红白白的花儿开得婀娜多姿，十分可爱。陶铸说，

他正是为了这池荷花，才在偌大的中南海内，独独选中了这处僻静住宅的。

陶铸分工负责宣传文教和组织工作，如：中宣部、中组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出版局、广播事业局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等部门。他的办公室设在西楼。那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响此起彼伏，四名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

当时正是红卫兵闹得最凶的时候，所有的机关都分裂成两派，大学生又插足进行“煽风点火”，因此，几乎各部党委都处于全瘫和半瘫状态。陶铸既要同各部委领导同志商量对策，又要与两派群众对话，还要接见分管系统内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向他们解释党对“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还要当场解答红卫兵的质问。各省市自治区虽不属他分管范围，但那里的负责同志大多与他较熟，有些还是老朋友，他们绕过“中央文革小组”，也纷纷来电话反映当地炮轰火烧“走资派”，揪斗干部群众，抢砸档案材料，以及互相打派仗的情况。此外，还要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教师；要参加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各种各样的会议；每隔几天，还要与总理一道向主席汇报（后来才知道，主席是分开听周总理、陶铸和江青、陈伯达的汇报的）。

总之，“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形势的特点就是“天下大乱”，弄得陶铸纵然使尽浑身解数也应接不暇。吃饭睡眠等一切正常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陶铸说，这几个月，是他近几十年来最忙碌的一段时光。

大约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后，我发现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每当他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画来画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阴郁，面色铁青。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了我的关注，但是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简短地回答：没什么！他

什么也不肯说。说实在的,我对他这点很有意见,哪怕把我当做一名普通的同志,彼此也应该交流思想。我估计他遇到了与个人命运相关的棘手问题,于是开始留心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确实有些异样,例如:

"中央文革小组"把曹轶欧派到陶铸这里"协助工作",把陈伯达的老婆也安插到陶铸负责的某个部门中去。这分明是对陶铸职权的干涉,而绝非一般简单的人事安排,但当时,我也仅仅是感觉而已。

有一天,陶铸给汪东兴打电话,说周扬过两天要从天津回来,住中宣部不安全,希望办公厅能找个地方。汪东兴用质问的口气问道:

"怎么,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

"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回来接受群众批判,但身体还应该照顾,请你设法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的住处,王明住过的房子,现在不是空着吗?"陶铸解释说。

"好吧,跟他们商量一下吧!"电话里,传来汪东兴的回答。

我心里暗自纳闷,前些日子,汪东兴每次见到我们都很热情亲切,为什么今天口气突然变得这样生硬呢?

我还观察到,近来,每当"中央文革小组"通知陶铸去开会时,他总是面有难色,纵使去也极不情愿,这是为什么呢?我还奇怪,为什么他突然脱下军装,改穿便服了呢?

有一天,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少年京剧演员汇报演出,陶铸同意让剧团另一派来观看,江青故意冲着陈伯达发牢骚:

"放他们进来,两派打起来谁负责?"

江青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接向陶铸提呢?看演出时,我同蔡大姐坐在一起,江青走过来,热情地向大姐打招呼,但对我却理也不理,仿佛没看见似的。其实江青与我是熟悉的,以往她几乎每

年去广州过冬，我都要尽地主之谊，因此江青对我一直还算客气。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得如同陌生人了呢？

十一月份，主席下达指示：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陶铸自己的一摊子工作那样多，那样忙，纵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于应付，更何况总理也需要他协助，在这种时候，为什么突然命令他离开北京，下到地方上去呢？

以上种种迹象，都是些不祥之兆啊！

而最为明显的信号，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文艺界大会上，江青的一段讲话："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连陈伯达、康生都成了亲密战友，却惟独没有提陶铸。文艺界是陶铸分管的，在文艺界的大会上，把陶铸排斥于毛主席亲密战友之外，这实际上是向红卫兵、造反派们宣布：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人们可以任意怀疑并进而打倒他。果然，心领神会者立即响应。

浙江某中学高中生陆荣根，专写批判陶铸两本书的大字报。他来京后，挑选繁华的前门大街，张贴了一张两万多字的大字报，整整用掉了六十张大字报纸。有人抄下，我借来看过，完全是胡说八道，荒唐之极。例如陶铸在《革命的坚定性》一文中写道："我们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像岩石一般坚定，当狂风暴雨之夜，风想把它们彻底掀翻，雨想把它们打进沙滩，浪涛想把它们掷入大海，但是它们屹然不动。当风雨过后，当浪涛退后，它们仍旧矗立在大海边，指向青天，面对大海。"而陆荣根的大字报却胡诌什么："面对大海，就是面向台湾；指向青天，就是指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就是向往蒋介石。"真让人啼笑皆非。

耳闻目睹这种异常的现象，又眼见一批又一批的老同志任意被打倒，被揪斗，挂黑牌，戴高帽，游街示众，坐"喷气式"，受尽了折磨和凌辱。我的心真是沉重极了，我估计陶铸被打倒之

日，即将来临。我做了思想准备，并且让女儿也退出她那一派的“勤务站”，我对她说：“你爸爸在中央工作，弄不好会跌得粉身碎骨，你要有思想准备才好。”她太单纯，怎么也领会不了“粉身碎骨”这几个字的含意，还责怪我言过其实，以为我是故意吓唬她。

王任重的一首诗称毛泽东为“战友”、“兄长”，造反派大骂王任重胆大包天；“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上下勾结，形成对王任重的合围之势；毛泽东让“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给王任重提意见，矛头一转，对准陶铸猛烈开火；毛泽东出面保陶铸

转眼到了十二月底，一九六六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很是寒冷。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

“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判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

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平静：

“江青他们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我问道。陶铸愤愤地说：

“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

王任重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有水平，有能力，文化修养也高，人又潇洒，很得主席赏识，因此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他被调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北京市“文革小组”顾问。另一副组长是江青，陈伯达任组长，康生、陶铸任顾问。哪知任重来中央后，也和陶铸一样，与“中央文革小组”其

他几个人合不来。江青他们指责任重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中央文革小组”其他人商量,看样子很难再合作下去。

任重原来就患有肝炎和肝硬化,来北京工作后,由于劳累,心情也不舒畅,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天天发低烧,脸色灰暗,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十月份,就不得不去广州养病了。

正在这个时候,武汉的造反派,从任重儿子那里,发现了任重写的一首诗,诗中称毛主席为“战友”、“兄长”(大意)。这下造反派可就闹起来了,大骂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称兄道弟!一时间搞得武汉三镇乌烟瘴气。

“中央文革小组”不失时机地介入和控制了群众运动,把群众握于自己的股掌之中。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形成了对任重的合围阵势,任重的处境岌岌可危!

陶铸见状,很是着急,为了解脱任重的困境,给主席写了个报告,建议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首要的是应该让他治病。主席在报告上批示:

“王任重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中央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会议由周总理主持,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小组”将全体人马都拉来了,甚至连一般工作人员,也在这样一次党的最高级会议上占得一席之地,会场的气氛可想而知了。

“中央文革小组”向任重提了一会儿意见后,突然矛头一转,对准陶铸猛烈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这样周密的安排,肯定是事先预谋好的。“中央文革小组”不管小的还是大的,个个板起面孔,恶声恶语地凶得不得了。批判的内容主要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

大的保皇派”；继续推行刘邓反革命路线，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是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政治局的同志提了什么意见没有呢？”我问道。

陶铸说，政治局的同志只是在听，没有什么人发言，先念同志讲了两句，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意见，没有提路线错误；最后富春说了几句：“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

“你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住他吗？”

“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得下去呢？身体又那样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家一把嘛，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陶铸一下子冲动起来。

这才是陶铸的本色！他是这样的人，我太了解他了。

我见他心情恶劣，便安慰道：“事已如此，就只好正确对待吧。”我估计自己也不会例外，随时都可能被揪斗，被拉走。我望着陶铸，很平静很诚恳地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而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吵得很凶，但是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然后，我去到蔡大姐那儿，把事情简单讲了一下，回来后就闭门谢客，听候处置。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

“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

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

“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

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方向路线错误，随便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

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

“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说，并批评陶铸：

“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谈到下去视察问题时，主席多少有些不满，问：

“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

“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陶铸解释道。

“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主席说完话，亲自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二十多个人，还指示陶铸：

“这些同志烧是要烧，但是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

主席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陶铸：

“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最后，主席话题一转：

“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在中南戏剧汇演上讲话时，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

主席的意思是，现阶段，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样，陶铸以为既然主席已经亲自出面保了他，江青他们也就奈何不得了。他太天真了，事情仅仅是开始呢！对于他的政治生命来说，这一天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

造反派下通令，强迫陶铸接见，否则就全体绝食；

被激怒的陶铸向造反派提出抗议；造反派说陶铸压制群众，企图揪走陶铸；警卫人员带枪进入会场执行任务，造反派说是武力镇压群众；陈伯达说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

在“四人帮”时代，真是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而陶铸简直连一天都过不了，就又落入江青他们设下的新陷阱中。

就在主席保了陶铸的第二天（即十二月三十日），已经是晚上十点，为某种特殊目的而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突然狂放起来，强迫陶铸立即接见。原本说好是第二天接见的，但是他们下通令，如果当晚不接见，就要全体绝食。不得已，陶铸只好去接见。

一进会场，陶铸就发现气氛不对头，对方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挑战姿态。陶铸见状当即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合作搞一份谈话纪要。二是让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参加（是被他们从广州揪来北京的）。三是派出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

但是造反派偏偏对着干，一是非录音不可，二是坚决不让李一清参加，三是任意提问。他们的一位头头蛮横无理地叫嚷：

“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

陶铸本来就是个燃油般的人，一点就着，此刻他强压怒火，严正地说：

“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形式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

分明受到挑唆的学生，此时是有恃无恐的，他们硬是胁迫陶铸接受质问，陶铸那里肯依，冲突越来越尖锐，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造反派居然“勒令”陶铸回答问题。陶铸终于被激恼了，盛

怒之下他宣布：

“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以我个人的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

他哪里知道，激他发火动怒，乃是一个极其阴险的阴谋，他落入了圈套。造反派见激将成功，气焰更为嚣张，他们故意扩大事态，说陶铸压制群众，并强行把双方争论的录音带走，甚至企图把陶铸也揪走。警卫人员怕发生意外，于是进入会场执行任务。他们身上带着枪，造反派又借此制造事端，说陶铸动用武力镇压群众。整个会场一片鼓噪，犹如鸦雀闹林。

此时，坐在隔壁一间房子里的陈毅和李富春等人，听说造反派要揪走陶铸，陈毅气得一拍沙发：

“我要保护陶铸同志！”

直到陶铸勉强承认了有些感情用事，不太冷静，因而结束了这一长达六个小时的“接见”后，陈毅和富春才放心离去，此时已是凌晨四点钟了。

据李一清说：“专揪”造反队的一位学生告诉他，他们一到北京就通过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关锋，与“中央文革小组”取得了密切的联系。这样，他们的所做所为及险恶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几天，就这样艰难地度过去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迎来了新的一年。然而对于陶铸来说，一九六七年意味着终结。一月四日晚上七点来钟，李一清慌慌张张跑来找陶铸，陶铸不在，于是一清告诉我说：

“今天下午五点钟，‘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学生们回来后扬言——要把陶铸揪出来！”

对一清反映的情况起初我还不相信，我这个一九二六年入党，有着四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怎么也想像不到党内也会有如

此卑鄙的搞阴谋诡计的家伙,我也真是太天真了。到晚上九点,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大喊大叫:打倒陶铸!并且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的讲话内容。与此同时,传单已四处散发,行动真够神速。

我请警卫同志要了份传单,通栏大标题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具体内容如下:

“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中央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康生说:同学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

陶铸一直未归,我心情沉重地拖着两腿走到西门口,只见黑压压的一片,足有三四千人,喧嚣的声浪,可以传出几里地之外。我茫然若失地来到陈毅家,陈老总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

“大姐,你放心,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

陈老总亲自送我出门,并一再安慰我放宽心。哪里想到,这一面竟成为永诀。

直到深夜十二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他说:

“今天下午我与他们一直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界来京的革命群众,会后总理、我、还有他们几个在休息室还说说笑笑并无异样;总理同我商量工作后,我去找安徽的张恺帆同志说事情;接着又去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中央文革小组’就在我隔壁房间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呢?”

他立即给总理挂电话，总理说：

“我正在与群众代表谈判，处理完后再打电话给你。”

凌晨两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总理说：

“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广东省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正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

“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过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太好。’也就再没讲什么了。”

最后，总理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也就在当天夜里，我在上海读书的女儿，被同学叫醒，从而证实了她父亲“粉身碎骨”的预言。我的外甥正在广西南宁串联，半夜也听到了他舅舅出事的消息。如果不是事先周密的预谋，绝不会在几小时之内传遍全国的。

邓小平提议陶铸来京，毛泽东首肯；小字报上登毛泽东说“陶铸不老实”，我写信给主席，主席用铅笔在“不老实”三个字下画了横杠，打一个“?”；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江青要陶铸向刘邓开炮，陶铸和周恩来没有发言；国庆检阅新闻稿，发现没有邓小平的照片，指示新华社补救

当初，陶铸看中的这座带“卍”字廊的幽静住宅，没想到现在居然成了一座囚室，在这里我们竟做了近三年的囚徒。

囚徒的生活，最富有的就是时间，陶铸这下总算能坐下来了。最初没有派看守人员，我们还能在荷花池边散散步，自由地交谈。从陶铸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总算搞清楚了他与“中央文革小组”关系的始末，了解了他被打倒的真正原因。

陶铸调来北京，确实是邓小平提名，并得到主席的首肯的。我们是从小字报上才得知这件事的。小字报上登了主席的一段讲话，大意是：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给中央的，我说陶铸不老实，他说还可以。我不相信主席会说陶铸不老实，是否是将“不老成”误为“不老实”？于是写了封信给主席。主席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这三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横杠，并打上一个“？”。这封信后来退还给了我。

当时，几个秀才得势便猖狂，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大有抢班夺权之势。在这种形势下，小平推荐善长于实际工作的陶铸来京，用意是很深的。

起初“中央文革小组”对陶铸也还持欢迎态度，因为陶铸与少奇和小平仅仅是一般工作关系。再说陶铸敢放炮，这一直率的特点，可以日后借用来炮打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最初一段时期，“中央文革小组”对陶铸是采取拉拢的策略。

然而“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就对陶铸失望了。最早的分歧发生在派工作组问题上。陶铸刚赴北京上任没几天，六月九日就飞杭州去参加主席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少奇、小平等大多数主张派，主席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但陶铸说：

“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组织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

七月十八日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江青立即利用北京大学大字报事件向主席进谗言。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于六月一日贴

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后，北京大学的群众立即张贴出五百多张大字报响应，其中有四百多张是反对聂元梓的。后来又发展到有几千人围住他们辩论。

江青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事件。她对主席说："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到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我开始注意学校，例如南京大学匡亚明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他们是要革命的，可是他们竟被打成所谓的反革命。坚持派工作组的人把革命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且通报全国，以此镇压全国的革命师生，企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主席听了江青和陈伯达等人的汇报后，从六月二十日起连续召开了许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七月二十六日又召开了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八月五日，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再明显不过是针对少奇和小平的，公然提出了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错误观点。

陶铸刚调中央没几天，就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站到刘邓一边。但是真正令江青等人失望和不快的，还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次。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总理之后，陈伯达的前面，这就是所谓"第四号人物"的来历。

陶铸说：

"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伯达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主席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

生活会，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会前，江青私下找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

“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我没有遵照他们的意图打头阵，甚至从头到尾也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

看样子，“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意图是想拉拢陶铸，给他们当炮弹，去打少奇和小平。陶铸不仅没有打头炮，甚至连谢富治的发言都没准印简报（简报是发给大会看的）。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主席以党的会议形式，组织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全面围攻。尽管保留一些名义上的职务，但明眼人都看得清楚，刘、邓即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还仍然是国家主席，而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例如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要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同志说可做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的照片移补过来。

这就是后来哄动一时的，被“左”派所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而主席与少奇的那张，江青也子虚乌有地指责是陶铸拼接成的。

陶铸长期搞地方工作，对中央内部的情况很不了解，一般地说，他对中央负责同志都是很尊敬的，对少奇就更是如此。陶铸说：

“一九四二年，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

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的问题上，我觉得刘少奇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一九五三年，我对刘少奇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少奇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直到解决高饶事件的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找我谈了一次话，我承认了自己在高岗问题上犯有错误，同时也谈了对刘的意见。刘少奇听后，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了他看人可能有些偏。"

陶铸说："经过这次谈话，我对刘少奇的观感有所改变。以后刘少奇去广州，以及我来北京开会，接触就比较多起来，对刘少奇的好感也就渐渐增加了。我觉得刘少奇这个人，有意见可以提，尽管我在财经会议上放了炮，但是他不计前怨，还是找我谈心，待我不错，对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视和支持。尤其一九五九年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

至于陶铸与邓小平的关系，那就更好了。陶铸说："一九四九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我对邓小平的观感，确实是好的，在一九五四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陶铸与刘少奇和邓小平，虽然没有更深的历史和个人关系，但是在思想上是接近的，感情上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陶铸调中央后，始终不能遵照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意图，站到反刘邓立场上去的原因之一。相反地，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却总是与"中央文革小组"格格不入，以致最后"刘邓"变成了"刘、邓、陶"，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妇孺老幼，几乎

无人没喊过“打倒刘邓陶”的口号。

谢富治由于打头炮有功，顿时变成江青的宠信，成了“左”派头面人物。谢富治与陶铸都死于癌症，但谢富治去世的时候，一切都是超规格的隆重，甚至天安门降半旗致哀。

然而陶铸死后九年，人们才在一间凋敝的骨灰堂的角落里，找到了他的遗骨。

同是跟着主席征战几十年的人，结局却是如此的不同！

江青命令陶铸支持教育部和科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两个造反派，陶铸指出那两人有历史问题；江青说：“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声色俱厉地说“你也干涉得太多了”；江青大哭大闹；陶铸与周恩来商量让江青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江青说你们碰到鬼了

如果说在对待刘邓的问题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陷入很深的危机中的话，那么他们直接冲突的导火线则是在卢正义和吴传启的问题上。卢正义是教育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吴传启是科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陶铸掌握了很多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证明他们是心怀叵测和别有用心之人，并且有重大的历史问题。

但是江青极为赏识他们，一再催促陶铸去教育部和科学部，封他们二人为“革命左派”。陶铸不同意这样做，再三向江青说明真实情况，但是江青哪里肯听？最后，在卢正义问题上陶铸做了些让步，他去教育部讲了一次话，大意是对卢正义的大字报表示支持，但因卢有历史问题，仍然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并未按江青意图封卢为“革命左派”。在吴传启的问题上，双方则完全搞翻了。

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

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陶铸说。江青蛮横地打断他的话：

“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江青又傲慢地补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陶铸也火了，立即反唇相讥。

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让人受不了！有一次，我与总理商量：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于有个名义联系工作。谁知道江青听了气得要命，竟然说什么你们碰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可能她认为自己是主席夫人，又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很了不起了，应该列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了。国庆节，天安门检阅的排列名次，

是按历来传统安排的。我们党的传统，主席夫人是不能与主席并列检阅的。按着名次的排列，江青的位置在比较边远的地方，她心里很不满意，为此又责怪于我。”他指了指茶几上的报纸，轻蔑地说：“你看，这几天的报纸，照片上居然将江青与总理平列了，像什么样子！”

陶铸从来没有像这样推心置腹地向我谈论过他工作范畴内的事情，他实在压抑不住了，在这间孤寂的、与世隔绝的小屋内，他的一切痛苦、委屈、愤怒、迷惘只能向我倾诉。

他说：“曾志，你不知道，自从同江青吵了那次以后，我的日子好艰难哟，每次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戚本禹、姚文元、王力那帮人，总是对我冷嘲热讽，故意找岔子，出难题，穿小鞋，想方设法打击我。连我穿军装他们也要说风凉话，江青他们挖苦我：陶铸，你又不是解放军，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我说：我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为什么没资格？你们也穿军装，你们又是什么解放军？如果我穿便装去开会，他们又会讥笑：怎么？不敢当解放军了？真是盛气凌人！”

“又如纪念鲁迅诞辰八十六周年的活动，张春桥说召开百把人的纪念会就可以了，我照此办理，他们又指责我贬低鲁迅的革命影响，结果由他们自己主持召开了一个千人的纪念大会，他们这是故意刁难我。唉，谁会相信，我陶铸今天会受到如此的凌辱！现在我不得不顾全大局，如若是过去，说什么也容不得他们如此张狂。”

陶铸说：“自从吵了那次以后，我跟江青就彻底闹翻了。跟陈伯达的芥蒂，却是由来已久。我很清楚他的老底。早在一九三〇年，中央派他前往福建工作时，就表现出贪生怕死，临阵逃跑，我对他印象极坏，因此在延安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我公开表示反对选他，并且在小组会上谈了对他的看法，为此，他对我一直耿耿于怀。我来中央后，关系就更加恶化了。”

陶铸对共产党的天下不让共产党员当家百思不解；我和亮亮向他发牢骚，他吼道：你们为什么问我?我也想不通，你去报告主席吧，就说我陶铸想不通

从陶铸断断续续，有时甚至是不太情愿的倾吐中，我渐渐地明确到：他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决裂，并非是单纯的人事不和，或历史宿怨，而主要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所产生的观点与思想上的深刻分歧。根据我的记忆将这些分歧大致归纳如下：

一、关于派工作组和暂停各级党组织领导，改由各级“文革小组”行使权力的问题。陶铸几乎一进京就本能地站到少奇和小平一边。他对共产党的天下却不让共产党员当家的怪现象百思不解，异常痛苦。记得有一次我和女儿向他发牢骚，对“文化大革命”取消党的领导表示不满。起先他一声不吭，皱着眉，急速地在室内踱来踱去，突然，他停了下来，爆发出一股怒气，几乎是吼道：“你们为什么问我？这样子搞法又不是我决定的，我也想不通，你去报告主席吧，就说我陶铸想不通！”

接着又冲出一句：“你们若是怕我犯错误，现在就划清界线好了！”

当时，我只是觉得他脾气发得莫名其妙，话也说得莫名其妙，现在我才理解，他的愤怒来自于他的无法排解的困扰和痛苦。

二、在农村和城市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也是大相径庭的。“十六条”是在总理主持下，搞的一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性的文件，实际上对“文化大革命”起了一定限制作用。“十六条”明文规定农村和城市中的企业不搞“四大”，不进行串联。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惟恐中国不乱，他们在平谷县搞“大民主试点”，并写了一

份调查报告，江青在报告上批示：此材料很好。

陶铸看后认为，这一套绝不能推广，因此扣压下来未予转发。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高压和操纵下，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又发了一份《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草案第七条写道：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队与队、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空闲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

对这份草案，陶铸已失去过问的权力，除了痛心之外，他无能为力。此后，中国朴实憨厚的农民们，也赶时髦似地搞起“造反”来，保定地区两派农民之间的自相残杀，不是至今使人们记忆犹新吗！

三、陶铸长期从事实际和具体工作，对革命和生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切身的体会。经历过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九年期间一系列诸如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三面红旗”、反“右倾”和“彭黄反党集团”等频繁的运动后，谁人不深感其害，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搞怕了，全省的粮库竟到了粒米不存的地步。他怕重蹈覆辙，因此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论和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但是遭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非难，说这种提法实际上是以生产压革命，是搞经济主义。

陶铸说：“‘中央文革小组’背地里动员中学教员和各地文艺戏剧人员来京上访控告，中央三令五申通知他们不要来，可是他们还是大批大批地来，他们一来就向我要吃要住要生产费。‘中央文革小组’又反过来指责我搞经济主义，真是难得很呐！”

四、在对待两派群众和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是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分歧的一个很直接的触发点。陶铸的观点，认为两

派组织都是革命群众，只是在思想认识上程度不同，因此他一直热心地做两派群众的团结工作，极力促成两派组织的联合。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绝对地支持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致酿成大规模的武斗，造成群众无谓的伤亡。当时的造反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宠儿，江青称红卫兵为“小太阳”，林彪武断地说革命造反是合理的。王力则说得更加肉麻：“外交部的一个收发员都可以当外交部长，只要他是造反派。”

而陶铸与大多数老同志一样，对造反派是不赞成和看不惯的。有一天，他晚上回来，阴郁地对我说：

“造反派抓了十几个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同志，就蹲在中南海墙根下，这么晚了，又这么冷。”说到这里，他眼圈红了。从他对待“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和大造反派吴传启和卢正义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窥见他那种极为伤感的情绪。

五、陶铸被称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我认为这真是一种荣誉。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党政负责同志都受到冲击批斗，游街、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受尽了折磨和凌辱，他们跟陶铸都较熟，更主要的是息息相关，对这些被揪来北京的负责同志，陶铸的做法是：第一步向造反派交涉，把他们先弄出来，安排到招待所住。也就是先保下来，然后再进一步“解放”、任用。可惜，这仅仅是他的一个愿望，当他自己倒下以后，凡受过他不同程度保护的同志，均变本加厉地受到迫害。他难过地说：

“我虽不曾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啊！”

陆定一被打倒以后，陶铸曾有指示：生活待遇不变，搬家后一定要安排沙发。当陶铸也被打倒后，一天，陆定一专案组来了十几个人，一进屋就将陶铸身上戴的毛主席像章扯掉，要他低头弯腰向毛主席请罪，原因是为什么他主持的陆定一的专案几个月都搞不出名堂来，而谢富治一接手，马上就有了重大突破？为什

么要从政治和生活上包庇陆定一？

十月十九日，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林彪在会上讲话：“这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是两头劲足（即中央领导和群众），中间劲头不足，甚至还有点顶牛。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陶铸曾说：“我同全国各省市部委负责同志一样，对于这场运动，的的确确很不理解。”直到他被打倒以后，他才搞清楚，原来这场运动是对着刘邓来的。但他执拗地表白：

“江青、陈伯达的那些观点、那些做法，我认为不对，我不能跟着他们转，我按照我的理解和我的原则去干。”

当“中央文革小组”以各种莫须有罪名围攻他时，他凛然地宣布：

“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们家被停送文件，拆掉红电话机；“七二〇”事件后，造反派抄了我的家；借口有人往春藕斋墙上爬，将“卍”字廊变成牢房；一九六八年三月，警卫人员对陶铸已是片刻不离；面对精神折磨，陶铸写诗明志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以后，除了丧失自由之外，其他一切如常。但元月二十日左右，往后停止了送文件，并派驻了四个警卫。又过一个来月，将红电话机拆掉了，电灯线也改为三十六伏的低电压。陶铸每天在警卫的押送下去西门看大字报，除了中南海内的造反派随时批斗外，其他单位的造反派代表也进来批斗，有时在家里，有时拉到小礼堂去。最初的半年就这样过去了。

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第二天，中南海墙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又高喊打倒陶铸，说陶铸是“七二〇”事件的总后台，这正是

那个时代造反派的特征——指鹿为马，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真让人啼笑皆非。晚饭后，我与陶铸正在猜疑何谓“七二〇”事件，突然拥来了一批人，把陶铸双手往背后一扭就走了，连外套都没有让他穿。同来的几位女同志，稍后一些也将我拉走。深夜，我和陶铸陆续回来，见到家已被抄过，文件、笔记本、书信和相片等物统统被抄走，箱子被撬开，柜门被砸开，房子里乱得一塌糊涂。

陶铸似乎已精疲力尽，冷漠地看着家里的情景，一句话也不说。

我们房子的隔壁是春藕斋，主席经常在那儿活动，陶铸厕所的窗子，正对着春藕斋的墙。一天晚上，三点来钟的样子，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声，是警卫在报告，说发现什么人往墙上爬。第二天又有几个警卫队的负责人来察看，我问陶铸的警卫秘书曾云，究竟是怎么回事？曾云说：“不晓得他们搞什么名堂，哪来的人爬墙。”我太天真了，我说是猫，我好几次看见猫在墙上来回走。我还让曾云将此情况反映上去，曾云没有理我。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什么有人爬墙！完全是在制造事端，借口这件事，将警卫由四人增加到十几人。把陶铸厕所的窗子钉死，窗子封死，玻璃上涂满墨汁。又在陶铸的卧室里，对准他的枕头，安装了一个耀眼的灯泡，白炽的光线直射到他的脸上，使他彻夜不得安眠。将一直比较关心和照顾我们的曾云也调走了，连去西门看大字报的一点点呼吸自由空气的机会也取消了，“卍”字廊完全变成了一座牢房。

警卫人员对陶铸的态度也越来越坏，动辄瞋目裂眦，恶声呵斥。每天三餐饭，他们列队从我们房门走过，故意放声唱辱骂陶铸的歌，什么“反革命犯陶铸，砸烂他，打倒他……”有时，站在床头的警卫，整夜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成心搅得陶铸无法入睡。陶铸苦恼极了，实在忍无可忍时，也会同他们吵起来，他们

骂陶铸是混蛋、毒蛇，是国民党叛徒和特务，陶铸轻蔑地说：

“你们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干革命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生下呢，如果我是国民党，你们岂不成了国民党的儿子和孙子了吗！”

当然，这种争吵是不会有好结局的。“播罢‘红灯’、‘海港’时，窗灯射目壁如灰。梦魂欲觅终难觅，怕听钟声鹊噪枝。”从这首小诗中，我们可以想像出他当时的情景。

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底，对陶铸的看管又第三次升级，警卫人员增加到两个班，在屋里设了三个岗位。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像影子似的紧紧盯在陶铸身边，写字时站在椅子后，睡觉时站在床头，吃饭时站桌边，上厕所时站在面前，我俩说话时也是贴身而站。

这是江青一伙设计的一种精神酷刑，它使你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盯视之下，真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比五花大绑，更使人感到紧张、沉重和痛苦，神经稍微脆弱的人，非精神失常或自杀不可。

然而，陶铸对这种精神折磨却处之泰然，他以超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宁和坦然的心境。在看守的眼皮底下，他竟然能够旁若无人、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事情。

为明心志，陶铸用毛笔写了一纸，端端正正的摆在桌上：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陶铸每天都用大量的时间拚命读书，除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外，对历史书籍和唐诗宋词也很有兴趣，但是最心爱的还是那部

《名臣录》，他每每以那些古代的直节忠臣而自比。在一首诗里，他写道：

卍字廊前花木森，
风送芬芳入杳冥。
静坐偶欣惟蝶舞，
夜眠深苦是蚊鸣。
汉家狱辱因何怨，
宋室廷刑岳慨承。
人世烦冤终不免，
求仁奚用为身名！

陶铸还酷爱书法。书看累了，就提起毛笔练字，以陶冶和安抚性情。没有宣纸，就用旧报纸来代替。两年多的时间，他将家里的新旧报纸都写光了，摞起来足有两米高。一九六九年他被遣送到合肥后，我打扫北京家里房间，望着这堆报纸，好一阵酸楚袭上心头，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陶铸了！我随便从中抽出几张来，留作永久的纪念，其余的付之一炬。

一九七〇年，陶铸去世后，有一天女儿整理他的遗物，顺便翻了翻我留下的这几张报纸，意外地发现，在许多旧诗词当中，竟夹着他自己的诗和词，我没能把绝大多数报纸带出来，真是痛悔莫及。

正是凭着这样的机智，他才得以在看守的紧盯之下，用诗词抒发了自己的满腔悲愤、刚直的气节和磊落的襟怀。除了以上引用过的几首外，还有一些寓意很深的诗，如：

料峭风寒花独开，
孤芳心事费疑猜。

成尘我爱香如故，
妒忌无端究可哀。
独自沉吟独自宽，
熬膏煎血又年年。
每忆莫愁湖畔月，
头颅惨白不成妍。

批斗会以后，陶铸双眼喷火，高声说“要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拼了”；发现陶铸生癌，周恩来组织了第一流的专家参加医疗小组；陶铸凭信念活着，痛得死去活来，也不哼一声；汪东兴的一番话，如同五雷轰顶

一九六八年八月，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人的“批斗刘邓陶大会”，为了互相响应，在中南海分三个场子，分别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斗陶铸的有三百多人，我被拉去陪斗。我看见有几个人把陶铸的脑袋使劲往下按，把他的双手反剪着，陶铸则进行着反抗，拚命把头昂起来，于是几个人围上去对准他一阵拳打脚踢，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鸡蛋大的肿包。为了拍实况纪录片，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

我俩心碎神疲地回到家中。正在家中养病的女儿，两眼红肿，颊上还挂着泪痕，端着盆热水走过来，想让我们泡泡那双站得浮肿酸痛的脚。女儿发现了父亲额上的血肿包，扑上去想给揉揉，陶铸一把推开她，脸色惨白，双眼喷火，高声说道：“如果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拚了。”

我那时病痛交加，瘦得只剩下六十多斤，经过这场野蛮批斗以后，更显得虚弱不堪。陶铸悲愤交集，指着我对看守说：

“你们为什么斗她？难道这个样子斗我还不够吗？她是个病

人呀！”说到这里，两行老泪顺着他憔悴的面颊缓缓流下。

一九六八年国庆节前后，陶铸突然说头晕，眼花，想呕吐，但无人过问。拖到一九六九年元月，又出现胃部不适和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毫无食欲，请来医生看看，也只是随便给点胃药和去痛片，病情仍然不见好转。到了三月份，陶铸的眼睛和皮肤变黄，我央告医生，仍然不予理睬。直到三月中旬，才来了位医生，检查腹部，发现右上腹有一个馒头大包块。草草诊断为肝炎，便将陶铸送进三〇二医院传染病房。入院后检查，才搞清不是肝炎，是胆囊部位的癌症，需要立即动手术。

病情上报给总理后，总理批示要积极治疗，并指定上海第一医院的董芳宗主任主刀，三〇一医院的陆惟善主任做第一助手，阜外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负责麻醉，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吴杰也参加医疗小组。这个阵容，确实是国内第一流的，体现了总理对陶铸的关怀。

陶铸又被从三〇二医院转到三〇一医院的外科。他们将陶铸病房的窗户用木条钉死，下面的两块玻璃用报纸糊上，四个警卫轮流在门口监视着，哪里还像什么病房，十足的牢笼！

动手术需经家属和本人签字，他们怕陶铸不同意，动员我去做说服工作。哪知医生刚说明意图，他二话没说就签字了。我们当时没敢告诉他是癌症，只说是胆管堵塞，需要做胆囊切除术。

但是陶铸心里很清楚，只是没有道破罢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去追究自己的病，只是有一次，他实在疼痛得太厉害了，才脱口说了一句：“没想到癌这么痛！”

我给汪东兴写了封信，要求允许我每天去医院看护，但是直到手术后第三天的下午，才让我去探视。陆主任向我介绍了手术的情况，他说给陶铸做的是胰腺癌根治术，是普通外科最大的手术，手术进行了八个多小时，除了切掉胰头的癌瘤外，还切除了胆囊和十二指肠，胃切掉三分之二；大网膜去掉了四分之一。

在白罩单的映照下，陶铸显得格外瘦削萎黄，两个鼻孔、伤口及手臂上，全都插着管子。但是他很平静，脑子也很清楚，见我来，用眼神和手势向我示意：一切都顺利，请放心。

但是手术后第四天，病情却急转直下。由于严重的肠胀气，将手术切口撑裂，大量的腹水向外流淌。医生用吸引器不停地抽吸胃肠液及胆汁，每天要抽出四千毫升又黑又腥的液体。随后陶铸又并发了可怕的肺炎和胸膜炎，持续高烧，神志模糊，生命垂危。

我去看他时，见他正处于昏睡状态，我连声唤他，好不容易才睁开眼睛，见到是我，便喃喃地说："曾志，看来我过不去了。亮亮，你要好好照顾亮亮……"还想再说什么，一阵膈肌痉挛，打呃不停，随即寒战高烧，又昏迷过去。

谢天谢地，危险期总算度了过去。在医院住了两个来月，他恢复得很快，回到家来，能在走廊散步一个小时，看书习字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一九六九年九月下旬，陶铸又感到腹内阵阵疼痛，发低烧，脉搏微弱，医生诊断是癌肿扩散，已无法治疗，只有用止痛剂和麻醉药来减轻痛苦。

我至今想起他那副痛苦的样子，仍觉心中酸楚，那是言语难以形容，常人难以想像的精神加肉体的双重疼痛。他常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吃点流质，虚弱得连大便的气力都没有，需要我用手去抠。

陶铸以惊人的毅力向病魔挑战，任凭痛得死去活来，也咬紧牙关绝不哼一声。我劝他："忍不住你就哼几声吧，也许会好一些。"他说："你已经够苦了，听到我哼，会更难受……"此时的他，与其说凭肉体活着，不如说是凭信念、凭意志活着。

对陶铸悲惨命运的最后一击，终于降临了。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早上七点钟，汪东兴派人来叫我去，

对我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

我如同五雷轰顶，勉强自持，问道："什么时候走？"

"明天。"

"明天不行，陶铸病得很重，至多也只能活两三个月，我要为他准备一下。"

"那就十八号！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一百元生活费，生活自理。"

我回去后，将汪东兴的话如实相告，陶铸沉思良久，然后毅然决然地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你要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第二天，中直政治部王良恩主任来谈话，陶铸躺在床上平静地说："好吧，我同意离开北京。"王良恩又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陶铸冷冷地说：

"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

此生此世，我们在一起只有三天的时间了，我强压悲痛，为他收拾行装。他考虑得很周到，请我帮他装了一箱子的书；要我买一双雨鞋和一把伞，因为很可能要到室外上厕所；还要再准备一床薄被里，以便自己换洗。

我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替他洗个澡，我估计去合肥后，是不会有人为他洗澡的。我把水放好，再把他扶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躺在澡盆里，慢慢地为他擦洗，我望着他骨瘦如柴的身躯，灰暗的面容，心中无限的凄凉。我问他还有什么话交代，他说：

"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把小亮带大。"

他要了亮亮、外孙小亮和我的小照片，包好后放在内衣口袋里。他说相片在我怀里，就好似你们时刻都在我身边。我说你一定要力争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生离死别的三天，我们就这样互相勉励安慰着，没有说一句凄切的话，更没有掉一滴泪。

十八日这一天，无情的分别到了，我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他送行。由于他肠道已经梗阻，所以吃了足足有一个小时。他说若不是为了你，我是什么也吃不下的。

上路的时间到了，护士替他打了一针杜冷丁，顿时就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他将毛衣、棉衣、大衣都穿在身上，但仍然感到冷。我曾要求送他去机场，没有获准，只好在家门口送行。

陶铸拄着手杖，镇定自若，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出家门，踏上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

我们微笑着握手，郑重地道再见；我为他打开车门，两人再次地握手；车开走了，我们依然互相挥手，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

一周后，我也搬出了这所留给我无限思念、无限苦痛和无限空虚的家。

我知道陶铸将不久于人世，他将凄凉而孤单地走完这人生的最后一程，但他情愿牺牲自己，来换得我一个自由。我现在反而无法想像，当时我们的诀别会是那样的冷静，那样的从容，那样的坚强!我们微笑着做了这一生一世的最后告别，彼此都没有流泪，因为泪水已无法表达我们那种渗透骨髓的痛苦和依恋。

十一月三十日，陶铸在合肥悄然病逝。

那些人假借烈性传染病，深更半夜以白单裹尸一烧了之。死

前不许我们去，死后也不准去料理后事。从我们分别到他逝世，只有四十三天时间。

他满含冤愤悲怆，连同他未竟的事业，以及弥留之际未能与亲人诀别的遗憾，孤单单、凄凉凉地去了。

陶铸从一九六六年六月走马上任，到一九六九年十月抱病离京，我俩相依为命在“卍”字廊生活了三年多。我补偿了以往由于工作繁忙，或者说是个性好强，而被忽略了的妻子的义务；作为报答，陶铸赠我一首诗，是用钢笔写在一片小纸上的。我小心翼翼地将它卷起，用塑料纸包紧，缝在棉衣里。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了，我才把它拆出来，公之于世，立即受到群众的喜爱，并被广为传颂。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
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
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
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
心底无私天地宽。

如今陶铸已经去世三十个春秋，然而那些如烟的往事却时时飘荡在我的眼前、我的心房里。透过岁月的风尘，我永远能见到一张面容，而且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生动、那样的亲切。我不时觉得，陶铸也许根本没有离开过我们，仍然活在一切爱他、敬他、理解他和同情他的人们的心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当然不可能见到毛主席，但我比许多人都幸运，因为我得到他的关照与保护。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广州植物园陶铸石像落成

一九六七年元月，陶铸被打倒后，我写信给毛主席，“我怎么办呀?我是请假来养病的，组织关系、工资和供给关系都在广东，现在陶铸倒了，我若回广州，像我这样的身体，体重才六十七斤，能经得起革命造反派的审查批斗吗?但我在这里，什么关系也没有，中南海的造反组织要赶我走又怎么办呢?”毛主席在我的信上批道：“曾志同志，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帮助陶铸同志做检查。你的党组织关系，去找东兴同志。”批件送到汪东兴同志那里，东兴阅后派秘书送给了我。不久，中南海的造反派抄家，将这封信也给抄走了。

转眼到了四月份，我又开始感到惴惴不安，于是又给毛主席写了信：我若再不回去，人家会以为我逃避审查批斗，但回去又怕身体吃不消。特请示主席，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但这次毛主席没有回复。事隔两年后，从汪东兴那里了解到，毛主席

看了我的信后，曾与总理商量："你看曾志要回去，连黄永胜他们都不能立足了，都跑到北京来了，曾志能够回去吗?算了，不要回去了。"

由于毛主席的保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才免受皮肉之苦和人身的摧残，只是有一回，中南海造反派分片批斗"刘、邓、陶"，强行拉我去陪斗。在批斗场上，造反派揪住我，要我低头弯腰，这时有人示意他们不要动我，让这批莽汉退了下去。我知道，这都是由于毛主席的缘故，如果没有他的保护，在那么恐怖的批斗大会上，我是必死无疑了。

第十四章　监管插队

中央批准我到粤北插队劳动，属军队管制；在翁源县渔溪大队邱屋生产队找到一间房；保卫科长无情地说：你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不拿工分，给你一个粮油供应证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我从被禁锢的中南海搬出来暂住在地安门招待所，有关部门在那里给我安排了一套间，处境有所好转，行动也比较自由。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看望外孙小亮，过了几天就接到通知，领导批准我到广东粤北插队劳动，并经批准，临行之前，我打电报要在甘肃临夏的女儿斯亮以及东北辽阳军工厂的儿子春华来京相见。

不久斯亮和春华都先后来京，小亮和她爸爸也搬来同住，我和小亮睡在床上，斯亮夫妇睡在客厅地下。三年来各自西东，对亲人无限的思念只能埋在心底，意想不到能在此相聚，暂时得到了家庭欢乐，给了我破碎的心灵一丝慰藉。我们都很珍惜，每天拿点鱼肉，在洗手间用煤油炉子煮了吃，格外香甜。

大约十一月中旬，中央办公厅为我们买好了去广州的火车票，居然是软卧。此时外孙小亮已一岁零一个月了，作为陶铸的外孙，群众不敢抚养，而机关托儿所因为“一号命令”，大都解散，小亮的去处成了一个问题。后经批准，领导允许我带小亮去



一九六九年出中南海赴翁源前与曾春华全家在一起。

州插队。女儿女婿一路送行。

到了广州，我们就住在军区原来专家住的招待所，那里已住着几个黑人外宾。因我被派去插队，属军队管制，上面下令不准与广州市任何人联系，要保密，连出大门都不准。可是晚饭后，我们还是悄悄到附近街上闲逛。

招待所就坐落在越秀山脚下，街道上行人稀少，商店的货柜上空空如也，几乎没有什么卖的。这与原来广州市水果很多形成鲜明对比。现在摊子上除了几串香蕉外，其他什么都没有，蔬菜、鸡鸭鱼肉的数量也少得可怜……

一个繁华的都市突然间萧条得让人吃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破坏似乎随处可见，看了让人痛心。

我要去插队的地方在粤北翁源县渔溪大队，那是一二六师所在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初早上八点，由广州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带队，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拉着我全家及行李，往渔溪大队前进。

车过丛林，沿途都是山路，越往里走，山越陡，路越弯曲，

颠簸不已，弄得我晕头转向，在途中就呕吐了两次。据说离目的地只有三百里，可是走了九个多小时，差不多下午五点多钟才到达那里。

在师部招待所门口迎接我的是参谋长和保卫科科长，他们虽然知道陶铸已被打倒，但对陶铸的崇敬之情犹在。参谋长怀念地说，一见到我，就想起陶铸，说军区的一些建筑，遇到困难都是陶政委帮助解决的，陶政委如何平易近人，对待同志如何热忱等等。

我相信他的话是发自内心的，公道自在人心，不管在多么禁锢的年代，人性毕竟不会都泯灭。

这个招待所建在小山坡上，有七栋小洋楼，是师领导的住处，师长、政委、参谋长等各占一栋，每栋洋楼约六至八间房，陈设都比较讲究。用作招待客人的房子也是一栋洋楼，有八九间房子，不管单人间还是双人间都很清洁，单间尤其华丽。我一下车，参谋长就热情有加地接待，扶我进最好的房间。晚饭让我同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同吃，四菜一汤，鱼肉齐全。这种照顾让我感到了一丝温暖。

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天起来，情况迥然相异，让我搬到最次等的房间，比我女儿夫妇住的还差。并且须自己到大食堂打饭菜。保卫科科长态度也变得冷酷无情，前后判若两人，说话带命令的口吻。参谋长也不见了踪影，我估计是保卫部副部长狠狠地批评了他。

经过许多变故，我对人情冷暖已习以为常了，所以面对这一切我心里并不怎么难受。

一二六师师部所在地坐落在山落里，四面都是高山，到韶关乌石火车站乘公共汽车要翻山越岭六十多里路，去韶关约两百多里，到集镇要步行十二里。村少人稀，几十年来住的大都是军队里的人。在一二六师范围，方圆五六十里内，知道我真实情况的只有师长、政委、参谋长和保卫科科长，其他无论军队干部还是地

方群众都只知道我是北京下放的干部，也是惟一的。

即使是最次等的房间，我在师部招待所也住不长久，保卫科科长以及从广州送我来此的那位保卫干事一直在附近几个村庄生产队为我插队找房子。也许因为住房都很紧，找了几个地方，都没办法为我腾出一间房子来。后来在离师部约三里的邱屋生产队找到了一处。那家有五口人，五间房，因为大女儿出嫁了，儿子尚未娶媳妇，可以让出一间来，于是决定让我到邱屋插队。

行前，女儿女婿及两名护士，去邱屋帮助打扫房子。女儿回来皱着眉头说：

"那间房子可不是人住的，到处是蜘蛛网，蜘蛛脚张开来有饭碗大，怪吓人的！"

战士搬来了可铺一张双人床的两扇床板和长凳子，抬来一个有两个抽屉的小桌子、两个凳子。我们做着到邱屋生活的准备，考虑到外孙才一岁零两个月，要煮奶粉、做稀饭，我们抱着小亮到十二里外的新江镇买了木炭炉子、锅、碗、脸盆、暖壶等物。

保卫科科长面无表情地对我说："你的组织关系由师党委负责，但是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不拿工分，给你一个粮油供应证，每月三十斤粮，一斤油，你的工资恢复了，每月由我负责送给你！"

为了便于到邱屋参加劳动，我以每月二十五元工资雇了一名老阿婆带外孙。这样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大概到师部的第三或第四天上午，在师部门前，我与马上要随转广州的女儿女婿伤感地告别；随后背着外孙，跟随两名抬行李的战士往邱屋而去。

邱屋二十一户人家，一百一十口人，只有六十亩薄田，全村人一年四季三餐都吃稀粥；我把二十六斤米和一斤油全交给房东，每顿只吃两半碗稀饭；我一口气吃过五块热豆腐

一进邱屋，出乎意料。村里的老老少少都热情地与我打招呼，尤其看到在城里长得白嫩白嫩的外孙小亮，不认生，见人就笑，觉得很可爱。那个雇来的阿婆接过小亮，大家一起逗着他玩开了。

我抽身走进房子，环顾四周，泥土夯的四面墙壁如同黑炭窑，连楼板都没有，只有几根梁柱。抬头看看屋顶，稀稀拉拉从瓦缝中透进些光线。前后各开着两扇只有一尺半大的小方形窗户。后窗户外面是块小坡地，是房东的菜园。窗户下面是一条水沟，沟与房子的地面一样高，墙角还有几个鼠洞。如果下雨，沟里的水一定会漫进来。近十平方米的泥土地面潮湿得像泥浆，放置一张床及小桌子后，大约什么也放不下了。

随身携带的四个樟木箱子根本没有地方放。没办法，我只好请求保卫科科长把四个箱子搬到离邱屋约一里地的连队附近一间无人居住的空房子里。那里军队营房宽大，水泥地，较干燥，比我的住处要好几倍，放在那里我也比较放心，这样总算安顿下来了。



调皮滑稽的小亮陪伴姥姥在邱屋度过艰难的日子。

“你住的这间房，原来是喂猪的，后来关牛，再后来做了许多年的灶房，所以四面墙都熏得黑乎乎的，这两年有时也住人！”房主对我说了这间房的历史，令我感慨良多。

原来邱屋是一个大院，正门有两个不住人的大厅，两边的旁门进来有一条长的小天

井，周围都是住房，也许邱屋由此而得名。

一进大门，上下两个大厅的四个角都是厨房。邱屋人管厨房叫厅。我们房东在大厅的一角做饭。我刚到邱屋，房东说："请在厅里坐！"结果是把我带到锅灶旁，拿出两张矮竹凳子。这才知道所谓厅，就是厨房。他们的灶很简单，用六大块泥土砖搭成三角形，每面两块砖。做饭用的是可装三十多斤水的大铁桶。炒菜锅十分大，煮猪食的尤甚。他们煮饭炒菜煮猪食烧的是木柴，有时把碗口粗的木头也砍下来，实在可惜。由于广东地区阴雨天多，木柴湿，烧起来满屋冒烟，目不见人，呛得眼泪、鼻涕直流，如果用樟木烧火，则香气四溢，非常好闻。

邱屋共二十一户约一百一十人，其中精神分裂症者一人，癫痫症者一人，严重肺病者一人，傻子一人。

贫穷的邱屋人只有六十亩薄田，人均六分多土地，全队只有三头瘦牛，不久累死一头，只剩下两头，没钱买化肥，土杂肥也很少。牛少，牛圈里挖出来的肥，草多，肥效很低。粮食产量两季稻合起来每亩最多五百来斤，每月人均口粮二十九斤谷子，一年差两三个月的口粮。油是用油菜籽榨的，收成好时，每家每年可分到八九斤菜籽油，煮菜放的油极少。每户的菜籽油平时都舍不得吃，留着过年炸油果子，每家每户都把一年所喂养的猪、鸡、鸭以及生产的糯米都集中在那几天食用、走亲戚、招待客人。二十一户人家，除了我的房主和另一家，因做手工业，人多肯干，才勉强够吃，其他人家的生活都很困难。

这里的农民们实在太穷太苦了，全村人三餐都吃稀粥。就拿我的房东来说，全家加上我共六口人，每顿量约七两米的一竹筒米煮一大锅稀饭，看不见米粒，也不像稀饭，一勺喂狗，装几勺汤拌粗粮喂鸡鸭，有时候还要装一点拌猪食，剩下的就只是不多的饭渣子了。每年缺粮两三个月，到了四五六月份青黄不接时，

人也越来越瘦。大部分人饿得皮包骨，胃部陷下一个洞，似乎可以放进去一个小酒杯。饿得实在发昏，农民们就去捞连队在溪水里洗菜扔掉的烂菜叶、老蒜皮和菜根，一旦发现连队在半夜偷偷埋掉的死猪死马，哪怕已经腐烂也要挖出来，分给大家吃掉，他们也吃被黄鼠狼咬死在稻田里长满了蛆的鸡。他们被饥饿困扰着，也顾不上生病和死亡。

说也奇怪，一些农民吃了这腐烂的带病毒的东西，竟不会中毒和生病，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我虽然吃商品粮，每月定量供应，每月除留足四斤给小外孙外，把二十六斤米和一斤油全都交给房东，但我想到其他人的劳动强度比我大，不敢多吃，每顿只吃两个大半碗稀饭。一般都是八点钟吃完早饭，不到十点钟，肚子就饿得发慌。我过去在部队打游击时也挨过饿，但那最多两三天时间，而在邱屋则是成年累月持续着。那时我觉得，若能吃到干饭，不要任何菜，都比在城里吃摆满山珍海味的宴席香甜得多。

记得有一次，我背着小亮走到四里外的师部，看到一个杀猪兼磨豆腐的摊子，我请求师傅卖二两瘦肉给小亮做稀饭吃。那个师傅知道师部保卫科科长到过我那里，也陪我买过两次肉，他总算同意我的请求，卖给了我二两瘦肉，多买则不行，我看到豆腐刚出笼，还热气腾腾的，又请求他卖了五块。这时已是上午十点多钟了，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我拿起豆腐就往嘴里塞，真是美味可口极了，边走边吃，一下子把五块豆腐吃个精光，那种滋味至今仍留在脑海里。

邱屋的农村景象给人展现出了当时农村一幅凄惨的画面，令人触目惊心，反映了当时农村政策的破坏性，体现了当时农村生产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那时农村实行军管，军管战士掌管一切，但什么都不懂，只凭上级指挥办事，什么事都千篇一律，毫不顾及农村各队的实际情况，瞎指挥，群众怨恨极了。

我刚到邱屋时，生产队没有派战士军管，农民群众还可以搞点副业，如上山采野果、竹笋或用竹子编织箩筐等拿到新江集镇上去卖，换钱买油买针线，可以在田头房角的边角地上种些蔬菜自己吃，这样农民的手头会活络些。军管以后，到新江镇的路口有人把守，竹笋、竹筐、竹篓一律不许出卖，违者一律没收。弄得群众一贫如洗，粮食不够吃，副业不让搞，养猪用野菜喂，一年也长不到一百斤,养鸡不断遭鸡瘟,死得多,活得少。

更荒唐的是，军管战士把犁田、播种、收割的时间都规定得死死的。有一年冬天，油菜还差几天才能收割，而各村军管的人勒令一天之内一律拔掉，五天之内全部犁完田。各村的农民被逼无奈一边拔油菜一边痛哭流涕。他们能不心痛吗？要知道油菜可是他们的油源，一旦油菜不成熟，根本榨不出油来，整年就分不到一滴油了。

只有邱屋例外，这个小小的生产队也派来了四个刚参军的战士，眼见不妙，我想办法说服了四位军管战士，向他们保证，五天后全村的田全部犁完，请他们不要向上级报告。为了万无一失，我又同村民打招呼：

“全村劳力要齐心协力，人可以轮流干，牛一定要早几天派专人饲养喂足，以便日夜劳动。如果大家同意就这样干，油菜保证榨出油来，家家有油吃，如果不同意就算了！”

因为关系到全村人自身的生计，大家都很赞成这种做法。我又找生产队长、组长、老农们谈了自己的想法：

“过三四天油菜籽就成熟了，等到第四天全村老少出动拔油菜，边拔边犁田，用两个通宵一个白天保证可以干完。”

他们都认为可行。到了预订时间，全村人们都行动起来，热情高涨，轰轰烈烈干了两天一夜，保住了油菜籽。

邱屋的农业资源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气候适宜，各种作物决不会冻死。水利条件也不错，村边有一条长年不断流的溪，落差

也很大。邱屋人把竹子破成两半，把溪水引进门前，就像用自来水一样方便。这股水比冰雪还凉，即使夏天也一样。村里人平时做饭、洗衣、冲凉都用它。如果用来发电，可建一座上百千瓦的小水电站。有了电，就可以办些加工厂，几十亩的荒地、旱地也可以变水田了，农民的粮食可增加一倍，至少口粮是够吃了。

可是由于军管太死，事事都由大队军代表根据上级指示，把农业生产也像军队那样军事化，农民们没有一点搞生产的自由天地。如养鸡、养鸭的人家每户每年平均要上缴五只，鸡鸭蛋若干个，若养猪每年要上缴一头一百斤以上的猪。杀猪一律要到屠宰场去，一百斤猪肉，倒有六十斤要按平价卖给国家，剩下的才能自行处理。所以条件虽好，农民却过不上好日子。

我看到这些情况非常痛心，曾向一位副营级大队军代表反映多次，可是他根本听不进去。

这些也是“文化大革命”以及“四人帮”给农村造成的穷困灾难，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农民早上八点钟出工，十一点半收工，下午三点出工，五点半收工，每天出工约六个小时，但大家都磨洋工，实际上劳动时间不足三个小时。邱屋生产队一个劳动力平均日值三四角钱，劳动力少或是遇上病灾的户，劳动一年不但没有分文收入，还倒欠生产队的口粮钱。这种情况怎么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呢？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这种情况，老百姓怎么会吃得饱穿得暖呢？

而冬天地处粤北山区的邱屋也相当寒冷，寒流降临，气温都在零度上下，可是全村人都没有棉衣，只能穿一件卫生衣，一条单裤。生活好点的，一年也仅做一套新衣服，尤其是一些儿童穿着破成一条条的衣服，再冷也赤着脚，冻得皮肉发紫，黄鼻涕直流。村里的少年儿童没有几个，病的不少，有的患过脑膜炎，有的患过骨髓炎、肺炎等。有个四十九岁的妇女，生了十五胎，只活了六个，有生下来一岁死的，也有两三个月死的。年年生，年

年死。那里的人对生死已看惯了,孩子一死,不声不响装在粪筐里埋掉了事,好像毫不在乎。但队里规定,孩子一死,每月二十九斤谷子的口粮要收回去,这倒更令那些失子者感到可惜。

邱屋的妇女更愁苦,那里的农村有个传统,凡强劳动都是由妇女来做,男人反倒干轻松活,比如干犁田或挑秧等技术活、轻活。如果是挑大粪,清除牛栏、猪栏里的粪肥等这些脏活让男人做,妻子则会被认为不贤慧、不能干。

这些风俗和北方以及我们湖南家乡完全不同,北方的妇女是只干家务活,不干农活的。而邱屋的妇女不仅要抚养儿女,干喂猪喂鸭等沉重的家务活,而且还要出工种地、上山砍柴等。她们往往天不亮就起床到几十里外的山上砍柴。砍完柴赶回来做早饭以及饲养家禽,八点多钟出工参加队里劳动,十一点钟回来做完饭又要上山砍柴,下午两点多钟又出工,五点收工,做晚饭煮猪食,饭后替孩子们洗洗补补,差不多要忙到八点多钟。日复一日,整天连轴转。妇女劳动强度大,报酬却比男人低,男人满分是十分,女人只有八分,一些老弱的男人,干活比女人差,也可以得八分。这明显是同工不同酬。

妇女的生活待遇很低,她们平日从早到晚都赤脚,只在出门走亲戚或上集镇时才穿鞋,但从不穿袜子。因长期劳动,手脚都硬了,不擅长做针线活。她们生孩子没有假期,往往是孩子一落地,自己就去冰冷的山沟水里洗血裤,换衣服,两三天就下地劳动。

虽然生活过得穷苦,但邱屋人的生活也充满情趣,他们有一个“冲凉”的习惯,在房间的一角打一个洞,垫上一块石板,用半桶热水,先擦全身,然后将热水从肩上淋到双脚,不论寒冬腊月,每天晚饭后人人都要这样“冲凉”。如果感冒发烧,就上山采些中草药,放在锅里熬了“冲凉”,一般也可退烧,或者用一把黄豆加石膏炒后用水煮开,吃了也可退烧。

农村有些偏方用来治病还是比较有效的。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邱屋人用自己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健康。

我下决心当个名副其实的农民，除了有时挂念女儿和外孙，思想上没什么负担；小孩总爱带我去找野果子，劳动给我带来的愉悦无法形容

在北京时，当我得知上面决定让我到农村插队，我就下决心要同农民一样劳动、一样生活，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农民，不更多地去考虑将来。

我始终相信，乌云是挡不住阳光的，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陶铸和我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拨云见日，会搞清楚的。我们的一颗赤诚之心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党工作问心无愧。想想许多人为革命流血牺牲了，活着的人更应该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我为革命工作不为名不为利不为官，个人的荣辱沉浮其实算不了什么。

我认为共产党员应是一粒种子，无论种到哪里都要发芽、开花、结果。因此对这一切我都想得很开，保持革命乐观主义，把个人心中的苦乐埋在心中，投入到新的环境中去，除了有时挂念女儿和外孙外，思想上并没有什么负担，更何况参加热火朝天的劳动生活的愉悦也时时在冲洗我心中的愁闷。不论多么脏、多么累的活我都很投入地去做，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温馨。

广东这地方春天来得早，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中旬我抵邱屋插队时正值那里忙于生产备耕，我马上加入了他们的劳动行列。挖塘泥、铲草皮、烧石灰，为树木锄草、培土、修枝，插秧，割稻，样样都干。

邱屋门前有一个不到一亩地大的水塘，水深不及一米，年年放养些小鱼苗。到年底，把池里的水抽干，最大的鱼不足两斤，全村每户约可分到两三斤鱼。这还在其次，主要是把塘泥挖出来

与草皮放在一起沤肥。我到邱屋的第二天正好遇上挖塘泥，便毫不犹豫地上了工地。塘泥相当湿，大家都赤脚踩在塘里用铲子一镐一镐地挖出泥，装到粪筐里。生产队长照顾地对我说：

“你刚来，赤脚劳动不习惯，你就在岸上挑塘泥吧！”

确实，我有几十年没有挑担子劳动了，在广州时，虽也参加过植树、种菜之类的活动，但那只是培培土，劳动强度不大。泥塘的土重，一镐下去就是几十斤，这里十二岁的小孩子都能挑五六十斤重的担子，而我挑得十分吃力。起初他们往我粪筐每头放两镐塘泥，一担五十斤，我就挑得直不起腰来，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很不稳，挑了两趟，累得气喘吁吁的。社员们见此情形，只在我的筐里各放一镐，差不多减轻了一半重，挑起来也轻松了，但劳动一天下来，第二天两个肩膀酸疼得举不起手来。

邱屋山区水冷、土酸，种稻子一定要放石灰，除了可去寒，中和酸性土质外，还有杀菌杀虫的作用。一亩地大约需施几十斤石灰粉。所以烧石灰对那里的农业生产举足轻重，也是一种重体力劳动。要到几十里的矿区去购买石头，又要装车卸车，挑上挑下。石头弄回来后，因为邱屋一带没有煤炭，完全要用柴烧，三万斤木柴才能烧出一万斤石灰，每年需要木柴三十万斤，社员们要到几里外的山上去砍木头，山陡路窄，费时又费力。这期间，我只是烧火、添柴，没有参加更重的劳动。最可惜的是烧一窑石灰，大约就要砍光一个山上长着三米高、碗口粗的松树。

据邱屋的群众介绍，十几年前，村前村后长满了脚盆大的松树和樟树，有的樟树一个人都合抱不过来。土地改革后，许多樟树分给了贫下中农后，大部分被砍下来，做成家具出售。我在新江镇赶集时，只花了十元钱就买到了四块樟木箱板，那是山里拿来卖的。等到我在邱屋看到的情形是连后头两座山也都光秃秃的，一片红黄色的泥土。

在邱屋人的生产安排上，春节过后，紧接着就是繁忙的春

耕，按育秧、犁田、耙田、施肥忙开了。我觉得插秧最辛苦，既要弯腰又要后退。腰弯久了酸疼得好像要裂开，站起来往后退，头晕眼花。双脚踩在泥里不容易拔出来，摇摇晃晃，怕摔倒。水里又有沙虫蚂蝗，沙虫能钻进脚里、腿肚子里吸血。相比起来，我最怕沙虫，田里多得很，钻进肉里就出不来，不像对付蚂蝗，只要抓点石灰往它的身上一抹，就会掉下来。好在消灭沙虫也不愁无招，只要每天下水田回家用热水洗脚，把竹油涂上，就不会烂脚。

我也上山给树木锄草、培土。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的，很高兴，充满欢声笑语。我们把每棵树周围的杂草锄净，给树松土，把烂叶子和杂草埋在树底下，这样既可以使土质变松软，也给树木施了肥。社员们还可以把一些灌木枝挑回家当柴火，也算有收获，相得益彰，大家都很高兴。

在山上，我们还能采到一些野果子吃。尤其是休息的时候，小孩子们总爱把我带去找野果子，我把这当做一次野营，高高兴兴上山，高高兴兴地回来。劳动带给人的愉悦是无法形容的。

有时，乍然间在山上见到一些未见过的植物令我惊喜不已。

“这是什么？有什么作用？是不是药材呀？”我总是喜欢向社员群众问这问那，他们懂得很多，无论问什么都能耐心详细地告诉我。

山上可以做药材的植物非常多。较年长的村民一般都可以用山上的草药为人治病。我的女房东病了，用我的体温计一量，高烧达近四十度，邻居四婆跑上山采了一些草药给她煎汤喝，煮水洗澡，两三天病就好了。

我的男房东，有一次到二十五里远的高山上去抓蛤蟆，找竹笋，不小心被猎野兽的铁夹子钳住了，四个铁夹齿深深地刺入脚后跟，足有三四分深，鲜血直流，铁夹子像自行车锁一样，没有钥匙打不开，如果用手去扯，则越扯越陷入肉里。山上没有别

人，他带着铁夹子硬从山上爬回家里，双手磨破，脚肿得很大，用铁锤砸开铁夹子一看，四个铁夹齿把脚后跟两边都夹通了，每个洞眼有筷子粗，人已不成形了，伤势严重。四婆等人就近采些草药，用水煮沸后替他冲洗，用破布把碾碎的草药敷在钳烂了的脚后跟上部，疗效很好，脚没有发炎，也没有溃烂，半个月就又可以劳动了。

十一岁的房东女儿，不小心赤脚踩到还有余火的灰堆上，脚烫起了水泡，且溃烂红肿，后用一种炒熟的普通蓑子籽，调上植物油涂在发炎的脚上，不几天就消肿了，伤口也愈合了。过去草药也治好过我的病，对此我深有体会。

在邱屋插队劳动，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我很讲究调整自己的心境，与当地群众和气相处，过着一种与先前截然不同的生活，使我获得了不少的安慰，内心也平静了。

但我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不忘学习，订了两份报纸——《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这是师部特许的，尤其那时的《参考消息》不是谁都能订阅的。于是每当夜深人静，大家都熟睡了，我就开始读书看报，不仅使我了解到许多国内外消息，也增长了不少知识。

星期天或寒暑假，我常同邱屋几个十一二岁的小学生上山采蘑菇，摘小竹笋，捡毛栗子，采洋姑娘，摘山参子叶等等。有一个星期天，吃完中午饭，大家谈起采蘑菇，说某某山上的松树林里已长了许多蘑菇。我怂恿说：

“我们去采吧！”

“有十五里路呢，又都是爬山，路不好走，来回三十里，你能走吗？”他们似乎有意难倒我。

“能走啊！这就走吧！”他们见我很坚定，便同意了。

我跑回家取了一个布口袋，他们四个男女孩子有的提着篮子，有的拿着口袋。大约下午两点多钟，由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带

路，我们五人出发了。离开村里往山上走几里路就是自然森林，许多树干上长满了粗藤，一条小溪从山上奔流而下，流水潺潺，小溪两岸长着野芭蕉，各种花草争妍斗艳，香气扑鼻，空气新鲜极了。我看过湖南张家界自然植物林，还没有这里壮观呢。一种投身大自然的快乐在我的心中油然弥漫着。

孩子们对这条路都很熟。为了抢时间，我们在平地上都是一路小跑。但大多是陡峭的山路，有的坡度高得像楼梯，走起来很慢。穿过两个村子，我们到了山坡上，眼前森林茂密，松树林居多，树的针叶掉满了山坡，往下一看，犹临深渊，山脚下的溪流奔腾而过。

我们在山坡走，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用绳子拖着一个什么东西，从对面走来，近前一看是一条碗口粗、约三米长的大蟒蛇。我们好奇地问来人："这样大的蟒蛇怎么能打死它？"

"这种蟒蛇不会追人，不用害怕，慢慢地接近它，用木棍对准蛇头七寸部位狠狠地打下去，蛇立即被打晕了，赶紧拖住蛇尾往坡下摔打，蛇就瘫痪了。然后用绳子紧紧拖住蛇的头部七寸的地方，蛇就再也活动不了了，全条蛇有三四十斤，可卖好几十元呢！"

孩子们对我说，这一带老虎、蟒蛇、黄羊、鹿子不少。由于我们爬上山坡时已经快五点钟了。有的孩子催促地说：

"我们赶快采菌子吧，迟了怕遇上野兽！"

我们扒开落下的松枝一看，啊！到处都长着鲜嫩的蘑菇，然而我们很快又失望了。那里遍地都是红色蘑菇，这种菇虽能吃，但有毒，须先用水漂过，多加油才能吃，我们的兴趣骤然降了下来，也不敢多采，随便装满了自己的口袋就下山了。这时天色已暗淡了下来，我极目远眺，只见远隔十几里的天宝山铀矿区，灯光闪亮。

我们加快了脚步，不管下山还是田埂平地都是一路小跑着，

纵是如此，到家时，天已大黑了。我们怕等到第二天蘑菇长蛆，赶紧用水漂洗。由于没有多加油，煮后没有其他菇好吃，第二天把剩下的全倒了。

再说采竹笋吧，邱屋的竹笋有两种，一种无毒，采回来可以做菜吃，一种有点毒，需要先煮熟，再用水漂洗干净才可做成菜吃。我与几个小孩经常在早上或傍晚上山找小竹笋，这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这些都令我开心，一是发现自己虽然有六十多岁了，仍能随着孩子们跑步上下山，足见身子骨还硬朗，二是观看了风景，陶冶了心情。

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健康的身体和乐观的心情是适应各种环境的首要条件。

由于我没带过孩子，外孙小亮几次生病，使我心急火燎；人见人爱的小亮成了我在邱屋的开心果和辛酸源

讲起外孙小亮和我在一起的原因颇曲折。我女儿斯亮毕业分配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解放军陆军总医院工作。先是任外科医生，有时做手术七八个小时，下不了手术台，一九六八年十月她在医院生下小亮，孩子未满月时就上手术台了，不像现在可以半年不工作，在家带孩子，还工资还照发。孩子无法喂奶，也没人带，只好在生下二十六天时，由他爸爸装在手提包里带回北京。

他爸爸好心的同事们这个帮一帮，那个帮一帮。先是由车间的一位女工帮助喂养，后来送给一位工人同事的母亲喂养，不幸老太太摔伤了，又托了另一位工人同事的母亲，后又转给街道的一位大嫂喂养。东寄西托，因为是陶铸的外孙，人们怕受牵连，林彪又发布“一号命令”，说北京准备打仗，要疏散人口，更无人肯喂养小外孙了。许多机关的托儿所也都解散了。小外孙的去处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女儿女婿无奈地希望我把小外孙带走。可我也有为难之处，虽然生了四个孩子，可我没有直接带过孩子。虽然如此，看来小外孙也只有跟我走了，幸好这件事得到领导的批准。

小外孙从小人小胆子大。早在北京招待所，他第一次看与日本鬼子打仗的电影，津津有味，一声不响地看完了两个多小时的片子，事后还学日本松井的样子。我们刚到广州，住在招待所里，他刚会走路，发一个音，自己歪歪扭扭到处跑，遇到小水沟敢爬过去，还会爬楼梯。招待所来了一些黑人外宾，他也不怕，黑人一招手，他就跑过去，还同黑人一起吃饭。

到了邱屋，小外孙成了孩子大人们的玩乐物。谁逗他，他就和谁笑，从来不哭。晚上我房子总会有五六个大人小孩逗小亮玩。要他学松井，做鬼脸，他总是像小丑一样，逗得一屋子人哈哈大笑，往往要闹到九点多钟，大家才散去睡觉。

大概是寒流骤降的三月天，我看到村里的孩子都打着赤脚，穿破单裤、破卫生衣，完全不像外孙那样身上不仅穿了棉袄、棉背心，还穿了卫生衣、毛裤。他们虽然整天流鼻涕，却还活泼。

我忽然心血来潮，心想我家的小孩也像邱屋老百姓小孩一样，要锻炼抵御寒冷的能力，学会适应环境。为此第二天我把小亮的棉袄、棉背心都脱了，只剩下卫生衣和毛裤，并带他到空地上去玩。结果中午睡觉脸红红的，醒来我又带他到空地上去玩，可他却一副恹恹不展很难受的样子，不愿跑。我下意识摸摸他的额头，烫得很，赶紧抱回房里试体温，一看三十九度，天黑时升到了四十度。喂他牛奶也不肯吃，我有点紧张，急坏了，赶紧到后面连队医务所找医生。

医生来后，再试体温已近四十一度。那位医生打电话给医院，一名副院长很快乘一辆吉普车来接。房东女儿背着小外孙坐上车，我紧挨着坐下。一路上小外孙双手抱着奶瓶呕吐，牙齿咬得格格响，双眼发呆。

到医院一会诊，说是重感冒，并发展为肺炎，立即住院打针。医院上下对我们都很好，有几个医生是从广州陆军总医院和广东省人民医院调来的，救死扶伤，很重视医德，为小亮治病十分认真。他们也都知道我是北京来的老太太，但不知具体身份，或许也能猜出我是走资派或走资派的老婆。

在医院呆了十几天，烧退后好几天，小亮才会走路。他这次病完全是我造成的，事后想起来真好笑，也有点后悔。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期间我见小外孙高烧，心里慌得很，上医院前，我叫他拉屎，以为都拉到地上了，后来忙着去医院以及会诊吃药，抱他睡觉，没有顾及其他事情。第二天早上，我走到洗脸地方弯腰一看，裤裆上黄黄的一片，再低头仔细一看，整个裤裆都是小外孙拉的屎巴巴，有的还一块一块粘在裤子上，令我很难堪，很不好意思。幸好我出门早，没被人看见，赶紧跑回家把裤子换了。

有一次，我抱着小亮到附近连队篮球场去玩，我找来一个箩筐和一张小矮凳。我把小凳放进箩筐里，把小外孙放在小凳上，告诉他坐下不要动，我要为他照像。当我把照像机对准他时，他高兴地从小凳子上跳了起来，一下扑到箩筐的边上。上牙碰到下嘴唇上，差不多把一半嘴唇撕裂了，血流不止，嘴唇肿得很大。小亮痛得大哭，我把他抱到卫生所，医生给他上了药。那时每天还用奶瓶吃三次奶粉，嘴唇摔破后，奶嘴塞在嘴里都很困难，小外孙倒不哭了，只是用牙齿咬着奶嘴慢慢吸。一个星期左右就好了。

还有一次小外孙在床上蹦蹦跳跳，不小心从床上栽到地上，额头碰到了砖头角，立即青紫了一块。我不懂常识，用手去按摩，反而鼓起了一个核桃大的紫血包。后来才想起，按摩只会使血出得更多，便改用冷水敷，没几天血包就消了。

我每次都是用炭炉子为小外孙煮稀饭，先喂他吃，然后把炭

炉子里的红炭夹出来用水浇灭，但炉子里还有余火。有一次我与房东一家正在吃饭，小亮用扇子在炭炉上扇着玩，不小心一只手伸到炉子里，大哭起来，他自己也懂把手抬起来，但手已烙上几条黑焦印，不一会手板心起了几个大水泡。我怕他受感染，把小手泡在稀盐水里，痛得他喘不过气、哭不出声来，脸都发紫了。我赶紧给他的手涂鸡蛋清、用嘴往他手上吹风，他才好受起来。接着我把手绢、剪刀和一双旧袜子放在小锅里煮了消毒，并用剪刀把手上的水泡挑破，上点黄胺药料，包上手绢，套上袜子。

第二天小亮发烧，到医院顺便打开一看，全感染了，有水泡的地方化脓了。医生有点责备地说："不应该把水泡挑破，要由它自己收缩才不会感染！"还告诉我：

"你外孙的手，有的地方是二度烧伤，大拇指处是三度烧伤，可能会留后遗症，会有点伸不直！"我有点担心。

那个医生用消毒的剪子把化脓和破皮的地方剪干净，用黄胺类药水淋湿纱布，把手包起来，每隔两个小时再把纱布打湿，三天换一次药。小亮的皮很嫩，四十多天伤口才痊愈。

我经常背着小亮与邻居们到十二里多的新江镇去赶集。邻居们是挑柴去卖，我纯粹去玩。最初，每次赶集时，我都给房东一元钱，托他买回萝卜、包心菜等一些最便宜的菜，一斤只三五分钱，一元钱能买几十斤，即使如此别人因为穷却买不起。我和房东一家经常有菜吃。但也好景不长，只买了三四次，师部保卫科长就来批评我不该在队上大吃大喝，在群众中影响不好，后来除了每月买六斤盐供房东做菜外，没有再买菜。这也反映了我在邱屋一方面比较自由，另一方面师部保卫科对我看管也很严，四处还有监视我的眼睛。

有一回邻居大嫂也不知从哪里捡来一副劳动用的破白线手套，她见我用手扯薯秧，薯浆沾在手上黑乎乎的，很不容易洗掉，便给了我一只破手套。不知怎么，竟让保卫科科长知道了，

批评我劳动戴手套,影响不好。

还有一次插秧时，队里安排我和另一个女孩站在田头两边掌握标准线竹杆，插完一排秧，竹杆要移动一次，这种活不下水田，事先我便穿了双雨鞋，又遭到保卫科科长的批评，他三五天就来一次，相当严肃地问东问西，还要求我一个月写一次书面报告，我写了两次以后就不写了。

师部礼堂差不多一星期有一场电影，事先他们都用有线喇叭通知附近村庄的群众免费观看，引得十里八乡的群众吃完晚饭，打着火把前去看电影。邱屋离礼堂不过三里来路。因此晚饭后，只要有电影，大人小孩都争相前往。我们常常背着小亮去看，回来的时候，小外孙总是在人家背上又笑又蹦。

有一次半途中，他突然大哭大叫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回到家我仔细察看他身上，发现他的腿肚子凸起了一个红色的包。房东看了，说是被一种蚊子咬了。那种蚊子比普通蚊子粗，又比苍蝇小，金黄色，头尖，嘴长有一根有毒的长针，扎到人身上要肿痛两天。后来在我的蚊帐上也发现过，幸好没被咬着。

我的住所又小又潮湿，都不敢让小亮下地，只能让他在床上走来走去。那里的老鼠又多又大，一般都有三四两重，大的重达六七两。每晚在房柱上、蚊帐顶上跑来跑去，互相打闹，吱吱叫唤。此外蚊子、跳蚤也特别多，每天都能在床头捉到四五只跳蚤，小亮的身上总被跳蚤咬出几个大包。

住所的外面有个小天井，鸡鸭窝就做在屋檐下，猪狗鸡鸭满地跑，天井又湿又脏又臭，到处有狗屎、猪屎、鸡屎。根本不能让小亮出来，否则全身都会弄得脏臭。我们为了防止他从房子里爬出去，在房门的门栏上又加了两层木栏杆，他就只能把头伸向外面了。邱屋的小孩拉屎就叫狗来，把小孩子屁股舔干净。起初小亮一拉完屎，房东也叫狗来舔屁股，被我看见以后，就改用纸了。

有一次，外村人来村里爆米花，爆一斤大米，收加工费一角。我爆了两斤，并在米花还热时，用开水泡了给小亮吃。第二天发现他的眼角沾满了眼屎，拉出的小便像米汤。房东说是受了内热，要我买荸荠（也叫马蹄）煮水喂他吃。我双管齐下，一边煮荸荠水，一边喂他生荸荠，随后又连吃了四个香蕉。结果小亮消化不良，吃香蕉拉出香蕉，吃挂面拉出的也是挂面，一天拉三四次，我急得要命，连队医生对我说：

“不能再给小孩喂挂面、冲奶粉了，应该给他吃烤焦了的馒头和很稀的稀饭！”

可是那一带根本没有人会做馒头，我只好向连队厨房说明来意。厨房里的同志每天给了我两个馒头。一个星期才治好了小亮吃什么拉什么的毛病，小家伙身上掉了好几斤肉。

回想起来，真叫人心酸，所有这些都是缘于我没有带孩子经验造成的，可见要带好孩子也真不容易。

女儿斯亮生第二个孩子，我申请去探望，大概是汪东兴批准了我的请求；到了临夏，亮亮下楼来，我奇怪地问：“你怎么没有大肚子?”亮亮说“昨晚生了，是个女孩”；在女婿家里住了不到二十天，我接到通知：“马上离开，不许乱窜。”

一九七〇年五月，是我女儿斯亮第二个孩子的预产期，我非常牵挂她，便试着向管我的师保卫科武科长提出：

“我要去甘肃临夏市解放军第七医院探望女儿陶斯亮，她快要生孩子了，她有直立性低血压症，那里山高气压低。她在那里生孩子，我很不放心，请武科长向中央领导报告，请求他们批准我去临夏帮助女儿坐月子。来回大概两个月，八月一定返回邱屋！”

我不抱什么希望地等待着回音。

出乎意料的是，四月的某天，武科长来了，告知上级批准了我的请求。我一阵惊喜，我本估计不可能被批准的，这次也可能是汪东兴批准的，因为我到广东插队，一切都是他安排的。

于是我开始做行前准备工作，首先写信把这件喜事告知斯亮，也写信到北京告知在国防科工委十五研究所，即电子计算机研究所(后改为由国家科委领导)工作的女婿张冀，设法买了三十斤亮亮最爱吃的大米，买了十五斤花生米。火车票托师部武科长帮助代买，从郑州转车到宝鸡，再转车到兰州。我又发电报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张冀，要他在郑州车站等候，一起去探望亮亮。

这次探亲路途遥远，须转两次车，还要带才一岁六个月的外孙小亮，旅途并不轻松。或许师部领导想到了我的境况，特地派了一位三十多岁的老连长，打算送我到宝鸡，转车后，返回部队。

大约是五月初，我背着小亮，房东阿婆帮助挑着东西，终于从广东翁源县邱屋起程，又是步行，又是坐公共汽车，翻山越岭六十多里才到达广东韶关乌石火车站，那里有个二十六师招待所，我们暂住了下来。

半夜十二点，从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到站了，只停留两分钟，这里没有站台，也没有搭板，我背着小亮根本上不去，连长便跳上车，连拉带扯地把我拉上了车，接着他又把行李搬上了车。

这时火车已缓缓开动。我与送我的房东告了别，坐在硬座车厢里，在火车的轰鸣中，往北飞驰而去。

火车行驶了一天两夜，第三天凌晨两点钟到达郑州车站。我们正要下车，做转车准备，女婿张冀突然快步走到我面前说：

“不要下车了，我已为你们买了回北京的车票，小亮必须留在北京，他若去亮亮那里，你就没办法帮助亮亮坐月子了！”

事出突然，而火车在郑州只停二十分钟，时间很紧，我问送我的连长：

“怎么办？”

“你就去北京吧！我就在这里下车返回部队，把情况报告武科长！”连长说。

于是他把我去临夏的通行证、介绍信交给我，就下车了。

这位连长对人很严肃，很少同我讲话，但他为人厚道，在火车上相当周到地照顾我们，我很感激他，只可惜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抵达北京，住进了张冀那间不到八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对小亮的去处，张冀也做了安排，他说：

“我父母已解除关押，被安排居住在河南陕西交界的西华山下一个部队仓库的所在地。那里空气、环境都较好，把小亮送到那里去，并且仓库正好在北京去宝鸡的铁路线附近，去火车站只有几华里，很方便。”

我同意了他的安排，在北京住了两天就又起程了。到兰州后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靠近汽车站，这里距临夏还有两百多公里，要坐七个小时汽车。卖票人告诉我去临夏的途中正下雨，汽车不能行走。

等了两天，汽车才起程，车出兰州几十公里，就碰到了一座叫大道梁的大山。山高路险，都是盘旋路，由山顶往山下望，犹临万丈深渊。沿途村庄很少，大道梁上偶尔见到几间泥土房，屋檐下吊满了一尺多长的冰凌。

那时已是五月十四日，这一带却都还是冰天雪地，可见中国之地大。汽车在冰雪山上行走，扭来歪去，随时都可能掉进深渊。

一路艰辛劳顿，我们总算安抵临夏市，因到医院还有八里路，我便雇了一个手拉长板车。到了医院门口，正好碰上一位女

护士，她说陶斯亮正在楼上住院。我马上让她喊亮亮下来。不一会，亮亮下来了。“你怎么没有大肚子？”我很奇怪地问她。

“昨天晚上生了，是个女孩，我这就上去抱下来，一同坐这板车回宿舍。”

路上，亮亮告诉我，小女孩生下来居然有七斤重，生下来时，脸上的水分尚未干净，肿肿的，很丑，她怕张冀看见孩子太丑不高兴。

亮亮的宿舍是一间大小约十一平方米的小平房，放了一张床，中间又放了一个火炉，剩下的空间就很少了。但因母女相逢的快乐冲淡了我对环境的要求，一想起来就很满足了。我心里决定一定要让亮亮把月子坐好。

那时临夏的东西非常便宜，一元五角可以买到一只三斤重的母鸡，瘦肉一斤才六毛钱，羊肉则更便宜。一元钱可以买到十四个大鸡蛋。不方便的：一是买鸡、肉、菜都要到八里外的市区，没有公共汽车，要步行八里，从市里到医院的路上才能雇到板车。二是煤炭困难，不仅一块砖煤要两角八分，炉子一天要烧四至五块煤，还很难买到。三是那里的自来水冷如冰，刺骨的冷，产妇用水困难。为此我请了一个临时保姆，每月工资十五元、饭菜自理。她每天为亮亮煲一只母鸡，煮六到八个鸡蛋，餐餐猪肉，猪肘子不断。

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很不适应那里的环境。临夏地势高，早晚气候差别大。早上天高气爽，蔚蓝色的天空清净极了，非常美丽，都可以穿上棉衣。中午太阳很辣，紫外线强，只能穿单衣。下午三时左右，天一下子变了。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或者一阵大雨。晚上我要盖两床棉被。我不太适应低气压，走起路来像踩在棉絮上面，软泡泡的。脑子里喳喳作响，虽然没有生病，整天昏昏沉沉。

不久恰逢张冀来信，要求我们去他父母那里，说那里已经准


与小亮和小亮的奶奶在一起。当时小亮三岁半。

备好亮亮坐月子吃的东西，一家人可以团聚。想起在临夏的诸多不便，我们决定回北京。因此亮亮产后十八天，我们就抱着小外孙女经兰州乘火车到潼关车站下车，在一个特定的客栈等待张冀来接。等了一个多小时，张冀来了，我们搭了一辆装煤车到他父母那里。

张冀的父母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此时他们住在华山下一排三间的平房里，自己种了不少蔬菜，还挖了地窖，为亮亮储备了许多鸡蛋和炼乳。

我们到家时，小亮还在睡觉。我把他抱起来，他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却“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挣脱开我，又扑到床上睡着了，弄得我莫名其妙。难道只离开个把月，小亮就不认识我了吗？起初我猜测是没有睡醒，可是醒了后，对我也不如过去那样亲热，过了两天才又与我亲热起来。

一岁半的孩子是否很快就会把最亲近的人给忘了呢？直到现在，这个谜还在我的脑子里盘旋。

动乱年代，亲人们聚在一起都很高兴，但好景不长，住了不到二十天时间，管理那个地方的兵站政委通知了张冀父母，要我们马上离开，不允许外人在那里居住。后来政委意犹未尽地又找我谈话，要我规规矩矩地呆在自己的地方，不要老在外面窜。

在他们的眼中，那时陶铸是反革命两面派，中国最大的保皇

派，我是他的老婆，对我当然要监视。但政委的话刺痛了我的心，我据理力争：

“我是党中央组织上批准的，不是我自己乱窜！”

说完把通行证、介绍信给他看，并有点赌气地对他说：

“我买到票就走，我是自由人，不是被监护的，同你们是一样的,哪里都可以去！”

过了三四天，吃完晚饭，张冀父亲张汝光和我轮流背着小外孙女，张冀母亲用自行车托着行李，张冀自己用自行车载着小亮，沿着铁路去附近一个小站搭乘驶往北京的火车。约十点钟，我们到达目的地，张冀母亲骑着自行车先一步到了。我们告别了两位老人，从此他们又要过那种孤单的生活了。

记得我们来时，张冀的母亲何曼秋曾说：“今后我们生活在一起就是一家人了！”哪知不到二十天时间，愿望就成了泡影。既然政委已下了逐客令，我们只好告别了两个老人，回到了北京。

一到北京，张冀马上四处找人托养小女儿。结果斯亮只喂了小女儿四十多天奶就把她托给一位汽车司机的妻子喂养了。因为斯亮还不能完全自由行动要受到一定限制，不久，医院来电报催她回去。我虽然还有近一个月的假期，也不想在北京呆了，愿意提早回邱屋。在是否带小亮回邱屋的问题上，我们做了商讨。邱屋生活条件太差，小亮已有了佝髅病，当地没有条件医治。这种病会影响小孩发育，造成畸形。还有邱屋有些小孩患过脑膜炎，万一被传染上，小亮一生就毁了。此外邱屋的蛇多，万一被咬了，也是很危险。

亮亮夫妇有顾虑，怕小亮在邱屋会长不好，佝髅病难治。我也有顾虑，我有点不想带小亮去邱屋，但亮亮那里是绝对不能带孩子的，又怕张冀自己无法抚养。女儿女婿又怕我一个人在邱屋孤单。我们反复商量的结果还是把小亮留了下来，我独自回

邱屋。

七月二日那天，我乘火车，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又坐了大半天汽车才回到了邱屋。

我第二次请求去临夏，部队没有派人护送；正赶上抓“五一六”；由于穿戴时髦的上海保姆引起人们怀疑，我们被派出所盘查；我当场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时间在冷漠中一点一滴地离去，我在邱屋呆了一段时日后，异常思念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

一九七一年四月，我又试着写了一份报告，请求批准我去看望女儿亮亮和两个外孙。这一次倒相当快就批准下来了，部队照样为我开了介绍信和通行证，有效期仍是截至八月。

这次部队没再派人护送我了，五月中旬我独自一人从邱屋起程，到北京后，因为张冀父母已基本解放，父亲张汝光分配在成都军区后勤部卫生部担任副部长，与他原任的总后卫生部部长相比，算是降级使用，他们全家都搬到成都，小亮也随去了，张冀好像也在成都出差。我便坐三轮车直接到了收养小外孙女阿妹的那人家里。

那对夫妇及其两个不足十二三岁的女儿对阿妹都很好，尤其那对夫妇对阿妹甚至比自己亲生女儿还要疼爱，阿妹穿得很干净，对他们也很亲昵，我很欣慰，并对他们说明了带阿妹去甘肃临夏的来意，请求女主人一同前往，一同回来，为期大约一个月时间。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先搭乘火车到了成都。小亮已两岁零七个月了，已经上了幼儿园。他的嘴甜，见人熟，见人亲，更活泼懂事了，连站岗守卫的警卫人员都很喜欢他。每天回家，由一位保姆带他睡觉。

这次小亮见到我也特别亲，我们在成都休息了两天，准备动

身去兰州，张冀母亲一定要我把上海来玩的一位年轻保姆带上，便于路上照顾小亮。

那天深夜两点多钟，我们一行五人才抵达兰州。半夜三更，人生地不熟，出了站，我们只好雇了两辆黄包车，由车夫把我们送到一家旅馆。那个旅馆只剩下一间房的一个床位，我们人多，老板娘只好把自己的住房腾了出来，给阿妹和保姆住。

万万没想到这时“文化大革命”正开始反“五一六”，兰州街上四处贴满了反“五一六”标语。上海来的这位年轻保姆原本是上海的中学生，穿戴很时髦，根本不像带孩子的保姆。老板娘和旅馆的职工对我们这老少五人产生了怀疑。

第二天，我们去买汽车票，到邮局给亮亮打电话，晚上八点多钟，派出所所长就到旅馆盘查我们，先是找那位年轻保姆盘问，回来时她吓得脸都发白了，害怕被拘留。后又找阿妹和养护人盘问。最后找我盘问。我如实告诉他是去临夏医院看望女儿，并向他出示了证件、通行证，他还不大相信，继续盘问我，我也与他周旋着。

“你丈夫是谁？在哪里工作？”

“我丈夫叫陶寒剑，在中央办公厅工作！”

“什么职务？”

“厅级干部！”

“你哪里有这么多的钱请两个人为你带孩子？花这么多路费？”

“我老头子一个月两百多元，外孙的爷爷是成都军区卫生部副部长，一个月三百多元，钱很够用！”

那名派出所所长见问不出什么破绽，末了语气严厉地说：

“现在到处都在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你们今后不要乱跑！”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钟，我们乘公共汽车到达临夏市车站，正

下着雨。正在无计可施之际，意外地发现亮亮不知从哪里找来一辆吉普车，正等着接我们。亮亮告诉我们，车是医院政委派来的。我猜测亮亮在医院的处境有所好转。

果然到了家里，政委马上来看我，并送来了好几斤鸡蛋，还说今后要什么可到厨房去拿。过了几天张冀也赶来了。住处不够，医院又另外给我们腾出了两间房，我很感激。

可是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情况又突变。那年代，真令人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

首先政工科科长找张冀，责问他带这么多人来医院是什么目的，医院又不是避难所。张冀同他大吵，两人要打起来，被亮亮拉开了。亮亮还向那位科长道了歉。

大概隔了一天，一位姓谢的科长找我谈话。我告诉他，我们这些人不经上级批准是不会出来的，并把证件、通行证都拿给他看。我怕他不放心，当场给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大意是：

> 承蒙您批准我来临夏七医院探望女儿陶斯亮，我带着她的孩子，医院同志怀疑我是逃跑出来的，恳请您见信后速向七医院说明情况！

我把信交给谢科长，请他急速发出。大概是医院领导看了我给汪东兴信的缘故，没有赶我们马上离开。但从此以后，医院领导，甚至先前对我们很热情的人，同我们也保持距离，不敢亲近了。

个中缘由，我后来才听说，原来是医院政治部林主任去兰州开会，碰巧也住在我们住过的那个旅馆。他听说我们在旅馆住时，被公安局的人盘查、监视过，说我们可能是逃跑出来的“五一六”分子。于是姓林的主任回医院向领导做了汇报，弄得医院

领导有些紧张。我估计他们没有什么怀疑的根据，只是存有戒备心理。

因此，我们商量，保姆不要住久了，住久了也不方便，何况过些时候陶铸的外甥刘志修还要来。不到十天，张冀带着年轻保姆回成都，阿妹北京的养护人也走了。家一下子也冷清了许多。

阿妹刚一岁，会走几步，还不会说话，整天哭着要养妈。尤其到晚上哭得更厉害，不要亮亮抱，也不要我抱，闹得邻居不得安宁。



一九七一年六月，带着小亮、阿妹千里迢迢到甘肃临夏看望亮亮。后立者为刘志修。

小亮倒自由自在，一个人到处乱跑，不管同老年人、年轻人、小孩子都玩得来。他会唱二十多首歌，会念十几首毛主席诗词，会讲几个故事。虽然年仅两岁八个月，讲话却口齿清楚，语言连贯。

记得有一次他在火车上都会自动问叔叔伯伯们："我唱歌好吗？"一旦得到人家鼓掌表扬，他就又唱又跳，成了车厢里的中心人物。

在临夏，有一天礼堂开晚会，演出正要开始，冷不防小亮跑到台上，大声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弄得全场轰堂大笑，刚好那晚政委也在座，很不高兴地说：

"这是哪家的孩子，怎么不管，随便让他跑上台去？"

后来我骂了小亮，要他以后不许乱跑乱窜，他竟然会不高兴地说，这个家我不要了。说完就真的跑出去了，活像个大人。

不久志修来了，住了两天，我们商量着两个孩子怎么办，阿妹是否还回北京。大家的意见是：先送小亮回成都再说。因为张冀父母曾邀请我在成都住些日子。

我们正准备买票去那里，就在这时，突然接到曼秋的来信，信中希望还是直接去北京再转回广东为好，我猜测成都情况有变，到处反“五一六”、抓“五一六”分子，风声鹤唳，他们也处境困难，自身不保。我一下子踌躇了，大家都束手无策。但亮亮无论如何带不了两个孩子。怎么办？想来想去，现在条件最好的就属小亮的爷爷奶奶，还是把小亮送到成都去为好。

于是我和志修还是决定带着小亮、阿妹往成都去。到成都已经是晚上十二点钟，赶上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司机见我这个老人身上背的手里牵的，都是小孩，发了善心，路过成都军区后勤部门口时居然停车让我们下，否则我们又得走回头路。幸运的是后勤部门口站岗的战士都认识小亮，没有把我们挡在大门口。

从门口到小亮爷爷奶奶的住处，足有一里来路，弯弯曲曲，有的路段没有路灯，一片漆黑，上次我虽然来住过两天，晚上没有出来过，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走。小亮自告奋勇地说，姥姥，我会走，我带你走。说完他牵着我的手，东拐西转，走了好一阵，停在了一栋楼房面前，他先爬上楼敲门，大叫：

“小亮回来了！”

他奶奶开门看到突然而至的我们，又惊又喜。我苦笑着说：“没办法，只好我自己送小亮回来，明天就买票回广东。”此时张冀也正好在成都，他建议阿妹也留在成都，请人抚养，不要回北京了。

第二天，我听小亮奶奶和在新都县办事的爷爷通电话，把我来成都的事告诉他并小心地问：

“报告上面了没有？”

“已经报告过了，还没有说什么！”

我后来了解到这件事的情况是，报告到了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那里，张国华反问一句：

“曾志有什么问题？”

这个话我后来是听毛主席讲的，不知在一次什么会议上，谈到陶铸问题，联系到我时，毛主席就有点不悦地说：

“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大意）。”

总之，这次探亲遭遇了许多波折，我在成都只住了三天，大约七月上旬转道北京，比规定期限提前许多回邱屋了。

邱屋人虽穷，但不自私，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文化大革命”中没人打砸抢，没人参加武斗，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在我离开邱屋时，全村群众泪流满面

虽说邱屋是南国一个穷困落后的村庄，可是我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后，深感世代生活在这个偏远角落的人有许多美德。穷苦并没有掩没他们善良的品质。他们那种美好的、朴素的情操，我至今历历在目，对这个村庄充满了无限的留恋之情。

邱屋村风气好，全村日不关门，夜不闭户，全村各家各户从早到晚，下地、出远门、走亲戚，从不关门上锁。他们视偷鸡摸狗等偷窃行为为奇耻大辱，哪怕有人挖了人家一块红薯，全村都集合起来对他进行批评。

这种传统的好风气影响到孩童，连三岁的小孩都不会去拿别人家屋里的东西。即使他们再饿，宁可去捡连队洗菜扔了的，连猪都不吃的菜叶子、菜根，去挖连队埋在地下的死病猪，也不去动连队种的没有人看管的蔬菜、红薯。连队喂猪的大包心菜、红薯随便堆在那里，也无人看管，从没有人去拿。邻村曾有人偷过

部队几棵白菜，邱屋生产队即召集全村人进行教育。

无论我在水沟里洗衣服丢了肥皂，还是晒衣服弄丢了夹子，村里的小孩看到了，都会捡了送还给我。我有四个樟木箱子存放在无人住的空屋子里，并曾把箱子里的皮大衣、毛衣、呢子衣服拿到空地上去晒，然后又放回箱子里，即使附近有人看到也不去撬锁。

他们对我不是没有好奇心，但由于我来邱屋插队时，驻地军队交代生产队不要向我打听任何事情，全村人就遵守纪律，也没有向我问过一句有关的话。

邱屋人虽穷，但不自私。按照那里的风俗，从腊月二十三四开始，各家各户都热闹起来，做大米年糕（又叫糍粑），炸糍粑，大年三十杀鸡宰鸭，多的十几只，少的也有四五只，并用大锅煮，煮熟后捞出吊在房梁上，用鸡鸭汤煮上一大锅自制的蕉芋面条，自己除了留下一点在年三十晚上吃，其余的都用来送礼或给各家各户送上一碗，很注重做“情面”，自己吃的少，给别人的多。从年初二开始，各家各户担着一点鸡鸭、糍粑走亲戚拜年。而邱屋的习惯是走亲戚时，一旦接到好吃的东西，回来后送给邻居尝尝。杀猪或是煮了一点新鲜菜，也都要分送给邻居一点。

有位叫四婆的孤寡老人，六十四岁了，手头十分拮据，但她煮了一小罐糖醋肉，也要给邻居送上一点。邻居摘到不足一碗的新鲜豌豆，也要给小亮和其他邻居送一把，村里不管谁在山上采到什么野果子、菌子，煮好了也都送一点给邻居，大家都这样互相送劳动所得，互相关心，从不只顾自己，以送东西给其他人为荣。

他们的身上折射出了中国农民善良朴素的美好品德。

邱屋人参加集体劳动虽然积极性不高，但生性很勤劳，易满足。他们天一亮就起床，不是上山砍柴，就是下地劳动，采猪菜、忙家务，从早到晚起码劳动十一个小时。参加集体劳动有些

磨洋工，为自己劳动总是小跑着赶路。

邱屋人不大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念书，而要求他们参加劳动，带弟妹或做家务。六周岁的孩子就用背带背两三个月的弟妹，小婴儿不会抬头，脑袋像安装在轴承脖子上，转来转去，真可怜。八九岁的孩子就要帮助挑水做饭或上山背木柴，十二岁的小孩就要和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了。因此那里学校条件虽然较好，大队还有一所初小，教员都是部队干部的家属，教学质量还好，老师到各家各户动员孩子们上学，入学率仍不高。并且男孩子高小毕业就满足了，只有我的房东女儿上了初中，后来儿子也上了初中。

也许正因为文化低，见识少，邱屋人的思想很单纯。“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人搞打砸抢，没有人参加武斗，军管说什么就听什么，没有反抗的话。粮食不够吃，也不怨天怨地，新稻子割下了，就像过年办喜事一样，全村人自己带菜聚在一起美美吃一顿干饭，大家欢天喜地，他们只要能吃饱饭，不挨冻，就心满意足了，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

但邱屋人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出奇地认真。“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最高指示一下来，哪怕是半夜三更，大队也要通过有线广播通知各村各队迎接。大队还组织几十人游行，到各村各队喊口号，喊毛主席最新指示，这样很快就传达了指示精神。

有次半夜两点钟了，大队还通知大家到村外去迎接毛主席最新指示，很快我们都赶到村口列队，并烧了一桶开水。一会儿大队人马来了，高喊着毛主席最新指示：“办学习班好！”大家也跟着喊，每个村子都不例外。第二天社员们就要学习讨论，尤其要求每个社员都要学、要会背毛主席的老三篇，还要当场考试。为此可真急坏了社员们。许多男女老少，没有文化，记不下人家念读的内容。

一天晚饭后，全村人集合在禾坪地里，考试老三篇。许多人都记得几句《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可我的房东和另

一位大嫂居然能把《纪念白求恩》一文基本背下来。此外，大队和公社也办各种学习班，要求自带大米去学习，一期半个月，我的女房东也去学习过。

我房间的上厅是宣传活动室，生产队把有线广播装在里面，那位宣传员小学文化，既是记分员，又是小组长。每天公社、大队有什么事都在广播上讲，有时也讲报纸上的事。

"林彪事件"以前，我曾给邓大姐和周总理写了一个报告，说明广东地方太潮湿，妇女劳动强度大，不利于我劳动、学习和身体，再卖力气也赶不上本地妇女能干，自己又不甘落后，年过六十的人，如果拼命干，对身体有影响等情况，要求调北方工作。过不多久，广东军区来人说：周总理指示，同意你调北方。并且同意把我和女儿调在一起。问我是否肯去陕西临潼干休所。我同意了。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初，广州军区分别派来了一位处长和科长，为我办理了回陕西临潼的手续，那位科长直接送我去临潼。

掺杂着酸甜苦辣，我就要结束邱屋两年多的生活，走时全村群众依依不舍都来送我，大家都泪流满面，连接我去陕西的军队干部都被深深感动了。在送行的人群中，我没有见到房东的大儿子，便跑回来同他辞别，结果发现他一个人躲在门后面哭，面对此情此景，我感动得流泪了。

我在心里发誓，往后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尽自己的能力为这些纯朴善良的老百姓谋福利，同时也深深地祝愿勤劳善良的邱屋父老兄弟姐妹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第十五章　北京供养

西安受冷遇，我感到奇耻大辱，提笔给李瑞山写信抗议；与女儿等在临潼团聚，产生了在干休所安家定居、养老送终的想法；给毛泽东写信，要求穿上军装

我原以为这回周总理指示，允许我调北方，应该多少透露出我的命运有了转机，处境应该会好转起来，可以享受到组织上的温暖。可是随后发生的事情无情地粉碎了我的乐观，我的生活依然无处不充满阴影。

从抵达西安到临潼干休所，直至调回北京，我的遭遇真可谓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我到西安后，住进了西安宾馆，一切手续均由送我来的张科长代办。头两天没人来见我，也没有人找我谈话。只是到西安的第二天上午，女服务员告诉我，说今天晚上宾馆礼堂有招待外地客人的晚会。晚饭后，全宾馆的客人，甚至连服务人员在内都去参加晚会了，看来一栋大楼就只没给我一个人发票了。

虽然参加晚会是件很小的事，而且就是请了，我也不一定会去参加，我从来不热衷于这类活动，但从这件小事来看却反映出他们对待我的政治态度问题，我感到受了奇耻大辱。

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党组织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工资关系，又把我安排在兰州军区的高级干部休养所工作，这里不是监狱，不是看守所。况且我起码也是个革命干部，为什

么在全宾馆上下人员中惟独不通知我一个人呢？这决不是遗忘，也不是疏忽，而是陕西省委和省革委会有人作了指示。

难道他们仍然把我当成是有什么政治问题的人吗？

我认为这决不是一件小事，不能容忍，便提笔给省委书记李瑞山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在宾馆受到歧视的情况。我在信中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在省委眼皮底下还遭受歧视，说明政治上仍然对我不信任。在省委尚且如此，到临潼干休所就更可想而知了。我是周总理亲自安排在临潼干休所的，我和大家是一样平等的共产党员，而不是坏人。我在临潼干休所要长期生活下去，这样受歧视，精神上怎么能忍受得了？……”

我的信李瑞山一定收到了，但他没有回信，没召见我，也没有打电话来。不知何故？本来我和李瑞山是比较熟悉的。他来陕西前（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在广东担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我在广州市委也管工业，都属于中南局领导，我们在一起参加过几次会议，共同讨论过工业方面问题，彼此并不是陌生人。不过后来我了解到，那里只有革委会说话才算数，他虽然是省委书记，只是个空架子，不起什么作用。看来他的日子也不一定好过。

大概是我到西安后两三天，省革委会组织部姓赵的部长代表省委党组织来同我谈话，他是一名军队干部，穿着整齐的军装，四十多岁的样子。陕西省革委会里绝大多数是军队干部，大都是军师级干部，我见过的除这位赵部长外，还有一位组织部副部长也是军人。

记得赵部长例行公事向我交代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你的组织关系留在省委组织部，在临潼干休所过组织生活。

第二，生活上由干休所代管。

第三，粮油关系由临潼县粮店按月送发，要买好的大米可由干休所代买高价米。

第四，医疗看病，可在干休所或在二十六总医院看，也可在医院看病，医疗费交民政局报销。

第五，工资每月由陕西省直接发给。

他宣布了五条对我的安置办法后，也没有征求我是否同意，只说："明天由副部长送你去临潼干休所！"

出乎意外，到了临潼，上下左右的同志对我都相当热情，我第一次参加支部会时，大家表示欢迎，我又感到温暖，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临潼共有十个疗养院，都是军队和中央部委办的，因为这里是风景旅游地区，但我看到游人很少，只是少数西安或外地来临潼华清池洗澡的人，也许在那嘈杂的年月大家都少了闲情逸致。

临潼干休所地址在陆军总医院内，这是兰州军区直属干休所，几排平房，几栋两层的小洋楼均掩映在树丛中，环境幽雅洁净，很适合修身养性。

那里除我是周总理特批的地方干部外，厅还有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的哥哥，退休前他担任过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其余二十多家都是在军队离休或靠边站的军队高级干部，其中包括兰州军区原副司令员韩练成、装甲兵副司令员程世才、工程兵后勤部政委李基、总政治部政治学院训练部部长吴瑞卿等。

我女儿陶斯亮在我调来后不久，从甘肃调陆军总医院做医生，我侄女曾敏也来帮我料理生活。东离西别，我们五个人在这里又有了一个新的家。我们共住着五间平房，相当宽敞，房子质量自然比现在的差，但暖气、自来水都有，医院里还有温泉浴池，晚上人少时可以洗温泉澡，住处的附近是骊山，离捉蒋亭只一里多，还有传说是杨贵妃洗澡的临潼温泉。医院大门外，有一片几百亩的石榴树，非常美丽。

按照有关安排，我的党组织关系编入干休所休养干部支部，那里党的生活相当正常，一星期一次党小组会、一次学习会，大家都做笔记，发言时准备发言稿。规定读什么书，大家都看，读书笔记做得十分认真，都参加讨论。

那里各个方面的条件确实都不错，对于我这个已显身心疲惫的花甲老人来说极具吸引力。我当时思想上认为就在干休所安家定居，养老送终了。因此，我设法使家庭周围的环境变好一些。

房前屋后所有空地底下都是鹅卵石，基本上没有黄土，据说陆军总医院一带，古时是沙滩，我决定挤出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这些地方种上果树、花草及蔬菜。为此，我和侄女两个人共挖掉了五十多车鹅卵石，又运来五十车黄土，搬来上百块从旧房子上拆下来的泥土砖。侄女还到公共厕所挑来二三十担粪便当做菜园的泥土和肥料，随后，我们种上了六棵好品种的桃树、两棵梨树、四棵马上可以结果子的葡萄、四棵临潼特产的火金丝柿子、一棵花椒树，并种了五种蔬菜，还种了菊花、月季花。

干休所距临潼城关三四里路。那时临潼虽没有什么新鲜鱼肉买，但东西很便宜，干休所管理员每十天出去采购一次，鸡、鸭、鱼、蛋、糖、油、大米、白薯，想买什么，只要开个单子交给管理员就行，不用自己上街。当时我没有冰箱，食品也不敢多买，大约买一次肉吃十天，煮得再熟也会变坏。我们总是头几天吃肉菜，后几天多吃蔬菜鸡蛋。

这种生活比在广东邱屋强十倍还不止，儿女又都在身边，尽享天伦之乐，当时我对这种生活很满足。

话又说回来，我安于临潼干休所的生活现状，并不是悲观消极的思想，并不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党失去信心，也不是动摇了对毛主席的信仰，我一直深信毛主席最终一定会纠正当时出现的一些问题。只要全国人民都享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温暖，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我们少数共产党人没有工

作，受些委屈，一辈子当老百姓都没有关系。

我是自觉参加革命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为当官、为名利地位的。没有机会工作，当普通的老百姓仍是共产党员，也是革命者，也能做贡献，并无其他索求。相比起来，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荣誉和待遇已经很多，这一辈子够了。

可是在临潼生活了近一年时间，感到我的组织、工资、医疗和供给关系要由四个地方解决，十分不方便，不能长此以往，应该尽快把这些关系一律转归干休所管理，但前提是必须把自己转为军人，这个难度比较大。为此我又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请求。信中说明：临潼干休所是军队的，都是不在职的军人，不完全按照在职的军人待遇，他们每年只发一套军装，没有领章。我是最早的红军战士，有红军就有我这个红军战士，“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女同志原来做地下工作，也转为军人，穿上了军装。我也请求转归军队，每年发一套军装。

我认为自己的理由很充分，便在等待回音。不久，省委书记李瑞山把我叫到西安，告诉我，毛主席看了我的信，并指示，如果我愿意留在西安，就在省委安排我的工作，不愿意可以调回北京。

回北京！乍听这个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过去是连做梦都不敢想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工作关系一直在广东，陶铸调北京工作，我尚未调动，之所以呆在北京是因为广东省委考虑到我病后身体虚弱，给了我三个月的病假。现在机会来了，多年的心愿就要变成事实了，我想都没想就答复李瑞山：

“请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我愿回北京工作！”

到北京后，汪东兴找我谈话：“来北京就不要再工作了，由中组部供养。”大批老干部被解放出来，许多人又重返政坛；“供养支部”里的老干部们，也很关心国事

一九七三年三月八日，我们全家带着几件必要的行李，在陕西省委刘秘书的护送下搭火车赴北京，结束了整整一年的临潼干休所生活。当时中组部负责老干支部的刘同志接我们住在中组部招待所。大约两三天后，汪东兴找我谈话，在场的还有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郭玉峰。汪东兴对我说，来北京就不要再做工作了，算离休，由中组部供养。问我是否同意，我同意了。汪东兴又交代郭玉峰为我安排六间左右的住房，办一张北京医院的医疗证，调配一名服务人员等。

后来我被安排在老年干部支部过组织生活，女儿斯亮分配在空军总医院做医生，两个小外孙在中组部幼儿园入托。我又可以安排一个新家了，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回想起来，我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感激之情是无法言喻的。也很感谢汪东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能切实按照毛主席等领导的交代，关心照顾我。

因此，我一直很想做些事情回报党、国家以及关心爱护我的领导、同志们。

我们一家暂时被安排住进了万寿路招待所的两间客房，我住在楼下带卫生间的小客房，女儿、外孙则住那间有四个床位的大房间。安顿下来后，我向组织提出了到临潼把剩下的家具搬回来一事。中组部便派了一位干部，跟女儿、女婿前去搬家，我留在北京照顾两个小外孙。我一个人根本看管不了两个活蹦乱跳的小家伙，便通过朋友把他俩暂时寄托在农业科学院的幼儿园。

中组部在万寿路的招待所后院还有五栋小楼，都是两层楼房，一栋楼房两个单元，每个单元共有五间房，客厅、厨房、卫生间、小锅炉等一应俱全，比前院宽敞得多了，足可住十户人家，但一直没有住客人，招待所的副所长特地通知我，如果临潼的东西搬回来了，可以迁到那里的小楼居住。另外给我定居的房

子也有了着落，行政处按照郭玉峰的交代，把我带到南长街小楼六号看房子。这是四合院，共有住人、会客的房子大小九间，原是法院副院长吴楷之的住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批斗死于医院后，儿子也被赶走，房子一直空着。我看它就在中南海旁边，地点很适中，环境好，就对郭玉峰说，不必再看了，就定在这里吧！只是这房子因为多年没住人，纱窗玻璃、门窗地板都破烂不堪，灰尘四布，地上还有人粪，不修理无法住人，郭同志见状便对我说：

“你确定后，我们派人来修，可能要三四个月才能修好，你们先住在万寿路招待所！”

这期间，我打听到了同乡也是我的启蒙老师彭镜秋，还有彭儒也都在北京。彭儒四岁左右则随其父母在我家短时期住过，后来她成了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比我低两班。湘南暴动时，她在家乡参加了革命，又上井冈山，与我成了朋友。也就在那期间，十五岁的她与后来任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结了婚。彭镜秋和彭儒还是两亲家呢，彭儒的女儿宜生是彭镜秋老师儿子吴方义的爱人。我们在北京奇遇，彼此都感到特别亲切，虽然公共汽车较拥挤，我还是常常去她们家玩。

后来，我在延安时期和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几位女友听说我调到北京，也来看望我，较常来往的有三位大姐：一位是广东人宋维静，她是大革命开始时的党员，参加过广州起义，一九四二年在延安高级党校与我同学。她个头高大，性格耿直，想什么就说什么，决不让人，完全男性化性格，可她勤劳能干，粗细活都能干，饭菜花样多，饼干、蛋糕、点心也会做，毛线活织得又快又好，针线活也不错。

延安整风期间，她倔强的男性化性格使她吃了不少苦头。挨打挨整很重。有人拉着她的头发在地上拖来拖去，把她一个人关在岗楼那样没有窗子的四面木头房，只能容一张小床，时间长达



一九八〇年北京小桥北河沿胡同全家福。

四个月之久。放出来后与我同住一个窑洞。开始她连话都说不清楚，总是自己一个人说来说去，显然精神不大正常。我尽量与她说笑，她的精神渐渐才正常了，我们也成了好朋友。

另一位是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一个地区的战友，叫丁修。她同宋维静性格差不多，都是直肠子，爽直人，对不顺眼的人和事，嘴里就唠叨，尤其对“四人帮”，想到什么就破口大骂。我怀疑我家被装了窃听器，她骂“四人帮”的话，万一被窃听出去就会当反革命。我劝她少说这些，她还骂我胆小鬼。后来我们就在厕所里尽量利用洗脚时间谈话，一人坐在一条矮凳子上，一边洗脚，一边听她谈论。

除了这两位常客，还有在郑州棉纺厂居住的八十三岁的堂姐龙淑，常带儿孙来我家探望。她是一九二七年衡阳农民协会妇女部部长，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结婚介绍人。她是大革命时期湖南衡阳特委书记、后为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陈佑魁的遗孀。她那时因回湖南老家生孩子，未一同被捕，但她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一直在家乡一带任小学教员、校长等职，直到全国解放，她才参加工作，不过仍从事教育工作。

四月份，我作为最早的一户搬进了三楼楼西。从五月份开

始，一些解放出来的各省和部委负责同志都陆续搬进了小楼。第二位搬进小楼西的是陶鲁笳，他比较幸运，解放出来没几天就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随后，陶希晋、朱连从广西搬来入住一号楼。

见到他们我真高兴，似有一种隔世之感。朱连曾是我在延安马列学院的同学，当时我们同住一炕，和郭明秋、王季青都玩在一起。朱连曾任南宁市副市长、北京国家妇幼局局长、外科医生、针灸专家。她丈夫陶希晋在董老领导下，好像在政法委员会工作，批判政法工作右倾时，被下放到广西，朱连也随同调任。

紧接着廖志高住进了二栋小楼，江渭清、叶飞、江华分别入住三栋、四栋、五栋小楼东，曾生和杨其钦分别住进一栋东西房。小楼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每个同志解放出来，我都把它当成最大的喜事，致以衷心的祝福，老朋友、老同事历经劫难又相聚，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怎么能不值得祝贺呢?

但出来的同志大都被摧残得半死不活。曾生在秦城监狱呆了七年，放出来后，说话中气不足，声音很小，很难让人听清，行走缓慢，过去任广州市市长时的活跃劲头再也见不到了。叶飞讲话也是磕磕巴巴，不连贯。此情此景，令人非常痛心。相比之下，我因出来早些，生活条件、身体状况各方面都好些。在内心深处，我对他们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感。

也许这是因为过去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战斗经历所培植的一种同志间的深厚感情，我有责任对他们尽量给予同志式的关心。我把烧好的鸡汤给叶飞送去，那时宋任穷住北京医院，他的夫人钟月林住在我们的前院客房，自己不能起火，常常到我厨房做些菜肴送到医院。

此时，毛主席又批示要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因此，时隔不久，除欧阳钦年老体弱长期住院外，这些同志都陆续分配了工

作，走出了招待所。

廖志高出任福建省委书记，江渭清任山西省委书记，叶飞任交通部部长，曾生任交通部副部长。不久叶飞调任海军司令，曾生任交通部部长。江华在全国四届人大上被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渐渐好起来了。全国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期间，我被推荐为人大代表，随后当选为四届人大常委。

许多老同志又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意味着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是每个同志人生的转折点，也成了中国当时极具代表性的缩影。

我所在的“老年干部支部”的成员，都是外地回来的老同志，只有十来人，支书杨士杰是六十年代鞍山市委书记，一九六二年开七千人大会时突发心脏病，一直在休养。我由中组部供养，也被编入这个支部，后被推选为支部副书记。

在这个支部里的同志还有张策、袁任远、郭述申、王学文、曹菊如、吴岱峰、蹇先任、孙以瑾、曾碧琦、李凡夫、李初黎、吴克坚，其中后三人因为病重，很少参加支部生活。

老干部支部的学习活动在中组部办公大楼以外的平房里，出入证与在职干部不同，我们只能进中组部第一道大门岗哨，办公大楼另有岗哨，没有在职干部带领，我们不准进去，被隔离了起来。显然认为我们还是有问题，楼里楼外两种待遇，真是阴魂不散呀！

我们支部一星期学习两次：一次看文件，但规定不能看省军级文件，只能看县团级文件、《参考消息》、《参考资料》、《内部参考》、《红旗》杂志等；另一次是学习讨论会，因为人少，学习和讨论都不分小组，大家开支部会都很愉快，精神舒畅。

我们虽然年迈，身不在其位，但都很关心国事。杨士杰、袁老两个消息灵通人士，常在支部会上传播一些小道消息。如毛主

席有什么指示啦，“四人帮”中有什么问题啦，哪些人又要解放了等等。

“文化大革命”后，国家在“五一”、“十一”节日都不举行游行了，只是分散在五六个公园举行游园活动，上级领导对老同志参加节日游园非常关心重视，所以人们常常能从中看出一些关系到自身命运的消息来。如果被打倒的同志第一次被通知参加游园或茶话娱乐晚会，《参考消息》等报纸都要把参加人的姓名登出来，哪怕是成百人也不能例外，因为这是一种极重要的政治待遇，报上有名，表明这个同志政治上解放了。有些老同志，即使病入膏肓，不能行走，也要坐上轮椅游园一趟。因此那时报纸上常有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有时名字就占了报纸大半版篇幅。

一九七三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被通知参加节日游园，并派专车接送。会后见了报，这才算真正亮了相，算初步公开解放吧！

幼儿园老师向中组部政工处报告，说我的外孙在小朋友中喊反动口号，并将此事上报中央政治局；纪登奎批示严查，我们全家又遭受不白之冤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灾难似乎总是无休止地纠缠着我家，有时刚刚过上一段宁静舒心的生活，却又横遭不测，使我们重新掉入黑黝黝的深渊。就在批林批孔运动前后，我们全家人又遭受了不白之冤。

起因说起来令人哭笑不得。我的外孙女和外孙经组织批准入托中组部幼儿园。大字报就此借题发挥，大肆批评，说按幼儿园规定只有在职干部和职工的儿女才能入托，曾志是姥姥，不是父母，隔代入托，就是利用特权。

我并没有太在意这样的大字报，但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提醒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了。

幼儿园的某位老师向中组部政工处报告，说我的外孙女告诉朋友，姥爷不是病死的，是被人害死的，还说我的外孙在小朋友中喊反动口号。这位老师借题发挥地指出小孩子的行为都是父母亲教的，是阶级仇恨，告诉儿童从小就要记住阶级仇恨，以图将来报复。

这种事竟被上纲上线报到了政治局。纪登奎批示，要严查。汪东兴又批示，要中组部找我谈话，指出这样的事要及时教育。中组部两位同志严肃地要求我要加强对女儿女婿的教育，不要在儿女面前灌输错误思想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令我震惊不已，无言以对，所有有良知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一个仅三岁零七个月，另一个五岁多的两个小儿童会有反动言行。

"我感到很意外，小小儿童怎么会讲反动的话，我去幼儿园了解一下，确有这事，我做检查，接受处分！"我只能这样对那两位同志说，但我不相信竟会如此蹊跷。

这两位同志还算好，没有对我责备。但我一定非得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可！

"你们向两孩子讲过姥爷的什么事没有？"我首先问女儿女婿。

"我们没有讲过，两个小孩子只知道姥爷早死了，连姥爷是陶铸都没有告诉他们，他们也从来不知叫姥爷，因为爷爷健在，便也叫成爷爷！"女儿女婿有点委屈地说。

心中有底之后，我到幼儿园，找到了小外孙的班主任。她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

有一天，我外孙女阿妹与同龄的小男孩一起玩。后来那个小男孩不知他怎么对妈妈说：阿妹说自己的姥爷不是病死的，是被人家害死的。小男孩的妈妈便无事生非把这话告诉了幼儿园管政

工的刘老师了。

“三岁多的小孩懂得什么。那个男孩同妈妈讲这话，也不会懂得什么意思，只不过胡乱讲着玩的。小孩子闹着玩的事，你不要在意！”班主任老师安慰了我一番。

是啊！事情原本简单，却闹得越来越荒唐。真相大白，我的心情轻松了不少，又去找外孙小亮班主任，他也介绍了情况：

“孩子们喊喊叫叫，吵吵闹闹的，有时学大人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有时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毛主席等等，他们哪里懂得‘打倒’是什么意思。他们哪知道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是什么样的人物，都是闹着玩的。打倒毛主席不单张亮喊过，至少有七八个孩子都喊过，我的孩子也在这个班，同张亮一样大，天天在一起玩，我的孩子也喊过。孩子们乱喊时，我们都是制止了。但孩子们玩起来，喊溜了嘴或有喊错的，这些事你不要去计较，要讲责任，我们比你大，放心吧，没有事的！”

事情虽然已明了，但我还有点不放心，接着去找幼儿园负责人赵同志，她也说：“几岁孩子懂得什么？小孩的话，不要信以为真！”

看来那个令人压抑的年代虽然时常黑白颠倒，善恶不分，公道还是自在人心的，但那位向上级打报告的老师的态度就令我费解了。

“你们要教育孩子学好，不要教那些坏心眼，你们要紧跟党，紧跟毛主席。”她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教训我，好像这些道理我不懂，把我这个有四五十年党龄的老革命当成市井老妇了。

也就是这位老师，有一次值夜班，与孩子们同睡一个房间。半夜小亮喊，老师，我要尿尿！她说，不准去尿，快睡觉。小亮憋不住，趁其不注意，想从小床底爬出去小便。不巧被这位老师发现，把他抓住关进了没有暖气的厕所，小亮还赤着一只脚，衣

服也穿得少，在厕所里受冻。等到这位老师叫他回来时，竟发高烧了。第二天，这位老师打来电话，叫我们接回小亮，后来我替小亮试体温，高烧四十度。

我听了小亮说了情况，心里感到气愤，这位老师，大概是阶级立场坚定得过分吧！不然为什么对一个不到六岁并不懂事的无辜小孩这样狠呢？不行，这件事，我得讨个说法，我经过调查，便向中组部写了一个检查报告，一方面针对平日对女儿女婿教育帮助不够作自我检查，另一方面把从幼儿园了解到的情况作了汇报，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专案办被撤销，一切档案材料移交中组部。中组部清退档案材料时，查出了中组部政工组关于我两个小外孙的问题向中央的报告、纪登奎和汪东兴的批示以及我的检查材料。搞清理的同志拿给我看，见上面注着“汪东兴同志批示，存入永久档案”的字样。这份材料本应退给我，存入永久档案有什么意义呢？但材料在我手上放了一年多，又退了回去，也不知出于何意。兹将我的复制件抄录如下：

时间：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六日起至一九七四年四月七日止。根据本部档案材料保管期限，保管永久年。

老郭（中组部部长）、老郑（副部长）同志：

曾志女儿陶斯亮的两个孩子在我部幼儿园，据反映陶的小孩说伟大领袖是坏蛋，还说过陶铸的死是“坏蛋”害死的。据小孩说是他爸爸（陶斯亮的丈夫）说的。对于这件事，幼儿园的同志向陶的小孩进行过教育，我向本园同志反映过。我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是大是大非问题，是他们要报杀夫之仇，杀父之仇，值得深思！

×××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六日

郭玉峰、郑屏年圈阅后，呈给了登奎、东兴。

纪登奎指示：

请郭玉峰、郑屏年处理，你们只圈阅上来，也不提处理意见，这种做法希望能改正。

三月五日

汪东兴批示：

郭玉峰、郑屏年，请当面找曾志谈清楚，如果攻击毛主席的言论，不批判不抵制是错误的。

三月五日

就这样，两个分别为三岁和五岁多的小孩玩耍时的胡言乱语，竟成了我要报杀夫之仇，女儿要报杀父之仇的罪证，令人不寒而栗！那个荒唐年代带给人们的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悲哀，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谁能轻易相信？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既然小亮、阿妹入托中组部幼儿园有人批评，我便设法把阿妹转至离家很近的中山公园幼儿园，天天可以回家。小亮六岁多，刚好幼儿园毕业，进了离家更近的南长街小学分校，过马路就到了学校。

不久，亮亮到河北宣化农村作为期半年的巡回医疗，把两个孩子甩给了我。张冀虽然在北京，对孩子们生活、学习很少关心，孩子们也都很怕他。一旦小孩出错，他便打。有一次他又打小亮，小亮痛得哇哇惨叫，我急了，拼命去救。我也是气晕了，竟在他手腕上狠狠地咬了一口。为阿妹也同张冀打过。可以说，我每次同张冀吵架，都是因为打孩子。至于他与亮亮闹别扭之类的事情，我基本不理。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因性格冲突，而于一九八〇年分手了。后来，张冀与王恩茂同志的小女儿结婚，而陶斯亮也找了作家理由。两个外孙则一直留在

了我身边。

亮亮和张冀这对曾共患难的夫妻虽然离了婚，但彼此谁也没伤害谁，仍是很好的朋友。与小孩的爷爷奶奶，我们既是革命战友，又共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所以彼此之间的关系并未受到影响，我们至今仍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张冀的两位老人一直与我们感情笃厚。这真是值得庆幸的。

阿妹的扁桃腺经常发炎，隔不多久就发高烧，小亮也有此症。因此亮亮在出差前，送两小孩去医院动了手术，都很顺利，只住两天就出院了，能与往常一样吃喝玩耍，我竟忘了要让他们适当休息。小亮出院的第二天，我就带他徒步到王府井，再走到故宫，他一下子坐在地上说：“姥姥，我走不动了！”我这才想起他割了扁桃腺，可能失血多了容易累，我一下子后悔起来，只好也坐在地上休息，然后祖孙两个才慢慢往回走。

一九七四年，我在北戴河过了一生中最自由自在、最舒心的日子；全国四届人大会上，我和周恩来都在天津组，间隔十年，他还记得我的病

不平凡的六七十年代，与我在生活上、政治上遭受种种不幸相伴随的是，病魔一直纠缠着我……

一九六七年陶铸被打倒时，我仍是半个病人，心律不齐、冠心病、甲状腺亢进、膀胱泌尿系炎等病经常发作。一九六八年二月，我泌尿感染厉害，中南海门诊医生要看管的警卫带我去北京医院检查，因为检查基础代谢，要先查体重，我脱下衣服，医生惊奇地说，你怎么瘦成这样？加上秋衣秋裤，只有六十七市斤。

下放农村插队后，我的健康逐渐好了起来。一九七三年调回北京，一年来倒也没发生什么大病，只有几次比较严重，一次是下公共汽车时，我的脑袋被车门夹住，造成短期脑震荡和前额软



一九六〇年，毛泽东与一批省委书记夫人及子女在北戴河。前排右起第一人是曾志。

骨损伤。其次常犯冠心病，有一次心绞痛不已，尤其是胆结石症一犯起来就痛得在床上直打滚，有时连胆汁苦水都吐了出来，而且发烧。医生诊断是心脏痉挛，不管医生还是女儿都多次劝说要把胆囊切除，才能保安全。并说，胆和心脏的神经从来是连在一起的，这种病可互相影响，万一心脏绞痛，以为是胆痛，会贻误治疗时机，就很危险了。大家都劝我赶快动手术，以保心脏。我的思想有些松动，但又感到身体很瘦弱，动手术是否会一命呜呼呢？左思右想，最后才下定决心切除胆囊。

为了使手术安全，医生建议我休息一段。于是我写信给汪东兴，说明病情，请求批准去北戴河疗养。很快，汪东兴在我的信上批示，同意我去北戴河休养，并交代了有关人员。七月中旬，我和两个外孙、女婿、侄女来到了北戴河，女儿在医院工作，不能请假，没有同行。

我曾于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二年来过北戴河。第一次是邓大姐交代，要一些女同志来北戴河开会。此前中央正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陶铸早已在北戴河了。第二次是陶铸来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我因病随他来休养。两次都住在六浴室附近分配给广东省的房子里。那时感到很疲乏，哪里也不想去，整天想睡，很少去游览北戴河的什么景观，也没有下海游泳。

这次来北戴河，我被安排在中直管理局西山三区。那里背靠山，面对海，空气新鲜，树木参天，郁郁葱葱。我体重虽仍不足八十市斤，但精神很好，没有前两次疲乏。我因经不住亲人的怂恿，也下了海，套个救生圈在海水里泡泡。

女婿带着五岁的外孙小亮，只下海几次就把他身上的救生圈扔了，要他自己游回来。我在沙滩上看到小亮在水里沉沉浮浮，大叫爸爸，女婿就是不理，只是要他使劲划水。我怕小亮不会划，气力不够，呛了海水的话，会沉下海底上不来。心里一阵抽搐，急得请浴室的救护战士下水去救，这时女婿才把救生圈推给小亮，我激烈跳动的心才缓解过来。

说来也奇怪，小亮经过这一场虚惊，胆子真大了，不久就丢开救生圈，自己能抬头游泳了。阿妹才三岁，只在沙滩上玩。

我的活动量相当大，早上六点准时起床（如果要去海滩散步则五点就起来了）。经常提着网袋，上山采蘑菇，跑遍从莲峰山到吊死鬼楼的山峰，有时也带小亮去。一次晚饭后，小亮跟随我上后山采蘑菇，山对面有村庄，有群众在砍柴割草。我在山沟里看到了一条两尺多长的花蛇，我自己只顾埋头找蘑菇，转身发现小亮不见了，大声喊叫都没有回声。我从这山头跑到那山头，跑上跑下，还是不见小亮。

看看天即将黑下来，我焦急地想，夜深人静，要是小亮在山沟里遇上野兽，遇上蛇就糟了。我不死心，又跑到靠西山的顶上往马路方向看，忽然看见小亮在同一个解放军很自在地谈话，心

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我大声喊叫,他们根本听不见,便跑步下山，走到大路边，小亮才跑过来。他说：

“姥姥你到哪里去了，老找不到你？”

“你到哪里去了？”

“对面的山上有人割草，还有小孩，我跑去玩了，回头找不着你，走着走着就走到这里，我以为你回家了。”

“你害怕吗？”

“在山上害怕，见到解放军叔叔就不害怕了。”

小亮虽小，但跑南走北，跟着大人走过五个省份，也算见多识广了，脑袋灵活，换成是没见过世面的五岁孩子，在深山沟里找不到大人，一定大哭大叫了。

一九七四年的北戴河冷冷清清的，尤其海滨街道的商店很少，游客更少得可怜，但因为那时还是公社制度，私人不能自由买卖，一切由公家定价，北戴河的鱼虾螃蟹非常便宜，且大多是活蟹，每星期可到供应站订购两次，一市斤公蟹三角，母蟹两角五分，这样低价格，渔民恐怕连工资都收不回来。我们每次都买上几十斤活蟹，大的一只有一斤多，小的至少也有半斤，每人每餐尽可吃上三四只，真够享受了。并且伙食也不贵，每人每天一元五角，工作人员、小孩则更少，我家大小五口人，住了一个多月，也只花了两百元。

这是我一生中过得最舒心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自由自在过。

我们在北戴河疗养了一个月，八月底搭朱总司令专机回到北京。九月上旬入北京医院做胆囊切除手术。外科主任高兴地说：

“你的手术很成功。切除胆囊到探查肝脏到缝合，只四十分钟，一般胆囊切除至少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脂肪厚的复杂的还得三四个小时。手术时间短，主要是因为你太瘦，没有什么脂肪，你整个内脏都下垂四指多，割开肌肉，就现出肝脏，胆囊手

术很容易进行。”

他还补充说，探查了你的内脏，用手摸了肝脏没有硬块，很正常。后来他把割下来的胆囊给我看，包括胆管整个大约四寸来长，医生取出大小两个像黑色盐精状石块，每块都有几个尖角，这种结石的尖角一进入胆囊就会痛得死去活来。外科主任说：“你现在切除胆囊是正确的！”

住院半个月，我已完全痊愈，就出了院。不久就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牵动人心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在京开幕。我是天津选区选举的代表，我参加天津代表团，人数大概一百八十人左右，庆幸的是，周总理也是天津选区的代表。

自从一九六六年底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周总理。人大会上，周总理一来，大家欣喜欢腾，惊天动地的热烈鼓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我触景生情，使劲地鼓掌，把手掌都拍红了，既激动，又心酸。激动的是周总理来主持四届人大，心酸的是看见周总理瘦骨嶙峋，脱了人形。但总理精神尚好，他只念了政府工作报告的开头和结尾两段，其余是播音员播的，不过从早到晚，他都坚持在会场上。

中间休息时，天津代表集中在台湾厅，周总理与天津全体代表会见。周总理手拿着代表名册看，凡是他认识的，都叫名，并问几句。他看到民主人士刘裴时，问：

“刘老，好久不见，你好吗？”

“身体不好，快不行了啊！”刘裴感动地回答。

“我比你的病还厉害，我得了膀胱癌，做了手术，不过现在不要紧了。”周总理感叹地说。

代表们听说这话，心情都很紧张。周总理却显得轻松平静，见到大港海上采油的代表，便兴奋地问，海上采油平台建设怎么样了，并问海上采油情况。代表同志一一回答。

“人大会后，我要去大港海上采油平台看一看！”总理说。

“你不能去，你身体不好，海上风浪大，乘海船会影响你的病体。”代表们赶紧劝阻。

“不碍事，今年三四月我一定要去一趟！”总理很肯定地表示。可是四届人大会后，他的病逐渐加重，海上之行并没有实现。

总理与代表们交谈着，在名册上继续翻着，当发现我的名字，便叫：

“曾志同志来了吗？”

我站起来，他深情地看着我，问道：

“你好吗？你的病好了没有？”

记忆的闸门一触即开，总理对我的关怀一幕幕涌了出来。记得还是一九六五年，我因心脏病和甲状腺亢进，住进北京医院。周总理去医院看民主人士陈叔通时，也去看望了我。时隔快十年了，他还记得我有病。接着总理马上又说：

“看你神色很好呀！”

“我现在身体很好，谢谢总理。”我非常激动地回答说。

我还记起一九七三年广东李坚真大姐来北京看望了周总理，后来李大姐告诉我，说周总理问她见到曾志没有。她说打算去看看她。总理说，好！去看看她吧！

唉，我这样的普通干部，总理都常关心，对其他人士就更不用说了。

代表们知道总理患癌症后，小组讨论开始都转移到关心周总理的病症上来，有的同志讲着讲着就流下眼泪。这时又听说李富春也得了肺癌，住在北京医院，他也是代表，不能出席人代会。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郭玉峰大骂邓小平是“纳吉”；中组部的一张大字报说“四个现代化”是十

足的卖国投降，倘若误服这帖毒药，我国的自然资源将化为帝国主义的廉价原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将成为官僚买办所有制

一九七五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四人帮”处处感到了制约，感到了威胁。他们不甘心坐以待毙，想尽一切办法反扑，兴风作浪。他们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借毛主席“指示”，攻击小平等中央领导，由此逐步展开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时共和国的天空又阴云密布。

中组部部长郭玉峰等对我们老年支部同志的态度也有了改变，宣布今后不安排我们外出参观，就是北京的工厂企业、名胜古迹也不安排，说是有人批评我们参观太多，影响不好。

那时清华大学出了不少不点名或点名批判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中有关方针政策方面的大字报。郭玉峰通知我们去看大字报。我们老年支部的人都没去，谁肯去看那批判小平等老一辈领导同志的大字报。

大概在十一月下旬，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共有一百五六十人参加会议，我们老年支部的同志全都参加了。与会者绝大多数是不在位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刚出来的老同志，也有在位的一部分年轻人，后来知道，那些年轻人是掺砂子来的，目的是监督小组讨论，起带头批判作用。

打招呼会表面上还是由小平主持。没讲什么，大意只是叫大家展开讨论。会上，宣读了据说是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指出：

“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决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接着，与会者分成几个小组进行讨论，根据讲话要点，让每个参加讨论会的同志作自我检查和批评。我们小组同志们的发言，大都是重复讲话要点的重要意义，根据报纸上登载的讲几句，没人点名批评小平。

我说，我多年没有工作，也没有参加学习，今天才第一次听说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及严重性情况，真是惊心动魄，会后要加紧学习，站稳阶级立场等等。

宋任穷和李素文也在我们小组。李素文原本是沈阳卖菜的劳模，这时已是副委员长和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代替李先念组长职务。她见我们小组讨论不热烈，首先向宋任穷发难，严正批评任穷在东北局领导“文化大革命”工作中的一些思想路线错误。她手指着任穷说三道四，她讲的问题我们不了解，那时很不愿听她的指责，所以她批任穷什么问题，完全记不起来了。好像打招呼会后，又把任穷送回盘锦去喂猪。

打招呼会议以后，不点名的批邓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从此，全国全党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组部掀起了批邓高潮，大会报告，小组讨论，大字报贴满了组织部办公大楼，一片乌烟瘴气。

郭玉峰等人忠实执行“四人帮”的路线，四处煽风点火，在党员干部大会上，极力辱骂邓小平是“邓纳吉”、“反革命”，七、八、九月三个月那么多谣言都是从邓记公司里发出来的，说邓小平包庇叛徒，一九七五年上台后，任用了好多坏人，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是私设的没有经中央批准的非法机构，邓小平是最大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说“全面整顿是邓小平的复辟纲领”，邓小平推行反革命干部路线，干部工作也受到了邓小平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影响，邓小平讲的“台阶论”是完全打击限制新生力量。

郭玉峰说，去年的整风整党草稿是错误的，重点调查“双

突”，是把“双突”看得太重了，都是邓小平修正主义的影响等等。

大字报批判小平主张把石油煤炭棉布压价出售给资本主义国家是汉奸行为，污蔑买船是假洋鬼子，诬蔑四个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到来之时，搞四个现代化是假，让红旗落地才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说什么四个现代化是十足投降卖国，倘若误服这帖毒药，我国的自然资源将化为帝国主义廉价原料，国家主权将化为乌有，社会主义所有制将成为官僚买办所有制，半殖民地苦难又将重演等等。

他们还排除异己，视干部为仇敌，千方百计迫害各类干部，搞一锅端干部政策。中组部和中监委原有六百多名干部，他们除了给中组部留下二十人，中监委留下五人，把其余的干部一律下放干校劳动或打倒监禁起来。连服务人员也不放过。中组部原来也有两百多名服务人员（包括公务员、司机、打字员、电话员、厨师等），结果也只留下二十余人，其余的都被下放了。

无数干部被诬陷迫害，长期拖着不作结论，不分配工作，再三刁难患病的干部。例如舒同生病后，他们就把他放在招待所房间的行李扔出去，锁上房门，强迫他回延安，把他赶走。甚至残忍到把上访的人员两脚朝天地拖出大门。把中组部之家由党员之家变成了“阎王殿”，变成了“门难进、人难见、脸难看、话难谈”的地方。

批邓，当然也连带批我们这些老同志。大字报点名批评我们到各地参观，点名批评一些老同志生活琐事。说邓小平是“还乡团”，反攻倒算的“总后台”，我们这些出来了的老干部当然也是“还乡团”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形势一步一步紧张起来，请我们这些老同志去参加打招呼会，其用意绝对不是关心老同志，而是向我

们亮黄牌。许多老同志被笼罩着的恐怖气氛弄得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我估计我的处境还会恶化，陶铸问题又没有解决，我当然是被监视侦察的对象。看到“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暗中逮捕许多人。我觉得也许哪一天也可能被抓走，做好了被抓的准备。

周恩来逝世，“四人帮”通知不准开追悼会；中组部设了灵堂，老干部推举我为代表致悼词；朱德因吃了不洁净的生黄瓜，腹胀呕吐，并发肺炎，最后导致心力衰竭去世；毛泽东去世，平时最爱哭的江青却不流一滴泪；林月琴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我躺在床上听六点半的新闻。

突然一个声音无比悲伤地报道周总理已于一月八日逝世。我一下子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把小外孙从睡梦中惊醒，他从小床上爬过来问，姥姥怎么啦，是不是哪里疼？我说周总理去世了，说着又流泪不止。

虽然在全国四届人大会上，见周总理那瘦弱的身体，我就想到他将不久于人世了，并不意外。但一个在人人自危的时期，能够力挽狂澜，使更多的人幸免于难的伟人走了，那种对他尊敬的感情，感激的心理使我实在不能自禁，以泪洗面。

其实何止我一个人如此，全国上下男女老少，闻其噩耗，千千万万的人都在流着眼泪。各单位、个人都自动戴黑纱，在家里挂上周总理黑框相片，相框上缠上黑纱插上白花，以致悼念。许多机关自动设了灵堂，中组部头头虽是“四人帮”的人，但在机关干部悲伤情绪下，不敢强行制止。

这时“四人帮”却通知，一切机关团体以及个人都不准挂总

理像，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开会悼念。并派人到各机关、团体、各家各户进行检查，把周总理挂像取下，把灵堂也拆掉。我们组织部设的灵堂倒是照旧，在举行的追悼会上，机关同志自动上台讲话悼念。老干支部推举我为代表致悼词。

“四人帮”不准讲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在悼词中，首先就强调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悼念活动之势日增，不可遏制，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对总理表达深切的哀思和怀念，长期以来被压制的情感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四人帮”越是禁止，参加悼念活动、送花圈的人就越多，真是民心不可违呀！

劳动人民文化宫进行三天悼念活动，只准三千人前去，群众就自动到天安门纪念碑前悼念。每天都有上百人秩序井然流着眼泪向总理致悼词，表决心，念决心书。天安门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花圈，纪念碑、花坛、电线杆以及树上都是花圈，许多青年在天安门纪念碑前张贴自己的文章、诗歌、绘画以及标语等，进行宣传。

“四人帮”把天安门广场及除纪念碑前面以外的电灯全部关闭，使平日灯火辉煌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黑暗世界。

但是黑暗也阻止不了络绎不绝的人流及上百万群众的悼念活动。没有警察，没有维持秩序的人员，但一切井井有条。几万辆自行车自动有序地排列在黑暗的广场上……

最悲壮的是全北京市人民为周总理送灵柩。市民群众因为不知道总理的灵车什么时候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出来开往八宝山，上午就等候在长安街两侧。

一月，正是最寒冷时节，马路两侧男女老幼不畏寒冷，等待灵车，人们忘了饥饿、忘了寒冷，从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外一直到八宝山沿路都是人山人海。十里长街二百来万人为总理送灵。灵车经过之处，哭声震天动地。那电视里的场面比那悲恸的现场要

逊色多了,大概也是受了“四人帮”的限制。

“四人帮”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压制和禁止悼念总理，更加激起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

四月五日清明节前几天，工农商学兵四面八方的群众自动汇集天安门，送花圈、贴诗词，有些漫画明显地影射“四人帮”。一些青年学生不点名地反对“四人帮”。“四人帮”惊慌不已，派警察干涉送花圈演讲，送花圈单位只好派人轮流值班，保护花圈。“四人帮”如临大敌，除大批警察干预，还强迫各工厂的几百名工人、民兵，拿着木棍，名为维持秩序，实为做打手。故宫广场、北长街、南长街、东华门摆满了装人的大卡车，地上睡满了打手们。四月四日深夜，警察和所谓工人民兵冲到天安门纪念碑前大打出手，抓走了看守花圈的群众，不少人被打伤。

“四人帮”的暴力行为，并没有吓倒悼念总理的广大群众。四月五日清明节那天花圈照送，人群继续拥向天安门。警察还有军队在人群中抓人，把人抓进人民大会堂，抓入总指挥部，抓走了好几百人。愤怒的群众把他们的小汽车都推倒了。一部分群众拥向人民大会堂东门，讨回抓走的群众，一部分人群跑到×××总部讲理，发生冲突，有人放火烧了指挥部的房子以及小汽车。这就是所谓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

“四人帮”在天安门又是打人又是抓人，残酷镇压无辜的群众，造成了流血事件。据来我家的南长街一位年轻的女户籍警说，天安门纪念碑附近到处是血，爪牙们调动水龙头来冲洗。不但如此，“四人帮”还指示便衣们，把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的群众的照片暗地拍下来，然后根据照片把许多人抓来当做反革命分子关押，并且要求不论机关、团体，每个人都要填表，说明有没有去天安门，还要代填子女亲属的情况，甚至连有没有听谣、传谣也要填写。“四人帮”真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

我曾填表说明在中山公园门前观看过天安门广场情况，子女

没有到过天安门。其实那时讲真话的人少极了,除紧跟“四人帮”外,许多单位领导对职工群众说,你们没有去天安门,就不要随便写去了。其实是暗示职工不要填写去了的表。“四人帮”的法西斯镇压手段,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七月六日,一个不幸的消息又传来,我们爱戴的总司令朱德也逝世了。我的胸口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

据说他得病是因吃了不洁净的生黄瓜,腹胀还呕吐,接着发高烧,并发性肺炎,最后心肾衰竭而去世。如果不是误吃了不干净的食品,他老人家那样健康的身体活一百岁是完全可以的。

此时毛主席的病情一天天加重,周总理、朱委员长相继去世,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失去了自由。这真是多灾多难的岁月呀!

这是国家的不幸,是人民的不幸,共和国疲惫不堪的身体又被重重地踹上了几脚。

“四人帮”等一帮妖孽却趁机在党内外大肆活动,制造舆论,暗示江青当女皇,抓紧了篡权的准备,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组织工人民兵武装,发枪支,暗中布置篡党夺权阴谋。

九月九日,我们敬爱的毛泽东主席去世,江青毫无悲痛,平日最爱涕哭的江青,在主席逝世前前后后,毫无感情,竟未流一滴眼泪。在百万人的追悼会上,她身着黑纱,俨然像个恶鬼神。我想她人虽在追悼的会场上,心早已在做其女皇美梦了。

共和国的擎天巨柱轰然倒地,“四人帮”失去了最后的掣肘,篡党夺权更加明目张胆,有恃无恐,他们以为美梦就要实现了,得意忘形,猖狂一时。

殊不知处心积虑,枉费心机,坏事做尽,必遭天谴!

大概十月七日上午七点多钟,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我有点纳闷:自己是中组部供养的干部,平时来往的人又少,这么早来电话,会有什么事?我疑惑地拿起来一听,原来是罗荣桓元帅的夫

人林月琴打来的，她兴奋地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四个人昨晚被抓起来了！”

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忙问她：

“是哪四个人，怎么一回事！”

“就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们‘四人帮’呀！”

“谢天谢地，谢谢你告诉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我一听，兴奋得手都在发抖，恶魔终于伏法了，我如释重负。林月琴赶着继续打电话告诉别的同志。

我放下电话，手舞足蹈，赶紧把消息告诉女儿、女婿，只是不敢大声呼叫，因为对门八十一号就是中央警卫局，我早就怀疑他们在我家里装了窃听器，消息还没有公开宣布，怕有差错，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天老干支部的同志也听到消息，但中央组织部好像拖到十月十六七日才召开会议正式传达。

北京市人民群众、机关干部奔走相告，争相庆祝粉碎“四人帮”，把街上的烟酒都买空了。人们喜形于色，见面无不高谈“四人帮”的滔天罪恶，无不欢呼粉碎“四人帮”这件大快人心的好事。随后各机关、团体自动组织上街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各处的游行队伍汇成一股长流，川流不息。

自从回到北京，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毛主席，一来是他此时已经不容易见到了；二来陶铸问题没解决，我这个身份也不便去。

我最后一次见毛主席，是一九七六年十月，我满含悲痛地向他老人家的遗体做了最后的告别。但我内心深处总有种深深的惋惜：毛泽东英明了一世，为什么在他的晚年，要搞这么一场天怒人怨的“文化大革命”!?

我的女儿总问我一个问题：爸爸死得那么惨，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这是个很肤浅的问

题，我跟随主席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那么我对我的指路人当然会永存敬意！我叹口气，对我女儿说："不怨，主席晚年是个老人，是个病人嘛！"

第十六章　耀邦麾下

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是”的观点阻碍揭、批、查，我和老干支部的同志一道贴出了题为“向郭玉峰进一言”的大字报；汪东兴出面与我们谈话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万恶的“四人帮”终于被送上历史的断头台。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及其蛊毒已深深渗透到社会肌体中，“两个凡是”，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不准搞群众运动等框框，都成了一条条绊脚绳，阻碍着全国人民揭、批、查“四人帮”及其余孽。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同志上任后奉行这“两个凡是”的观点，把它视为金科玉律，实质上对扭转全国的形势于事无补。

事实上，明眼人都知道“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很多都是假借毛主席名义，打着毛主席旗帜干的。“两个凡是”实质上是保护“四人帮”所作所为，是真正违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路线的。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结果使大批被“四人帮”迫害和打倒的干部不能平反，冤假错案不能纠正，各级造反派头头大都仍稳坐台上。

更严重的是在“两个凡是”的指导下，到处又发生新的冤假错案。有些正直的人被抓进监牢，有些青年人遭枪杀，据说全国

有一百来人遭杀害，张志新烈士等无辜青年的血白流了。

但“两个凡是”压制不了全国人民和党员要求揭批“四人帮”、要求拨乱反正的呼声。全国各地仍旧运用种种形式揭批“四人帮”，如大字报、小字报、报刊杂志以及大会小会揭发批判。

倒是中组部宛如一潭死水，在职的所有干部一张大字报都未写，不言不语，埋头上班。我们老干部支部和部机关的老干部支部，在球场周围贴出许多大字报，没有一名在职干部去观看，没有一人公开或半公开对我们的大字报表示支持。这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紧锣密鼓布置大字报栏，贴出许多批邓文章，尤其是小组讨论，好像人人都要过关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

这并非说中组部干部是没有良知和感情的人，而是被郭玉峰一伙人严格控制封锁压制所致。

据说郑屏年还在纪登奎那里汇报，认为我们写大字报批判“四人帮”和揭露中组部领导人批邓的错误事实是企图反攻倒算。郭、郑他们还派人偷偷抄录我们写的大字报，其意明显是要算我们这些老干部的新账。还暗地散布谣言，说我们这些老家伙的尾巴长不了，嘱咐在职干部，坚守岗位，不准靠近我们这些老家伙。

他们对揭批“四人帮”，老是按兵不动，一声不响，后来将中组部王桂冀及陶信成、李继增三人抛出来，而这三个人是“四人帮”的忠实爪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这几个人又以批邓还没有形成更大的高潮为由，指责郭玉峰、中组部等批邓不力。郭玉峰抛出这三个人，却不公开批判的材料，不与群众见面。

即使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党的十一大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们也只提继续批判王、陶、李三人，但长期未能公开揭发批判，仍然不准我们进办公大楼，不让我们与大楼里在

职干部接近，不让我们知道大楼里揭批“四人帮”的情况。

我们老干支部的同志在小组讨论时，对粉碎“四人帮”后还继续深入批邓的做法很有意见，认为小平一九七五年再度出来并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时，提出的要全面整顿和工业企业发展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及综合提纲都是正确的，并不像“四人帮”故意歪曲事实的那样，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毛主席也曾指示以粮为纲，以钢为纲，难道就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吗？

我们还揭露“四人帮”借批林批孔，实际批判周总理、小平等老一辈中央领导同志，共同要求为反“四人帮”的正义行动“天安门事件”平反。我们列举出了许多有目共睹的事实，要求尽快释放因“天安门事件”被捕的人员，为“天安门事件”死去的人员昭雪等。

总之，粉碎“四人帮”的半年多时间内，老年干部支部的同志利用每星期两次或三四次讨论机会，尽力揭批“四人帮”和中组部郭玉峰等错误。那时我们对他们只是一桩一桩举出错误事实，要他们站出来检讨。但是郭玉峰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

我们老年干部支部的同志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无法控制住内心的愤懑，我们不能眼看着许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毁在少数不讲原则的无能分子手中，便以个人签名形式，在中组部球场的墙壁上贴出了大字报——

向郭玉峰同志进一言

郭玉峰同志传达了我党十一大的盛况和精神，我们都十分兴奋。但是你传达报告为什么和组织部的问题毫不联系？在推选你和高淑兰同志作代表时，你毫无表示，就光荣参加了十一大。现在外面广泛传言，你在十一大受了好多代表的批评，但你为什么传达时一字不提呢？你传达时说，你有好

多感受，为什么惟独对于这些批评没有感受？你的这种态度，能算是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吗？能说是实事求是吗？能说是有自我批评精神吗？邓副主席说："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你为什么不能按这个起码标准来做呢？揭批"四人帮"已有十个多月了，你的这种态度，能符合华主席的号召和十一大的路线吗？

接着中组部干校留守组第二支部也贴出大字报。我们集中揭批中组部领导郭玉峰忠实听命于"四人帮"的阴谋诡计，迫害老干部、排斥各类干部，搞一锅端干部政策；揭发郭玉峰等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向"四人帮"大表忠心，大献殷勤，辱骂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罪魁祸首"等劣行和罪行。

可是，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过来。这更加激怒了我们老年干部支部的老同志，看来光写大字报绝对督促不了他们检查，如此的中组部及领导怎能挑起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呢？

支部的同志们一致同意把中组部郭玉峰他们不揭批"四人帮"的一切，向中央反映。于是大家共同起草了一份报告，请管我们老干部的同志带回去找人抄写，并请其寄中央办公厅交中央领导。管我们的同志一口答应了。可中组部办公室不负责承担抄写任务，也不负责转报中央，不能替我们代办这件事。不知为什么他不把电话打给支部书记杨士杰。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我找到支书杨士杰，把情况作了汇报，九点钟我们老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大家商量，最初有同志提议要我抄写，由我送出。我表示有难处。有的同志以为我是害怕引火烧身，其实不然，我所顾虑的是陶铸仍认定是有问题的，如果由我出面，有的人很容易认为是在为陶铸活动。以前两个三岁和五

岁的孩子，是在玩耍时胡讲了一点话，就认为我们教唆孩子们，是企图阶级报复，要孩子们记住阶级仇恨等。小事都扣这种政治大帽子，何况向中央反映中组部不揭批“四人帮”情况，郭玉峰他们又要反咬我是阶级仇恨了。结果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经我这一解释，他们好像也觉得由我出面不大妥当，便请袁任远去办。袁老的儿子在总参工作，通过他儿子把我们的报告和材料送到中央负责同志手里。大概过了四五天，汪东兴找袁老、杨士杰、我以及郭述申四个老同志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大概是中央领导已经讨论过了，汪东兴对我们很客气，除了清茶，还在每人面前放一小碟哈密瓜。袁老汇报时，边讲边流泪，我们也感慨万千。汪东兴听完我们的汇报后说：

“你们老同志很关心中组部的问题，这种精神很好，中组部要改组，郭玉峰他们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你们放心，回去继续搞揭、批、查工作。”

他的一席话，使我们精神大振，好似吃了定心丸，回来告诉了老年干部支部的同志，大家都很高兴，但情况仍保密没有外传。据说，汪东兴也找了郭玉峰、郑屏年几个人谈话，内容不清，但他们散布谣言，说汪东兴批评了我们。

事实明摆着，我们对此毫不在乎，此时，最想知道的是谁来接替郭玉峰的工作？

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宣布“中组部要恢复为干部之家”；我任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组组长；胡耀邦从疑难案件入手平反冤假错案

因为关系到党的命运以及大批蒙冤的老干部的“解放”问题，也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尊严，我们老年干部支部的同志一直关注中组部改组一事。

传说胡耀邦要出任中组部部长，大家都无比高兴，杨士杰马上跑去询问耀邦。他说，华主席找他谈过了，还没有正式任命，不要公开出去。

果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免除了郭玉峰、郑屏年等人的职务，中组部原领导班子，即核心组亦停止工作。这样一宣布，大楼里在职干部也活动起来了，他们贴出了欢迎胡耀邦的标语。

月底，耀邦到任后，首先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一开始，他传达了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讲抓纲治国八条方针，即“八个一定”。但他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根据华国锋讲话的八条方针，用他自己的语言，一条一条作解释说明，既传达了华国锋政治报告的精神，又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见解，真是妙得很。

他在会上强调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尤其是干部路线是非再纠正过来，要尽快进行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他宣布机关各单位业务工作照常进行，努力搞得更好。

另外他开宗明义宣布成立三个大组：一是接谈组，由陈野苹任组长，与来访的老干部接谈，一般接待工作由信访组负责；二是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组，由曾志任组长；三是右派改正工作组，由杨士杰任组长。老年干部支部及干校留守支部的同志大部分都参加到这几个工作组里工作。

耀邦还在大会上宣布，中组部要恢复为干部之家，把关闭多年的大门打开第一道窗口，做好传达室工作是政治任务。要求传达室改变作风，任何来人来访都要礼貌相迎，耐心谈话。针对十年间老干部的身体大都受过摧残，上楼不大方便，耀邦特地要求接待组在办公楼一层腾出两间好的办公室，摆上沙发，让来访的老同志坐着谈话舒服些，还要让他们喝上热茶。中组部在职干部和不在职干部的精神十分振奋，面貌一新。

“阎王殿”砸碎了，西单中组部大门敞开了，门岗以及大楼内外有别的出入证取消了，我们这些老同志可自由进出大楼了。传达室的同志热情接待，耐心倾听来访同志的申述。来信来访者络绎不绝。对过时还没有离开的来访者，负责接待的同志就拿出自己的饭菜票为他们买饭菜。许多老同志来访时，被请着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热茶，心里热乎乎的，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地说：我们又回到家了！全国各地又纷纷传开了“中组部又是我们党员之家了！”这句话，从中反映出中组部的面貌已大为改观了。

随后，耀邦召开部分老同志和部分在职干部座谈会，商讨组织部本身的“揭、批、查”活动采取整风的形式，还是搞揭、批、查？会上只有少数同志发言，有主张用后者，也有主张用前者的，莫衷一是。

我建议，用整风形式较好，其中也含有揭、批、查内容，只是更加和风细雨。后来耀邦同意我的主张，并宣布除有严重问题的同志要处理外，整风期间，机关各部门每个干部职工上午参加整风，下午照常抓业务工作。既要积极参加整风，又要努力搞好本职工作，揭批“四人帮”和中组部郭玉峰等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等。大家都赞成。

大楼里的大多数在职干部卸去了思想上的包袱，积极参加“揭、批、查”活动。当然也有些同志思想上仍有顾虑或顾虑很大，持观望态度，这也是难免的事，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嘛！

参加完一段机关集中整风后，我就投入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中去，安置中央、国家机关待分配的干部。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不仅工作量大且困难，仅待分配干部的人数至少就有六七千人，如果加上仍在干校的和不适当地分配到外地需要回来重新安排工作的，则将近万把人。这些干部分散在各机关，年龄不一，情况各异。年轻的，既有党政干部，也有技术干部。他们之所以

没有安排工作，主要是所在单位认为他们政治或历史上有问题；或“文化大革命”中派性斗争所致，或是机构撤销，暂时找不到接收的单位。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他们长期没有工作。一时要给他们安排工作实在是既艰难而又复杂，特别是国家机关一些仍在台上的造反派们，千方百计阻挠那些被排斥出去的干部再回来工作。因此，还得先为这些干部落实干部政策，为其平反或纠正。

幸好胡耀邦充分考虑到问题的难度，适时主持召开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二十六个部委的部长、副部长座谈会，商量待分配干部方面的问题，耀邦特别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第八条关于“一定要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要尽快安置待分配的干部，对那些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干部，也要妥善安置，对需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少数人应尽快加以办理。基本上先请各部门自己解决，个别难以解决的，提出来和中组部共同商量解决。他指出这些工作做得怎么样，关系到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的问题。

确实，干部能否尽快分配工作，关键在于落实干部政策。我们根据耀邦座谈会讲话精神，督促和帮助各单位按具体情况开展工作，落实干部政策；并要求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成立由一部级领导亲自抓的待分配干部工作办公室。可是在台上的某些领导和一些干部群众，都借口待分配干部有问题不够明确，开展工作举步维艰。

耀邦了解情况后，征得华国锋的同意，分批从省和中央国家部门找些疑难案件，由中组部共同集体研究解决，具体分两部分同时进行。第一部分是安排湖南等四省组织部各带几份疑难案件来中组部，由耀邦亲自主持，参加开会的同志集体讨论。另外也召集了六七个部近三十名负责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同志，以及国务院政工组管干部的同志开会，先由一个部提出一个疑难案件向

与会同志汇报，如果其他部门也有同类型案件亦提出来一起共同研究。会场上气氛很热烈，各种观点、看法并存，互相争论，有些同志抱着“两个凡是”的观点，强调不能改变和平反毛主席批示过、指示过或过去已决定了的。也有些同志认定“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对的，认定某案件的人在某些问题上有反“文化大革命”行为等。这种种原因使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展不很顺利。

针对这种情况，三月底，中组部召开了国家机关十四个单位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从全国形势讲到如何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以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还讲到如何振奋精神问题，点面结合，深入浅出，目的是提高落实干部政策的同志们在新形势下的认识水平，解决思想顾虑和抵触情绪，对人触动很大。会后我们待分配干部办公室的同志们趁热打铁分头到各单位参加落实干部政策的研究讨论，以及揭批“四人帮”大会等。这样一来，虽然因情况各异，还有难度，但各部门待分配干部的工作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展较顺利起来。

耀邦告诉我，他听到老同志说，曾志这个人很厉害，在大会上居然敢公开点名批评；我认为耀邦高瞻远瞩，有勇有谋，实事求是，是个典型的工作狂

耀邦从一九七七年任中组部部长到一九七八年调中央工作，整整一年时间。这一年，是中组部翻天覆地、改头换面、工作突飞猛进的一年，他在我印象中的形象也渐渐地明朗起来。

我是一九四〇年在延安王家坪认识耀邦的。那时，他担任总政组织部部长，住在一栋平房里，与同期调总政兼宣传部部长的陶铸住的窑洞相隔不足三十米，只差一个上下坡。耀邦和陶铸很

谈得来，是好朋友，每星期六都有四五个住在王家坪的同志到耀邦或我们家聚会，一起聊到深夜，我因同耀邦没有工作关系，虽然天天能见面，但很少交谈，与李昭反而接触更多一点。全国解放后，陶铸每次到北京，差不多都要去看耀邦，而我仍旧很少接触。



一九九五年与胡耀邦夫人李昭在一起。

一九七三年我调回中组部供养，只是礼节性地去耀邦家里看望一次，因为陶铸还没有平反，我们家属去他原来的朋友、熟人家里，怕增加人家的精神负担，怕会给人家惹麻烦，所以我估计耀邦对我并没有什么了解，甚至对我的工作历史也是不大了解的。

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我第一次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与他的接触、联系密切了。他也常找我谈心、谈话。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听到老同志说，曾志这个人很厉害，在大会上居然敢公开点名批评调查部久拖不安排没有工作的一批同志。我问他，那些人是不是对我意见很大？耀邦笑吟吟地说道：

“不要紧，只要做得对，就不怕有意见！”

他对我是既鞭策又鼓励，坦诚地对我说：

“做工作要多交朋友、多交心，中青年朋友都要交，不要只交几个朋友，要广交朋友，交朋友要知心、交心，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他还掏心似地对我说：

“我有很多朋友，甚至还有小学生，八九岁的朋友，同他们交朋友也有好处。做工作、了解情况要注重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要从全面去了解，不要听一面之词。有时候，反面意见或少数人意见很有价值，要重视反面意见，有时反面意见也会出真知，多讨论讨论反面的意见有好处。对不同意见和反对过自己意见的人，不要抱成见，还应该主动和这些同志多接触，多接触可以多了解不同意见。在诚意的下面，也可以请持反面意见的同志考虑自己的意见，对持反面意见的同志不要动不动抱成见，甚至有个别同志想报复。这种思想不可能实现团结，尤其是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更应该注意这一点！”

有时耀邦也跟我商谈工作上的问题，征求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讲他自己的意见，一点也不拿架子。在他面前，我没有一种上下级的特别感觉，给人创造了一种轻松愉快的工作氛围。耳闻目睹，观其行察其言，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但他给我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从中也大受裨益，我的认识和水平等因此有很大提高。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认识不仅没有淡化，而是越来越明朗化。

——*实事求是，高瞻远瞩，有谋有勇。*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时，校长仍是华国锋，那时四处笼罩着“两个凡是”的阴影，耀邦却召集党校《理论动态》杂志和党校的其他同志，依据实事求是精神，共同研究商讨当前的大事要事，高瞻远瞩地抓住了当前的关键环节，出谋划策，组织人力写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两篇文章，先后在报刊上发表出来，石破天惊，大快人心。

这在当时一九七七年还要继续深入批邓的环境中，在华国锋是顶头上司的压力下，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但耀邦却在这夹缝中巧妙地掌握斗争艺术，把自己对时局的真知灼见，公诸于众。既不得罪华国锋，又把颠倒了的干部路线必须纠正过来的见解宣传、推广开了。真可谓谋略与勇气俱全！

他在就职讲话时，不是一开口就讲一番夸夸其谈的训词，照本宣科，而是以传达党的十一大华国锋政治报告的八条方针、以“八个一定”为蓝本，有重点地按照自己的意思发挥、解释，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推波助澜。当中央专案办公室不肯提交中组部整理的六十一个人的大案要案材料、档案时，耀邦就组织中组部干部配合外地干部重新调查，搜集大量事实材料，用真实材料作判断报给中央。

也许正因为如此，耀邦做工作，注重走群众路线，为他的正确决策提供了难得的一手材料。耀邦初到中组部时，部里机构没有正式成立，处于非常时期，工作千头万绪，可是他不事事包办，他首先找有关同志商谈某个事情、某个问题，然后交代任务，信任放手地让这个同志去完成，他还经常到我们各个办公室去找同志们座谈，鼓励大家放手工作，晓以工作方法。

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耀邦说，他喜欢在会前与到会的同志交谈、磋商，听取大家意见，对不同的认识作些解释，力求意见一致。在会上就尽量少发言。我认为这也是耀邦工作的艺术，也就是他经常所讲的“对人对事就是要实事求是做好群众工作”的观点的具体运用。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和福建务虚会议上，耀邦采取这种方法推动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

当然在那样的年代，要做到这点很不容易，有时甚至是要付出代价的。惟其如此才显得可贵。当因为“两个凡是”给我们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事情造成了最大阻碍时，耀邦在中央信访会议上又站起来理直气壮

地讲：

“不管是哪个领导批了、圈了，不管是已经决定了的，不管是历史上的问题或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都要以实事求是、群众工作、从实际出发去弄清事实，搞清真相。”

在大的原则问题上，耀邦总是勇敢地站起来，直接顶撞两个“凡是”，尽管要冒很大风险，顶着很大压力。

——高效率，快节奏。耀邦工作效率之高，也是惊人的，他一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时，是个典型的“工作狂”。早上八点钟左右来部，中午只在办公室长沙发上休息，下班后也要八点左右才回家，不是看人民来信，就是看报纸。据说那时人民来信每天一千多件，信访处看头遍，把约两三百份比较重要的来信，交耀邦秘书阅读，然后提送耀邦批阅。据说他每天要批阅两百多封人民来信。耀邦做工作总是先着手弄清情况，一旦情况明了，马上决定，决定了的就马上干，有下文，有结果，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很果断。他连星期天都不休息，总是找各部同志座谈了解单位“揭、批、查”问题。

耀邦这种扎实果敢、高效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了中组部的干部，那时差不多每个干部甚至连传达室、食堂的干部职工，人人都主动工作，高效工作，像干部部门的同志差不多每天加班到深夜两点左右，第二天又照常上班，没有加班费也没有什么夜餐供应。

——艰苦朴素，热情待人。耀邦这点在中组部是有口皆碑的。刚来组织部，他与大家一样在大食堂排队买饭。有一天中午，他牙痛，饭菜咬不动，可仍然忍痛在食堂吃饭，只见他用手托着下巴，很痛苦地慢慢嚼着。

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几年，他家门庭若市，老、中、青都去他家，来打听消息的、了解情况的、交流意见的、看望的都有。耀邦一律来者不拒，热情接待，若刚好碰上吃饭就一起吃。

那时，国家经济还很困难，油、盐、柴、米都凭票供应，也没有人送什么礼，招待客人吃饭，完全是靠自己全家节省下来的，他宁愿自己少吃点，总是乐呵呵地让大家吃安心饭。很多同志都在他家吃过饭。

耀邦没有什么领导架子，在中南海的时候，每天都有一帮人跟在他的前后散步。他们海阔天空地谈论，我都碰着好几次，虽然听不清楚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他平易近人的神态我看得清楚，也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

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金无足赤，人亦无完人。不管是多么伟大的人都会有不足和缺点，耀邦也不例外。我在这里谈的只是在他身边工作期间的亲身体会，至于他在工作中和思想上有哪些缺点，存在什么问题，党组织和许许多多的同志大都知道，用不着再讲什么了。耀邦已经去世多年了，我永远怀念他。

为解决陶铸历史上的疑点，我四处奔波；为所谓"呈文"问题，我致信华国锋、邓小平；陈云把我叫到家里，说写"呈文"要求释放政治犯参加抗日，不算自首叛变行为；陈曾固告诉我："呈文"的事我与陶铸商量过，但由陶铸修改是瞎编的

我终于弄清了陶铸历史上的一个疑点。

一九七三年我调回北京不久，就开始为弄清陶铸问题而奔波。首先我向曾在南京军人监狱与陶铸同监的同志调查。住在北京的，我就设法去拜访，在外地的去信了解实情。

从大字报的材料和一些老同志谈话来看，陶铸的问题好像主要是"呈文"问题。"四人帮"把南京监狱政治犯都定为以陶铸为首的叛徒集团，说陶铸是南京监狱叛徒集团的主要头头，是陶

铸带头成立一个组织，发动监牢的政治犯签名，向国民党写“呈文”，要求释放政治犯参加抗战的。据说“呈文”是陶铸负责起草的,内容主要是根据我党发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据说其中有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取消边区政府、改编红军等等。专案人员认定此文是一种自首行为。

我四处申诉也主要是为“呈文”问题，我请求陈云、华国锋、韦国清、邓小平等同志向中央转过信。我把陶铸专案组要陶铸重新写的自供中关于“呈文”一节全部抄录下来。

他在自供中说，西安事变以后，监狱中一些政治犯同志谈到释放蒋介石问题，有的认为党中央主张释放蒋介石是错误的，同意改编红军、放弃土改、取消边区政府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陶铸不同意这些同志的看法，他拥护党中央发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觉得当前中国主要矛盾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我们党不计前仇，争取蒋介石国民党一致对外抗日，团结全国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主要矛盾变化了，党的方针政策要符合团结统一抗日。

关于“呈文”问题，陶铸是这样说明的，狱中同志得到西安事变和中央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消息以后，非常振奋，希望早日出狱走上抗日前线。为此狱中政治犯各执己见，发表各种各样的主张。有主张向报界发呼吁书呼吁释放政治犯抗日，有主张集体签名向国民党写“呈文”，有主张分散写、个人写，也可写信给有资望的亲戚朋友，向他们呼吁，甚至有个别人急于想出去，提出找亲戚朋友代为履行简单手续，保出去。

陶铸坚决反对这些动摇行为。他对狱中的同志说，我们在监牢坐了这么久了，现在为什么不堂堂正正走出监牢，而要从狗洞里爬出去呢？这些话坚定了一些同志的信心。

陶铸说，写“呈文”一事，有些同志同他商谈过，某几个同志找机会也一起研讨过。他觉得写“呈文”没有什么意义，自己

没有写也不反对，但不主张政治犯集体签名写“呈文”，认为这样目标大，监牢那么大，政治犯那样多，一个一个监号传递签名不容易做到，主张分散写。后来也没有几个人共同写“呈文”，因为这时候监狱里已与外面的同志有了联系，个别同志已经出狱。自供书现已被中央存档，以上这些话则是凭我的记忆写的，不是照抄陶铸自供的。但可以明确的是自供中根本否认写“呈文”及呼吁书是陶铸执笔的。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六日，陶斯亮与女儿陶冶（阿妹）在湖南祁阳陶铸铜像前。

我相信陶铸自供写的是事实，记得一九三七年十月，我从上海、南京出来，途经武汉，与陶铸重逢以后，他向我讲述了在南京监狱的几年情形，其中也谈到在对待释放蒋介石和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问题上，与狱中某些同志争论过。那时他讲的和自供写的基本相同。而他还说出狱以后，在南京招待所，曾把在监狱中争论的问题，向审查组的同志提了出来，审查组认为他是对的。因此我辩白陶铸不是叛徒，请求中央早日为他做出审查

结论。

一天，陈云把我叫到他家，拿出陈曾固由甘肃寄给他的信。陈曾固也是南京军人监狱政治犯，与陶铸同时由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直接到监狱接出狱的。同时接出狱的共有六个同志，后来在延安、在东北都在一起工作，已是好朋友。陈曾固的信中也写了关于“呈文”问题。他说，“呈文”是他和陶铸等五个同志共同商量，然后报国民党的，内容是按照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释放政治犯参加抗日。

陈云认为，写“呈文”要求释放政治犯参加抗日，不算自首叛变行为。他从书架上，找出有关党的六大以来的一本厚书，找出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给我看，并允许我拿回家看了再还。陈云说，你根据这十条去为陶铸说明“呈文”不是政治问题，不是叛变自首，即便“呈文”个别词句不大确切，也不算政治错误（大意如此）。陈云同我谈话很亲切。那时他还没有出来工作，还在靠边站的时候，他这样信任陶铸，我万分感激。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也是陈云首先提出为彭德怀、陶铸平反昭雪的，这是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告诉我这一内情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曾固由甘肃回北京，我去看他，才真正弄清楚了这一问题为什么弄得阴差阳错。针对“呈文”一事我对他说：

“陶铸专案组，包括所谓南京叛徒集团，审查了几年，结果发现呼吁书是那时《法国时报》登载的，是搞中国情报的人写的，有名有姓与陶铸无关。而以全监狱政治犯写的‘呈文’，是一位叫何云的政治犯自己个人写的，他自己的文章中也详细述说了写‘呈文’情形，其他一些同志都说，有七八人签名，有的说了签名内容，有的说没有，但都未见正式‘呈文’的东西，你怎么会记得这样详细？”

陈曾固回答说："'呈文'的事是我与陶铸、何云等商量过，后来是否以全监狱政治犯名义签名还是分散签名我记不清楚，'呈文'由何云执笔、由陶铸修改是瞎编的。专案组要我承认，在压力下，瞎编一套。写给陈云的信也是瞎编的。我对不住陶铸，但我不是故意的。那时各种意见都有，谁的什么主张也记不清楚，有些情形凭想像、凭估计。"

听了陈曾固这些话，我觉得很可笑，也有点气愤，一个革命者怎么能为了自己一己之私，怕报复而信口雌黄，不顾别人生死呢？不过那时他身体很坏，"四人帮"把他整得半死，加上女儿和妻子都有精神病，脑子有些糊涂，我同情他，也原谅了他。

有人指责我包庇"三种人"，有人写小报告给中央领导，把我说成是别有用心，搞阴谋诡计，毫无党性原则的人；胡耀邦肯定我"对待干部公道正派"

疑难案件座谈会议后，我们中组部待分配办公室的同志们就分头投入参加有关部委批揭"四人帮"，拨乱反正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我参加的单位挺多，这里只着重写几个与我相关，甚至关系我个人前途命运的典型例子。

在地质部，我意外地遇到许多老熟人，他们的遭遇与二十多年前的情况何等相似，历史在某些时候就是那么惊人的相似！

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时，我在中南工业部工作，中南地质勘探局的工程技术人员，因大都是旧时人员，在那场运动中大都受到冲击，有的还受到体罚。我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制止违法行为，同年中南局这一机构撤销后，这套人马大部分调回北京地质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又受到冲击，科技人员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分子、"臭老九"。著名地质专家、地质部部长李四光，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含冤逝世。

揭批“四人帮”开始后，这批被打下台的科技干部仍得不到平反，曾在中南地质局的那些老熟人，纷纷来找我，诉说他们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我深入了解，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才摸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曾点名何某某及其他部的另外三个同志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因此拥何某某的一派受到冲击。刘、邓、陶被打倒后，拥何的一派翻身上台，揭批李四光一班科技干部，连站在科技干部方面的一些干部也受牵连，或被下放劳动或被送进干校。

我参加了几次他们的揭、批、查会，两种观点截然对立。掌权的一些同志，大都是行政管理干部。他们一口咬定失势的那些干部是支持打砸抢造反派的，说那些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周总理，但说不出什么具体内容，缺乏真凭实据。

例如“文化大革命”初期地质部一位副局级干部积极分子，支持李四光等技术干部，也为一般科技干部说过公正话。因而指责她支持部里一伙造反派，是为他们出谋划策的军师，证据是那伙造反派头头曾向上级写申诉信，信封笔迹像她的，但又没有验证，本人又不承认。在大会上，她的发言相当理智，首先检讨了自己的思想，解释一些情况，还是没人愿意安排她的工作，在揭、批、查总结报告草稿中，仍然把她列入部内一小撮造反派三种人团伙里面。

我相信这个同志决不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因为我查了她的历史，全家人都在革命队伍里，抗战初期，八岁的她就被叔父带到革命队伍里生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从来没有离开过革命队伍，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和培养起来的。

我找部领导商谈，传达耀邦“不要提团伙或一伙，这样不利于分化，不利于团结”的讲话精神，要他们实事求是地帮人，是什么问题就只写什么问题，可是在最后大会报告时，仍把她列入

有打砸抢行为的一伙里面去了，同时也不给地质部其他一些支持李四光的科技人员和党政干部，特别是局处级以上党政负责人安排工作。后来地震局重新调整班子，要中组部推荐人才，才安排了相当一批地质部的科技干部和党政工作干部。

可是事隔两年，在一九八二年党的十二大小组讨论会上，原地质部一位同志竟批评我包庇“三种人”，帽子真大。

轻工业部的情况有点特别，在揭批“四人帮”时，全体干部职工都紧锣密鼓、轰轰烈烈、劲头十足。可是进展到清查和落实干部政策时，各种意见分歧出来了，认识不一，观点不一，困难重重，特别是落实干部政策，难以进行下去。

轻工业部与其他一些部门一样，都是一派当权，另一派在台下，台上、台下干部对立。在台下的要求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并且有些同志控诉台上当权的某些搞清查、专案的人，打过他们，整过他们。

除此之外，轻工业部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是部内原本就有了裂痕、有成见。主要因为轻工部是“文化大革命”前由轻工业部、地方工业部、食品工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四个单位合并起来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军代表闻讯后进驻轻工业部，开始搞各造反派大联合，搞来搞去，各派都是桌面上握手言欢，桌下交锋，弄得一团糟。后来变成军代表只支持一派及其部领导，另一派及其领导都被打下了台，形成了一派当权、一派在台下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粉碎“四人帮”后，几年都没办法扭转，几任部长都觉得棘手。

我奉组织之命到该部帮助搞“揭、批、查”及落实干部政策，没想到惹上了一场麻烦，受到了当时的轻工业部一位领导同志的无端指责。她给中央常委写信，说我不按耀邦指示召开部党组会，而是偏听偏信，主观行事，颠倒是非，蒙骗中央……

我详述了我去轻工部帮助搞“揭、批、查”及落实干部政策

的过程和做法，我特别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六中全会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轻工业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和是非，应该说是清楚了的。现在的问题是以什么观点、立场、方法来分析研究和认识。一种是坚持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我们分析研究和处理轻工业部“文化大革命”中的遗留问题，要根据决议精神。另一种是坚持“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老观点，一成不变地认定“保”自己的一派不算造反派，是正确的。对同一观点的，搞专案、搞清查的干部，有些搞逼供信，搞打砸搜抄的，则认为是“奉组织之命”，并总以“一贯正确”自居。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就是轻工业部问题的焦点所在。

最后，我写道：

我的思想、理论、文化水平都很低，说话、处理问题、做工作一定有不少错误。但自信是兢兢业业，尽自己最大努力，想把工作做得稍好些。工作中发现了错误，我也是尽力去改正的。一九七八年恢复工作以来，虽然不多提意见，还是敢于负责的，但也深深感到现在做工作的确很难。调查研究、处理问题，凡涉及到人，就会有各种意见。特别是个别老同志，不顾事实，就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指责我和经济局的信已有三四起了。例如，×××同志写给中央的信，报送给中央常委、书记处、中纪委、国家机关党委，相当地广泛。竟把我当成了一个别有用心的、搞阴谋诡计、毫无党性原则的人。她是大革命前的老前辈，一直受人尊敬的老大姐。她对我的种种指责，流传出去是会令人相信的。我估计

现在有的同志已经对我有了看法。她这种指责在我平生还是第一次,我怎么去解释呢?不免有些委屈!当然,我决不会因此去做“难得糊涂”的人,照旧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工作。虽然我即将退下来,但原则问题绝不迁就。我最后写上这几句话,是向领导倾诉内心的难处。

不当之处,恳请指教。

曾志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日

幸好中央领导很英明,洞悉一切,很相信我,对我报告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极为重视,毕竟那个仅凭一面之词,打小报告而定人罪责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七月四日,耀邦迅速做了三条批示意见。

仲勋、野苹同志:

(一)这些年,曾志作了大量的工作,办事勤勤恳恳,对待干部公道正派。历史证明,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女干部,对此,是应充分肯定。

(二)×××也是我们党一位资历很老、饱经风霜的女同志,但“文化大革命”以后犯有毛病,对此缺乏认识,应给予帮助。

(三)曾志提出中央有些部门要注意的三个问题,我认为有道理,请告紫阳和万里,采取什么方法和步骤适当地解决才好。

胡耀邦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

七月七日仲勋在报告上对我提的三条意见做了批注：“这三条意见是正确的,请中组部研究一下,提出具体政策界限和解决办法，以便有章可循，不出偏差。”

同时紫阳和万里都在阅办件上做了批示：“我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也同意仲勋同志的批注。”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央专案组匆匆作出了“陶铸犯有政治上动摇的错误”的结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率先打破沉默，对陶铸光明磊落的一生给予评价；陶斯亮一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轰动全国

在陶铸受迫害的日子里，最揪我心的就是他的历史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为其伤脑筋。死者已矣，不管从夫妻情分还是从战友关系上来说，我都不能让他的英灵蒙尘。我始终相信历史和人民会还他公正的，我也时时在寻找着为他平反的机会，我在心里暗自盼望着那一天早点降临。

粉碎“四人帮”后，我除了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之外，心里的那个愿望悄悄萌动了，苦难的日子应该熬到头了，我全家翘首等待着。我们等呀盼呀，日子在令人苦涩的期盼中流逝着，可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却迟迟没有出现。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陶铸一人仅有。许多被“四人帮”打倒的老同志也都没有平反。原因何在？主要症结在于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阻挠，使拨乱反正困难重重。

虽然“四人帮”的一伙头面人物被粉碎了，但其帮派体系、机构人员基本未动，尤其是中央为审查制造被打倒老干部罪名而设立的专案办公室全班人马照常运转。“四人帮”幻化的幽灵仍然在四处飘荡，甚至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央召开工作会

议的前夕,中央专案办还匆匆作出“陶铸犯有政治上动摇的错误”结论,其意实在是欲置陶铸的政治生命于死地,实在令人寒心!但是以小平、陈云、耀邦为首的一班英明的领导同志时刻都在为此斗争着。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们得到了为陶铸和彭德怀平反的喜讯。会上陈云率先打破了沉默,随后不管是与会的中央领导还是其他同志都对陶铸光明磊落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赏,有些同志谈到陶铸的为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兹把一些同志在会上发言的原始记录摘要如下:

陈云说:陶铸、王鹤寿等是南京军人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七七”抗战后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的党籍问题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长级的干部。陶铸一案的材料却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他们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但处理中也有缺点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王任重说:陈云的发言,我完全同意。陶铸和我一起工作多年,他的历史是没有问题的。姚文元那篇《评陶铸两本书》的文章是荒谬的。其中一篇文章中提到:“太阳是光辉的,但有黑点。”这本来是正确的,因为太阳确有黑子。姚文元却诬蔑陶铸反毛主席。本来一部书出版前,作者进行修改是正常现象。姚文元硬说陶铸对一些文章修改,是因为有鬼。还说陶铸是“南霸天”,实际上他民主作风好,接近群众,是善于倾听群众意见的(几位同志插话说,陶铸确是一位好同志,是一位有能力的

好干部)。

陶铸因患胰腺癌，一九六九年逝世于安徽，死得很惨，应该给他平反昭雪。姚文元那篇文章应该彻底批判，肃清流毒。

“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要认真总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要分清楚。不然，心有余悸的问题解决不了。一个出了问题，牵扯一大片。因为我和陶铸在一起工作过，他们说我是陶铸的“心腹”。我被审查后，和我有工作关系的同志，有些人被打成了“黑爪牙”……家属、小孩、秘书、警卫员统统受牵连。政治上受歧视，使用上受压制。“四人帮”搞的这一套，必须彻底批判。

有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讲真话，明明是入党介绍人，他不肯承认，讲假话，写假材料，还有的人把自己的错误推给别人，有的还打人、骂人。“四人帮”横行时怕字当头可以谅解，现在应向党讲真话，讲老实话，承认错误。这样才有利于干部之间的团结，有利于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赵紫阳说：听了陈云、王任重关于要求为陶铸平反的发言，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陶铸是个好同志。他在广东工作十七年，贯彻中央路线方针是坚决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至今广东人民和干部对他还是很怀念的。一九六二年二月下旬，在解决广东军管问题会议上，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说：广东工作做得比较好，有成绩，其中陶铸有一份。我认为陶铸同志是受“四人帮”和陈伯达迫害的。一九七一年我去内蒙工作时，周总理找我谈话，讲到：陈伯达所以要打倒陶铸是为了抢他的第四的位子。毛主席本来要把陶铸的问题放在中央内部解决，可是陈伯达把这个问题搞到社会上去了，造成既成事实。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陶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各省市和中央各部领导同志说了很多话，保了不少人，所以遭到陈伯达、江青的打击迫害。

关于陶铸的历史，我不太了解。但我听说他被捕后在狱中表现是好的,斗争是英勇的。至于写过什么信没有我不知道。去年我接到他女儿的一封信，说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小报上关于陶铸历史问题的材料时，曾问过她父亲历史上有没有问题。陶铸付之一笑，说请你们放心，我的历史经得起考查。他女儿并提出对中央专案组审理陶铸问题不相信，认为他们只看一面的材料，要求增加一些新成员。我把此信转给了华主席。有关陶铸的材料应转到中央组织部处理。陶铸的审查结论要同其家人见面。现在到了实事求是地解决陶铸问题的时候了。

金明说：关于陶铸的问题，我同意陈云和许多同志提的意见。我原在中南局同陶铸工作过，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善于团结同志。他对搞好广东、广西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我在广东时不只是一次在街上听到群众议论，怀念陶铸在广东工作时他们生活比较好过的情景。陶铸是同江青、陈伯达和康生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有完全不同的意见被排斥和遭受迫害的。鉴于上述情况，我虽对他的其他情况不很了解，建议中央组织部，仍应对陶铸的问题进行了解，搞清楚，在适当范围内有所交代。

吴庆彤说：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午夜三点多，中南海西北门围了几千群众要求抓陶铸，周总理站在西北门门口对群众讲话时说，你们说陶铸是叛徒，我不清楚。你们有什么意见可推出代表谈。当时最活跃出头露面的人是原学部的王恩宇，后来知道此人是追随陈伯达、江青一伙的。可见，当时中央没有讨论陶铸的问题，揪陶铸的行动是陈伯达、江青一伙策划的。原来听说毛主席对陈伯达、江青一伙背着中央煽动群众揪陶铸很不高兴。

安平生说：我同意陈云、王任重、赵紫阳关于要求为陶铸平反的发言。陶铸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他工作有魄力，敢于负责，作风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他的不幸逝世，

是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应予平反昭雪。

杜星垣说:陶铸的女儿对我讲,南京有个刘顺元,当时是负责办理我党出狱人员工作的。据他说,出狱的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表现好的,继续留在白区工作;第二类是怀疑的,送延安审查;第三类是表现差的,发给路费回家。陶铸属于第一类,出来后仍留在白区工作。

刘志坚说: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同志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江青回去后大发脾气,说陶铸的选票为什么那么多?排列第四?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科委开大会,未通知聂荣臻、陶铸等同志,陶铸问为什么不通知我,江青大发雷霆,说你这样对待群众,群众就要打倒你。不久,街上就出现了“打倒陶铸”的大字报。

张平化说:陶铸工作干劲很足,敢于负责。他到中宣部工作后,首先就抓《毛泽东选集》出版工作,筹备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关于他历史上的问题,现在老同志们都在,我看可以查清楚。

杨静仁说:陶铸过去工作是有成绩的。“文化大革命”中说他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实际上这是林彪、“四人帮”搞的。我同意给陶铸平反。

……

这些发自内心的发言,是对“四人帮”恶行最直接的控诉,是有亲密战友情谊的同志们,对陶铸表达的无尽缅怀。

我女儿陶斯亮激动得激情迸发,将积压了十年的悲愤和感情诉诸笔端,急急忙忙写成了长达一万多字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悼念他的父亲。文章贯注着对父亲深切、真挚的情感和对“四人帮”颠倒黑白行径的强烈控诉。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纷纷转载,引起了全国无数父老兄弟同胞、党政各级干部的强烈共鸣,引起震动。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去合肥迎取陶铸骨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陶铸身边的工作人员及亲友赴京参加陶铸追悼会。

安徽省委的同志在当地报纸上看到斯亮的文章后，马上发来电报,告知陶铸的骨灰放在合肥陆军医院。次日在空军司令部刘世昌副政委的帮助下，空军派专机送我全家去合肥接陶铸的骨灰。

大概是行动比较仓促的缘故，我们一上飞机，发动机刚转动，就发现坐椅底下冒烟，并有股胶皮被烧焦的臭味，只好改乘另一架飞机了。抵达合肥已近上午十一时，安徽省一些党政领导同志专程到机场迎接我们，随后直奔陶铸骨灰存放处。陶铸骨灰原来已被改名黄河，存放在一个破房子里，我们去时，骨灰盒改换成新的，并设了一个灵堂。瞻仰完，我们又到陆军医院，召集医生、护士等分头座谈，了解陶铸从住进××医院到去世前的生活细节。下午二时，我们捧着骨灰盒返回北京，抵达西郊机场已薄暮暝暝，可是我一下飞机，竟发现有几十位陶铸生前的同事朋友们冒着凛冽的寒风在飞机场等候陶铸骨灰的归来，那一刻我再次被感动了，我在心底为陶铸感到由衷的自豪。

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会，参加人员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政军同志外，还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的全体同志，共两千多人，陈云、邓小平分别为陶铸和彭德怀致悼词。随后，陶铸的骨灰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规格安放在八宝山骨灰堂第一室。

第十七章　照人余光

耀邦宣布我和杨士杰为中组部副部长，但我却没见到过正式任命通知，七十五岁才正式行文免职；我集中精力投入到经济、科技战线干部和人才的考察培养工作中去；党的十二大前，我参加了考核党代表工作

胡耀邦一就任组织部部长，即安排我们老年干部支部的同志参加中组部工作。他在部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任命我和杨士杰为副部长，我分工负责经济干部局(但实际上我和士杰一直都未见到中央正式任命的通知，我只见到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在中组部要我和杨士杰担任副部长的请示报告上画了圈，是耀邦给我看的，并告诉我正式任命等调整领导班子时再办)。

蹊跷的是后来我仍未见到中央的正式任命，不知是忘记了，还是什么?我任副部长，当然没有人怀疑，况且免职时也有文字通知。这也说明我是有任命的，但我总有点迷惑不解，也许是特殊情况吧!

以前规定我们退休年龄，一律为七十岁。我满七十岁的第二天就向中组部领导写报告，请求退休，结果拖到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才正式行文免职，前后总计五年半。

这时风风雨雨大半辈子的我，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也发生重大的变化，陶铸问题的彻底解决，卸去了我内心最大的心病和包袱，我们再也不用躲在受禁锢的环境里生活。



胡锦涛与曾志和陶斯亮摄于北戴河。

时光荏苒，岁月无情，承蒙党和人民的信赖，又给了年过花甲的我工作的权利，我只有加倍工作，才能报答这份恩情，我集中精力投入到经济、科技战线干部和人才的考察、了解、培养、使用及其领导班子的调整研究工作中。

经济干部局所辖的单位多、范围广，除国务院机关、各部委办局、参事室等单位的副司局以上干部由各部委管理，中组部备案、审查外，各部委的直属工厂、企业、科研院所相当于副司局的干部亦需中组部做具体工作。两者总计七百多个单位，分布在全国各地，不但要直接去考察了解处以上干部，还要对这些单位的领导班子全面考察，提供有关情况以及使用、培养、调整等意见向中组部汇报。而经济局的干部仅五十多人，如果仅靠这些人想做好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常常与部委中管理那些单位的同志及省市组织和经济部门的同志共同配合开展工作。

七十年代,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理论，

他说：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危机，不是四个现代化路线方针对不对，真正的危机是缺乏一大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小平还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注意吸收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参加各级领导班子。

耀邦也要求经济部门要重用科技干部，以此来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陈云也多次指出，各级领导要吸收青年干部。他建议中组部成立青年干部局，专门在全国各地考察了解青年干部，要储备大批青年后备干部名单。后来正式规定，各级领导班子的干部要成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干部。

根据这些精神，我们随即召开了经济战线和科技部门的各部委负责干部工作的干部会议，作了传达。还要求各部委都要抽调干部到企业和基层单位去蹲点，调查发现考察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人才。

为了着重考察了解科技干部的工作和使用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掌握第一手材料，从一九七九年初开始，我和经济局的一些同志首先深入燕山、首钢、内燃机厂、北京针织厂、纺织厂、第二化工厂、北京塑料厂、酿酒厂等北京一批正在试点的工厂了解情况。这些厂都是党委书记负责制，有的厂正在实行目标管理和职工代表大会民主管理试点，那里的车间主任、分厂长大都由老工人一级一级提拔上来的，年龄都比较大，科技人员在生产技术上根本没有指挥权，厂长对生产指挥的作用也不大。但有的企业党委集体领导得比较好，而有的则只是党委书记一人说了算，情况并不容乐观。

随后我们到了天津和唐山煤矿。在天津分别召开了老中青科技人员座谈会，请他们充分对自己的工作、生活上的问题发表意见和感想。

普遍反映的是老科技人员，虽有职有位，但年老力衰，科学

知识赶不上现代化生产发展的需要。中年科技干部则有职无权，无用武之地。

青年科技干部更是如此。一些“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有专业特长的青年，有的仍在车间当工人，有的在机关部门打杂。开滦煤矿总工程师对我说，他有职无实权，常年是书记、厂长的技术秘书，领导开会、做报告，他得负责准备技术发言稿及技术资料；到上级去汇报，他得作为临时资料供给员，夹着皮包坐在书记、厂长身边。青年技术人员工资低，生活困难，住房紧张、孩子上学难等问题成了他们沉重的精神负担。一些科技人员因为家庭或海外关系等，压得他们抬不起头，自卑感很强。“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科技人才劳动的多，搞科技工作的少。

更有甚者，有的工人认为科技人员的发明创造，如果没有他们去制造、操作，也是白搭，据此他们也提出要分发明创造奖金。所以有的年轻技术干部说，不搞技术发明创造倒好，若搞点，不要说得奖金，还得倒贴上自己的工资买糖果，分给大伙工友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几个人肯伤神去搞发明创造？

至于落实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就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也相当的困难。例如粉碎“四人帮”以后，邮电部在干校劳动的其他职工和干部都回北京了，惟独不让六位科技干部回来，直到我们发现后，提出询问，他们才被解放。还有地质部、煤炭部亦有同样情况，看了令人沉重。

紧接着我们又到沈阳、抚顺、营口、大连等东北一些地方了解企业优秀中青年干部和领导班子情况，本来还要去吉林和黑龙江，可是到吉林，我得了肺炎，不幸病倒了，只好返回北京住院。

出院后，我就分别把从天津、唐山开滦煤矿和东北考察了解到的科技人员以及优秀中青年干部情况整理成材料，向部务会议

汇报。

一九八〇年五月，中央组织部召开全国各省市组织部部长和各部委管干部的负责同志座谈会。主要研究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和调整“三位一体”（即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调整不称职的干部、年老体弱的干部退居二三线）领导班子等问题。这时已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以及已任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参加了会议。耀邦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大意）：

我们现在已经真正在搞“四化”建设了，现在第一个困难是领导班子不够理想，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我们是一个大国，在干部工作上的打算要长远一点，局面要布得开一点，两年内一定要完成“三位一体”调整领导班子的任务。

会议一结束，我和经济局的同志商量后，从一机部、四机部、冶金部、交通部、经委等单位各抽调几位比较负责和有经验的同志，共同组成考察工作组，主要任务是宣传这次组织工作座谈会议精神，了解企业领导班子，并和当地党委组织部门商讨企业如何按照“三位一体”调整领导班子。

因此，我们每到一处除向地方党委汇报意图和做法外，都选择几个工厂，召开所在地区工厂企业的党政领导班子、非党员科技人员、党政工作干部和职工代表参加的上千人大会。

最初由我宣讲，逐条解说座谈会的精神，然后由参加大会的同志回本单位组织人员座谈讨论。我们考察组全体人马以及地区做企业干部工作的有关同志都分头下去宣讲或者组织附近工厂分片宣讲，参加小组讨论，听取意见。

同时我们又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一份《民意调查题目》，对领导班子进行称职或不称职的民意测验，并推荐其他的优秀中青年干部、科技人员。大家做这项工作非常认真，认为是组织给他们民主权力，一定要实事求是，有的同志把被推荐者的事迹，写了十几页纸，使我们从中发现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这样做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把组织工作座谈会议关于选拔年富力强的优秀中青年干部、“三位一体”调整领导班子的要求和重视科技人才使用，以及今后要从有文化的工人中提拔干部等问题，一竿子插到底，使各工厂企业干部、职工都知道了有关精神，效果很好。

这次考察，我们走遍了陕西、成都、重庆，然后乘长江轮船到湖北武汉，与干部、群众接触面比较广，讨论和调查中同志们也提出不少问题。

因此在湖北省委召开的干部会上，我专门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从领导班子不够理想、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速度必须加快、“三位一体”调整领导班子是否会大换班、今后脱产干部一般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农民中提拔、知识分子参加领导班子是否会变修、不称职干部的界限、年老体弱的同志退居二三线、对年龄偏低的工农出身的干部提点建议、政治思想工作、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等十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入手，谈了自己的看法，解去了许多人心中的疑问，影响很好。

随后我们把到各地直属和地方企业了解到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和科技干部的情况，几经筛选，基本上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个原则选拔了约二百来名较高级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并把这二百人的简历造册，每人另附一份优秀事迹表现材料，经部审阅后，由中组部报送中央书记处领导审核选拔。

中央领导同志看了，都认为是一份很有用的考察材料。

为了进一步培养和提高这二百名比较优秀的中青年干部，特别是提高他们的党性原则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我们在党校专门为他们开办了为期一年的中青年干部理论培训班，学马列主义，毛主席的方法论、实践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以及当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

我认为对这些有知识、有专业却缺乏革命理论知识的同志来说，很有必要补上这一课，才能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领导班子的需要。

这批同志毕业不久就陆陆续续参加了中央各部门、各大企业领导班子和省市部门工作了。特别是一九八二年国务院各部委调整领导班子，有好些人都是从这批干部中选拔的。

在一九八二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党中央十分重视对十二大代表和中委有关候选人员的考察，从有关部委抽调人员，组成专门的审核机构，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领导。我作为中组部的副部长，对十二大候选人的考察及一些准备工作，理当有责。中组部还有两个副部长、十二名局处级和一般干部被抽调到办公室和小组做具体工作。同时我们还要负责六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考察和审核。

所有被抽调的人员从一九八三年三月进入这个临时机构，直到六届人大和六届政协正式开幕时才完成使命。说明党中央对党的每个代表、人大、政协每位代表与委员的资格审核都非常认真负责。

党代表们都是最基层的党员，层层民主提名，经过各级和各部门党组织层层考核，由下而上，下下上上几经反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不例外，既充分发扬了民主又严肃认真地做到了集中，体现了党的核心、中心领导作用。

不过，对候选人意见不一致的事情常有发生。尤其是受十年“文化大革命”派性斗争的影响，对一些候选人的看法，往往掺杂着派性观点。遇到这样的问题，就要反复全面细致地调查考察，决不能只听一面或一派之词。

作为中组部干部，我有责任查清楚有争议的候选人情况。因此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上面。本着对同志、对问题负责的原则，征求多方面意见，认真研究分析，提出实事求是、客观合理

的意见，但有时很可能会受到某一派观点的攻击。要有维护真理，不畏攻击的精神准备。

例如，某个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经过多次调查，党组织知情人都多方证明查清楚了。但有派性观点的人，硬是揪住不放，听信四处散布的不实之词，特别是在一些老同志面前说三道四。某些老同志也信以为真，纵然后来向这些老同志说明真相，他们不仅听不进去，还要在一些场合胡乱宣传，以讹传讹，三人成虎，有些人更是确信无疑了，对当事人造成更大的不利，要为他澄清事实，就要费力地做更多的工作。我始终认为做组织工作就要对群众负责到底，不能让同志背包袱，受委屈。我在这方面花了不少力气，遇到候选人审查组人员有分歧意见，我还得用大量事实，几经说明，才能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

当然，在考察代表候选人中，我们也发现鱼目混珠的现象，一些属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或支持造反派错误很严重的人，根本不适宜做代表候选人，经过慎重讨论研究，被我们退了回去。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要明辨是非，保持清醒的头脑。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感慨万千，觉得人言可畏，舆论的力量不可低估，一些不负责任以及毫无根据的传言一旦被人接受，就很可能变成致命的武器，而且一种气候、舆论一旦出现，往往容易于一边倒，给人以毁灭性的摧残，令人无力反驳，只能忍气吞声。一些人在某种气候、某种形势下，虽明知传言不可信，不公正，也不敢站出来讲公道话。

党的十二大后，我成为中顾委委员，最初两年，中顾委建立临时党委，我与傅崇碧是副书记；中顾委名声很大，社会上很多活动都请中顾委参加，我一时成了“电视明星”；我费了相当多的精力，中央才批准同意成立“全国工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央通知免去我中组部副部长的职务，党的十二大又把我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顾委”)委员。

中顾委属荣誉性的机构，二线工作。其实我在那里既没有怎么顾，也没有怎么问。最初的两年，中顾委建立了临时党委，伍修权任党委书记，我和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为副书记。

中顾委的主要任务是定期学习。党委经常开会抓在京委员学习和了解外地委员的生活、学习情况，有时也出席中顾委的片会。后来因为临时党委在党的生活会上对中顾委有些同志进行了批评，这些同志不服，写信给总书记，总书记批示，停止批评。不久中顾委临时党委就撤销了，各地中顾委片会也随之取消。

除了组织学习中央文件，学习领导同志讲话外，中顾委就是组织委员们外出参观访问。有些中顾委委员从外地调查访问回来，都写文章登在中顾委通讯上。我最初去外地回京，也写过几篇报告登载在那上面。后来觉得内容平淡，不起什么作用，反而浪费纸张和印刷，就不写了。

中顾委的名声倒相当大，人们都尊重中顾委委员，社会上的一些什么鉴定会、颁奖会、新产品发布会、纪念会都要请中顾委老同志去参加。我身体较好，中顾委办公厅同志比较经常地分配我参加这一类活动。这倒让我矛盾起来，不去参加吧，邀请的人会认为我摆架子、傲气。去参加吧，又会有人说我爱出头露面。

我想，为什么一些单位，特意要请我们这些老同志？无非是想让老同志给他们一些支持，给他们增添点知名度，使他们的工作更顺利些，也就是为他们做宣传广告。既然这些人需要我们这点微弱的余光，且又不是坏事，我就尽量去贡献吧！说三道四的人总是会有的，听了就是，只要问心无愧。所以那时电视里经常出现我的镜头，我好像倒成了电视明星。

我还有被聘请为各种顾问的聘书二十多本。当然，除了全国工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顾问外，其他的都是挂名的，没有真正去顾什么问。而我当全国工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顾问是有原因的。

早在一九八二年，各工业部门政治部、党内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济部以及国家经委政治部都在机构改革中被取消了。可是思想政治工作决不能放松，今后的工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该怎样去做呢？一定要有一个组织来维系它、联络它。因此想采取以全国工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这种半群众、半行政性质的社会团体，把取消了的全国政治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承揽下来、维系下去。

为此，我费了相当多的精力，中央才批准这一组织成立。编委会也给了十几名专职工作人员的编制。先是挂靠在国家经委，后来改挂在中宣部，我对这个组织是重视的，最早参加也是积极分子，可是很遗憾，后来我除了每年参加开会，没有做什么具体工作，严格地说我这个顾问也是不称职的。

一九八三年闽东之行，老区人民尚未摆脱贫困，也没人承认闽东是老苏区、老根据地；我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中央发了[1984]年第八号文件；十年后的一九九四年我重返闽东，老区已发生很大变化；一九九七年，我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党的十五大

大约一九八三年十月底，福建省福州市委召开征集党史资料座谈会。我曾在那里做过工作，便应邀参加，也勾起了我在闽东战斗岁月的回忆。往事虽如烟，但犹历历在目，十分怀念那里曾与我一同出生入死的父老乡亲们。

于是会后我毅然决定前往，我沿途走访了宁德、福安、霞

浦、福鼎等地，给我最大的感受是，这些地方经过三十四年时间的建设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沿海市镇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公路贯通各县，一些山区的羊肠小道也可以通汽车了。

不过四处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不见了，满山遍野剩下的只是茅草灌木。闽东海岸线很长，有些港湾盛产黄花鱼、带鱼等，很多县都有很好的滩涂，极适宜发展养殖业，可是我这次沿海岸线跑了几百里，仍然像三十年代我在闽东工作时一样，没有看见有一处滩涂被利用起来。

老区人民还没有摆脱贫困的阴影。

但这次闽东之行最令我震动和不安的是闽东老区地位的确认问题。

从一九三三年闽东成立五县市连成一片的苏维埃，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叶飞带领闽东红军独立团编入新四军，整整五年时间内，闽东人民与国民党军队及地主民团反动武装进行了殊死搏斗，房屋被烧数万间，牺牲了上万名干部群众，不管革命处于高潮还是低潮时期，一直没有放弃斗争，为革命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是福建省政府仅把闽东定为游击区，竟没有承认它是老苏区、老根据地，也没有充分认识闽东在我党革命斗争史上的历史地位。

因此一些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赤卫队员，得不到国家、政府的照顾，他们贫困交加，有的老队员连儿女也不愿意赡养。儿女们说，你为革命出生入死，为革命战斗一生，解放了，国家政府、党对你毫不理睬，做儿女的也养不了你。有一位七十来岁的老交通员，儿女都不愿养他，自己便在深山里挖一个地洞居住，平时在地洞周围种点红薯之类的东西，以红薯、野菜度日，也准备以地洞当坟墓。看了令人心酸，着实不该，我更是坐立不安。

其实叶飞、粟裕都在闽东进行过革命斗争，叶飞、范式人早应该证明闽东是老苏区了。不知为何一直拖着没办，使一大批农村“五老”多受了一些苦难。我下决心要尽自己所能奔走呼告，帮助解决这个事关闽东发展的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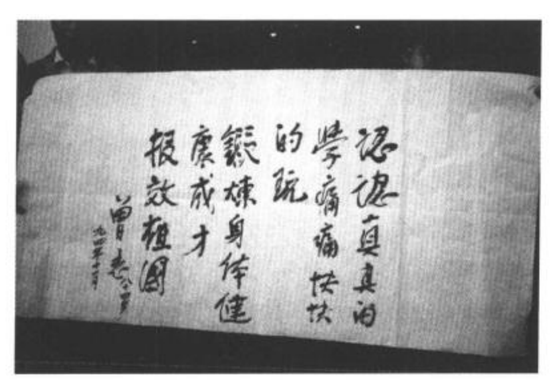
因此，我把闽东革命斗争的前前后后，以及二十来天在闽东各县的所见所闻，详细写成了一个报告，着重提出了包括闽东老区问题在内的八条建议，向项南和省委几位领导同志汇报，让省委了解实际情况。

一回到北京，我又针对这八个问题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耀邦、仲勋都分别作了批语，由中央办公厅以[1984]第八号文件转发给福建省委和各地，不久中央办公厅又书面催办。因此，这几个问题很快在福建解决了，闽东老区问题也解决了，闽东人民奔走相告，十分高兴。

十年后，我应邀参加闽东苏区创建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回到这片红色的土地。我惊奇地发现，闽东老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宁德、福安市区高楼林立，灯火辉煌，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一〇四国道沿途的山上种满林竹和各种果树；赛江沿岸遍植绿竹，形成百里长廊；沿海滩涂和海域被利用起来发展养殖业，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当年闽东苏区的首府柏柱洋修通了全区第一条村级柏油公路并开通了程控电话，我高兴地参加了通车剪彩仪式和电话开通仪式。当我兴致勃勃地接通了北京家里的电话时，在场围观的数千名老区群众热烈地鼓起了长久的掌声……

一九九八年春，宁德地委书记荆福生晋京到医院看望我。从他那里，我高兴地获悉：从一九九五年六月起，一场波澜壮阔的争创小康村活动在闽东大地全面展开，百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当年老区人民的优良革命传统，为改变贫困落后面貌，铁心拼搏，艰苦创业，谱写了一曲战天斗地、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



在闽东为希望小学题词。

三年来，他们以宣传为先导，营造万众一心奔小康的氛围，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增产增收为重点，千方百计实现民富村富，一九九七年全区农民人均收入两千五百多元，村均集体纯收入达六万八千元。同时，他们始终坚持在争创小康村活动中，实施扶贫攻坚计划，采取多种措施和形式，帮助贫困村、特困户脱贫致富。



这是小亮为姥姥拍的最后一张照片。虽然病魔缠身，却依然笑容灿烂。

至一九九七年底，全区共有八万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消除了绝对贫困；造福工程搬迁近五万人，结束了近万人至今还居住茅草房的历史；使全区农村行政村基本实现了通水、通路、通电、通程控

电话和电视覆盖。这可是一大了不起的成就！

听到这些消息的当晚，我躺在病床上心情激动、夜不能寐。我为闽东老区有今天的可喜变化而感到十分欣慰，同时我也衷心地祝愿闽东老区人民有着更加美好的明天。

我的一生虽然历经许多坎坷，但我又是幸运的、幸福的，生活得无怨无悔。虽然也犯过不少错误，可是党组织始终信任我，领导、同志们和群众也信任我，给了我许多荣誉。一九九二年我都八十二岁了，大家还选我当十四大代表，这在中直党代表中，年龄算是最高的。一九九七年，我又以列席代表身份出席了党的十五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党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比金子珍贵，甚至比生命还重要，我对这种信任终生感激不尽。

现在我已是一个耄耋老者，也不再担任任何职务，我的一生也就此告一段落，我愿足矣！

后　记

作为中国革命的幸存者和见证人，我深感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的革命历史过程记述下来留给后人。因此早就萌生撰写回忆录的念头，但后来由于公务繁忙而未能付之实施。

一九六七年，陶铸在北京被“中央文革小组”打倒，我们被禁锢在中南海的“卍”字廊住所中。怀着痛苦的心情，在寂寞的时光中，我动笔开始了这漫长的写作，并且完成了初稿。然而骤变的政治风云，很快打乱了我的计划，我不得不停下笔来，与陶铸一道来抵御那场风暴的袭击。陶铸蒙冤去世后，我被下放广东监管，插队邱屋，每天除了下地劳动外还得照看着年幼的外孙，根本无法动笔写作。

一九七三年，我获准回北京。一九七七年我出任中组部副部长，投入平反冤假错案等重要工作，写作再次搁浅。

一九八三年，我从中组部工作岗位退下来。尽管社会工作很多，但我还是忙里偷闲，并且充分利用数次到北戴河休养的有利条件抓紧写作。

爬格子确实是一件苦差事，更何况这是一个五六十万字的浩大工程，且前后历时二十几个寒冬酷暑。如果说在“卍”字廊住

所时，我是被造反派们禁锢在紫红色的高墙中才求得暂时的空闲开始写作的话，那么在北戴河休养时，我是不得不将自己关在四周塞紧了的蚊帐里写作，以躲避众多蚊子的侵扰。

为了求真求实，我尽量自己构思框架，自己动手撰写。只是后来由于年岁已高，气力不支，才改由我口述，我的前后任秘书刘朝辉、朱华、李东梅根据录音进行整理。有些部分则是引用了当年的文献材料、总结报告和工作简报等。经过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于一九九三年脱稿完成六十余万字的第二稿。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修改此稿了。

但女儿陶斯亮根据我的录音，写了部约十一万字的书《曾志的故事》，由于是本儿童读物，我觉得过于简练和概括，心想总有一天，我还是要将自传详细写出来的。但没想到，一九九五年我被发现患了恶性淋巴癌，且已是中晚期，我以八十五岁高龄毅然接受了化疗，全力以赴地与病魔进行斗争，写书的事自然暂时被搁置下来。

一九九七年秋天，虚弱不堪的我再次住进了北京医院。每当夜幕降临时，我常常因想到那尚未修改完成的书稿而难以入眠。因此我想借此次住院治疗之机，也抓紧时间治治那个“心病”。

年底，时值福建省宁德地区驻京联络处原主任郑向忠到医院看望我，言谈中我流露出了书稿至今尚未整理出版的遗憾及欲将此事相托的意愿。郑主任旋即将此事向宁德地委荆福生书记作了汇报。宁德地委十分重视，立即抽调缪小宁、程沛森、邱树添三位同志组成整理编写小组进京，担此重任。经过三个月的辛勤工作，形成了第三稿。随后他们分头前往厦门、漳州、沈阳、内蒙、武汉、广州等地，在各地党史部门的支持下，对书稿进行了查实、补充、订正。最后缪小宁再次进京，完成全书的修改统稿任务。

在本书的整理出版过程中，宁德地委、宁德驻京联络处和福

安、福鼎、宁德三市委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予了无私的援助。在此我向所有关心支持本书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自己水平有限，加上年代久远，又由于时间有限，身体欠佳，我只能审读部分重要章节，而无法从头到尾看完。因此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本回忆录很难尽如人意，遗漏和失误在所难免，我期待着读者们的批评指教。

曾　志

一九九八年六月

附

致 母 亲

——白云山上的祭文

亲爱的妈妈：

还记得吗?二十年前，您带领我们一家来到白云山这一处僻静的山坡上，安放了这块松风石，并埋下一只盛过父亲骨灰九年的破旧盒子。这样做，是为了让蒙冤而逝的父亲，能够魂归他一生钟爱的广东大地。



曾志去世，陶斯亮、理由及小亮、阿妹、王亚钦送最后一程。

今天，我带领孩子们，按您的遗愿又来到这里，而这次埋下的是您的骨灰。您在广东的老战友们、老朋友们，以及亲人们，冒着冷冷的阴雨来为您送行。

您之所以选择这里，我想，一是惟有此处您才能与父亲相会；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广州是您一生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长眠这儿，可以永远守望着这座承载着您无限深情的城市。

您的遗嘱，我是在您逝世当天才拆看的。在一只旧牛皮纸信袋上写着一行字：我生命熄灭时的交待。看了您的遗嘱我不禁泪流满面，一半是由于悲伤，一半是由于感动。

您以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生死观来对待自己的后事。在遗嘱中您交待："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里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知打搅；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另一部分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绝不要搞什么仪式，静悄悄的，三个月后再发讣告，只登消息，不要写简历生平。"您写道："我想这样做才是真正做到节约不铺张。人死了，本人什么都不知道，亲友战友们来悼念，对后人安慰也不大，倒是增加了一些悲哀的忙碌，让我死后做一名彻底的丧事改革者!"

弥留之际，当您刚从一场昏迷中清醒过来，看到有那么多的人来看望您时，您用责备的眼光看着我，从失声的喉咙中发出费力的请求："不要把我抬得太高!不要把我抬得太高!"妈妈，您真的是想静悄悄，静悄悄地走啊!

就在您临终前不久，您让我清理了您的存款和现金，我从八十只信封袋(工资袋)中掏出了几万元的现金，这是您多年来逐月存下的。您再三嘱咐我："一定不要扔掉那些信封，因为它们可以证明这些都是我的辛苦钱，每一笔都是清白的。"

此时，您已病得奄奄一息，剧烈的癌症疼痛，常常使您浑身

哆嗦,神志恍惚,但您仍集中起全部意志力,向我口述了您的另一份遗嘱。您开宗名义:“共产党员不应该有遗产,我的子女们不得分我的这些钱。”“要将钱交中组部老干局,给祁阳和宜章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以及留做老干部活动基金。再留一些作出版我的书之用。”您在让我念了几遍,确认没有违背您意愿的地方后,才拼足最后的气力,用颤抖的手,签了您一生中最后的“曾志”二字。

您以八十五岁高龄与癌魔搏斗了近三年,已经创造了奇迹,更何况在这三年中,您还指导参与了两本书的撰写,一本是写胡耀邦主政中组部的纪实,另一部是近五十万字的自传。就在您报病危的当天晚上,我与广东人民出版社签了出书协议。第二天,您瞬间回光返照,我赶紧将这消息相告。我知道,您是多么渴望能亲眼看到这两本书的出版!特别是前一本,这是因为您已将该书的版权赠给了中组部老干局,您希望那点稿费所得能够为从外地来京看病的老同志们做补贴之用。

亲爱的妈妈,您一生追求崇高,却又甘于平凡;您从轰轰烈烈开始,却又以平平淡淡结束;当年那灼灼锐气已变为如水般的平静;但惟独对自己的信仰和忠诚不曾有丝毫退色,对革命的热情不曾有丝毫减退。您对物质生活的淡泊与您对精神信仰的执著形成巨大反差。这,正是您品格上的最大特色。

静下来的时候,我有时也想,您会为我们买了一元钱的时令菜而大为生气,却将自己一生的积蓄捐给了社会;您一张面巾纸都要撕成四瓣用,却将自己著作的版权赠给了老干局;您几乎是刻意地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如此清苦,何必呢?可转而又想,您是对的,谁叫您是共产党员呢!对自己的信仰守身如玉,您是真正做到了!

妈妈,这几日来我总是感到不安,因为您的遗嘱我无法彻底执行,您太让我为难了!我可以做到没有挽联,没有花圈,没有



一九九九年清明节陶斯亮、理由摄于广州白云山松风石前。

灵堂，没有悼词，没有官方的仪式，不邀请新闻单位，不发通知，不打搅一线的领导同志……您的遗体已交医院做了解剖，您的一部分骨灰已撒到井冈山一棵树下做了肥料，您的辛苦钱也已交给了中组部老干局……但是，我如何能拒绝组织上对您做出评价呢？即使是一名普通百姓，也该有个生平啊！何况组织上对您的评价是如此中肯和恰如其分呢！我更是无法拒绝您的那些老战友们、曾经共事的同志们对您的那份感情，无法剥夺他们与您告别的权利。您火化那天，来了那么多的人，都是自发来的，那场面既简朴又感人。特别是当双目失明的蔡斯烈叔叔摸摸索索走过来时，一直强忍悲痛的我再也忍不住那倾泻的泪水。蔡叔叔用双手抚摸着小亮抱着的您的遗像，摸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将脸颊贴了上去，与您喃喃话别。此时，革命战友间的那种生死之谊，令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之震撼和动容！

妈妈，您知道吗？当您变成一缕青烟飘入高空时，我也感到从内心深处得到了某种净化。在我送给您的那只小小花圈上，我

写下了两行字："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是这样的，当您的躯体化为"零"的时候，却把"无限"留给了我们。

今天，我们在这块松风石下，埋下的是您和父亲混合了的骨灰，你们在分别二十九年后终于可以长相守了。这只骨灰盒，是您的外孙和外孙女为您买的，这上面的党徽是小毅为您剪贴上去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几个字，是孩子们合计了很久后写上去的，它表达了年轻一代对您的评价。

当一切结束后，这里就变得静悄悄的了，一如您所企望的那样。从此您留给我们的是一棵树和一块石。那树为井冈增添翠色，那石供游人们小憩，您将以新的生命形式与这个世界与我们同在。

该与您做最后的告别了，亲爱的妈妈，一路保重，我的爱会永远陪伴着您！

陶斯亮

一九九八年七月四日